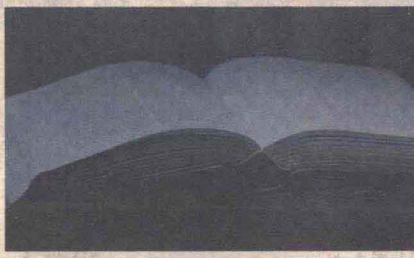
外教社
博学文库

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

An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Study of Lexical Motivation



赵 宏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
（项目编号10YJC740137）

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

An English-Chinese Contrastive Study of Lexical Motivation

赵 宏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赵宏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3384-0

Ⅰ. ①英… Ⅱ. ①赵… Ⅲ. ①英语—词汇—对比研究—汉语 Ⅳ. ①H313②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5210 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李健儿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889×124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55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6-3384-0 / H · 1765
定　　价：3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博学文库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姓　名	学　校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腊宝	苏州大学
王　蔷	北京师范大学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石　坚	四川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世生	清华大学
杨惠中	上海交通大学
何刚强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莲珍	浙江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陈建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黄源深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程朝翔	北京大学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戴炜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经营理念，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创新精神，多年来已推出各类学术图书600余种，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为广大优秀的博士人才提供广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外教社博学文库”。该文库遴选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遵循严格的“专家推荐、匿名评审、好中选优”的筛选流程，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等各个领域。该文库为开放系列，理论创新性强、材料科学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其问世必将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在相关的外语学习和研究领域提供又一宝贵的学术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序

理据问题是20世纪以来中西语言学碰撞、交火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国语言学的进程和命运。在几乎一个世纪里，中国语言学对“任意说”是彻底缴械投降的。因为“任意说”是索绪尔创建“现代语言学”所垒上的“第一块基石”，否认它，就等于否定了“现代语言学”；而接受它，就意味着与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对汉语汉字起源持“理据说”发生了根本的冲突。在两者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出于迫切跟西方“先进”的语言学“接轨”的心态，中国的语言学者始则被迫、继则不情不愿，最后却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意说”，而把载有“理据说”的《说文解字》等归为“文字研究”，与语言无关，一脚踢出了语言学殿堂，让自己埋头于“语言学”的沙堆里感到非常心安理得。

20世纪末西方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对索绪尔的“任意说”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其中的激进观点更采取了全面的“理据说”。随着认知语言学逐渐成为西方语言学的“主流”，这一观点既震撼了西方语言学界，更震撼了中国语言学界。中国语言学面临着从100年前的自我否定到今天“否定之否定”的180度转弯的艰难抉择，而其背后都是同样的“跟西方接轨”。在此情况下的中国语言学界出现了分化，出现了至少两大派，一派坚决维护百年来“现代语言学”的“任意说”，对一切质疑置之不理；另

一派则接受了新的语言学理论的观点，但又存在接受程度的不同。后一派中最温和的只把“理据”控制在复合词或复合概念内，这就被前一派指责为与“任意说”本无二致，只是标新立异。而且，在“理据”问题上，敢不敢纳进文字、特别是汉字因素，也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要把已被踢出去100年的文字再请回来，总让人有点羞羞答答。

因此对于理据问题的研究，实在有着太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涉及的是语言学的基础和根本，不同的选择将导致根本不同的语言研究方向和道路。这对于一个有志于研究语言学的人来说，挑战是很大的。赵宏的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确实体现了很大的学术勇气。这个勇气不仅有对自身的——即对自身学养和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学界的，因为它可能会提出对当代语言学研究“主流”的异见，从而在问世过程中遭到不理解和比选择其他题目要曲折和困难的道路。

这项研究最大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别单纯语言符号和合成语言符号，而把重点放在单纯语言符号上。这是理据研究上的一大进步。第二，对比英汉两种语言，分别分析了“理据说”和“任意说”在两种语言中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从而纠正了当代认知语言学的某些极端主张，同时也能使我们心平气和地评价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学的功过。第三，特别强调对中国传统语言学和传统语言理论资源的吸收。研究中的一些新观点也很有见地，如把英汉语引进外来语的不同方式归结为契合点的不同，又如指出单纯语言符号的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具有原生理据性质，是“人类语言和现实世界的接口”等。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对中国传统语言学资源和理论的发掘还不够深入，对外部理据的讨论也相对薄弱。这些都是今后可以加强的地方。

潘文国

2012年2月

前言

语言理据是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形成的理由和根据，也是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各种内外部因素之间的联系。对语言理据的看法反映了语言社团的语言观，是语言研究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同时也是语言哲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从英汉词汇系统理据现象、理据研究传统、理据类型、理据程度的异同入手，着力论证：(1)英语共时词汇系统的根本属性是任意性，汉语词汇则是一个理据性居主导地位的系统；(2)英汉语有诸多共同的理据机制，但理据类型和程度的不同也是导致英汉词汇系统诸多差异的根源之一；(3)理据是塑造词汇系统基本面貌的重要力量之一。

“理据”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是语言符号结构上的可分析性，也是语言符号生成发展的机制和动因；既是语言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种种关系，也是语言系统和各种自然、社会、人文因素之间的互动。因此，研究理据现象，不能仅将语言作为单一的、静态的、封闭的符号系统，还要看做多元的、动态的、开放的符号系统；不能仅将语言作为客体的、均质的、理想的对象进行研究，还要将语言作为主体的、复杂的、现实的对象进行研究；不能仅关注语言当前的状态，还要注意语言的历史、传统和发展；不能仅从西方理论的视角观察语言，还要从汉语事实和中国语

言研究传统出发观照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这就是说，语言理据的研究，必须跨越语言系统内外，兼顾共时历时视角，包容中学西学传统，融会科学人文方法。

西方语言思想和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对语言理据问题的看法历来大有不同。西方主流语言思想延续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语言是心灵的符号”这一观点，经由卢梭、黑格尔，至20世纪初由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发展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学说”。该理论体系在语言研究领域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将语言研究最终推入“科学”的轨道，为现代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任意性学说还成为20世纪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思想源泉之一，并进一步发展为“语言是存在的最后家园”[①]这一观点。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传统始终将语言理据问题作为主旋律。汉语研究发展了自成体系的“因声求义，以形求义”的方法，积累了《说文解字》、《释名》等一大批理据研究的卓越成果，创立了“右文说”、“声转”等系统的语言理论。传统汉语研究就是一部理据研究史。中西语言思想对语言理据问题不同观点的实质是：西方的“任意论”是“语言是心灵的符号”或“语言源自心灵”观点的自然延续和发展，至索绪尔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一个抽象的“心理实体”，排除“语言系统”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显示出比较强烈的唯心论倾向；而中国传统的“理据观”始终坚持发掘语言与自然实在的各种关系，探讨音义、形义间的联系，承认语言有现实和物质基础。

我们认为，语言理据是语言的形式及演变和各种内外部因素的联系。语言理据从共时角度可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从历时角度可分为原生理据和次生理据。内部理据关注语言系统各级符号意义与形式

① 此处的“语言”是西方意义上源自心灵的口头语言。

的关系；外部理据讨论语言系统所处的各种环境因素与语言形式的关系；原生理据反映人类先民认知现实世界，并将现实世界转化为语言的方式；而次生理据反映了语言社团利用原生符号创造其他语言符号的规律。本研究对英汉词汇理据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对词汇系统内部理据因素与理据关系的探讨，其中包括对(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合成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和外来语的理据性进行英汉对比研究；(2)对词汇系统和外部理据因素互动关系的探讨，主要针对经济理据和转隐喻理据这两种对英汉共时词汇系统影响较为显著的理据因素进行英汉语间的对比研究。

英汉词汇系统大致可分为(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词、合成词和外来语三个部分。英语单纯符号主要是(来源于古英语的)单音节词，汉语主要是独体字；英语合成符号主要是复合词和派生词，汉语主要是合体字和双音词；英语外来语主要是借词，汉语主要是写音外来语。

“单纯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但几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往往为人忽视，它们是：(1)排除了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的干扰；(2)将语言学的对象确立为音义结合的抽象心理实体；(3)忽略拟声词和感叹词。任意性理论是科学语言理论的完美典范，充满了理想化的魅力，是西方语言研究及思想传统两千多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如果我们以根植于西方思想传统和语言事实的任意性理论观照汉语汉字和中国传统语言思想，就不得不承认两者格格不入的事实。汉字在汉语系统中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不是“符号的符号”，故而不能被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语言符号[①]显然是人类历史和经验的积累，存在现实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完全来源于心灵；科学研究中被忽略的小量甚至痕量，

① 包括口头的语言符号和书面的语言符号。

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的研究表明，汉字在汉语系统和汉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文字应被视作语言符号的要素之一。英汉单纯语言符号都具有三元符号结构（语音、语形和语义），这一符号结构是文字文明时代具有普遍价值的语言符号结构理论。符号内部有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形式—意义关系同时发挥作用，形成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语音理据易随时空变迁磨损丧失；而文字理据具有“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稳定性。英汉语单纯符号均有残存的语音理据，而在文字理据方面则体现出很大的差别：英语单纯符号基本没有文字理据，汉语单纯符号有很高程度的文字理据。理据观和任意论是中西截然不同的语言观念，源自中西不同的语言事实和思想传统，二者的会通和整合必然能为语言研究带来更多启示。

“特性＋实体”的合成符号生成模式，是英汉合成符号共同的构成模式，同时也可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合成符号结构模式，反映了人类将简单语言符号组织成复杂语言符号的共同机制。这一模式使得合成符号语义较为透明，体现出较高水平的理据程度。外来语是典型的低理据性词汇。一种语言对外来语的吸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引进和同化。英语以语形为契合点引进借词，汉语以语音为契合点引进写音外来语。英汉语对外来语同化的实质，是语言核心机制对外来语这一异质成分进行筛选和改造的过程。英语对外来语的同化主要通过调整音义关系，使其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则；汉语对外来语的同化主要使写音外来语向形义结合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使写音外来语理据化的过程。

从英汉词汇的共时系统看，英语单纯符号理据性极低，汉语单纯符号则具有很高程度的理据性；英汉语合成符号具有共同的理据模式和相似的理据水平；而理据水平很低的外来语在英语中数量庞大，在汉语中则数量有限；故而**英语共时词汇系统整体的理据性较低，汉语词汇系统**

的理据程度很高。

经济理据和词汇系统的关系尤为密切，是词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和调节语言“开放性”的重要机制。经济原则对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语言社团要使用较为简约的方式表达概念，称为表达简约；(2)语言社团试图将词库规模控制在便于记忆和使用的范围，称为记忆简约。两者共同作用，相互平衡。英语理据性低，词化程度高；汉语理据性高，词化程度低。语言的开放性是经济机制作用的结果。英语任意性占绝对优势，对借词排斥很少，是“开放型”的语言；汉语理据性高，要求新词符合理据模式，对写音外来语排斥强烈，是“封闭型”语言。英汉语为满足其真正的需要而吸收外来语的能力则是同等的。转喻和隐喻思维是词义衍生的认知基础和驱动力量，有助于提高词的使用效率和表现力。英汉语中广泛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和转隐喻名名复合词是受转隐喻思维驱动的理据现象。核心概念词在意义衍生的初始阶段有较多共性，说明转隐喻思维有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共同特征。同时，转隐喻思维具有文化一致性，运作受到语言特点和文化环境的限制，故而英汉词汇的转隐喻理据也呈现出较大差异。

理据性是塑造词汇系统基本面貌的重要力量，语言符号的理据类型、理据程度和词汇系统的特征有直接联系，影响或决定了词汇系统的构成和规模、词汇发展的道路、构词法的类型、外来语吸收的方式和数量、词化程度、词库规模、转隐喻思维的运作等。理据性可以作为划分语言类型的标准之一，区别高理据性语言和低理据性语言。汉语是高理据性语言的典型代表，英语是低理据性语言，两者的词汇系统既有共性，也有因理据类型和程度不同造成的巨大差异。

本研究最初的准备工作起始于 2007 年协助恩师潘文国先生撰写《危机下的中文》的宝贵经历；其后思路在 2008～2011 年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不断发展明晰；2010 年底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的资助，论文有了进一步修改深化的机会；2012 年得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垂青，有幸忝列于“博学文库”之中。感谢我的恩师潘文国教授、邵志洪教授和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余毓国院长，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策划和责任编辑，感谢帮助过我的诸位师长、同门和同事，感谢本研究参考文献的作者，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无私支持永远是我幸福的源泉和前行的动力！

赵　宏

于白马寓所

2012 年 2 月 1 日

目录

序 …… xiii

前 言 …… xv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语言理据研究的意义 …… 2

1.1.1 理据现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 2

1.1.2 理据研究揭示语言的内在规律 …… 4

1.1.3 理据研究的理论意义 …… 6

1.1.4 理据研究的应用价值 …… 9

第二节 语言理据研究的方法 …… 11

1.2.1 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 11

1.2.2 内部与外部相结合 …… 12

1.2.3 中学与西学相结合 …… 13

1.2.4 人文与科学相结合 …… 15

第三节 本研究的概述 …… 16

1.3.1 本研究的选题 …… 16

1.3.1.1 词汇理据 …… 16

1.3.1.2 英汉对比 …… 17

1.3.2 本研究的结构 …… 19
第四节 小结 …… 22
第二章 语言理据研究的理论问题 …… 24
第一节 语言理据研究的历史 …… 24
2.1.1 宗教和神话中的语言理据观 …… 24
2.1.1.1 西方的“语言神授说” …… 24
2.1.1.2 汉民族的文字发生论 …… 26
2.1.2 “轴心时代”哲学研究反映的理据观 …… 27
2.1.2.1 古希腊时期的“自然论”与“约定论”之争 …… 28
2.1.2.2 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学” …… 31
2.1.3 古代语言研究中的理据观 …… 36
2.1.3.1 西方古代的语言理据研究 …… 36
2.1.3.2 中国古代的语言理据研究 …… 41
2.1.4 现当代语言理据研究 …… 49
2.1.4.1 语言哲学研究的理据观 …… 50
2.1.4.2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据观 …… 52
2.1.4.3 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理据观 …… 54
2.1.4.4 功能主义语言学的理据观 …… 55
2.1.4.5 认知语言学的理据观 …… 56
2.1.4.6 中国现当代的语言理据研究 …… 58
第二节 与理据相关的一些概念 …… 63
2.2.1 任意性与理据性 …… 63
2.2.1.1 现代语言学的“任意性”概念 …… 64
2.2.1.2 任意性与理据性的关系 …… 66
2.2.2 象似性与理据性 …… 72
2.2.2.1 语言象似性研究的现状 …… 73
2.2.2.2 语言符号象似性的概念 …… 77
2.2.2.3 象似性与理据性的关系 …… 81
2.2.3 内部形式与理据性 …… 83

2.2.3.1 “内部形式”与“内在语言形式” …… 83
2.2.3.2 内部形式与理据性的关系 …… 87
2.2.4 语义透明度与理据性 …… 89
第三节 理据的定义和类型 …… 91
2.3.1 理据的定义 …… 91
2.3.1.1 从语言系统内部入手定义理据 …… 91
2.3.1.2 超越“语言系统”的理据定义 …… 93
2.3.1.3 理据定义的再思考 …… 96
2.3.2 理据的类型 …… 103
2.3.2.1 前人对理据类型的研究 …… 103
2.3.2.2 本研究对词汇理据的分类 …… 107
第四节 小结 …… 113

第三章 词汇与理据性 …… 116

第一节 词的概念 …… 116
3.1.1 词和西方语言 …… 116
3.1.2 汉语的“词” …… 117
3.1.2.1 字和词 …… 118
3.1.2.2 词和语 …… 120
第二节 英汉语的词汇系统 …… 122
3.2.1 英汉词汇系统的发展：原生词和派生词 …… 122
3.2.2 英汉词汇系统的构成：单纯词和合成词 …… 126
3.2.2.1 英语的单纯词与合成词 …… 126
3.2.2.2 汉语的单纯词与合成词 …… 127
第三节 词汇和理据 …… 131
第四节 小结 …… 132

第四章 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理据性对比研究 …… 135

第一节 文字对语言的能动作用——以汉语汉字为例 …… 135
4.1.1 汉字的来源和特点 …… 136
4.1.1.1 汉字的来源 …… 136

4.1.1.2 汉字的特点 …… 140
4.1.2 汉字对汉语的能动作用 …… 148
4.1.2.1 共时层面上汉字对汉语的能动性 …… 149
4.1.2.2 历时层面上汉字对汉语的能动性 …… 151
4.1.2.3 从认知科学看汉字对汉语的能动性 …… 153
4.1.2.4 从汉语研究传统看汉字的重要性 …… 154
4.1.2.5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之反思 …… 156
第二节 单纯语言符号的结构 …… 159
4.2.1 单纯语言符号的二元结构观 …… 159
4.2.2 单纯语言符号的三元结构观 …… 161
4.2.3 单纯语言符号三元结构模式的普遍价值 …… 164
第三节 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 …… 166
4.3.1 英汉语音理据对比 …… 167
4.3.1.1 英汉语的拟声词 …… 167
4.3.1.2 英汉语的语音象征 …… 168
4.3.1.3 英汉语音理据的程度 …… 170
4.3.2 英汉文字理据对比 …… 171
4.3.3 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 172
第四节 理据观和任意论：中西不同的主流语言观 …… 173
4.4.1 任意论及其限制条件 …… 174
4.4.1.1 完美的任意性理论 …… 174
4.4.1.2 索绪尔任意性理论的限制条件 …… 177
4.4.2 任意论和理据观不同的语言哲学取向 …… 178
4.4.2.1 任意论拒斥意义和现实的倾向 …… 178
4.4.2.2 理据观与意义、现实的紧密联系 …… 180
4.4.3 任意论和理据观的不同研究路径 …… 182
4.4.3.1 任意论的科学方法 …… 182
4.4.3.2 理据观的人文路线和经验方法 …… 184
4.4.4 中西语言观念的会通与整合 …… 186
第五节 小结 …… 187

第五章　英汉合成语言符号理据性对比研究 …… 189
第一节　英语复合词和派生词的理据性 …… 189
5.1.1　英语复合词的理据性 …… 189
5.1.1.1　英语复合词的形式 …… 190
5.1.1.2　英语复合词的构成 …… 191
5.1.2　英语派生词的理据性 …… 193
5.1.2.1　英语派生词的形式 …… 193
5.1.2.2　英语派生词的构成 …… 196
第二节　汉语合体字和双音词的理据性 …… 197
5.2.1　汉语合体字的理据性 …… 198
5.2.1.1　会意字的理据性 …… 198
5.2.1.2　形声字的理据性 …… 199
5.2.1.3　合体字的音韵理据 …… 206
5.2.2　汉语双音词的理据性 …… 207
5.2.2.1　汉语双音词地位的确立 …… 207
5.2.2.2　汉语双音词的构成 …… 211
第三节　英汉语合成符号构造的共性特征 …… 212
5.3.1　英汉语合成符号的共同构造 …… 212
5.3.2　英汉语合成符号结构式共性的原因 …… 214
第四节　小结 …… 216

第六章　英汉外来语及理据性对比研究 …… 218

第一节　英汉外来语概况 …… 219
6.1.1　英语外来语概况 …… 219
6.1.1.1　英语外来语的数量 …… 219
6.1.1.2　英语外来语的来源 …… 220
6.1.2　汉语外来语概况 …… 222
6.1.2.1　汉语外来语的历史 …… 222
6.1.2.2　汉语外来语的范围 …… 223
6.1.2.3　汉语外来语的数量和来源 …… 227
第二节　英汉语对外来语的引进 …… 228

6.2.1 英语引进外来语的方式——“借贷” …… 228
6.2.2 汉语引进外来语的方式——“转写” …… 229
6.2.3 英汉引进外来语的共同机制及其理据 …… 231
第三节 英汉语对外来语的同化 …… 233
6.3.1 英语同化外来语的机制 …… 233
6.3.2 汉语同化外来语的机制 …… 235
6.3.2.1 汉语对纯写音外来语的排斥和淘汰 …… 235
6.3.2.2 在纯写音外来语上添加或更换表义的构字部件 …… 237
6.3.2.3 汉语外来语写音成分的“字化” …… 239
6.3.2.4 写音外来语的韵律化 …… 240
6.3.3 英汉外来语同化的理据 …… 241
第四节 小结 …… 244

第七章 英汉词汇的经济理据 …… 248

第一节 语言的经济性 …… 248
7.1.1 语言经济原则概述 …… 248
7.1.2 经济理据与英汉词汇系统 …… 251
第二节 英汉词化现象对比研究 …… 253
7.2.1 词库 …… 253
7.2.2 词化 …… 255
7.2.2.1 词化的概念 …… 255
7.2.2.2 词化程度的判断标准 …… 257
7.2.2.3 表达简约与记忆简约的互动 …… 261
7.2.3 表达简约的作用 …… 263
7.2.3.1 词项词化程度的提高 …… 263
7.2.3.2 词库规模的扩大 …… 264
7.2.4 记忆简约的作用 …… 265
7.2.4.1 词化手段的低词化程度倾向 …… 265
7.2.4.2 有效控制词库规模 …… 269
第三节 英汉语的开放性与经济原则 …… 272
7.3.1 英汉语的“开放性” …… 272

7.3.1.1 英语的“开放性” …… 272
7.3.1.2 汉语的“开放性” …… 273
7.3.2 英汉语的“开放性”与理据性 …… 274
7.3.2.1 英语的理据性与“开放性” …… 275
7.3.2.2 汉语的理据性与“开放性” …… 277
7.3.3 经济原则视角下的语言开放性 …… 277
第四节 小结 …… 279

第八章 英汉词汇的转隐喻理据 …… 281

第一节 隐喻研究的认知视角 …… 281
8.1.1 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 …… 281
8.1.2 隐喻的认知机制 …… 283
8.1.2.1 概念隐喻理论 …… 283
8.1.2.2 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 …… 284
8.1.3 转喻和隐喻的关系 …… 287
8.1.3.1 转喻是隐喻的基础 …… 287
8.1.3.2 转喻和隐喻构成一个连续体 …… 288
第二节 英汉“一词多义”现象的转隐喻理据 …… 289
8.2.1 一词多义现象 …… 289
8.2.2 一词多义的转隐喻理据 …… 292
8.2.3 英汉一词多义隐转喻理据的共性和差异：以 air 和“气”为例 …… 293
8.2.3.1 air 的一词多义现象 …… 294
8.2.3.2 “气”的一词多义现象 …… 296
8.2.3.3 air 和“气”一词多义转隐喻理据的共同特征 …… 298
8.2.3.4 air 和“气”一词多义转隐喻理据的差异 …… 299
第三节 英汉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 …… 300
8.3.1 英汉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类型 …… 301
8.3.1.1 半喻式名名复合词 …… 302
8.3.1.2 全喻式名名复合词 …… 303
8.3.1.3 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 …… 305

8.3.2 英汉名名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认知解释 …… 306
8.3.2.1 认知参照点模型 …… 307
8.3.2.2 框架语义学视角 …… 308
8.3.2.3 棱柱形模式 …… 309
8.3.2.4 认知理论对英汉名名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解释力 … 310
8.3.3 英汉文化和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 …… 311
第四节 小结 …… 313

第九章 结论 …… 315

参考文献 …… 324

1. 期刊论文 …… 324
2. 论文集析出论文及其他论文 …… 329
3. 专著 …… 335
4. 论文集 …… 344
5. 工具书 …… 346
6. 学位论文 …… 347
7. 网络资源 …… 347

图表目录

图表 1.1　索绪尔对语言学对象“同质化”的过程 …… 6

图表 2.1　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模式 …… 44
图表 2.2　语言理据和洪堡特定义的“内在语言形式” …… 88
图表 2.3　语言理据和布达哥夫、王艾录定义的“内部形式” …… 89
图表 2.4　王艾录、司富珍提出的汉语语词的结构 …… 104
图表 2.5　王艾录、司富珍对汉语语词理据的分类 …… 104
图表 2.6　严辰松对语言理据的分类 …… 105
图表 2.7　东巴文中的“爱”字 …… 111
图表 2.8　东巴文字举例 …… 111

图表 3.1　英语词汇的发展 …… 123
图表 3.2　英语最常用 10 000 词的来源构成 …… 124
图表 3.3　汉语词汇的发展 …… 125
图表 3.4　字化现象 …… 130

图表 4.1　八卦和数字 …… 137
图表 4.2　从彩陶图画到早期汉字 …… 139
图表 4.3　现代汉字的图画痕迹 …… 140
图表 4.4　汉语象形字举例 …… 145
图表 4.5　汉语指事字举例 …… 145
图表 4.6　印欧语言文关系 …… 146
图表 4.7　汉语言文关系 …… 146
图表 4.8　二简字的同音合并 …… 153
图表 4.9　A 的演进 …… 165
图表 4.10　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理据类型和程度对比表 …… 173

图表 5.1　英语复合词和自由短语的界限 …… 191
图表 5.2　英语复合词的构成 …… 192
图表 5.3　表示基本概念的英语词素 …… 194
图表 5.4　含有词根 mit/mis 的英语派生词 …… 195
图表 5.5　英语派生词的构成 …… 196
图表 5.6　汉语形声字的构成 …… 202
图表 5.7　汉语形声字法 …… 204
图表 5.8　高度词化的形声字体系 …… 205
图表 5.9　上古文献双音词使用情况 …… 208
图表 5.10　中古时期双音词使用情况 …… 208
图表 5.11　《普通话 3 000 常用词表》单双音节比重统计表 …… 209
图表 5.12　汉语双音词的构成 …… 211
图表 5.13　英汉合成语言符号典型结构式 AN …… 214
图表 5.14　Pickpocket 的结构式 …… 215

图表 6.1　英语表示同一概念而来源不同的词 …… 220
图表 6.2　英语外来词的来源构成 …… 221
图表 6.3　汉语外来语结构分类表 …… 224
图表 6.4　汉语外来语的写音和写义 …… 225
图表 6.5　提示外来语意义的写音汉字 …… 230
图表 6.6　寓意美好的写音汉字 …… 230
图表 6.7　写音外来语的表意成分 …… 230
图表 6.8　英语符号的音、形、义关系 …… 231
图表 6.9　汉语符号的音、形、义关系 …… 232
图表 6.10　汉语对纯写音外来语的淘汰 …… 236
图表 6.11　纯写音汉字表义部件的添加或更换 …… 238
图表 6.12　写音外来语的字化 …… 240
图表 6.13　写音外来语的韵律化 …… 241
图表 6.14　英语吸收借词的模式 …… 242
图表 6.15　汉语吸收写音外来语的模式 …… 242
图表 6.16　英汉外来语对比表 …… 246

图表 6.17　英汉共时词汇系统理据性对比表 …… 247

图表 7.1　汉语离合词 …… 258
图表 7.2　英汉基本概念词 …… 260
图表 7.3　英语词化类型 …… 264
图表 7.4　汉语双音词词化举例 …… 264

图表 8.1　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机制的解释 …… 286
图表 8.2　从转喻到隐喻的连续体 …… 289
图表 8.3　词义衍生的辐射方式 …… 290
图表 8.4　词义衍生的连锁方式 …… 291
图表 8.5　辐射方式与连锁方式的交互作用 …… 291
图表 8.6　ring 的意义网络 …… 291
图表 8.7　head 词义扩展的认知思维模式 …… 293
图表 8.8　air(空气)的一词多义现象 …… 295
图表 8.9　“气”的一词多义现象 …… 297
图表 8.10　英汉半喻式名名复合词 …… 302
图表 8.11　英汉全喻式名名复合词 …… 304
图表 8.12　英汉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 …… 306
图表 8.13　认知参照活动模型 …… 307
图表 8.14　“爪牙”识解的认知参照活动 …… 308
图表 8.15　“鳌山”识解的认知参照活动 …… 308
图表 8.16　名名复合词识解的框架复合模式 …… 309
图表 8.17　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棱柱形模式 …… 310
图表 8.18　“耳房”识解的棱柱形模式 …… 310

第一章

导　论

名称有什么关系呢?
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没有令人厌恶的粗粝还不成,
要让声音听来像意义的回声。

——亚历山大·蒲柏《论批评》

朱丽叶借玫瑰向罗密欧倾吐心声,无论他姓甚名谁,都是她深爱的人;而蒲柏则要让诗行朗朗,成为情感和意义的回声。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可谓众说纷纭,上面所引的几句诗行,只是相关讨论中的沧海一粟。人类对于语言形式与意义、现实、思维之关系的探究,开始于文明的早期,并始终是哲学界、语言学界、文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本研究所探讨的理据问题,就是这悠久传统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再次提起理据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进行新的阐释,既是为了重温先哲思想的光芒,更是为了结合现当代语言学迅猛发展的新语境以及中西语言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

第一节　语言理据研究的意义

1.1.1　理据现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语言是一个系统，各个成分彼此互有联系、相互依存，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语言系统之内的。每一个语言符号的存在都以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存在为前提，每一个符号的价值也都是由它与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关系定义的。Taylor (2004)[①]指出，理据就是一个语言结构同系统内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看，语言理据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例如，古汉语系统中“手”、“足”分指人类上肢和下肢的末端，“手”这个符号的价值就是与“足”相区别(因手、足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大不相同，试比较：狗的前肢和后肢未在汉语中形成高词化程度的表达形式)，两者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而“手足”一词又建立在“手”、“足”这两个符号存在的基础上，作为四肢的总称而存在，如“手足无措”；再进一步，“手足”又因其非常重要，转而指兄弟(姐妹)的血肉亲情，如“兄弟如手足”、“手足情深”。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语言符号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都是有理可据的。类似的现象在各种语言中都能找到很多例子。Taylor (2004：57－58)[②]指出，“一种语言中所有的结构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据性……没有任何理据性的结构和该语言中的任何成分都没有联系，故而往往不被视作该语言的组成部分。”对普遍的，特别是跨语言的理据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揭示语言运作的机制和奥秘，其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个别语言的特征和规律，更能为语言的类型研究乃至整个普通语

---

① Taylor, John R. 2004. The Ecology of Constructions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49－73.

② 出处同上。

言学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

每一种语言，都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语言，参与塑造其基本面貌，成为理据因素。人类的语言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例如，对生活在寒带地区的爱斯基摩人来说，雪是直接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在爱斯基摩人的词汇中，找不到相当于汉语“雪”这样的通称，却有十多种关于雪的专名；而主要生活在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语言中关于沙漠和骆驼的词汇就异常丰富。一种语言周围的各种人文社会因素，更对其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古代中国，马不仅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更是彰显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人们对马匹从形体、个头、毛色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区分，仅《尔雅》就列出了数十个马的专名，如“骊”指“纯黑色的马”、“骢”指“青白色的马”；《说文解字》的“马部”有 115 个和马有关的字，分别表示各种年龄、身高、体态、颜色的马，以及和马有关的各种概念。当今社会，马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古代那些专指各种不同品种、毛色的马的词汇，也几乎绝迹于现代汉语了。又如，英国历史上曾经屡次遭受异族的入侵，而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征服都带来了语言上的巨大变化：公元 5 世纪中叶，生活在西北欧的日耳曼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赶走了原来居住在岛上的凯尔特人，为英语打下了日耳曼语的根基；公元 9 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规模入侵又给英语带来了大量斯堪的纳维亚语词汇（如古诺斯语，Old Norse）；公元 11 世纪的诺曼征服使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英语词汇形成了突出的罗曼语特点，而在 16、17 世纪这两百年间，影响遍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重新发现了西方古代文明的价值，大量的希腊语、拉丁语词汇也由此进入英语。英语在 1 500 年的短短历史上，屈折形式不断简化消失，由繁复的综合语演变为简单的分析语，这种类型上的改变同英语历史上与异族语言多次大规模的接触融合不无关系。中国 20 世纪初发生的“白话文运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乃至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面貌，是汉语社团对当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应对。语言是人类赖以交流思想、传达感情、记载历史、书写文明的媒介，影响语言和塑造语言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形成

异常复杂的局面。语言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各种内外部因素都会成为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背后的理据。将语言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联系起来的理据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语言和历史、文化、社会、认知的种种复杂关系，使语言研究更好地服务现实。

1.1.2 理据研究揭示语言的内在规律

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据既指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非任意关系，也指语言结构与激发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对语言系统和语言结构进行精密细致的分类和描写，回答了“语言是什么”这一问题，探讨语言现象的理据，则会使我们了解“语言何以如此”，揭示语言现象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语言发展的趋势。着眼于语言形式的研究关注语言表层的结构，而语言理据研究的重点则在语言内部的机制，对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的规律进行解释。从这一意义来说，语言理据研究就是要探索和揭示语言的内在规律，解释语言编码的机制。徐通锵(1997：37)[①]指出理据研究是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

> 语言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弄清楚编码的理据。为什么？因为理据是现实规则的反映，是语言规则的语义基础，一种语言的理据表现在哪一个层次，那个层次就会成为这一语言的研究重点。

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理据就是语言内在机制的一部分，是参与塑造语言面貌的基本力量之一。王艾录、司富珍(2002：1)[②]开宗明义地说“理据是语言生命的基因”。这一观点将理据看做语言内在规律本身，而语言研究的核心所在，就是要进行理据研究，解读语言的基因图谱。正如同基因决定自然界生物的种种体征和习性一样，理据决定语言的面貌和特点。

---

① 徐通锵，1997，《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p.37。

②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1。

这里我们仅举一例说明作为语言内在规律的理据与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大规模地接触、引进异族语言文化，如汉代和西域文化的广泛接触、唐代大规模引进佛教文化、元代蒙古文化和清代满族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流、晚清至五四期间对西方文化全面的引进和推广，形成了数次和异族文化交往并引进外来语的高峰（参见赵爱武，2005）①。然而，现代汉语外来语的总数却十分有限。钟吉娅（2003：38）②对《汉语外来词词典》③所收录的全部外来语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排除了异形词因素之后仅得到 7 971 个外来语。一般学者认为汉语中的外来语总数约为一万个，与英语、日语拥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外来语相比，数量相差悬殊。事实上，曾经进入汉语的外来语数量是极其庞大的。钟吉娅（2003：7）④说，“佛经有裨于汉语极多，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 000个词”；而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文化浪潮中，进入汉语的外来语何止成千上万。汉语中外来语数量少，不是引进的少，而是淘汰的多。数量巨大的外来语如“戈栗拉”（gorilla）、“板克”（bank）、“伯理玺天德”（president）、“苦迭打”（coup d'état）、“葛郎玛”（grammar）、“梵婀玲”（violin）等均未能保留在当代汉语中。汉语对外来语表现出的强烈排斥倾向，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汉字顽强的表意性在汉语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它要求组成汉语语词的字在一般情况下能够起到提示语词意义的作用，形成了汉语社团强烈的“望文生义”的语言心理。但是，进入汉语的外来语往往把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使用，忽视汉字“义”的因素，与汉字的表意性产生了冲突。我们可以看到，遭到汉语社团淘汰的外来语，绝大多数是这种冲突的典型，它们在满足了一时之需后，就逐渐被符合汉语内在规律的表达方式所替代。

汉字的表意性原则是汉语十分重要的内在规律，它除了造成汉语排

① 赵爱武，2005，从外来语引进之三大高峰看其特征[J]，《语言与翻译（汉文）》(1)：45－49。

② 钟吉娅，2003，《汉语外源词——基于语料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38。

③ 刘正埮、高名凯等，1984，《汉语外来词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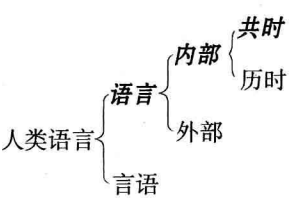
④ 钟吉娅，2003，《汉语外源词——基于语料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7。

斥外来语的倾向，还使汉语形成了其他鲜明的语言特征，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研究语言理据，无疑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类似的语言规律，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语言的种种表象。

1.1.3 理据研究的理论意义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语言研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隶属于人文研究：它曾经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是逻辑学研究的一部分，是文献考订的一部分，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20 世纪初，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语言学大师、“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用层层二分的方法明确了语言学的对象和任务，把语言的符号系统，即由符号间的差异构成的对立价值作为语言研究的唯一对象，获得了高度同质化并且极具确定性的研究客体，使语言研究摆脱了人文研究的传统道路，驶进了科学的轨道，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创立了“现代语言学”。下图是索绪尔通过二分法得到的语言学研究对象：



图表 1.1 索绪尔对语言学对象“同质化”的过程

（黑斜体的部分是同质的语言学对象，参见王骏，2006：13）①

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内部与外部、共时与历时的区分影响深远，决定了其后一个世纪语言研究的基本走向。此后，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究共时的内部语言系统的规律。一百年间，语言学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一路高歌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① 王骏，2006，科学主义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J]，《中国外语》(1)：11－16。

现代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路线并不意味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文语言研究传统毫无价值。申小龙(2005：10)[①]指出“索绪尔的排除不是出于轻视，而是出于同质性研究方法的需要”。语言是一个有着复杂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的实体，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不能解决所有的语言问题。王骏(2006：15)[②]表明“单纯依靠科学化的道路不能够解决人们希望语言学解决的一切问题。语言的人文属性使我们很难依靠一些通过归纳或演绎论证所取得的科学规律来概括全部的语言事实”。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从各种角度和侧面研究语言，各种“带连字符”的语言学蓬勃发展起来，如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而理论语言学自身在发展了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这两个立足于语言系统内部研究的学派之后，也出现了功能主义和认知语法这样以交际和认知等外部因素为切入点的流派。可以说，索绪尔开创的科学主义语言研究传统和古典的人文主义语言研究传统在独立发展的同时又不断碰撞、交叉、取长补短，为当代语言研究注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活力。

语言理据的研究，正是连接语言内部和外部、共时和历时的桥梁。语言的理据因素，包括了语言系统内部单纯语言符号的绝对价值，也包括了构成合成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还包括了从系统外部影响和作用于语言的种种自然、社会和人文因素。索绪尔区分语言的内部与外部，将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割裂开来。而语言理据的研究，不仅要为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找到语言内部的解释，也要探讨其外部的根源，揭示人类语言世界如何与外在于我们的自然世界以及内在于我们的思维世界形成互动。同时，语言理据研究将语言看成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产物。我们能在今天所使用的语言中随处找到古诗古文、成语典故，这说明语言始终是一个沿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吐纳、不断积累的体系。语言理据的研究既涉及语言的共时状态，同时也必然追溯语言结构甚至语言本身形成的早期情形。王艾录、司富珍(2002：33)[③]在讨论语词理据时说，

① 申小龙，2005，语言的人文功能与索绪尔的语言学自律[J]，《北方论坛》(1)：8－15。

② 王骏，2006，科学主义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J]，《中国外语》(1)：11－16。

③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33。

“从语词理据发展的历史线索的古今两头看，一头联系着古代语根语源，一头联系着现代合成符号的内部形式，这一历史线索可以为语词理据的研究提供根本依据”。理据研究对语言理论的贡献，就在于其沟通、联系现代语言学的科学主义精神和古典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当前科学主义影响仍然占据语言学领域绝对优势的局面下，在坚持语言研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同时重视各种外部的、历时的因素对语言系统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脱离了社会、人文因素的语言学，是精确缜密的推理，是客观确凿的演绎，虽然能够自圆其说，但却难以独善其身。语言不只是一个共时的内部系统，而且始终是人的官能，记录人的历史，书写人的文明。结合科学传统和人文传统的语言理据研究，必然能卓有成效地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

理据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源远流长的汉语研究传统，为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作出汉语独特的贡献。任何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之处才称得上“特点”，而汉语真正有价值的特点是其迥异于印欧语的方面。但是，目前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主流是西方语言学，主要建立在印欧系语言的基础上，汉语的特点和价值也就自然而然地排除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之外，形成中国语言学者大声疾呼要挖掘汉语特点，而挖掘出的特点又不被理论语言学接纳的悖论。例如，索绪尔虽然认为汉字对于汉人来说具有“第二语言”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口头的语言，把文字排除在外，汉字的语言学价值始终难以得到语言学界的承认。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由印欧系语言研究和非印欧系语言研究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于西方的语言研究传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真正的价值尚未被语言研究者认识。

汉语就是这样一种有着悠久的研究传统和巨大理论价值的语言。传统的汉语研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以训诂学为中心、以文字学和音韵学为两翼的格局，发展了“因声求义”和“以形求义”的研究路径，其研究的核心之一就是语言和文字的理据问题。这是汉语和汉文化贡献给语言学的一笔宝贵财富。如何继承这笔理据研究的财富，并以此为基点推动语言理论的发展，是摆在中国语言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让我

们再回到汉字的例子——如果汉字对汉语和汉文化的能动作用是确信无疑的，那么我们解决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之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依据事实修正理论。对汉语理据研究传统进行深入的挖掘，对汉语理据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将会对理论语言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独特的、有价值的贡献。

1.1.4 理据研究的应用价值

语言理据研究不仅关注抽象的、同质的语言系统，也关注实际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实践；语言理据研究不仅有理论价值，也有应用价值。

语言理据的应用首先体现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例如，人们对事物的命名往往特别关注，命名的理据在人名、地名、商品名、机构名等重要名称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成为颇有意趣的文化现象。如将冰雪覆盖的格陵兰岛称为 Greenland，寄托了人们美好的希望；苏州城中的知名饭店“得月楼”则得名于诗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别有一番风雅在其中。17 世纪英国作家 John Bunyan 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和曹雪芹《红楼梦》人物命名匠心独运，故事中每个人名都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 Passion（热切）、Simple（单纯）、卜世仁(不是人)、贾雨村(假语村言)等。对语言理据的合理运用往往能创造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增强语言的审美价值。譬如，语音象征常被作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学手段，在诗歌中频繁使用。诗人 Clinton Scollard 在一首题为 *A Rain Song* 的诗中写道：

[1.1] With its little patter, patter,
And its tiny clatter, clatter,
And its silvery spatter, spatter

诗句反复运用理据性强的拟声词描绘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为诗歌创造了音乐般的音响效果。南宋女诗人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则用一系列发音短促单薄的叠音烘托出了作者饱经离乱、苦楚悲哀的心境。目前文学语言的象似性研究已经受到文学界和语言学界

诸多学者的关注，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并出版了一定数量的论文集和专著。汉字的理据性还成为不少文字游戏和字谜的素材，这是汉语中独有的理据现象。相传刘统勋和和珅相互斗气写下的对联就充分利用了汉字的理据性："有水念溪，无水也念奚，单奚落鸟变为鸡，得意的狐狸欢如虎，落坡的凤凰不如鸡"（刘统勋）；"有水念湘，无水也念相，雨打相上便为霜，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和珅）。语言理据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语言生活的一部分，对理据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享受语言的乐趣。

语言理据的应用还体现在语言的学习和教学中。理据能揭示语言符号的组织规律，而规律性的学习内容比杂乱无章的内容更容易掌握。海曼（1985/2009：D20）[①]表示，象似的记号（即有理据的记号）比任意的记号更容易学习和记忆。Lakoff（1987：539）[②]也指出，理据程度高的语言更易于记忆和掌握，语法系统的理据程度可以衡量其表达概念的认知效率。不论英语还是汉语，若能在语言学习和教学活动中充分利用理据研究的成果，都能显著提高学习的效率。例如，在英语词汇教学中适当安排词根、词缀的讲解，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词义，还能促进整体的词汇习得。此外在语言教学中，依据理据原则合理编排教学内容能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这在理据性强的语言如汉语中尤其突出。吕必松（2010：41）[③]表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果依照汉字的理据性合理安排教学，充分考虑汉语字、词的系统性，可使零起点的外国学生用一年时间（720 课时）基本达到听、说、读、写全面过关，大大提高教学效率。

对语言理据的深入理解还能促进翻译实践等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不只是语言符号的简单对等，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

---

①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 D20.

②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39.

③ 吕必松，2010，汉语教学为什么要从汉字入手？[A]，潘文国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8》[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31－41。

翻译的过程中，如果能将语言结构背后的理据一并传达，则往往意趣横生，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反之，则会产生莫名其妙的译文和啼笑皆非的传播效果。例如，始建于南宋时期的苏州名园网师园，本有花园称为“渔隐”，蕴含着浓郁的隐逸气息。清代乾隆年间重建，定名“网师园”。网师意即渔夫、渔翁，与园林所在巷名“王四”（一说王思巷）谐音，又与旧时园名“渔隐”同义，“网师园”意谓“渔父钓叟之园”，含有隐居江湖的意思。该园名英译为 Master-of-Nets Garden，可谓字字对等，然而既未译出“网师”二字“渔翁”的字面意义，也未译出园名背后中国文人渴求“归隐山林”的隐逸之志，让人看了颇为迷惑。所以，在进行译介活动时，如何能将语言结构背后的理据一并传译，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需要对理据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语言理据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在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转换中，又往往成为翻译的限度，造成诸多不可译现象。具有中国特色的诸多文字游戏利用了汉字结构的理据特征，就基本无法用西方语言表达。

总而言之，语言理据和人们的语言生活、语言实践紧密相连，对理据现象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魅力，促进语言实践的开展。

第二节　语言理据研究的方法

语言理据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各种语言中，并且涉及语言系统内的各个层面和语言系统外的多种因素，是比较复杂的语言现象。在开展研究前，我们有必要对本研究将要采用的方法做一番梳理。

1.2.1　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语言既是共时的系统，又是历时的产物；语言中的理据现象，也同时

包含了共时理据和历时理据。研究共时理据，主要侧重从语言符号、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考查；研究历时理据，则主要从历史角度入手，侧重语言结构的演变和发展。然而，共时和历时的因素同时作用于语言，语言的共时面貌是历时发展的结果，而语言历时的发展又受到共时因素的制约。历史悠久的语言多有为数不少的成语、习语流传至今，成为语言共时系统的重要部分，但要了解掌握这些成语和习语的用法，恐怕离不开对其历时理据的追溯。我们仅举英语中的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1.2] I was *all in all* then to him, or would he have given up his fortune, his family, as he nobly did to make me happy?

—— W. Thackeray, *Vanity Fair*

[1.3] The short way would have been ... to have requested him immediately to quit the house; or, as Mr. Gann said, "to *give him the sack* at once."

—— W. Thackeray, *A Shabby Genteel Story*

上面的两个短语"all in all"和"give the sack"都是当代英语的常用短语。前者出自《圣经·哥林多前书》[①]，指像上帝一样重要的人或事；后者则出自16～17世纪的欧洲，当时作坊或工厂的雇工需要自备劳动所需的工具，这些工具装在一个工具袋(即sack)中，寄放在工作的地方。如果雇主要解雇某个工人，就把他的工具袋还给这个人，"give the sack"就发展了类似汉语"叫某人卷铺盖走人"的意思。这两个短语既由共时层面的组合关系构成，又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类似的语言现象在各种语言中都大量存在。我们研究语言理据，可以分别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探讨，但必然不能完全割裂这两者的联系。

1.2.2 内部与外部相结合

人类语言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系统，但这个系统不是封闭静止的，系

① 见华泉坤等，2001，《英语典故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p. 14。

统内的语言结构不断与外界的各种自然、社会、人文因素互动。同时语言是人的官能，必然受到人的生理机能和认知思维等因素的影响。在探讨语言的理据问题时，只有将语内因素和语外因素综合考虑，才能对某些语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例如，在男女社会和经济地位差异较大的日本，男性和女性所使用的语言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形成女性专用的“女らしさ”（女性语）。日本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之间的差异之大，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性别方言的文体和风格差异，已经成为一种规范。即使是在书面的人物对话中，作者即使不标明哪一句话是谁说的，读者也能正确地判断说话人的性别（参见戴昭铭，1996：258－259）[①]。又如，杨琳（1996：178－209）[②]提出，汉语词汇的主体由单音节发展为双音节，源于汉语社团喜欢骈偶对称的审美心理，指出“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对成双作对的现象有着比其他民族更为强烈的崇尚和追求，以偶俪对称为美的观念可以说是已成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这一看法颇有道理。再如，英语表示“烤”这种烹调方式有 bake（在烤炉或烤箱内烤）、roast（在火上烤干）、grill（直接加热烤制）、baste（边浇油边烤）、barbecue（在户外将食品放在炉架上烤）等，这是由于日耳曼民族比较多地使用烤的方式烹饪食物。这种生活习惯的影响折射到英语中，才使得英语发展了一系列词汇表示“烤”这一概念。以上列举的种种语言现象，仅在语言系统内部探究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将语言的内部世界同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完全割裂两者关系的研究则具有先天的局限性。

1.2.3 中学与西学相结合

传统汉语研究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且对语言理据问题非常重

① 戴昭铭，1996，《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pp. 258－259。
② 杨琳，1996，《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pp. 178－209。

视，形成了“因声求义”、“以形求义”的语言研究传统，实际上就是探讨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公元 2 世纪初，我国就诞生了系统探讨语言形义关系和音义关系的专著《说文解字》、《尔雅》和《释名》，这些著作即使在今天的汉语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后，我国的传统语言文字研究逐步走上了形、音、义相结合的道路，发展了被陈寅恪（1986：183）[①]称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的“右文说”，到清代时达到了顶峰。段玉裁（1815/2006）[②]认为“音生于义，义箸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古代学者对汉语形义关系和音义关系的重视。汉语丰富的理据研究传统是语言学的一笔宝贵财富。但是，在中国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之后，我国古老的语言研究传统被冠以“语文学”之名，成为“前科学”甚至“非科学”，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被排斥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外，不少还受到了批判。由于西方语言自身理据性相对较弱，西方语言学者对理据问题的关注不及传统汉语研究。在当前西方语言理论占据语言学领域绝对强势地位的局面下，如何继承传统汉语研究中丰富的理据研究成果，实现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接轨，是本研究努力尝试的方向之一。

另外，西方的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累。特别是现代语言学建立以来，语言研究进入了科学发展的快车道，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我们在研究中，也要特别注意批判地吸收各家学说中合理的成分。譬如，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虽然有诸多限制条件，但他对汉语和汉字的关系问题有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对语言系统内部理据的观点也非常有见地，是我们进行该方面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认知语言学提出的隐喻理论和象似性理论是理论语言学的新发展，对我们研究一词多义等理据现象有巨大的启示意义。Zipf 的经济原则强调了语言与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

① 陈寅恪，1986，陈寅恪先生来书[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葛信益、启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p. 183。

② 段玉裁，1815/2006，说文解字叙注[A]，《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pp. 753－765。

为我们从外部角度研究语言理据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研究理据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之，不论是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还是古老的中国传统语言研究，都蕴含了语言学者对理据问题的真知灼见。两者的碰撞和结合必然能产生精彩的火花。

1.2.4 人文与科学相结合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突飞猛进的发展，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领域掀起了“科学主义”的高潮，社会人文学科纷纷在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推动了学科的“现代化”，并把实现学科的自然科学化作为学科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现代语言学的创立是近现代科学主义潮流的产物之一，通过研究对象的同质化将语言这一纷繁复杂的现象客体化，从而实现了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精确性、可靠性。现代语言学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迅猛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发展了各种流派的学说，并且在语言自动处理、机器翻译、语音技术、语言教学、辞典编纂、人工语言智能等语言应用和语言实践活动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科学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也使得语言研究发展了实证、定量的研究方法，从而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科学主义思潮强调知识的可靠性、有效性和精确性，主张以自然科学作为知识的唯一合法形式，提倡科学知识的纯粹“客观性”，排除价值因素和主观因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2001：210）[①]。然而，人类的语言是复杂的，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具有社会属性和人文

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2001，《自然与科学技术哲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p.210。

属性;在语言的三种属性中,人文性是其本质属性(潘文国、谭慧敏,2006:201)[①],语言研究从其根本属性来说属于人文学科。对语言理据现象的讨论除了可以遵循索绪尔创立的现代语言学传统在语言系统内部进行,也必然会涉及语言外部的种种因素,故而离不开历史、文化、语言社团等诸多人文要素。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和研究基础上的,而人文学科由于有"人"这一因素的参与,其研究对象至少部分是超验的。故而我们认为,以自然科学方法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语言研究作为人文研究的一部分,必须接受人文方法的指导。

在理据研究中,我们既要注意吸收人文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精髓,又要充分借鉴"科学的"现代语言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做到人文方法和科学方法兼容并蓄,紧密结合。

第三节　本研究的概述

1.3.1　本研究的选题

本研究的题目《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有两个关键词:"词汇理据"和"英汉对比"。解读这两个关键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3.1.1　词汇理据

语言理据问题是语言研究最重大的理论问题之一。人类从开始关注自身语言之时起,始终没有停止过探索理据问题,不停地思考语言与现实、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学者们的看法历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对语

① 潘文国、谭慧敏,2006,《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201。

言理据问题的看法，同时也是建立理论语言学的基础，不仅决定着语言理论的整体走向，而且会对语言教学等语言实践活动和人们的语言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正是理据问题引起我们极大兴趣，并成为本研究选题的原因。

语言有词汇、句法、篇章等不同层面，而其中词汇层面对于理据研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语言中词以上部分是通过各种语言符号的组合和聚合生成的，符号间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就是这些语言结构生成的理据。大于词的语言单位都是有理可据的，只是不同的语言构成短语、句子、篇章的方式，即理据形成和作用的方式各有不同。人类有相同的大脑——神经结构、共同的语言官能和类似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语言的句法和篇章结构所体现的互通性和认知共性自然也较多。而语言的词汇层面，特别是单纯词汇（或词素）的音、形、义已经融为一体，没有合成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从而其理据性/任意性情况往往较为复杂，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显著。词汇中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单纯词汇。它们往往是一种语言中产生最早的词汇，携带着该语言的“遗传基因”，其成词的理据模式对后起的语言符号有极强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同时它们也是一种语言的“基本粒子”，十分活跃，能够生成数量巨大的其他语言单位，故而地位最为重要。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类型和程度，会对某一语言词汇系统整体的面貌产生重大影响，如决定一种语言的词化程度、词库规模、词汇的构成、外来语的吸收等，是塑造词汇系统面貌的基本力量之一。

1.3.1.2 英汉对比

汉语和英语都是使用人数众多、影响力广泛的语言；两者从类型学、发生学和历史接触上来说相距遥远。正如沃尔夫（1939/2001：123[①]；1940/

① 沃尔夫，1939/2001，习惯性思维、行为与语言的关系[A]，申小龙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pp. 119－148。沃尔夫（1939/2001：123）说：外来语言是观察我们自己语言的一面镜子。

2001：212[①]）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要打破“均质欧洲语”的“一元语言观”和西方语言学对现代语言研究的垄断地位，就必须选择非常不同的语言进行对比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英语和汉语是语言对比研究理想的对象。理据现象虽然是各种语言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但是英语和汉语在理据类型、理据分布和理据程度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对这两种语言的词汇理据问题进行探讨，可以揭示英汉词汇系统不同的内部机制，探讨理据性在语言类型学上的重大意义。

此外，西方语言和汉语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的语言研究都绵延两千多年，在对语言理据问题上的看法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西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观念长期以来占据着压倒性的统治地位，掌握着语言研究的话语权，成为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一传统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索绪尔时代，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了超越语言研究领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几乎成了不可撼动的“真理”。当代西方语言理论界主张“自然语法”的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虽然对任意性提出种种挑战，但都承认“单纯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汉语社团对语言理据现象的关注和相关理论的探索有悠久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五四”之前的传统语言研究始终秉承“因声求义”和“以形求义”的方针，这实际上认同了语言符号的理据观，认为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是有理可据的。传统汉语研究实际上就是一部探讨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的理据研究史。然而，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中产生了语言研究传统的断裂，在全面接受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同时，对传统语言研究持全面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也促进了任意观一统天下局面的形成。如何发掘汉语研究传统中有价值的思想和材料，实现和西方语言理论的接轨，是摆在每个中国语言学者面前的任务。

---

① 沃尔夫，1940/2001，科学与语言学[A]，王志欣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pp. 205 - 218。沃尔夫（1940/2001：212）说：这些语言（现代欧洲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同属印欧语系的同源语，其基本轮廓大致相同，从历史角度看是从很久以前的同一个言语共同体传承而来；这些同源语长期以来分担了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任务；这种共同文化中较为理性的许多成分，源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言背景。当我们将自己的语言与闪族语、汉语、藏语或非洲语言进行对比的时候，分析世界的差异就变得较为明显。

引起我们对语言理据问题浓厚兴趣的，正是类型迥异、来源不同的英语和汉语在理据类型、理据分布和理据程度上展现出来的巨大差异，还有汉语研究传统和西方语言研究传统全然不同的理论取向。如何在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发掘语言事实，实现西方语言理论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对接，需要对比两种语言的异同，发掘出蕴含在语言个性之中的普遍规律。从英语和汉语这两种目前使用广泛但类型迥异的语言出发进行对比研究，会揭示出当前主流的一元语言观无法展现给我们的语言多样性，从汉语的角度对西方语言理论做出补充和修正，为普通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1.3.2 本研究的结构

本研究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导论》，着力阐明理据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对本研究的选题和总体布局作简要的介绍。

本研究涉及各种理据现象和理据因素，但主要关注英汉共时词汇系统的理据状况，以使其对当前语言理论建设和语言实践活动发挥更大的作用。本研究主体大致可分为三部分：(1)关于理据问题的理论探索和英汉词汇系统的描写(第二、三章)；(2)对词汇系统内部理据因素和理据关系的探讨，包括对(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合成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外来语和理据性进行的英汉对比研究(第四至六章)；以及(3)对词汇系统和外部理据因素互动的关注，讨论主要涉及英汉词汇系统的经济理据和转隐喻理据(第七、八章)。

第二章《语言理据研究的理论问题》是重点章节之一，着力澄清和解决与理据研究相关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第一节回顾理据研究的历史，对西方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涉及理据问题的论述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介绍了理据研究史上重要的思想和观点。第二节重点阐释与理据相关的几个重要语言学概念：任意性、象似性、内部形式和语义透明度。这些概念频繁出现在理据研究的文献中，各家对它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我们的论述主要是澄清这些概念使用上的含混不清之处，避免引起混淆，

同时讨论它们与理据性的关系以及对理据研究的意义和作用。第三节概述前人对理据定义和类型的讨论，结合本研究的具体目标，提出了我们的理据定义，对本研究的对象进行理论上的界定；同时我们对词汇理据进行了重新分类，为下面几章的论述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第三章《词汇与理据性》对英语和汉语的词汇系统进行简要的描写，澄清一些概念和理论上的混淆，为后续的研究做好铺垫。第一节针对“词”这一源于西方语言的概念在汉语中的种种理论困境，探讨字和词、词和语这两对概念的区别，为本研究的对象作出相对清晰的界定。第二节对英汉语词汇系统分别进行历时和共时描写，将英汉词汇从历时角度分为原生词和次生词，从共时角度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阐述了这两组概念的性质和它们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第三节讨论原生词、次生词、单纯词、合成词之间的关系，指出英汉词汇系统在历时分类和共时分类上的重合现象及其意义，同时指出理据性是塑造词汇系统面貌的重要力量之一。

第四章《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理据性对比研究》是本研究的又一个重点章节，通过英汉语间的对比研究，探讨中西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问题。第一节重点讨论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澄清一些由来已久的理论误解和偏见，论证汉字对汉语的能动作用，认定汉字是汉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节分析单纯语言符号的内部结构，介绍源自印欧语传统的二元结构符号观和源自中国传统的三元结构符号观，认为单纯语言符号由语音、语形和语义三个要素构成。这一语言符号的三元结构观念是文字文明时代具有普遍价值的符号结构理论。第三节提出单纯语言符号内部存在着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形式—意义”关系，分别构成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这两种不同的理据类型。英汉语单纯符号的音义关系任意性占绝对优势地位；在形义关系上，汉语体现出了很高程度的文字理据性，而英语则基本没有文字理据。第四节对比源自中西不同语言事实和思想传统的理据观和任意论，表明理据观和任意论是中西不同的主流语言观，分别代表语言研究的人文路线和科学路线。两者共同发展，相互借鉴，对语言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章《英汉合成语言符号理据性对比研究》对英汉语合成词形式

和构成的异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对比研究，力图揭示英汉语不同表层形式背后的共同语言机制。第一节探讨了英语合成词的主体复合词和派生词的理据构成，第二节讨论汉语合成词的主体合体字和双音词的理据性，表明英汉语合成词的构成模式都是“特征 + 实体”方式，语义较为透明，理据程度较高。第三节探讨了英汉语合成符号表层差异背后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规律，指出“特征 + 实体”的结构模式可能是英汉语各级合成符号生成的共同结构模式。

第六章《英汉外来语及理据性对比研究》对比了英语借词和汉语写音外来语在引进和同化方面的种种异同，并揭示了这些异同背后的理据因素以及英汉外来语现象与语言理据程度之间的关系。第一节将本章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英语借词和汉语写音外来语，分别介绍了两者的数量和来源。第二节对比英汉语引进外来语的方式及其背后的共同机制，表明英汉语分别以语言系统中较为次要的环节为契合点引进外来语，符合语言系统运作的经济原则。第三节对比了英汉外来语在进入语言系统后同化的不同情况，表明英汉外来语同化的实质是语言的核心机制对外来语的筛选和改造，决定外来语同化过程的理据因素是语言的核心机制和外来语的使用频率。

第七章《英汉词汇的经济理据》从经济因素这一语言系统的外部理据因素入手，对比分析了英汉语的词化现象和词汇系统的“开放性”，探讨经济理据与英汉语词汇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节简要介绍语言经济理论的发展情况，指出语言的经济性是塑造英汉语词汇系统面貌的重要力量之一。第二节从语言社团和语言系统的互动入手，探讨英汉词化现象所体现的语言经济性，表明英汉词汇系统受到表达简约原则和记忆简约原则共同作用。第三节从词汇系统各种成分的互动关系着眼，探讨英汉语“开放性”与理据性的关系，探究其间所体现的语言经济性，认为语言在吸收外来语方面的“开放性”，本质上是经济原则作用的结果。

第八章《英汉词汇的转隐喻理据》讨论转喻和隐喻这两种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对英汉词汇系统产生的影响。第一节从认知视角介绍转喻和隐喻现象，通过概念隐喻理论、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了解隐喻的认知机制；讨论转喻和隐喻的区别和联系。第二节讨论英汉语广泛

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指出转喻和隐喻思维是词义衍生的认知基础和驱动力量，探讨英汉一词多义转隐喻理据运作的共性和差异。第三节针对英汉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展开研究，将转隐喻名名复合词分为半喻式名名复合词、全喻式名名复合词和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探讨认知理论对名名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解释力和局限性，探究文化因素对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制约作用。

第九章《结论》总结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同时指明理据研究继续深入发展的方向。

第四节　小结

本章是《导论》部分，主要内容共分为三节。第一节讨论语言理据研究的意义，指出理据现象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是涉及语言内部和外部各种自然、社会和人文因素的复杂现象，是语言系统运作的内在机制之一。对语言理据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的内在规律，推动语言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还能丰富人们的语言生活，提高语言教学、语际翻译、辞典编纂等各种语言实践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第二节探讨理据研究的方法问题。由于语言理据现象涉及多种复杂因素，对语言理据的探讨既有必要在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内部进行，也有必要联系语言系统外的种种因素，观察分析它们与语言系统间的种种交互作用。所以，研究语言理据问题既要关注语言的共时层面，又要研究语言的历时层面；既要考察语言的内部因素，又要分析语言的外部因素；既要借鉴西方语言理论，又要整合中国语言研究传统；既要树立科学研究的态度和精神，采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又要接受人文主义的指导。总而言之，语言理据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研究方法上要博采众家，注意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

第三节是概述。词汇（特别是单纯词汇）是语言的基本粒子，可以组合生成各种更高级别的语言符号，同时也往往代表语言社团认知世界的

基本单位，故而一种语言的理据特征，往往集中地体现在词汇系统中。我们之所以选择词汇系统作为考察语言理据问题的窗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英汉两种语言在类型、发生和历史接触上都相距遥远，其研究传统在理据问题上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取向，并且在词汇层面，特别是单纯词汇中，体现出理据类型和理据程度上较为明显的差异，非常适合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我们认为，英汉词汇理据的对比研究，有利于推动语言研究的发展和完善。另外，本节也逐章介绍了内容上的安排，以期提供一份简单扼要的概览。

第二章

语言理据研究的理论问题

第一节　语言理据研究的历史

2.1.1　宗教和神话中的语言理据观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人类从文明诞生之初就开始思考语言问题。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是宗教和神话，初民关于语言的思索便凝固在宗教和神话中流传至今，使得我们能够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语言的。

2.1.1.1　西方的“语言神授说”

西方的宗教和神话普遍认为语言是神授予人类的。《圣经旧约·创世纪》认为上帝在七日之内创造了天地万物，并给他的创造命名；上帝创造了人之后，就让人给万物命名[①]。这样看来，在人类掌握语言之前，上

① http://foreignedu.hdu.edu.cn/html/4-02.htm，登陆日期2009-09-03。

帝已经在使用语言了。语言是上帝“创世的工具”(姚小平,1992:37)[①],人类的语言毋庸置疑地来自于上帝的恩赐,而“人的语言只不过是神的语言的复版”(姚小平,1993:33)[②]。

基督教另一个关于语言的故事“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也流传颇广,在西方世界影响极大。巴别塔的记载也见于《圣经旧约·创世纪》,人类共同的语言由于上帝的干预而“变乱”(即“巴别”)为各种口音。学者们还发现,犹太教文献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都有类似的记载[③]。

古印度的《摩奴法典》[④]是一部集宗教戒律和世俗法规习俗于一体的法经,第一卷为《创造》,类似于《创世纪》。根据这部法典,语言是佛陀(吠陀)授意“至高无上的神”所造,其语言神造的观点与《创世纪》所述并无本质区别(姚小平,1993:33)[⑤]。

西方初民不仅认为语言是神造的,文字也是神的恩赐。西方的文明古国都有掌管文字之神,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钉头字)是命运之神那勃所创造;埃及的圣书字是知识之神托特所创造;希伯来文是摩西所创造;希腊文是何墨斯所创造;婆罗米文是梵摩天帝所创造(参见周有光,1995:140)[⑥]。

西方宗教和神话语言文字神造、神授的观念,无疑认定了神是语言的理据,语言的面貌由神的意旨决定,甚至语言的多样性也是神的干预造成的,人类在语言的创造和发展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初民的这种观念不仅反映了他们对语言强大力量和神圣地位的敬畏之心,同时表明了他们思索语言理据时的困惑心情。

---

① 姚小平,1992,Logos 与“道”——中西古代语言哲学观同异谈[J],《外语教学与研究》(1):34-45。

② 姚小平,1993,古印度语言文化二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30-35。

③ 参见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88%A5%E5%A1%94,登陆日期 2009-09-02。

④ 《摩奴法典》,迭朗善法译,马香雪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11。

⑤ 姚小平,1993,古印度语言文化二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30-35。

⑥ 周有光,1995,《语文闲谈(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p.140。

2.1.1.2 汉民族的文字发生论

西方文化普遍存在关于语言起源的神话，与此不同的是，汉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少有关于语言起源的内容，却存在不少关于文字起源的论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自古以来“重文字，轻语言”的传统。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影响比较大的是仓颉造字。许慎（约 100/2004：1－2）[①]对此有详细的表述：

>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按照这一说法，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氏（即庖牺氏）时代所作的八卦和神农氏时代的结绳记事，后由黄帝的史官仓颉依据“依类象形”的原理创造了真正的汉字。汉字的创制是中国文明史上感天动地的一件大事，汉代刘安的《淮南子·卷八本经训》[②]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描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第一叙画之源流》[③]称有了汉字之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中国古代社会对汉字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和西方宗教神话的“语言神授”不同的是，汉字是由“人”创造的。伏羲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目前保留下来的传说固然有极大的神话色彩，但据考证，伏羲是生活在新石器时期的部落首领，黄帝是远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两者都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关于史官仓颉，历

---

① 许慎，约 100/2004，说文解字叙[A]，宋易麟注《说文解字今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pp. 1－8。宪象：标准图像。迒：háng，兽迹；兔道。文：独体字。字：合体字。

② 刘安，汉代/1989，《淮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 78。

③ 张彦远，唐代/1964，《历代名画记》[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p. 1。

史文献中也多有记述。《荀子·第十五卷解蔽》[①]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君守》[②]则称："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gǔn)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韩非子·第十九卷五蠹第四十九》说："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③]只是到了后来，仓颉的形象越来越神化，成为"四目灵光"、"生而能书"的神人。历代研究文字的学者都认为，汉字不可能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汉语社团初民集体创造的结果。在文字产生之初，字形、字体的歧异必然较为普遍，而仓颉很可能是一位整理、规范汉字的人，这点从荀子"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中就可看出。章太炎先生的《检论·卷二·造字缘起说》也认为，"仓颉者，盖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章太炎，1915/1984：390[④])。可见，汉字起源的传说虽然有比较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汉字是"人造"而非"神授"，这和西方"语言神授"的观念截然不同。

神授语言的理据是虚无缥缈的神的意旨，而汉字的创制却实实在在、有理可据。天象、地法、鸟兽之文、地之宜、近身远物都是汉字形成的理据。独体字(即"文")是最早出现的汉字，是构成汉字体系的基本元素，许慎称之为"物象之本"，可见汉字的创制最初都是模拟物像而来的，是有理据的。

2.1.2 "轴心时代"哲学研究反映的理据观

人们对语言理据的研究，除了可以从宗教和神话中寻根溯源，还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辉煌灿烂的"轴心时代"(雅斯贝斯，1949/1989：

① 荀况，战国/1989，《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 127。
② 吕不韦，战国/1986，《吕氏春秋》[M]，(汉)高绣注，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p. 203。
③ 韩非，战国/1989，《韩非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 155。
④ 章太炎，1915/1984，检论[C]，《章太炎全集(第三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 349－628。

7－13)[①]。在这个人类文明大发展的时期，东方和西方的哲学研究都注意到了语言和现实关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理据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1.2.1 古希腊时期的“自然论”与“约定论”之争

西方文明对语言的重视不仅在宗教和神话中有所体现，还体现在古希腊学者的研究中。古希腊人把智慧视作“逻各斯”的艺术，“逻各斯”兼有言语和理性之意，所以智慧就是用优雅的语言表达思想的艺术（赵敦华，2001：32）[②]。古希腊哲学家首先注意到的语言问题就是名称的本质，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自然论和约定论。“自然论”与“约定论”两派的争论对西方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的影响持续至今，两千多年以来实际上从未停止，只不过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持自然论观点的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有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前480）、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克拉底鲁（Kratylos，公元前5世纪）、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伊壁鸠鲁（Epicurus，约公元前341～前270）；持约定论观点的主要有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公元前515～前5世纪中叶以后）、赫莫根尼（Hermogenes）、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70/356）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

赫拉克利特是主张名称包含了事物本质的第一个古希腊哲学家（王寅，2007：514）[③]，他“最早诉诸词语，把词语看做是事物本质的体现”，并且认为语言是无休无止变动的世界中最稳定的东西；“人类语言结构反

---

① 雅斯贝斯，1949/1989，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pp.7－13。轴心时代（Axial Age 或 Axial Era）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的哲学发展理论。他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的哲学都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繁荣的面貌。

② 赵敦华，2001，《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32。

③ 王寅，2007，《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514。

映着世界的结构，体现着那个结构——‘逻各斯包含于语言之中，就像一项意义可以包含于许多外表不同的记号之中那样’”（奥格登、理查兹，1923/2000：29）[①]。

柏拉图的著作《克拉底鲁篇》是古希腊时期讨论语言本质问题的名篇，对话在苏格拉底、克拉底鲁和赫莫根尼三者之间进行。赫莫根尼认为语言是约定的，事物的名称和它们的本质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任何名字中都没有正确性原则；一切名称都是约定俗成的，任何给定的名称都是对的，同时名称是可以改变的，一切名称都是使用者的习惯，甚至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对象的命名，如奴隶主可以随意改变奴隶的名字。而克拉底鲁则认为语言的声音符号必然与事物的自然本质相联系，名称必然符合事物的本质，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要通过语言实现，名称是有内在的正确性的。苏格拉底从总体上支持“自然论”的观点，但也表示了折中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语词中有真或假的意义，因而名称也就有真或假的意义，是用来传递信息和辨识事物本性的工具，从而批判约定论的相对主义哲学基础，指斥它抹煞了名称的意义所表达的事物本质的客观真理。另一方面，苏格拉底认为说话和命名都是人的行为，包括约定的因素，但是这种行为不是由人任意进行的；而必须根据命名对象的本质，选择适合的名称。（参见柏拉图，古希腊/2003[②]；汪子嵩等，1993：537－539[③]；李志强，2008：116[④]）

在《克拉底鲁篇》中，我们很难分清哪些观点是苏格拉底的，哪些是柏拉图自己的，一般认为柏拉图本人也倾向于“自然论”的观点。高名凯

① 奥格登、理查兹，1923/2000，《意义之意义——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及记号使用理论科学的研究（第十版）》[M]，白人立、国庆祝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p.29。

② 柏拉图，古希腊/2003，《克拉底鲁篇》[M]，《柏拉图全集第二卷》[C]，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③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1993，《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pp.537－539。

④ 李志强，2008，谈《克拉底鲁篇》的语言自然论与约定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15－119。

(1963/1995：343)[①]认为，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人类一般语言活动起源于摹声”的观点，认为“每一个字母都是摹仿事物的一定的性质的”，并且引用了柏拉图的话来说明这一观点：

> 显然，名称乃是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声音的模仿，起名字的人总是以声音来模仿它所称呼的事物的。

王寅(2007：514)[②]表明柏拉图将命名看做是模仿的艺术，人们所论说的一切名称，都是用于说明事物的本性。伊壁鸠鲁则采取了类似苏格拉底的折中态度，认为“词的形式产生于本质，但又因约定而发生变化”(转引自罗宾斯，1967/1997：24)[③]。

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名称是通过约定俗成而具有意义的口头发出的声音，认为自然所赋予的名称是不存在的，而将名称和事物的关系看做是一种社会达成的约定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古希腊/1984：56)[④]认为名词就是“依据惯例的一种有意义的声音”，并且进一步解释了“依据惯例”的含义：“没有什么东西借其本性就能够是一个名词或动词——只有当它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名词或动词”。亚里士多德无疑持“约定论”观点，这种观点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逐渐占了上风，主导了西方学界对名称和事物关系的认识。

“自然论”和“约定论”的对立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和语言研究的历史，中世纪时期表现为唯名论(Nominalism)和唯实论(Realism)的争论[⑤]，

---

① 高名凯，1963/1995，《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p.343。

② 王寅，2007，《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514。

③ 罗宾斯，1967/1997，《简明语言学史》[M]，许德宝、冯建明、胡明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4。

④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1984，《工具论》[M]，《亚里士多德逻辑论文集》[C]，李匡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p.56。

⑤ 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哲学争论在语言研究中的表现为：唯名论者认为词本身并不是事物，它只是事物的名称、符号，是通过协商而确定的；唯实论者则认为，词是思想的体现，词和思想之间存在内在关系(王远新，2006：185)。陈嘉映(2003：11)指出，20世纪的大多数重要的语言哲学家持唯名论观点。

17、18 世纪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对立[①],并一直延续到现代索绪尔与洪堡特等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形成了现代语言学流派在哲学背景、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分野,影响广泛,至今仍是语言研究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Simone (1994: vii)[②]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分别称为:柏拉图模式(Platonic Paradigm)和亚里士多德 - 索绪尔模式(Aristotelian-Saussurean Paradigm)。古希腊时期的"自然论"和"约定论"之争虽然主要属于哲学、逻辑学和符号学范畴,但人类对事物的命名是通过语言符号进行的,故而名称和事物之间的"自然论"与"约定论"之争的实质,也可看做语言符号的确立主要是由命名对象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还是由人"约定"的。这是理据研究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根本课题。

2.1.2.2 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学"

我国古代的"名学"与古希腊时期西方哲学家对命名问题的关注类似。早在"名实相怨"、"名实散乱"的先秦时期,生于动荡年代的先哲们就注意到了"名"的重要性并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形成了"名学",即研究"名"的学问。朱前鸿(2005)[③]将先秦名学分为无名学派、正名学派、立名

---

①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以不同的形式贯穿整个语言学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不管成名的作家,还是社会认可的普通说话者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做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做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语言内部研究语言(参见罗宾斯,1967/1997: 145)。另外,经验主义采用观察的方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调查,注重对每一种语言的观察,认为每种语言都有其各自的特点。理性主义从人类语言的内部进行研究,以人类逻辑理性的共同点出发,关注个别语法在交流思想时所隐含的语法统一性,确信人类理性在语法中所体现的普遍性。……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在当时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背景下,持续了近两百年时间,影响着经验语法和唯理语法的发展,甚至影响了现代语言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大学派——美国描写结构主义和生成语言学(参见王红梅,2007: 103 - 105)。

② Simone, Raffaele. 1994. Forward: Under the Sign of Cratylus [A]. In Raffaele Simone (Ed.) *Iconicity in Languag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vii-xi.

③ 朱前鸿,2005,《先秦名家四子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学派和“名家”四个流派，我们采用这一分类，对各家与语言理据问题有关的观点进行简要的介绍。

无名学派的代表是道家的老子（约公元前 580～前 500 年）和庄子（约公元前 369～前 286 年）。这一派观点被冠以“无名”之名，是因为老子“道常无名”[①]的主张，即“道”是一个超越一切、遍在万物、周行不殆的东西，不能言说，自然也就无名。但同时“道”又是有名的，老子“字之曰道”[②]，却又给“道”命了名，从而肯定了“名”的存在。庄子认为“名者，实之宾也”[③]。成玄英[④]疏：“实以生名，名从实起，实则是内是主、名便是外是宾”，即“名应由实决定，实为主，名为宾，有实才能有名”（见刘文典，1999：19）[⑤]。庄子认为评判“名”的标准在于其“是否符合物固有的东西，符合就是对的，不符合就不对”（朱前鸿，2005：45）[⑥]。

正名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的孔子（约公元前 551～前 479 年）和荀子（约公元前 298～前 238 年）。儒家的正名学说将“名”放在名实关系的第一位——“名正则言顺”、“制名以指实”、“名闻而实喻”，将正名作为施政治国的纲领。孔子关于“名”的最著名的言论，莫过于《论语·子路第十三》[⑦]中的话：

>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这里，孔子将“正名”看做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足以见其重要。

---

① 老聃，春秋/1986，《老子道德经》[M]，（三国魏）王弼注，据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p. 1。

② 老聃，同上，p. 14。

③ 庄周，春秋/2000，内篇·逍遥游第一[A]，《庄子》[M]，孙雍长注译，广州：花城出版社，p. 7。

④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6715.htm，登陆日期 2009－09－13。成玄英，字子实，唐初道士，杰出的道教学者，道教理论家。

⑤ 刘文典，1999，《庄子补正》[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p. 19。

⑥ 朱前鸿，2005，《先秦名家四子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p. 45。

⑦ 孔子，春秋/1998，《论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p. 158－160。

荀子的《正名》恐怕是语言学界引用最为广泛的先秦名学文献，其核心即“制名以指实”的名学思想。荀子最为人所称道的名实论（战国/2000：37－38）[①]即：

>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这段论述，历来多被语言学者作为我国最早的“语言符号任意说”加以引用，并以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这一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证明“我国古代学术的发达”（岑麟祥，1957/2008：19[②]；王力，1962/2006：4[③]）。但也有学者（李葆嘉，2001：103－113）[④]指出，《荀子·正名》的核心思想是“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王者制名，其民相效”而非西方语言学传统中由社会和民众的力量主导的“约定俗成”。我们认为，李葆嘉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荀子是孔子儒家思想的追随者，其重视“正名”问题的初衷，恐怕是要维护王权和等级制度，使得百姓“不做奇辞，听从使唤，‘谨于守名约’而达天下大治”（李葆嘉，2001：106）[⑤]。荀子名实论思想中的“约定俗成”是王者“约定”，其民“俗成”，将其等同于西方语言符号任意说中的“约定俗成”（conventional），是不恰当的比附。

鲍思陶（2006：52）[⑥]也指出，这里“荀子讲的不是最初的声义关系，而是在名实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如何被逐渐固定的问题”，并引用荀子的话[⑦]说明“约定”的具体含义：

---

① 荀子，战国/2000，《荀子·正名（节录）》[A]，洪诚编《洪成文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pp.33－46。曾收入洪诚编《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C]（1982）。

② 岑麟祥，1957/2008，《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19。

③ 王力，1962/2006，《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4。

④ 李葆嘉，2001，《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pp.103－113。

⑤ 李葆嘉，同上，p.106。

⑥ 鲍思陶，2006，《释名》声训的检验标准[J]，《文史哲》(6)：45－54。

⑦ 荀子，战国/2000，《荀子·正名（节录）》[A]，洪诚编《洪成文集》[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pp.36－37。

然而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事物由于什么而有相同或不同的名称呢？回答是：由于人(五官)的感觉。凡是生活、情感相同的人们，他们对一事物的感觉也是相同的，所以用来比拟的名称也就大体相似而相通。这就是大家共同约定而又相互领会的名称"(鲍思陶，2006：52)①。可见荀子所讲的"约定俗成"与西方语言研究传统的音义关系"任意说"有很大的不同。

荀子还指出，名有好坏之分，只有那些说出名称、人们很容易理解的名才是"善名"，而事实上容易理解的名称往往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联系事物特点的名称。

立名学派的代表是墨子(约公元前480～前420年)。墨子对孔子提出的"正名"学说及其体现出的"以名定实"的倾向持批判态度，主张"以实定名"。墨子指出"有文(之)实也，而后谓之；无文(之)实也，则无谓也②"，表明墨子认为先有实，后有名，名是第二性的，是对实的称谓，名随实变。另一方面，墨子也肯定名是约定俗成的，名一旦定下来，与对象就有了必然、固定的联系，也就有了自身的意义，就不能随意更改(朱前鸿，2005：59③；崔清田，2004：134④)。例如墨子指出，"君，臣、萌(民)通约也"⑤。古代以"君"名指称政长，就是由臣民通约确定的。

关于名和实的关系，墨子指出只有名实相符才是正确的关系，故而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⑥，即名就是称呼实的符号，实就是所称呼的对象，符号和对象要相互吻合。如何做到名实相符呢？

---

① 鲍思陶，2006，《释名》声训的检验标准[J]，《文史哲》(6)：45－54。

② 墨翟，春秋/2000，经说下[A]，《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p.295。

③ 朱前鸿，2005，《先秦名家四子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p.59。

④ 崔清田，2004，《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p.134。

⑤ 墨翟，春秋/2000，经上[A]，《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p.279。

⑥ 墨翟，春秋/2000，经说上[A]，《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p.292。

墨子提出的命名原则是“以名举实”[①]，又说“举，拟实也”[②]，即名要模拟实的特征，刻画实的性状，使人一目了然。墨子还指出“言也者，诸口能之。出民(名)者也，民(名)若画虎(虎)也”[③]，故而名要像“画虎”那样生动地反映其所指的对象。

名家的代表人物有邓析(公元前？～前 501 年)、惠施(约公元前 370～前 310 年)、尹文(生卒年不详)和公孙龙(约公元前 325～前 250)，朱前鸿(2005)[④]称之为“名家四子”。他们也有不少论述涉及命名与事物的关系。邓析(春秋/1957：8)[⑤]提出“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复，何事不成”，表明制名的方法就是要“见象”、“致形”、“循理”，模拟物象的表征、性状而成。尹文(战国/1957：23)[⑥]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可见“形”是命名的依据，“名形”即指根据事物外在的表征制定名称。这样一来，“名”、“形”对应，相互依存，才不会造成混乱。集名家思想大成的公孙龙(战国/1957：81)[⑦]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指出了命名要“名以命形，名实当乃得谓之，名实不当而不谓”(公孙龙，战国/1963：62)[⑧]。“而名的生成的最终的依据就是物，但它必须通过心智或思维对名的规定来体现……公孙龙肯定物是名的最终依据，并强调了心智对制名的作用，这是对的”

---

① 墨翟，春秋/2000，小取[A]，《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p.173。

② 墨翟，春秋/2000，经上[A]，《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p.279。

③ 墨翟，春秋/2000，经说上[A]，《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p.289。

④ 朱前鸿，2005，《先秦名家四子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⑤ 邓析，春秋/1957，邓析子校诠·无厚篇第一[A]，王启湘校《周秦名家三子校诠》[M]，北京：古籍出版社，p.8。

⑥ 尹文，战国/1957，尹文子校诠·卷上[A]，王启湘校《周秦名家三子校诠》[M]，北京：古籍出版社，p.23。

⑦ 公孙龙，战国/1957，公孙龙子校诠·名实论第六[A]，王启湘校《周秦名家三子校诠》[M]，北京：古籍出版社，p.81。

⑧ 公孙龙，战国/1963，论释第三·名实论第五[A]，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p.62。

(朱前鸿,2005: 188)[①]。由此可见,名家在肯定名实之间是指称与被指称的关系,其间没有必然联系的同时,也认为"实"的特征是命名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在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尤为重要。

先秦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在名实问题上的看法也异彩纷呈。一方面,当时的学者中已经有人开始明确主张"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涉及名实关系的学派都把"名"的问题看成是治国为政的要务,且多主张"名实相符"以避免"名实相扰"的局面。对"正名"问题的重视成为其后中国主流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在论及命名的依据时,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名要能够反映事物的意象和特征,能够反映"实"的名才能称作"善名"。重视命名问题与强调名实相符,形成中国独特的名实观,这与西方传统"约定论"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局面相比,可谓大相异趣。

虽然先秦时期的名学研究,主要属于哲学、逻辑学范畴,而研究的初衷也是为了解决治国施政的实际问题,但我们认为先秦名学实际上也是中国学者系统地从学术上探讨语言理据的发端。当时各家学说严肃认真的研究和论争,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语言理据,还有相当大的启发。

2.1.3 古代语言研究中的理据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类思想的不断繁荣,语言研究开始逐渐脱离哲学研究的范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语言理据的问题,在他们的著述中常可以看到关于语言理据问题的论述。

2.1.3.1 *西方古代的语言理据研究*

词源研究致力于解释词的形态和来源,属于理据研究的范畴。西方对词源的研究历史悠久,开始于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对"自然论"和"约定

① 朱前鸿,2005,《先秦名家四子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p. 188。

论”的争论。西方最早的语法学家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①]写的第一本语法书《希腊语语法》共有 6 个部分,其中就有一部分专门探讨语源问题;古罗马的语法学家瓦罗(Varro)曾著 25 卷本的《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其中第二卷至第七卷为语源学(江澜,2007:70)[②]。汤姆逊(1902/2009:28-29)[③]认为,“古代词源学求助于随心所欲的联想,凭借像等同、类比和矛盾等等这样的纯逻辑概念的任意运用,企图在词中找出一定的、事先设想的关于词所表示的对象的概念”,但同时也承认“可碰到他们解释得很成功、很正确的地方”。也有学者认为古代语言学者的研究是卓有成就的,如江澜(2007:70-71)[④]认为瓦罗的《论拉丁语》是语言起源和发展的早期研究,尽管其中有些语源带有想象色彩,更多的语源则证明了作者的才智和见识。

欧洲语言学者关注语源的传统延续到中世纪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宗教势力的发展,拉丁语的影响很大,成为欧洲各地学校教授的唯一语言,所以对拉丁语源研究的热情也日渐高涨。但是这一时期对语源问题的研究,总体上延续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方法和模式,研究范围也未能超出晚期拉丁语语法,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参见岑麟祥,1957/2008:52)[⑤]。

文艺复兴后,教会势力逐渐衰落,语言学者的研究对象并不限于拉丁语这一种语言,转而关注当时欧洲普遍使用的各种世俗语言。学者们开始广泛地搜集世界各地的语言标本,对词源的研究也受到广泛重视。如德国学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 1646-1716)极力主张研

---

① 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B%84%E4%BF%84%E5%B0%BC%E7%B4%A2%E6%96%AF%C2%B7%E7%89%B9%E6%8B%89%E5%85%8B%E6%96%AF,登陆日期 2009-09-18。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公元前 170-90 年)是生活于希腊化时期的一位语法学家。

② 江澜,2007,《瓦罗:古罗马百科全书式散文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70-73。

③ 汤姆逊,1902/2009,《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M],黄振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p.28-29。

④ 江澜,2007,《瓦罗:古罗马百科全书式散文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70-73。

⑤ 岑麟祥,1957/2008,《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52。

究词源，编写各种语言的语法、词典和语言地图（彭玉兰，2007：85）[①]，他搜集了许多可以解释德语起源的材料，并且特别指出各地方言土语的词汇对于解释语言词源结构的重要性（岑麟祥，1957/2008：96）[②]。这一时期欧洲出版了不少词源学著作，如分别于 1650 年和 1669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语词源词典》（*Dictionnaire etymo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caise*）、《意大利语词源》（*Origini della lingua italiana*），1676 年巴度维出版的《意大利语词源》（*Origines linguæ italicæ*），1663 年出版的《关于钦尔语的新见解》（*Nogle kninger-om det Cimbriske Sprog*），1769 年的《瑞典哥特语词汇》（*Glossarium Suio-Gothicum*）；此外，俄国学者的词源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参见汤姆逊，1902/2009：47－48）[③]。

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研究的这一转向中逐步兴起，对各种语言的广泛兴趣，特别是对梵语的研究，使学者们注意到许多语言的词汇有共同的来源。可以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和词源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先驱丹麦学者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的著作《古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的研究》（*Undersogelse om det gamle Nordiske eller Islandske Sprogs Oprindelse*）中的第一篇就是《词源学通论》，明确地规定了词源学的实质、任务和方法，阐明了词源学的重要性和价值（汤姆逊，1902/2009：64）[④]。德国语言学家格里姆（Jacob Grimm，1784－1863）提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要理论“格里姆定律”，用以指导语音的研究，力图找出各种语言间的语音对应，从而确定它们词源上的价值（参见岑麟祥，1957/2008：110）[⑤]。德国学者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1802－1887）的《印度－日耳曼系语言领域内的词源研究》（*Etymologische Forschungen auf dem Gebiet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选出了梵语和其他同系语言所共有的 375 个动

① 彭玉兰，2007，《语言学简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p. 85。

② 岑麟祥，1957/2008，《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 96。

③ 汤姆逊，1902/2009，《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M]，黄振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p. 47－48。

④ 汤姆逊，同上，p. 64。

⑤ 岑麟祥，1957/2008，《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 110。

词词根，研究它们的词源（参见岑麟祥，1957/2008：112）[①]。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既得益于词源研究，同时也大大地推动了词源研究，使词源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多种语言之间的比较，从而能够对更多词源有更好的解释力。

语言起源问题自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就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西方古代语言学者对此更是关注，提出了关于语言起源的种种理论。中世纪以前，西方世界普遍接受了《圣经》"语言神授"的观点；同时由于《圣经》关于"巴别塔"的记载，人们对语言起源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探索人类在语言没有变乱之前，究竟使用的是哪一种语言，并且是如何从这种语言衍生出各种不同语言的。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写成《旧约》的希伯来语是全人类最早的语言（岑麟祥，1957/2008：55）[②]。许多语言学者致力于建立"人类语言同出于希伯来语"的理论体系，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汤姆逊，1902/2009：50）[③]。

首先对"希伯来语源说"提出质疑的是德国学者莱布尼茨。莱布尼茨（1765/1982：308）[④]认为，"如果说希伯来的或阿拉伯的语言和这种原始语言最接近，那么至少它也应该是已经改变很大的。"随着宗教势力的衰落，18 世纪的欧洲学者开始用世俗的眼光看待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Jespersen（1922：413－416）[⑤]将前人的语言起源理论归纳为四种：摹声说（the Imitative Theory / the Bow-Wow Theory）、感叹说（the Interjectional Theory / the Pooh-Pooh Theory）、本能说（the Nativistic Theory / the Ding-Dong Theory，也有人译为声象说）和喘息说（the Yo-He-Ho Theory）。法国学者孔狄亚克（Condillac，1715－1780）在他发表于 1746 年的著作《人类认识起源论》中也指出：人类最初之所以有语言，是由于情感冲动而发出各种叫声，并且伴以各种手势；其后这些叫

① 岑麟祥，1957/2008，《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 112。
② 岑麟祥，同上，p. 55。
③ 汤姆逊，1902/2009，《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M]，黄振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 50。
④ 莱布尼茨，1765/1982，《人类理智新论》[M]，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308。
⑤ Jespersen, Ott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p. 413－416.

声变成指称各种事物的声音，结果就成了语言（转引自岑麟祥，1957/2008：90）[①]。孔狄亚克的学说后来被称为语言起源的“感叹说”。卢梭（1775/2003：15－23）[②]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精神需要（moral needs），亦即激情（passion），并认为“最初的语言是象征性的”，“绝大多数的根词（root words）的发音或是对激情之语调的模仿，或是对可感对象之感受的模仿”。赫尔德（1772/1998）[③]的《论语言的起源》是语言学史上研究语言起源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他提出的理论被称为语言起源的“摹声说”。赫尔德（1772/1998：28）[④]以人类对羊的命名为例，说明了语言起源的过程：

> 他的心灵仿佛也在内部咩咩地叫着，因为心灵已选择了这个声音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当心灵凭记忆识认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在它的内部就又咩咩叫了起来——于是语言就发明了！

赫尔德（1772/1998：55）[⑤]还指出，“语言越古老，越原始，从它们的词根里面就越能看出感官的相似性”。

对语言起源问题的关注一直持续到现当代的语言研究中，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兴起之后，语言起源问题又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广泛兴趣。目前，大多数学者已经能够接受语言起源于模仿的观点（朱长河，2005/2009：130）[⑥]。

对**拟声词**和**语音象征**的研究也是古代西方语言理据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方人对于词汇语音和意义之联系的关注，起源于古希腊时期。那时持“自然论”观点的学者认为事物的名称天然地代表了它们所指称的对象，而语言中广泛的拟声词和语音象征现象就自然成为他们论

---

① 岑麟祥，1957/2008，《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 90。

② 卢梭，1775/2003，《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 15－23。

③ 赫尔德，1772/1998，《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④ 赫尔德，同上，p. 28。

⑤ 赫尔德，同上，p. 55。

⑥ 朱长河，2005/2009，语言的象似性问题：外界的质疑与自身的应答[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5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24－132。

证观点的有力证据。西方的音义关系研究历史上一直散见于各种文献，如古罗马晚期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汀（Augustinus Aurelius，354－430）认为含有字母 v 的音节存在某种“浓密”和“强烈”的意思，如 venter（腹部）、vinum（酒）和 vis（力量）等（参见汤姆逊，1902/2009：30）[①]。由于西方语言研究传统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直是“约定论”一派的观点，所以对音义关系比较成系统的研究到 20 世纪才出现（贺川生，2002）[②]。

西方古代的语言理据研究从总体上说来不是语言研究的主流，语言学者普遍关心的是语言的形态和句法问题，这是由西方语言的特点造成的。但是，这些零散的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探讨语言理据问题仍然有不少启发。

2.1.3.2 中国古代的语言理据研究

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是以训诂学为主体，音韵学和文字学为两翼的“小学”，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语义问题，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形求义”和“因声求义”，也就是从语言的形式入手，探求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传统语言研究，非常注重语言的理据问题。可以说，中国的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理据的学问。许国璋（1988/2009：15）[③]指出，“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从理据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古代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丰硕，各成体系。

成书于东汉时期（约公元 100 年）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古代第一本体系完备的字书。著名学者许慎（约 58－147）依据前代字书《史籀篇》[④]、《仓

① 汤姆逊，1902/2009，《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M]，黄振华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 30。

② 贺川生，2002，音义学：研究音义关系的一门学科[J]，《外语教学与研究》(1)：22－29。

③ 许国璋，1988/2009，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 第 3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18。

④ 《史籀篇》是中国最早的字书，原书四字一句，编成韵语，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潘玉坤（2002：82）考证其由东周王室史官编订成书。“籀（zhòu）文”即是中国古代的大篆字体。

颉篇》[①]等材料依照"六书"体系编写而成，收入汉字 9 353 个，另有重文 1 163个，按部首分别收入 540 部。据清代朱骏声统计，《说文解字》全书的 9 353 个字中，有形声字 7 697 个(约占 82%)，象形字 364 个，指事字 125 个，会意字 1 167 个，其余转注字和假借字合起来不足 1%(转引自汪寿明、潘文国，1992：249)[②]。汉字是衍形而非表音的，《说文解字》依照字形将汉语词汇进行分类，借分析字形来探求汉语词汇的意义，再辅以字音与字义的关系。如属于"玉"部的"玲"表示"玉声"，"从玉令声"，使人对其音、形、义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历代学者对其都有很高的评价，如清代段玉裁(1815/2006：753－765)[③]说：

> 圣人造字实自象形始，故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几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颜黄门[④]曰："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

《说文解字》所创造的字书编排方式，成为后世仿效的典范，隋朝顾野王编写的《玉篇》、明朝梅膺祚编写的《字汇》、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现代的《辞源》和《辞海》采用的都是许慎依据字形分类的方式。

东汉年间刘熙(生卒年不详)所著的《**释名**》是一部解释词义、探寻事物得名由来的专著，是我国第一部词源学著作。《释名》把属于同一个语义场的词汇分成一类，写成一篇，全书共有二十七篇，如《释天》、《释亲

---

① 相传为秦朝丞相李斯所著。原是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秦始皇统一文字，成为小篆书体的样板。

② 汪寿明、潘文国，1992，《汉语音韵学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49。

③ 段玉裁，1815/2006，说文解字叙注[A]，《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pp. 753－765。

④ 即颜之推。该段文字见《颜氏家训·书证》(颜之推 南北朝/1995：206)。

属》、《释车》等。刘熙认为事物得名是有理可据的，他在《释名序》[①]中称：

>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

刘熙用以释名的方法主要是声训法，即用音同或音近（往往是双声或叠韵）的字相互训释。但刘熙往往在声训之后，用义训进一步明确补充，讲明声训的由来，如"川，穿也，穿地而流也"（周信炎，2000：45）[②]。声训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系统地运用声训法解释词汇、探求名源的，《释名》当属首创。由于汉字系统在发展中不断孳乳，形成很多"声近义通"的同源词族。同源词的存在正是"声近义通"的客观依据，同时也是声训法合理性的科学基础（闫顺英，2008：83）[③]。有学者将《释名》看成是理据研究的专著（刘中富，2009：55）[④]，王闰吉（2002：75－82）[⑤]将《释名》论及的理据分为四种类型：摹声性理据、借贷性理据（如外来语等在汉语内部无法找到的理据）、同源性理据和合成性理据。不可否认的是，《释名》中确实有作者一定的主观臆测成分，学界历来对其负面评价颇多；但也有学者（刘兴均，1998：59－64）[⑥]对《释名》中含有主观联想成分的训释加以分析，认为应该彻底否定的内容"所占比重不大"，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它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价值"。

中国语言学史上，《说文解字》和《释名》分别系统地确立了"形训"和"声训"的方法，和同时代的另外两部语言学著作《尔雅》和《方言》一起，奠定了我国传统语言学发展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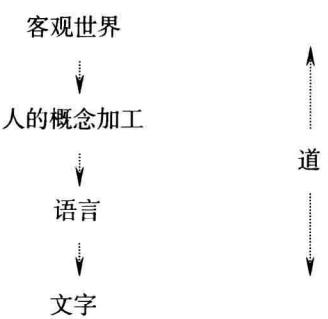
南北朝时期刘勰（456～？520/521）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六世纪

① 刘熙，东汉/2008，释名序[A]，毕沅（清）疏证，王先谦（清）补《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p.1。
② 周信炎，2000，《训诂学史话》[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p.45。
③ 闫顺英，2008，《释名》的语言学价值[J]，《怀化学院学报》(5)：83－85。
④ 刘中富，2009，《释名》性质新论[J]，《东方论坛》(1)：52－57。
⑤ 王闰吉，2002，《释名》的理据类型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6)：75－82。
⑥ 刘兴均，1998，试论《释名》中的流俗词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59－64。

初(501～502年),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学巨著,其中也体现着不少闪光的语言学思想。《文心雕龙·原道第一》[①]说:

>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冯宪光(2004:59)[②]指出,《原道》中所谓的"文"不仅是文章或文学的"文",而具有符号学的一般符号性质,包括人类的语言、文字和文章。刘勰将"文"之道和"丽天之象"、"地理之形"联系起来,认为语言的生成有客观世界的物质基础,要反映自然的现实世界。同时,语言的创造是"心生而言立",离不开"人"的因素。许国璋(1988/2009:16)[③]为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总结了一个模式:



图表 2.1　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模式(许国璋,1988/2009:16)

并指出这一模式的要点是:

---

① 刘勰,梁/1986,原道第一[A],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pp.9－10。

② 冯宪光,2004,《文心雕龙》的符号学问题[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8－63。

③ 许国璋,1988/2009,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第3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1－18。

(1) 承认客观世界的形和体；

(2) 充分肯定人的认知作用："惟人参之"；

(3) 认知产生语言："心生而言立"；

(4) 语言产生图像文字："言立而文明"。

可见，《文心雕龙》所反映的语言观和人类所处的客观世界紧密联系，作为"道之文"的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道"的反映和体现。

"右文说"兴起于宋代，最早明确提及"右文"是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卷十四艺文一》[①]：

> 王圣美制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而在王圣美之前，晋朝杨泉的《物理论》已有"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的论说，可说是右文说的萌芽(转引自洪诚，1982/2000：241)[②]。王观国《学林·卷五》[③]中也有类似的论证，并且已有"字母"这一说法：

> 盧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鑪，加火则为爐，加瓦则为甗，加目则为瞜，加黑则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也。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

此后的张世南《宦游纪闻·卷九》[④]也有相关记载：

> 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

① 沈括，北宋/1996，《梦溪笔谈》[M]，北京：团结出版社，p. 171。

② 洪诚，1982/2000，《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C]，《洪诚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p. 241。

③ 王观国，宋/1988，《学林》[M]，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pp. 176－177。

④ 张世南，宋/1981，《游宦纪闻》[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p. 77。

相从；如戋有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①]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皆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凡。

戴侗在《六书故·六书通释》[②]中也说：

六书推类而用之，其义最精。昏本为日之昏，心目之昏犹日之昏也，或加心与目焉。嫁娶者必以昏时，故因谓之昏，或加女焉。熏本为烟火之熏，日之将入，其色亦然，故谓之熏黄，楚辞犹作曛黄，或加日焉。帛色之亦黑者亦然，故谓之熏，或加糸或衣焉。饮酒者酒气酣而上行，亦谓之熏，或加酉焉。夫岂不欲人之易知也哉？然而反使学者昧于本义。故言婚者不知其为用昏时，言日曛者不知其为熏黄，言纁帛者不知其为赤黑。它如厉疾之厉作癘，则无以知其为危厉之疾，厉鬼之厉作禂，则无以知其为凶厉之鬼。梦厌之厌作魘，则无以知其由于气之厌塞，邕且之邕作雝，则无以知其由于气之邕底。永歌之永别作詠，则无以知其声犹水之衍永。璀粲之粲别作璨，则无以知其色犹米之精粲。

并且还明确提出语言学者不仅要“因文以求义”，还要“因声以求义”[③]：

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义矣，未知因文以求义也；训诂之士知因文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

戴侗的这一主张，实是后世“因声求义”理论的先声，颇见其远见卓识。

可见，“右文说”在宋代已经广为流传，宋儒研究右文蔚然成风。在此以前的学者研究汉字，特别是形声字，都认为形旁表义而声旁表音。

---

① 溷：hùn，《说文》乱也，一曰水浊。

② 戴侗，宋/2006，《六书故》[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p. 17。

③ 戴侗，同上，p. 12。

而“右文说”则发现了形声字的声旁不仅表音，还具有表示意义，提示词源的作用。右文说对后世的研究影响很大，学者们开始注意通过“音近义通”的原理系统地研究汉语词汇的分化孳乳问题，同时也能揭示汉语同源字间的理据联系。殷寄明(2007：17)[①]明确指出，“通过声符义的考释，可以揭示语词的构词理据”；殷寄明(2007：573)[②]对比了中国传统语源研究的“声训”、“语转说”和“右文说”三大流派，认为右文说流派的系源方法很值得借鉴。

清朝是我国“小学”发展的巅峰时期，名家辈出，成果丰硕，在文字、音韵和训诂方面的成就都大大超过前人。语言学者在音韵学不断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将“因声求义”理论化、系统化。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根据音义关系把孤立的汉字贯穿起来，找出他们之间的关联，他在《广雅疏证·自序》[③]中提出“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理论。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小学》[④]中不仅表明文字是“意与声之迹”，更提出了“声象乎义”的学术主张：

> 盖天下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义，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未有文字，以声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故文字谓之名也。
>
> 声象乎义者，以唇舌口气象之也。……更有显而易见者，如“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如口食酸之形，说“苦”若口食苦之形，说“辛”字如口食辛之形，说“甘”字如口食甘之形，说“咸”字如口

① 殷寄明，2007，声符义概说[A]，《汉语同源字词丛考》[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pp. 1－30。

② 殷寄明，2007，后记[A]，《汉语同源字词丛考》[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pp. 573－574。

③ 王念孙，1795/1984，《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p. 1。

④ 陈澧，清/1998，小学[A]，《东塾读书记(外一种)》[M]，杨志刚编校，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pp. 218－231。该段引文见 p. 228。

食咸之形。故曰以唇舌口气象之也。

48 清代学者程瑶田的《果蠃转语记》[①]从表示“果实”的叠韵联绵字“果蠃”出发，通过语音上的联系发展了一个庞大的词群。该文原有四篇，现仅存一篇。这一篇联系了200多个联绵字或字，成为分析联绵字语源和理据的代表作品。

这一时期在理据研究方面最大的突破是在“以形求义”的训诂方法基础上，更注重结合“因声求义”，突破了字形的限制，把汉语词汇的音、形、义三者结合起来研究，所以取得的成就也远超前人，堪称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黄金时代。《说文》大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上》[②]、《广雅疏证序》[③]中多次提到要把汉字的音形义结合起来研究：

> 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箸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推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
>
> ——《说文解字注》
>
>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
>
> ——《广雅疏证序》

段玉裁音形义互求的训诂学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是宋代“右文说”在理论上的发展和提升，大大促进了汉语词源学的研究。

在清代小学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对源起于宋代的“右文说”进一步阐发，黄承吉(清/1984：75)[④]阐明：

---

① 程瑶田，清/2009，果蠃转语记[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398－406。

② 段玉裁，1815/2006，《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p. 764。

③ 段玉裁，1795/1984，段玉裁序[A]，王念孙《广雅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p. 2。

④ 黄承吉，清/1984，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A]，黄生撰《字诂义府合按》[M]，北京：中华书局，pp. 75－83。

六书之中，谐音之字为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

凡字皆起于声，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已通知其义。是以古书凡同声之字，但举其右旁之纲之声，不必拘泥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

黄承吉认为声旁是“纲”，形旁是“目”，“纲为母而目为子”，则纲举目张，字义明晰。他不仅将“右文说”阐发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此基础上，认为许慎“形声”之说有误，而“谐声”为是，这是很有见地的。“右文说”在清代的发展，打通了汉字音、形、义三者的关节，成为汉语同源字研究的钥匙。汉字系统再也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条理、成系统地组织在一起的。但也有学者指出，有些清儒的观点把“因声起义”的法则过分扩大化了（张如清，2007：31）①。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传统语言研究认为语言是有理可据的，历代诸多语言学者从汉字的起源、汉语事物的命名、汉语词汇系统的分化孳乳等多方面阐释了汉语的理据性，其研究贴合汉语的具体实际，成果丰硕。特别是“右文说”的产生和发展，将汉语词汇的音、形、义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不仅对汉语语源学这样的历时理据研究有很大推动作用，对于汉语词汇系统的共时理据研究也非常有启发。我们今天研究语言理据问题，要特别注意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成果。

2.1.4 现当代语言理据研究

语言学史上的分期，一般把影响颇大的洪堡特作为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把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开端。而现代汉语研究，则肇始于 1898 年成书的《马氏文通》。自《马氏文通》刊

① 张如清，2007，读黄承吉“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有感[J]，《中医药文化》(4)：30－31。

行之后，中国的语言研究基本上中断了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传统，转而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故而，我们对现当代语言理据研究的回顾，自西方洪堡特和中国马建忠开始，并不再以地理疆域的不同作标准，而主要按语言学流派分别阐述。

2.1.4.1 语言哲学研究的理据观

陈嘉映(2003：17)[①]指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语言哲学的两个中心问题之一，很多现当代语言哲学家都探讨过这个问题。洪堡特(1836/2006：70)[②]说：

> (大自然中)这一切我们都在语言的种种相似之处中一再见到，并且语言能体现出这一切。因为在我们借助语言进入一个语音世界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语言的结构规律与大自然的规律近似，当他通过这样的结构激发起人那些最高级和最人性的力量的活动时，他使人更进一步理解大自然的形式印象，因为大自然确实也只能被看做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发展。

洪堡特的这种观点总结起来就是“语言和世界同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后来的奥地利裔英国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1922/1988：33－34)[③]表示：

> 4.011 初看，命题——就如它印在纸上的这个样子——并不像时期所讨论的实在的一幅图像。但初看，乐谱也不像音乐的图像，拼音文字(字母文字)也不像是语言的图像。然而这些符号语言却表明，即使就通常的意义而言它们也是其所表现的东西的图像。

---

① 陈嘉映，2003，《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7。

② 洪堡特，1936/2006，《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p.70。

③ 维特根斯坦，1922/1988，《名理论(逻辑哲学论)》[M]，张申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33－34。

4.021　命题是实在的一幅图像：因为，我若懂得一个命题，我即知其所表现的事势。而且无需对我解释其意义，我即懂得该命题。

陈嘉映(2003：142－143)[①]指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对语言本性的主要思考被称为“图像理论”，其基本构想是“语言与世界对应”，并主张“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形式”。这种语言和世界同构的语言观，无疑表明语言的结构是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的，是有理据的。

洪堡特还研究过语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问题，他指出：“语音部分地通过自身，部分地通过与其他语音的比较，产生一种听觉效果，这种效果和对象在人脑中产生的效果相类似，并以此来指明对象”(转引自 Jespersen，1922：396)[②]，并举出语言中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洪堡特的研究揭示了语音象征现象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

维特根斯坦(1953/2001：48－49)[③]提出了“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理论，颠覆了传统的共相观。家族相似理论认为范畴不必有一个特征是所有范畴成员共同拥有的，一个范畴的成员可以以 AB、BC、CD、DE 这样交叉的相似性存在(温格瑞尔、施密特，2006/2009：31)[④]。家族相似性在认知语言学中被视作范畴内非核心成员存在的理据，如 Lakoff (1987：65)[⑤]认为，“从核心成员虽然无法推知非核心成员，但由于家族相似性的存在，核心成员却是非核心成员存在的理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思想对作为认知语言学理论基础和核心议题的“范畴化理论”影响很大。

① 陈嘉映，2003，《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 142－143。

② Jespersen, Ott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p. 396.

③ 维特根斯坦，1953/2001，《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 48－49。

④ 温格瑞尔、施密特，2006/2009，《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M]，彭利贞、许国萍、赵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 31。

⑤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65.

2.1.4.2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据观

谈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首推其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并把这个原则称为其语言学理论的“第一个原则”（索绪尔，1916/1980：102）①。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影响巨大，在20世纪语言学界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不同的声音几乎都被其淹没，但对其理解却往往有失片面。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首先必须注意其产生的历史背景。顾海峰（2006/2009）②指出：

>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科学与化学科学的发展，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自然科学强调对事物内部结构和关系进行分析，反映在哲学中就是强调客观与理性，反映在语言学中就是把语言看做是一个自足的、有内在法则的符号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语言是自治的。其结果就是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者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分离。语言符号任意观正是在这种客观主义哲学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次，要注意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是一个排除了语言的历时因素、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纯粹的”语言系统，好像实验室里经过提纯的化学药品或物理学的绝对真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张绍杰（2004：139）③指出：

> 他（索绪尔）的解释完全基于对语言符号外部基础的否定，

---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02。

② 顾海峰，2006/2009，国内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学术争鸣述评[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33－142。

③ 张绍杰，2004，《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139。

> 而在语言系统内探求其内部基础，也就是说，索绪尔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语言的外部引向语言的内部，从语言被看做的独立实体引向关系系统来解决任意性和理据性的根本问题。所以，索绪尔的任意性和理据性概念本质上属于内部语言学的，而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外部语言学的概念。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考虑语言内部的问题，即取消了语言和现实关系这一问题，这也成为他遭人诟病的一个原因。另外，索绪尔本人对理据这一语言现象本身也持认同的观点，除了肯定语言中拟声词和感叹词确有理据存在（索绪尔，1916/1980：104）[①]，还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分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其中的相对任意性就是理据的一种。索绪尔（1916/1980：131）[②]指出：

> 符号任意性的根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把完全任意的，即无理据的和相对任意的区分开来。有些符号是绝对任意的；而在另一些符号中，我们注意到任意性虽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却存在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有理据的。

索绪尔认定的相对有理据的语言成分是通过句段关系组合起来的合成语言成分。索绪尔对于语言符号理据性问题的看法是：语言系统内部的单纯语言符号（除拟声词和感叹词这样“次要”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而合成语言符号是有理据的。

结构主义的影响超越了语言学界，扩大到心理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在结构主义的洪潮中，语言符号任意说为绝大多数语言学者所接受，但结构主义流派内部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雅各布森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Jakobson（1965：21－37）[③]抛开索绪尔的符号观，转而诉诸皮尔斯的符号学原理，对语言符号任意说提出了大胆的质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104。

② 索绪尔，同上，p.131。

③ Jakobson, Roman. 1965.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J]. *Diogenes* (51): 21－37.

疑，认为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如时序上的一致；即便单纯词也可能存在音义的对应关系，如语音象征、语音联想和词汇的意义衍生等语言现象，都是语言中的理据现象。

结构主义语言学盛行的时期，另一位研究过语言理据现象的著名语言学家是丹麦的叶斯帕森。叶斯帕森不属于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但在结构主义拥有压倒优势的时代里，他的观点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叶斯帕森重视语言音义关系的研究，在 Jespersen（1922）[①]中专辟一章《语音象征》讨论音义之间的联系。Jespersen（1922：197）[②]认为，将所有的语音现象都和意义挂上钩固然不对，但将音义之间的联系全然看做任意的，也是不符合语言事实的。实际的情况是：即便语音不总能提示意义，在某些情况下，语音象征还是存在的。Jespersen（1922：396－411）[③]讨论了 7 种不同的语音象征现象，对这一问题的阐释系统而全面，列举的实例也不局限于拟声词一种。

总的来说，结构主义语言学一般仅承认合成符号的理据性，而认为单纯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几乎所有的语言学流派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内，也有学者对语言符号任意说提出质疑，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理据研究。

2.1.4.3 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理据观

1957 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④]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乔姆斯基革命”的时代。形式主义语言学将语言看成一个抽象的数学系统，是一个“按一定规律构成的句子或符号串的有限的或无限的集合”（冯志伟，1999：212）[⑤]。乔姆斯基语言理论所研究的语言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系统，完全采用演绎的方法分析，认为句法

---

① Jespersen, Ott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② Jespersen，同上，p. 197。

③ Jespersen，同上，pp. 396－411。

④ 乔姆斯基，1957/1979，《句法结构》[M]，邢公畹、庞秉钧、黄长著、林书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⑤ 冯志伟，1999，《现代语言学流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p. 212。

是独立的、高度自治的，语言的形式不取决于语言的功能，而将语义因素完全排除在句法之外。Haiman（1985/2009：D17）[①]指出，乔姆斯基认为句法结构与语言之外的任何因素无关，这些因素包括意义、交际意图或使用频率。宁春岩（2001：F25）[②]表示：

> 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任务是使用“理想化”的方法研究普遍语法的生物学属性或人的语言能力，而所谓“理想化”方法就是“忽略各种具体语言间的差异、忽略语言社团内个体间的差别，观察语言使用者的语感，通过系统的推导方法，探寻具有普遍语法意义的规律，为人脑的语言系统提供形式化的描写。

可以说，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不仅排除了一切语言的外部因素，甚至在早期理论中连语义的作用也不予考虑，是对语言理据否定得最为彻底的语言学流派。

2.1.4.4 功能主义语言学的理据观

功能主义语言学派重视语言的使用和交际功能，在语言理据问题上持支持的观点。功能主义语言学的代表韩礼德提出了“自然语法”（Natural Grammar）的概念（Halliday，1994/2000：F43）[③]：

> 意义和语法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语法形式自然而然地和其所表示的意义相关。功能语法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相关性表现出来。

同时，韩礼德也接受了索绪尔的观点，认为意义编码成语音或书面形式则基本上是一个任意的过程，如“雨”这一概念在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和

① Haiman，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 D17.

② 宁春岩，2001，导读[A]，见 Jamal Ouhalla《转换生成语法导论：从原则参数到最简方案（第二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p. F23 - F33。

③ Halliday，M. A. K. 1994/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p. F43.

汉语中的语音形式各不相同，表明这些语音形式和语言代码之间，或者语言形式和语言代码所指的“雨”这一气象现象之间，是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Halliday，1994/2000：F43)[①]。这表明韩礼德认为，不发生语法关系的单纯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只有在语法发生作用的部分，语言形式才是“自然”的。

2.1.4.5 认知语言学的理据观

认知语言学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目前已发展成为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流派，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认知语言学的理据观首先表现在对结构主义理据观的接受。Radden & Panther (2004：1)[②]指出：

> 索绪尔提出的相对理据性和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任意性和可预测性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理据问题是在这个连续体上的程度问题。

但是，认知语言学对理据问题的认识相比结构主义语言学有了很大的提升，认为大部分语言现象是由理据驱动的，提出理据是“语言常态”(the norm of language)的观点。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 George Lakoff 指出：

> 它们(人的概念和语言系统)从各个方面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理据的。理据是认知的核心问题，其原因是：掌握有理据的东西，要比掌握任意的东西更容易；对有理据的知识进行记忆和使用，也要比任意的知识来得容易。(Lakoff，1987：346)[③]

---

① Halliday, M. A. K. 1994/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 F43.

② Radden, Günter & Panther, Klaus-Uwe. 2004.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motivation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 - 46.

③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346.

认知语言学者认为理据是语言的常态，这是其理据观和结构主义的根本区别，如Lakoff（1987：346）[①]表示“理据现象似乎在自然语言中是一种常态，而非特例”；Radden & Panther（2004：1）[②]也表示：

> 索绪尔的理据观和当代认知语言学在此问题上的看法主要是视角不同：他将理据看成是受到限制的任意性，而认知语言学者则将理据看成是语言的常态，只在理据无法解释时才诉诸任意性。

并且认为语言理据现象是由人的认知决定的[③]。Heine（2004：104－105）[④]区别了结构理据（structural motivation）和基因理据（genetic motivation）两种不同的理据观，前者即结构主义的理据观，后者代表认知语言学的理据观。他赞成认知语言学的理据观，指出：

> 人类行为并非任意，而是由理据驱动的。语言结构也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之一，所以也是有理据的。如果我们发现有任意的语言结构存在，则须对其作出特别的解释。

认知语言学派的许多学者在语言理据的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除了散见于各家著述的理据研究成果，还出版了 Cuyckens 等（2003）[⑤]和 Radden & Panther（2004）[⑥]两本论文集。

---

①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346.

② Radden, Günter & Panther, Klaus-Uwe. 2004.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motivation [A]. In Radden & Panther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46.

③ Radden & Panther，同上，p. 23。

④ Heine, Bernd. 2004. On genetic motivation in grammar [A]. In Radden & Panther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03－120.

⑤ Cuyckens, Hubert; Thomas Berg; Rene Dirven; Klaus-Uwe Panther (Eds.), 2003. *Motivation in Language: Studies in Honor of Günter Radde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⑥ Radden, Günter & Panther, Klaus-Uwe (Eds.). 2004.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认知语言学对理据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源自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象似性”这一概念，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目前已召开了多次以象似性研究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于象似性的定义，各家的范围各有不同，但都承认象似性至少是理据的一种表现形式。从事语言象似性研究的学者认为，“意义是基于体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体与世界互动的结果，与形式不可分离，两者间具有许多可论证的关系，因此象似性理论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中也就顺理成章”（王寅、李弘，2002/2009：92）①。Haiman（1985）②、Haiman（1985/2009）③、Simone（1995）④、Nänny & Fischer（1999）⑤、Maeder，Fischer & Herlofsky（2005）⑥、王寅（2007：505－564）⑦、王寅（2009）⑧等，都是象似性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目前象似性研究的成果涉及语言的各个方面，但主要集中在句法上。对于象似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将留待 2.2.2 继续深入。

2.1.4.6 中国现当代的语言理据研究

由于汉语在发生学和类型学上与印欧系语言差异巨大，汉语的理据研究自古就呈现出与西方语言研究传统迥然不同的趋向和特征。《马氏

---

① 王寅、李弘，2002/2009，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84－94。

② Haiman, John (Ed).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③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④ Simone, Raffaele (Ed.) 1995. *Iconicity in Languag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⑤ Nänny, Max & Olga Fischer (Eds.). 1999. *Form Miming Mea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⑥ Maeder, Costantino; Olga Fischer & William J. Herlofsky (Eds.). 2005. *Outside-In — Inside-Out: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⑦ 王寅，2007，《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⑧ 王寅，2009，《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通》之后，虽然中国的语言研究在整体上出现大量引进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在西方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的局面，但在理据研究的领域内，仍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清末民初学者章太炎以“小学”研究闻名于世，在《语言缘起说》（章太炎，1910/2003：31）[①]中谈到理据问题，认为“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而将事物的得名归结为两点：“以音为表”和“以德为表”，即用事物的声音和性质来表示事物本身。章太炎还指出，事物（即“实”）的名称是由其“德、业”两个方面决定的，认为“一实之名，必与其德若，与其业相丽”。在《原名》中，章太炎认为“名言者，自取像生”（章太炎，1910/2003：118）[②]。所以，在章太炎看来，语言的起源和事物得名都是有理可据的。

中国理据研究在现当代时期取得的成就之一是延续了“右文说”的训诂研究传统，进行音、形、义相结合的汉语研究。刘师培、杨树达、黄侃[③]、沈兼士等国学大师都曾对“右文说”进行过专门研究，使其理论日趋完善，例证不断充实。刘师培（2004：149）[④]说：

> 试观古人名物，凡义象相同，所从之声亦同。则造字之初，重义略形，故数字同从一声者，即该于所从得声之字，不必物各一字也。及增益偏旁，物各一字，其义仍寄于字声，故所从之声同，则所取之义亦同。

沈兼士的文章（1933/1986：73－185）[⑤]是右文说研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这篇长文系统地梳理了右文说发展的历史进程、各家对右文说的评价以及右文说的应用价值，同时提出右文研究不能拘泥于字形，大大拓

① 章太炎，1910/2003，语言缘起说[A]，《国故论衡》[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31。
② 章太炎，1910/2003，原名[A]，《国故论衡》[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118。
③ 黄侃（1983：206－210）、黄侃（1983：210－215）专文讨论汉语中的“右文”现象。
④ 刘师培，2004，《字义起于字音说》[A]，《清儒得失论》[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149。
⑤ 沈兼士，1933/1986，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pp.73－185。

宽了右文解释的范围。与此鸿文几乎同时代的杨树达(1934/2007：60－80)[①]、杨树达(1935/2007：80－112)[②]、杨树达(1943/1983：97－109)[③]、杨树达(1950/1983：171－181)[④]则以翔实严谨的考证为“右文说”提供了许多例证。

右文说的发展和完善大大推进了汉语词汇的语源研究，沈兼士(1933/1986)[⑤]专辟一节《应用右文以探寻语根》予以讨论，杨树达(转引自孟飞，2005)[⑥]曾表示：

> 右文所讨论，皆语言之根柢，欧洲人谓之 Etymology，所谓语源学也。盖语根既明，则由根以及干，由干以及枝叶，纲举而万目张，领挈而全裘振，于是训诂学可以得一统宗，清朝一代极盛之小学可以得一结束。

杨树达此说明确提出右文说的语源学价值[⑦]。陈寅恪(1986：183)[⑧]也指出音、形、义相结合的语言文字研究是今后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方向：

---

① 杨树达，1934/2007，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A]，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p. 60－80。

② 杨树达，1935/2007，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A]，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p. 80－112。

③ 杨树达，1943/1983，造字时有通假证[A]，《积微居小学述林》[C]，北京：中华书局，pp. 97－109。

④ 杨树达，1950/1983，字义同缘于语源同续证[A]，《积微居小学述林》[C]，北京：中华书局，pp. 171－181。

⑤ 沈兼士，1933/1986，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pp. 73－185。

⑥ 孟飞，2005，《右文考》，信息来源：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mengfei_ywk.htm，登陆日期：2009－10－03。

⑦ 事实上，汉语同源字这样的语源研究，其范围要比 etymology 广得多，意义也比 etymology 大得多。因为西方语源研究基本仅涉及语言的历时层面，词汇的原始形式也多为现代形式所更替，不再实际使用了。而汉字虽有古今之分，但古字往往只是不常用而已，并非为今字所替代；同时，目前常用的汉字中，仍然存在着同源关系的汉字，有效地利用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会为我们今天的语言实践做出很大的贡献。

⑧ 陈寅恪，1986，陈寅恪先生来书[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葛信益、启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p. 183。

> 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

陈寅恪先生不仅指出“右文”研究的语源学意义，并且点明了中国文字迥异于西方，中国语言研究如果完全照搬西方语言学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古今结合和中西结合的道路，语源研究也同样如此。汪寿明、潘文国(1992：261－264)[①]将中国传统语源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指出近代以章太炎、黄侃、沈兼士、杨树达等为代表的语源研究结合了因声求义和以形求义的传统，“以声音驾驭声符来探讨语源，实质上已离开了狭隘的右文，也不再是幼稚的声训，而是站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此后，我国汉语语源学著作层出不穷。王力(1982)[②]收词三千余条，是我国现代第一部严谨的语源字典，一改“此前章太炎的《文始》、高本汉的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可靠性都不大”(王力，1982：1－2)[③]的局面。另外如殷寄明(1998)[④]、刘钧杰(1999a)[⑤]、刘钧杰(1999b)[⑥]、殷寄明(2000)[⑦]、曾昭聪(2002)[⑧]、任继昉(2004)[⑨]、殷寄明(2007)[⑩]、郝士宏(2008)[⑪]等都是近年来语源研究的力作，大都深受中国训诂学传统滋养。齐冲天、齐小乎(2010)[⑫]从音义关系入手将 9070 个汉字(含现代汉语

① 汪寿明、潘文国，1992，《汉语音韵学引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p. 261－264。
② 王力，1982，《同源字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③ 王力，1982，《同源字典》的性质及其意义[J]，《语文研究》(1)：1－2。
④ 殷寄明，1998，《汉语语源义初探》[M]，上海：学林出版社。
⑤ 刘钧杰，1999a，《同源字典补》[Z]，北京：商务印书馆。
⑥ 刘钧杰，1999b，《同源字典再补》[Z]，北京：语文出版社。
⑦ 殷寄明，2000，《语源学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⑧ 曾昭聪，2002，《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M]，合肥：黄山书社。
⑨ 任继昉，2004，《汉语语源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
⑩ 殷寄明，2007，《汉语同源字词丛考》[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⑪ 郝士宏，2008，《古汉字同源分化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⑫ 齐冲天、齐小乎，2010，《汉语音义字典(上下)》[Z]，北京：中华书局。

7 000常用字)分为752个词族,每个词族均从一个语源字派生而成,少则两三字,最多的有上百个字。该字典确认了3 000多个字由两个语源、两部分音义构成,提出"单音节词也有构词法"、"殷周及殷周以前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汉语单音节词的发展,主要靠两部分音义体的结合"等重要观点,对字的理据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右文说之后"音、形、义"结合的语言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本土的语言学理论"字本位"学说。字本位学说既注重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又注重吸收我国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突破西方语言研究只关注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局限,主张汉语的基本单位是音、形、义相结合的"字",从而将"形"这一要素纳入汉语研究的视野,符合中国训诂研究不仅"因声求义",也"以形求义"的传统,比较好地结合了汉语的实际情况。"字本位"理论是非常重视理据研究的语言理论,其重要著作徐通锵(1997①;2001②;2005③;2008④)提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一论断,并辟出专门章节讨论语言的理据性问题,指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的代表,"汉语的研究传统历来偏重于编码的理据性","汉语是以理据性的约定为基础性编码原则的语言"(徐通锵,2008:48-49)⑤。潘文国(2002:91)⑥也指出,汉字这样表意的自源文字,文字与意义之间有必然的理据性。目前"字本位"学说尚处于草创阶段,其对语言理据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我国从事语言理据研究的学者也为数不少,成果丰硕,其中王艾录等学者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王艾录(1995/2006)⑦是一部专门解释汉语复合词理据的词典,并在其后附有《导论》,探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

---

① 徐通锵,1997,《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徐通锵,2001,《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③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汉语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④ 徐通锵,2008,《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⑤ 徐通锵,同上,pp.48-49。

⑥ 潘文国,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91。

⑦ 王艾录,1995/2006,《汉语理据词典》[Z],北京:华龄出版社。

理据性等问题；其后出版的王艾录、司富珍(2001)[①]和王艾录、司富珍(2002)[②]以及王艾录(2009)[③]则是对语言理据问题系统的理论研究。王艾录等学者将理据看成是“语言生命的基因”，明确提出了不同类型理据的存在，阐明了理据研究的意义和应用价值，认为“现代汉语是世界上理据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取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路线，但在具体的语词理据问题上，仍以历时考证为主。在王艾录教授的主持下，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语言理据研究所于2003年正式成立，这可谓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理据研究的学术机构。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现当代的语言理据研究一方面积极借鉴西方语言研究的各种理论、方法，一方面注重从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中汲取营养，试图走出一条中西结合、古今结合的研究道路。这一阶段从事理据研究的学者为数众多，成绩斐然，理据研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但是，我们认为，目前理据研究的主要不足仍然是实现中国研究传统和普通语言学接轨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语言理据的研究，甚至理论语言学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局限。

第二节　与理据相关的一些概念

2.2.1　任意性与理据性

语言的任意性和理据性问题是西方语言思想传统探讨的根本问题之一，可以看做语言研究的终极问题。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面貌成为西方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古希腊时期是“自

① 王艾录、司富珍，2001，《汉语的语词理据》[M]，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 王艾录，2009，《复合词内部形式探索——汉语语词游戏规则》[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然论”(Phisis,即 natural language theory)和“约定论”(Monos,即 conventional language theory)的对立,到了中世纪体现为唯名论(Nominalism)和唯实论(Realism)的对立,在 17、18 世纪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对抗,到 20 世纪现代语言学建立之后,体现为“任意性”(Arbitrariness)和“理据性”(Motivation)这一问题(参见 2.1.2.1 脚注对唯名论/唯实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说明)。直至今日,“任意性”仍然是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我们进行理据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2.2.1.1 现代语言学的“任意性”概念

索绪尔(1916/1980)[①]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详细界定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任意性概念。在这部著作中,索绪尔首先区分语言和言语,将语言使用者这一个人因素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然后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将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排除出语言系统;再区分语言的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从而又将语言的历史演变等因素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是一个“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系统(索绪尔,1916/1980:323)[②],是一种纯粹的、理想的语言状态。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充满了脱离现实的理想化魅力。

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指语言共时系统内部的符号;为了排除外部世界种种因素对其理论体系的干扰,他将语言符号定义为一个由两个要素构成的心理实体。索绪尔(1916/1980:101 - 102)[③]表示:

> 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
>
> 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 索绪尔,同上,p.323。

③ 索绪尔,同上,pp.101 - 102。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界定的语言符号是一个二元结构的单位，由表示意义的“概念”即所指和表示声音的“音响形象”即能指构成。由于所指和能指都是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心理实体，两者的联系就自然是任意的，即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的联系是不可论证的、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基石，被索绪尔称作语言学的“第一个原则”，对20世纪的语言研究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成为语言学者入门的常识。

虽然索绪尔(1916/1980：184)[①]认为“整个语言系统都是以符号的任意性的不合理原则为基础的”，但语言中却包含了“根本上任意的和相对地可以论证的”两种要素。索绪尔(1916/1980：183)[②]认为：

> 相对地可以论证的概念包含：(1)把某一要素加以分析，从而得出一种句段关系；(2)唤起一个或几个别的要素，从而得出一种联想关系。

可见，相对地可以论证的语言符号，都是通过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构成的合成符号，如英语复合词和派生词；而根本上任意的语言符号实际上就是单纯语言符号，这一点从索绪尔所举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

索绪尔(1916/1980：184)[③]还认为语言的任意性/理据性存在程度的差异：

> 一切都是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在最少的组织性和最少的任意性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的差异。

索绪尔认为，绝对的理据性/任意性构成一个连续体的两极，某一语言的任意性/理据性程度就是这一连续体上的某一点。

---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184。
② 索绪尔，同上，p.183。
③ 索绪尔，同上，p.184。

综上所述，索绪尔界定的语言是一个和外部世界无关的关系系统，故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一个内部语言学概念；单纯语言符号是绝对任意的，而合成语言符号则是相对有理据的；各种语言间有理据程度的差异。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传统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20世纪语言学发展的方向，还对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谓意义深远。索绪尔的理论体系严谨缜密，语言符号任意性学说在共时语言系统内部的二元符号世界中可以得到完美的阐释，无懈可击，这一点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如赵彦春（2001/2009：102）[①]、朱长河（2005/2009：130）[②]。但是，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我们必须注意到，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成立的前提是排除语言的历史、文化、社会、使用者等诸多外部因素的理想状态，和绝对真空、纯粹化学制剂一样，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是有限度的。把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普遍化、绝对化的做法，是有违语言研究的科学精神的。

2.2.1.2 任意性与理据性的关系

语言研究史上，关于任意性与理据性关系的问题，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结构主义的观点：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任意性是语言系统的根本属性，是语言不变性和可变性的根源。如果我们按照索绪尔的界定，把语言看成一个内部的、共时的系统，认定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二元结构，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基本上可以成立。但是，索绪尔同时也认为任意性虽然作为语言系统的根本属性决定了语言的本质，但其作用并不可以无限地夸大，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对任意性原则起到制约和调节的作用。索绪尔

---

① 赵彦春，2001/2009，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问题的辨析[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1年第4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95－102。

② 朱长河，2005/2009，语言的象似性问题：外界的质疑与自身的应答[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5年第1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24－132。

(1983/2001：131)[①]认为：

> 语言符号非理性的任意性原则如果漫无限制地加以应用，将导致混乱局面。但是，大脑在某些领域为混乱的语言符号引进了一条秩序和规则的原则，这就是相对理据性。如果语言机制完全合乎理性，我们只要研究这个理性机制就够了。但语言本质上是一个混乱的系统，这一机制仅对语言系统作部分理性的纠正。所以我们在研究语言的理性机制时，必须将它看做对语言结构任意性本质的限制。

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清楚地意识到，任意性原则无限扩大的后果就是整个语言系统都成为一个杂乱无章、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大杂烩，这既不符合语言事实，也不符合人类掌握语言的认知规律。所以，他在认定单纯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又诉诸符号间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理据性，以理据性作为任意性的限制条件，大大加强了其理论的解释力，从而使结构主义理论建构起来的语言符号世界与人们对语言事实的认识大致相符。

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根本属性、理据性是次生属性（通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产生）的观点影响广泛，索绪尔之后的许多著名语言学者都接受和继承了这一观点。萨丕尔（1921/1985：9）[②]表示，“语言是一种特别的符号关系，一方面是一切可能的意识成分，一方面又是位于听觉、运动和其他大脑和神经线路上的某些特定成分；从心理上说，这关系是一种任意关系”。王艾录、司富珍（2002：40）[③]指出，萨丕尔认为任意性是属于心理范畴的，比起许多既不论层次，也不讲范畴而以绝对化的观点来看待任意性的人，要进步许多。布龙菲尔德（1933/

①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83/2001.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Translated by Roy Harri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131.

② 萨丕尔，1921/1985，《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9。

③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 40。

1980：172）[①]明确提出，“语言形式跟意义的联系完全是任意的”。霍凯特（1958/1986：6）[②]认为，“所有已知的语言都显示出一定的一贯性和许多任意的不一贯性。我们看不出自己语言的任意特征，是因为我们习焉不察”。我们注意到，许多语言学家的表述与索绪尔本人的表述一样，为绝对的“任意性”加上了一些限制。这提示我们注意结构主义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原则有其适用的范围：这是一个脱离客观世界的、共时的、内部的、二元的语言符号系统，超越了这一范围，就必须重新考量任意性原则的适用性。

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跨出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既从共时的、内部的角度看待语言，又关注历史、文化、社会、交际等种种语言系统外部的因素，就会发现语言系统除了有任意性原则的作用，还接受理据性原则的控制。结构主义之后的语言学流派大都跳出了索绪尔为语言系统划定的条条框框，从而能从崭新的角度审视语言，重新界定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关系。诸多语言学者在系统深入地研究语言中的理据现象之后，提出任意性和理据性是语言中同等重要、共同作用、对立统一、相互补充的基本原则。王艾录、司富珍（2001：4）[③]和王艾录、司富珍（2002：34）[④]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和任意性看成语言自组织过程中各司其职而又相辅相成的两种变量；认为语言符号既存在任意性，也同时存在理据性；“任意性是语言贯穿始终的变量，它的存在支持着语言的变异性、选择性和多样性，理据性是语言普遍潜在的动因，它支持着语言的有序性、机制性和可证性”。王寅（1999/2009：77－83）[⑤]认为，“语言符号有其象似性的一面，也有其任意性的一面；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既

① 布龙菲尔德，1933/1980，《语言论》[M]，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72。

② 霍凯特，1958/1986，《现代语言学教程》[M]，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 6。

③ 王艾录、司富珍，2001，《汉语的语词理据》[M]，北京：商务印书馆，p. 4。

④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 34。

⑤ 王寅，1999/2009，Iconicity 的译名与定义[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中国翻译》1999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77－83。

互相对立，也互相补充”。Bernd（2004：106）[①]认为，“语言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是部分任意和部分有理据的”。张绍杰（2004：VII）[②]表示，“语言系统中任意性作为一条非理性原则同规定性的理性原则相互并存，彼此相互作用使语言保持平衡地运行和发展，以发挥其交际功能的作用”。季国清（1998/2009：56、61）[③]认为语言的共时结构是“历史效果、视界融合、文化积淀的结果”，“世界在语言的边界处封闭；语言则把世界的全部信息按其自身的方式编码储存；因此，语言既有其独特性又有其与世界的合目的性”；索绪尔发现了语言的独特性，提出了任意性原则，而语言的合目的性就是当今语言研究的热点——语言的理据性问题。朱长河（2005/2009：131）[④]提出语言的“理据性本身也是任意的”、“任意性也是有理据的”这样的观点，将理据性和任意性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立统一。这些学者将任意性和理据性看成相辅相成的两股力量，向不同的方向塑造着语言的基本面貌，每种语言都是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任意性和理据性所占的比重在各个语言中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塑造语言基本面貌方面的重要程度却是同样的。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理据性的重要性超过了任意性，是塑造语言的根本力量。譬如，韩礼德从语言功能的角度阐释了理据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语言的进化满足了人类的需要，就这些需要而言，语言的组织方式是功能的——不是任意的。功能语法本质上是一种‘自然’语法，也就是说，功能语法中的一切最终都可以联系语言的使用给以解释”（转引自张绍杰，2004：9－10）[⑤]。这表明功能主义倾向于认为一切语言成分

① Heine, Bernd. 2004. On genetic motivation in grammar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03－120.

② 张绍杰，2004，《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VII。

③ 季国清，1998/2009，语言的本质在“遥远的目光”中澄明——语言哲学的新视野[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1998 第 3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53－63。

④ 朱长河，2005/2009，语言的象似性问题：外界的质疑与自身的应答[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5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24－132。

⑤ 张绍杰，2004，《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9－10。

都是有理据的。Haiman (1985/2009)[①]认为，语言结构和其他各种图示一样，反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语言的任意性并非语言的天性和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知活动的经济性原则、泛化和联想等特性造成的。Haiman 这种“任意性是有理据的”的观点，实际上否定了任意性作为语言根本属性的地位，而将其作为语言的次生属性看待。Lakoff (1987: 346)[②]认为理据现象是认知的核心问题，人类语言活动作为认知活动的重要部分，从本质上说也是理据性居主导地位的；认知语言学将理据性看成语言的常态，而任意性现象则需予以特别的解释。李葆嘉(2009: 19－52)[③]认为人类的语言符号从根本上是有理可据的，“在人类语言的发展长河中，虽然语言符号具有自发任意性的倾向，但是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是其原生属性，而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次生属性”，任意性是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可论证性的磨灭而产生的，并且系统地提出了论证各类语言符号理据的具体方法，从而说明语言是全方位地可论证的。陆丙甫、郭中(2005: 32－39)[④]也指出，许多表面任意性实际上是不同理据性互相作用的结果，转而主张所有语言形式都是有理据的。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认为理据性是语言根本属性的学者，同时也承认单纯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如 Haiman (1985/2009: 3)[⑤]

---

①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3.

②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46.

③ 李葆嘉，2009，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三论[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19－52。该文是李葆嘉此前发表的三篇论文的合辑，包括：(1)李葆嘉，1986，荀子的王者制名论与约定俗成说[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4)；(2)李葆嘉，1994a，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与复归[J]，《语言文字应用》(3)，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4 年 11 期全文转载；(3)李葆嘉，1994b，《论语言符号的论证模式及其价值》[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3)，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1994 年第 61 期全文转载。收入《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时作者加了《前记》。

④ 陆丙甫、郭中，2005，语言符号理据性面面观[J]，《外国语》(6)：32－39。

⑤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3.

称“任意性原则的普遍适用是显而易见的”，Halliday（1994/2000：F43）[①]认为单纯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说明诸多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和学者讨论的理据性原则从语言系统外部着眼，它和从语言系统内部着眼的、单纯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任意性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功能主义语言学讨论的理据性，建立在人类语言活动必须满足交际目的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语言的交际功能成为一切语言现象和语言活动的理据。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必须遵守人类认知活动的一般规律，即人类的认知规律为语言现象和语言行为提供了理据。这种从语言系统外部着眼的理据观，并不涉及语言系统内部单纯符号的音义关系，而往往把视点集中在语言符号之间，集中在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功能主义、认知主义和结构主义理据观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1)前二者的理论体系着眼于语言系统的外部因素，后者的理论针对语言系统内部；(2)前二者的理论体系建立在理据性的基础上，将理据性作为语言的根本属性；而后者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任意性的基础上，理据性是语言的次生属性，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远不如任意性重要。

人类语言的理据现象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复杂现象，既可以从语言系统内部的符号关系上着眼，也可以从语言系统外部的历史、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着眼。所以在讨论任意性和理据性这一对重要概念的关系时，有必要对纷繁的语言现象做出区分。我们认为，在语言的共时系统内部，任意性和理据性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两股力量，从不同的方向共同塑造语言的基本面貌。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类，有着相似的自然环境和基本相同的生理结构，却创造出异彩纷呈的世界语言版图，使得操不同语言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和结构表达共同的概念，传达共通的意义，这是任意性的作用。同时，人类的语言符号和语言结构，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总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律生成并组织在一起的，这就是理据的作用。我们认同索绪尔（1916/1980：184）[②]关于不同语言的任意

① Halliday, M. A. K. 1994/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 F43.

②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84。

性/理据性程度存在差异的论断，但是不同语言的任意性/理据性在塑造该语言基本面貌的作用虽然有大有小，对于这一语言整体来说，任意性和理据性都同样不可缺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两者的地位同等重要。另外，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不同，我们认为语言的任意性/理据性不仅存在于合成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中，而且存在于单纯语言符号的形义关系中。从这一角度看，(单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仅是一个局部适用的原则，并不能构成语言系统运作的唯一基础。语言系统是建立在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双重原则的基础上的。

如果我们从历史、文化、社会以及交际、认知等人类活动的角度看待语言，则会发现人类所有的语言现象和语言活动几乎都是有理可据的。一切历史上存在过和现存的语言现象，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条件下产生并发展的，背后必然有其形成的背景和原因。陆丙甫、郭中(2005：32)[①]指出，“尚未找到理据性”不等于“任意性”。而任意性现象的形成，是否也有其背后的原因呢？语言研究的任务，是找到纷繁芜杂的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探求语言理据的过程。我们认为，语言的面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现象背后的理据是复杂的、多元的，可能无法马上得到有效合理的解释。这里我们认同 Lakoff (1987)[②]的观点，将任意性看成是不得已而最后诉诸的解释；而且我们认为，只要人类对于语言规律的探究不停息，就永远也不能把任意性视为语言现象最终的、合理的、完美的解释。

2.2.2 象似性与理据性

自 Haiman (1985/2009)[③]和 Haiman (1985)[④]正式出版以来，认知

① 陆丙甫、郭中，2005，语言符号理据性面面观[J]，《外国语》(6)：32－39。

②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③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④ Haiman, John (ed).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语言学理论框架下的语言象似性研究已经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深入到语言的各个层次，构成当今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象似性和理据性这两个概念联系密切，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2.2.2.1 语言象似性研究的现状

尽管人类“语言的形式可以模仿语言的意义”(Haiman，1985/2009：D17)[①]的象似性观念，在西方学术传统里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但正如我们在此前追溯理据研究的历史时总结的那样，这种象似性的语言观在西方思想发展和语言研究的进程中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对语言象似性的研究也不受重视。Haiman (1985：1)[②]指出，西方理论语言学家为了追求理论体系完美的一致性，对不能解释的语言象似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Jakobson (1965：21－37)[③]是最先注意到皮尔斯将符号分为象似符、标记符和代码符理论并将象似性概念运用到语言研究上的语言学家，他运用皮尔斯的理论对语言屈折形态和句法结构中的象似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这篇论文在当时的语言研究领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后语言研究的功能主义和认知学派逐渐兴起，对语言象似现象的研究渐成规模。Haiman (1980)[④]和 Haiman (1983)[⑤]的发表，标志着象似性概念开始引起主流语言学界的关注。1983 年 6 月，“句法象似性学术研讨会”(Symposium on Iconicity in Syntax)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召开，大会论文集 Haiman (1985)[⑥]和另一部专门讨论句法象似性问题的专著 Haiman

①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 D17.

② Haiman, John (ed).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 1.

③ Jakobson, Roman. 1965.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J]. *Diogenes* (51): 21－37.

④ Haiman, John. 1980.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 [J]. *Language* 56 (3): 515－540.

⑤ Haiman, John. 1983. Iconicity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J]. *Language* 59: 781－819.

⑥ Haiman, John (ed).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5/2009)[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揭开了语言象似现象研究的新篇章。1992年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语言象似性学术研讨会",大会的论文集Simone (1995)[②]收录了参会学者向大会提交的重要论文,影响很大。1996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联合开展了"象似性研究项目"(the Iconicity Research Project),由阿姆斯特丹大学的Olga Fischer教授和苏黎世大学的Max Nänny教授、Christina Ljungberg主持,并于1997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语言与文学象似性学术研讨会"(Symposium on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至今已经举办了7届会议[③]。会议论文集均由John Benjamins出版,形成一个名为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的书系,迄今已经出版了5部,即Nänny & Fischer (1999)[④]、Nänny & Fischer (2001)[⑤]、Müller & Fischer (2003)[⑥]、Maeder, Fischer & Herlofsky (2005)[⑦]、Tabakowska, Ljungberg & Fischer (2007)[⑧]。近年来

---

①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② Simone, Raffaele (ed). 1995. *Iconicity in Languag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③ 这7次会议的举办时间分别为:1997年3月在瑞士苏黎世的University of Zurich,1999年3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University of Amsterdam,2001年3月在德国耶拿(Jena)的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2003年3月在比利时鲁汶拉那(Louvain-la-Neuve)的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2005年3月在波兰克拉科夫(Krakow)的The Jagiellonian University,2007年4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University of Johannesberg,2009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University of Toronto。

④ Nänny, Max & Olga Fischer (ed). 1999. *Form Miming Mea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⑤ Fischer, Olga & Max Nänny (ed). 2001. *The Motivated Sign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⑥ Müller, Wolfgang G. & Olga Fischer (ed). 2003. *From Sign to Sig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⑦ Maeder, Costantino; Olga Fischer & William J. Herlofsky (ed). 2005. *Outside-In — Inside-Out: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⑧ Tabakowska, Elzbieta; Christina Ljungberg; Olga Fischer (ed). 2007. *Insisting Images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的该书系不再局限于语言与文学象似性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推出了该系列的第6及第7卷De Cuypere（2008）[①]和Willems & De Cuypere（2008）[②]。前者是以象似性为题的一部博士论文，可谓迄今为止全面系统讨论象似性问题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后者也是一本论文集。

由于中国的语言研究素来有重视语言理据的传统，西方的语言象似性研究兴起后，很快在国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自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的许多知名学者纷纷发表了关于象似性研究的重要成果，王寅（2009）[③]是一部汇集了国内象似性研究所有重要成果的论文集，收入了沈家煊（1993/2009）[④]、杜文礼（1996/2009）[⑤]、严辰松（1997/2009）[⑥]、王寅（1998/2009）[⑦]、王寅（1999/2009）[⑧]、延俊荣（2000/2009）[⑨]、文旭

---

① De Cuypere, Ludovic. 2008. *Limiting the Iconic: From the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② Willems, Klaas; Ludovic De Cuypere (ed). 2008. *Naturalness and Iconicity in Language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7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③ 王寅，2009，《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④ 沈家煊，1993/2009，句法的象似性问题[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1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01－212。

⑤ 杜文礼，1996/2009，语言的象似性谈微[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61－170。

⑥ 严辰松，1997/2009，语言象似性概说[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3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13－221。

⑦ 王寅，1998/2009，标记象似性[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1998年第3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22－233。

⑧ 王寅，1999/2009，Iconicity的译名与定义[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中国翻译》1999年第2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77－83。

⑨ 延俊荣，2000/2009，《汉语语音与语言意义象似性例举》[J]，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71－187。

(2000/2009)[①]、文旭(2001/2009)[②]、秦洪武(2001/2009)[③]、王寅(2001/2009)[④]、王寅和李弘(2002/2009)[⑤]、赵彦春(2009)[⑥]、朱长河(2005/2009)[⑦]、顾海峰(2006/2009)[⑧]、张喆(2007/2009)[⑨]等国内知名学者在语言象似现象研究方面有影响的论文,内容涉及象似性的理论问题、音义间的象似关系、词汇-句法象似现象和超句层面的语言象似现象。

可以说,语言象似现象通过国内外学者20多年的研究,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其研究涉及语言学、哲学、符号学、文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触及了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等各个层面,形成了跨学科、多层面的研究特点,其成果丰富,影响广泛,成为语言研究中生机勃

---

① 文旭,2000/2009,论语言符号的距离象似性[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2000年第2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47-255。

② 文旭,2001/2009,词序的象似性探讨[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2001年第1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56-270。

③ 秦洪武,2001/2009,语言结构的顺序象似性[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研究》2001年第1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80-287。

④ 王寅,2001/2009,象似性:取得问题特征的重要手段[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34-246。

⑤ 王寅、李弘,2002/2009,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84-94。

⑥ 赵彦春,2009,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问题的辨析[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95-102。

⑦ 朱长河,2005/2009,语言的象似性问题:外界的质疑与自身的应答[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5年第1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24-132。

⑧ 顾海峰,2006/2009,国内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学术争鸣述评[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33-143。

⑨ 张喆,2007/2009,我国的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2007年第1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44-158。

勃的热点领域。但是，目前国内外的语言象似性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句法和篇章层面，特别是句法层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近年来则有向篇章象似问题拓展的趋势。如 De Cuypere (2008：4)[①]表示，过去二十年间，对于语言象似性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形态学和句法学层面。沈家煊(1993/2009：201)[②]指出，“我们要谈的象似性主要是指语言的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甚至句法规则是非任意的，是有理可据的，也就是说，句法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王艾录(2009：105)[③]也指出，“目前为止的象似性研究基本限于句法平面，个别文章也注意到词平面，但只限于句段词(合成符号)，其实质仍然属于句法平面。对于揭示单纯符号的理据，象似说就往往显得束手无策”。张喆(2007/2009：149)[④]表示，“象似性的研究由句法向语音、语篇层面拓展，但句法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从总体上看，学者们的注意力仍主要放在句法层面”。学者们的研究较少地涉及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词汇层面，特别是单纯词方面，已涉及单纯词汇象似现象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较少，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拟声词、感叹词、语音象征和象形文字等方面，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的成果数量很少。

2.2.2.2 语言符号象似性的概念

现代西方符号学的两大流派都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建立在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基础上，以二分的方法区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内部和外部，将符号看成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

---

① De Cuypere, Ludovic. 2008. *Limiting the Iconic: From the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 4.

② 沈家煊，1993/2009，句法的象似性问题[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01 - 212。

③ 王艾录，2009，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03 - 123。

④ 张喆，2007/2009，我国的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2007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44 - 158。

对立，对封闭、静态的语言结构进行阐释；而与索绪尔几乎同时代的皮尔斯，在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建立了经验主义的符号学理论体系（郭鸿，2008：41－55）①。皮尔斯符号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对符号的三分法。皮尔斯（1955/2006：278－281）②将符号称作第一者（First），符号的对象称作第二者（Second），符号的解释者是第三者（Third），并依据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将符号分为图像（icon）、标志（index）和象征（symbol）。王寅（1999/2009：77－83）③认为应将皮尔斯定义的这三种符号分别译为象似符、标记符和代码符。皮尔斯对三种符号做出了界定：象似符“仅仅借助自己的特征去指示对象”，是“质的指号”；标记符“通过被某个对象所影响而指示那个对象”；而代码符“借助法则和常常是普遍观念的联想去指示对象”。王寅认为象似符与所指在某种方式上相似，如照片、图画和象形文字；标记符与所指之间在因果、存在或邻近关系上相联系，如危险与骷髅骨符号、手指与所指对象、人与足迹等；代码符与所指之间没有理据性，如没有理据性的语言符号。

当今语言学者们讨论的语言符号象似性，就源于皮尔斯定义的象似符和其对象之间的这种象似关系。Haiman（1985/2009：1）④将语言的象似性表述为：

> 语言之所以形成某一形式，常常是由于它们像图示那样反映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结构；而语言结构彼此相像，是由于人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它们所代表的不同概念域。

这是认知语言学对语言象似性问题较早的界定。Haiman 将象似性分为动因（motivation）和同构（isomorphism），动因即是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

---

① 郭鸿，2008，《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p. 41－55。

② 皮尔斯，1955/2006，《皮尔斯文选》[C]，涂纪亮、周兆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p. 278－281。

③ 王寅，1999/2009，Iconicity 的译名与定义[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中国翻译》1999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77－83。

④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 1.

的象似性，而同构则着眼于语言系统内部符号间的象似关系。后来，Haiman 所描述的语言象似关系被简单地称为“形式模仿意义”(form miming meaning)和“形式模仿形式”(form miming form)。

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联合开展的“象似性研究项目”将象似性定义为：

> 作为一个符号学概念的象似性指：符号(能指，即 signifier，可以是一个字母、声音、单词、结构甚或符号的零形式)的形式与其在现实世界或人们的概念世界中所指的对象或概念(所指，即 signified)之间存在的自然的相似或类比关系。①

该项目将象似性分为两类：图像象似(imagic iconicity)和图示象似(diagrammatic iconicity)②。其中图像象似指画像和拟声那样能够通过象似符直观反映对象特点的相似关系；而图示象似则更加抽象，通过符号之间的关系反映对象或行动之间的关系，如恺撒大帝的名言“*veni*，*vidi*，*vici*”就反映了三个动作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这实际上和 Haiman 对象似性进行外部和内部的区分并无本质差别。该项目还认为，语言符号的图示象似对于语言和文学语篇研究的意义更加重要。

De Cuypere (2008：2)③强调了前人理论研究中未受到足够重视的一点，即只有在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决定符号的功能(即对符号的解读)时，象似性这一概念才有意义。他指出近年来西方学者对视觉象似性的研究证明，象似性在语言中仅起到次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语言符号音和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象似性不决定符号本身的理解，而仅仅拓展了符号的意义。象似性研究在文学领域受的重视恐怕更胜于语言学领域，

---

① 见象似性研究项目网站，http://es-dev.uzh.ch:16080/en/iconicity/index.php?subaction=showfull&id=1197027781&archive=&start_from=&ucat=2&，登录日期 2009－11－06。

② 张喆(2007/2009：148)将其分别译为“影像象似性”和“拟像象似性”，而将皮尔斯提出的另一个概念 metaphorical iconicity 译为“喻像象似性”。

③ De Cuypere，Ludovic. 2008. *Limiting the Iconic: From the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p.2.

这一现象正是由象似性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的。De Cuypere 的这部专著冠名 *Limiting the Iconic*，其意味恐怕也在于此。

我国学者也对象似性这一概念本身有比较充分的探讨。沈家煊（1993/2009：202）[①]认为，语言的象似性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两者的结合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可据的。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就是语言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体现概念结构”。严辰松（1997/2009：213）[②]指出，语言的象似性就是指“语言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所经验的世界结构”。王寅（1999/2009：81）[③]、王寅和李弘（2002/2009：89）[④]则在讨论了前人的种种象似性定义的基础上，将象似性定义为“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张喆（2007/2009：147）[⑤]则将象似性看成“映照在语言符号系统单位、关系之间以及语言功能过程中的被人感知的与相应所指对象或关系的自然象似性特征”。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汉语中的种种象似现象展开，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汉字以形表义的特点，如王寅（1999/2009：81）[⑥]，但总体上认为“语言的这种拟声和拟形的

---

① 沈家煊，1993/2009，句法的象似性问题[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01 - 212。

② 严辰松，1997/2009，语言象似性概说[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国外语言学》1997 年第 3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13 - 221。

③ 王寅，1999/2009，Iconicity 的译名与定义[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中国翻译》1999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77 - 83。

④ 王寅 李弘，2002/2009，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84 - 94。

⑤ 张喆，2007/2009，我国的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2007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44 - 158。

⑥ 王寅，1999/2009，Iconicity 的译名与定义[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中国翻译》1999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77 - 83。

模拟手段是极其有限的”(沈家煊,1993/2009:201)[①]。如何将语言象似性理论与汉语的实际更好地结合,依然是摆在中国语言学者面前的任务。

2.2.2.3 象似性与理据性的关系

象似性是近几十年才出现在语言学文献中的一个新概念,它与语言学者早已频繁讨论的理据性之间有何种关系,也是很多学者感兴趣的话题之一。Haiman (1985/2009)[②]将象似性分为两种,其一是同构,其二就是“motivation[③]”,此处的 motivation 意指语言的外部象似性,是整体象似性概念的一部分。可见在 Haiman 看来,理据性是象似性的一个类别。有些学者(王寅、李弘,2002/2009:88[④];朱长河,2005/2009:130-131[⑤])将广义的象似性等同于语言的理据性,但也有学者(王艾录,2009:105)[⑥]认为理据性作用的范围大于象似性。关于象似性与理据性之间的关系,可谓众说纷纭。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讨论的理据性,不仅指索绪尔界定的理据性或可论证性。索绪尔的理据性,与由其界定的任意性同样,是一个共时的内部语言学概念,讨论的是语言系统内部符号和符号的关系问题,大致相当于本文此后所讨论的合成理据。我们所讨论的理据性,包括了语言系统内部、外部、共时、历时的各个层面,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

① 沈家煊,1993/2009,句法的象似性问题[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201-212。

②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③ 汉语中的“理据”和“动因”均是英语“motivation”一词,此处的 motivation 多译成“动因”。

④ 王寅、李弘,2002/2009,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84-94。

⑤ 朱长河,2005/2009,语言的象似性问题:外界的质疑与自身的应答[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5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24-132。

⑥ 王艾录,2009,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03-123。

其范围要大得多。象似性研究也跨出了共时的语言系统，涉及语言的方方面面，讨论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种种象似关系，呈现出多样、复杂的特点。从这方面讲，象似性和理据性都讨论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种种相关性，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因素，两者是一致的。

语言象似性概念建立在皮尔斯提出的符号"三分原则"基础上，象似性研究被广泛地看做当代认知语言学的一部分，受认知语言学基本原则的指导。当代认知语言学虽然提出理据性是"语言常态"的观点，认为语言研究须对任意性予以特别解释，但却接受了"单纯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核心观点。譬如，认知语法的代表 Langacker (1987/2004：328－368[①]；2007：122[②]) 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语音极" (phonological pole) 和"语义极" (semantic pole) 两个部分组成的形式－意义结合体 (form-meaning parings)，符号结构即是语义结构与语音结构的配对，而语音极与语义极之间的联系无疑是任意的。由此，语言象似性研究一方面承认拟声词、感叹词和语音象征这些语言象似现象，另一方面同时认为这些语言现象在语言系统中居于边缘地位，从而把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句法和语篇层面，研究语言符号之间的各种关系。王艾录 (2009：105)[③]就指出：

> 目前为止的象似性研究基本限于句法平面，个别文章也注意到词平面，但只限于句段词 (合成符号)，其实质仍然属于句法平面。对于揭示单纯符号的理据，象似说就往往显得束手无策。

张喆 (2007/2009：149)[④]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象似性的研究由句法向语

---

① Langacker, Ronald W. 1987/2004.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328－368.

② Langacker, 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cke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122.

③ 王艾录，2009，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03－123。

④ 张喆，2007/2009，我国的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外语学刊》2007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44－158。

音、语篇层面拓展，但句法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从总体上来看，学者们的注意力仍主要放在句法层面”。这样看来，象似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受到其自身理论背景的限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讨语言符号的组合、聚合关系同外部世界或人的经验结构之间的同构关系。而本研究所讨论的理据性，指语言的形式及演变与各种语内语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涉及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的各种关系，对各家语言学理论批判地吸收而不限于一家之言，故而其涵盖面相当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据性讨论的范围远大于象似性研究，象似性研究是理据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艾录(2009：105)[①]就认为，“所有象似性研究的成果都可成为支持理据性的证据”。

2.2.3 内部形式与理据性

语言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词汇的内部形式，并将其与语言理据现象联系起来加以深入讨论。但是学者们对“内部形式”这一概念的阐释却往往各不相同。

2.2.3.1 “内部形式”与“内在语言形式”

不少语言学者认为，“内部形式”这一语言学术语最早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1836/2006)[②]提出，如张永言(1981：9)[③]、邹玉华(1995：24)[④]、王艾录(2002：70)[⑤]、王艾录和司富珍(2002：20－21)[⑥]等均持此

① 王艾录，2009，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03－123。

② 洪堡特，1836/2006，《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③ 张永言，1981，关于词的“内部形式”[J]，《语言研究》(1)：9－14、82。

④ 邹玉华，1995，论词的内部形式与社会文化[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24－29。

⑤ 王艾录，2002，关于词的内部形式[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70－74。

⑥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p. 20－21。

观点。洪堡特(1836/2006)[①]专辟一章讨论"innere Sprachform"(英译为 inner form)的问题,姚小平(1995:118)[②]将其译为"内在语言形式",潘文国、谭慧敏(2006:10)[③]则称之为"内蕴语言形式"。洪堡特把"语言形式"分为内在语言形式和外在语言形式(Lautform,即语音形式)。有学者认为,洪堡特提出的"内在语言形式"是"作用于某一语言语法和词汇背后的形式原则"(Mathews,1997/2000:165)[④]。王艾录、司富珍(2002:22)[⑤]对洪堡特学说的认识则深入了一步,认为内部语言形式不仅是所谓的语法形式和造词的规则,而将其看做某一语言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总和。姚小平(1995:119)[⑥]指出,洪堡特所指的"内在语言形式"是"语言创造力量对语音形式的应用",即人类精神力量驾驭外在语言形式的活动,涉及语言和思维这一重大而古老的命题,具有深刻的含义。内在语言形式是"语言创造过程中精神活动所循的轨迹,或者换另一种比喻的说法,是语言创造力量用以浇注出语音的模型"。我们认为,洪堡特定义的"内在语言形式"绝不只是语言的词法和句法。它包含了人类语言现象和机能背后的种种精神和思维活动。洪堡特(1836/2006:57-58)[⑦]明确地指出语言形式这一概念远远超出了词法和句法,"完全可以用于基本词汇构成本身,实际上也必须尽可能地在这方面使用,如果语言的实质真正可以被认识的话。"这与后来许多学者以"内部形式"分析合成词理据和词源理据的研究实践大相异趣。

---

① 洪堡特,1836/2006,《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② 姚小平,1995,《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118。

③ 潘文国、谭慧敏,2006,《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10。

④ Mathews, P. H. 1997/2000.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p.165.

⑤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2。

⑥ 姚小平,1995,《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119。

⑦ 洪堡特,1836/2006,《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p.58。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在洪堡特看来，人类语言是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他主张“全人类只拥有一种语言，而每个人又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1836/2006：60)[①]。洪堡特一方面认为“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普遍一致性在于，它们具有一种统一的内在形式，而在这一形式的范围内则允许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又坚称“每一种语言的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形式”(转引自姚小平，1995：117)[②]。普遍语法论者如乔姆斯基(1965[③]；1966[④])声称其理论的发展受益于洪堡特。普遍语法认为人类语言有能够生成无限多表达方式的有限规则，这似乎就是洪堡特的“内在语言形式”；世界上种种语言都具有共同的内在形式，通过深入研究某一语言的内在规则，就可以揭示所有语言生成的奥秘。姚小平(1995：119－120)[⑤]指出，洪堡特提出“内在语言形式”这一概念是为了强调语言的个性，强调各种语言表达某一概念的具体方式是不同的。事实上，洪堡特的内在语言形式并非乔姆斯基所描述的一套有限的、生成句子的规则，它不是一个共时的句法概念，而涵盖了更深广的意义。

洪堡特的语言思想对后世的语言学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受到诸多语言学者的追捧，如德国“新洪堡特主义”的代表魏斯格贝尔提出的“母语中间世界”理论[⑥]、美国语言学者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的“语言相对论”假说都被看做是对洪堡特语言思想的继承。转换生成语法和认知语法也都认为其理论得益于洪堡特的启发。“内部形式”(inner form)这一概念在洪堡特之后，为从事词汇研究的语言学者广泛使用。他们使用的

① 洪堡特，1836/2006，《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钱敏汝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p.60。

② 姚小平，1995，《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117。

③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The MIT Press.

④ Chomsky, Noam. 1966. *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 [M]. New York: Harper & Row.

⑤ 姚小平，1995，《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p.119－120。

⑥ 参见李洁，1988，莱奥·魏斯格贝尔的语言理论及其内容相关语法[J]，《国外语言学》(2)：83－86；或彭彧，2009，论魏斯格贝尔的母语研究[J]，《德国研究》(3)：73－77。

术语一般为“词的内部形式”，并声称这一术语源自洪堡特的“inner form”，但其含义却渐渐偏离了洪堡特“内在语言形式”的本意。

苏联语言学家布达哥夫将“内部形式”定义为“用词表达概念的方式，词的声音外壳及其最初意义之间联系的性质就叫做词的内部形式”（转引自王艾录、司富珍，2002：26）[①]。这一定义从词的音义关系入手，强调词汇的“最初意义”，这实质上把内部形式与理据问题，特别是词源理据联系在一起。布达哥夫可能是明确提出把“内部形式”与理据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人，这一观点对我国语言学界影响很大。此后，国内语言学界坚持内部形式就是理据研究和词源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譬如，张永言（1981：9）[②]将词的内部形式定义为：

> 所谓词的内部形式，又叫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指的是以某一语音表达某一意义的理由或根据。研究词的内部形式，目的在于阐明事物或现象为什么获得这样那样的名称，帮助我们认识语言里词与词之间的语义联系和语言词汇的系统性，寻求词义演变和词汇发展的规律。

伍铁平（1994：1）[③]认为：“构词的理据，也就是命名的根据，或者用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洪堡特的术语，叫做‘内部形式’（inner form）。”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内部形式研究，往往着力探讨事物所以得名的缘由，即词源理据的研究。

王艾录、司富珍（2002：20－28）[④]发现了洪堡特和布达哥夫对“内部形式”这一术语的理解和界定存在明显的差异，并对“内部形式”做了新的解释。王艾录（2009）[⑤]是一部专门探讨汉语词汇内部形式的著作，该书将内部形式定义为：

---

①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 26。

② 张永言，1981，关于词的“内部形式”[J]，《语言研究》(1)：9－14、82。

③ 伍铁平，1994，论词义、词的客观所指和构词理据[J]，《现代外语》(1)：1－7。

④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p. 20－28。

⑤ 王艾录，2009，《复合词内部形式探索——汉语语词游戏规则》[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p. 169。

内部形式(inner form)就是语词自身的展现形式,就是语词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总和。只有具备了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语言符号才有内部形式可言。语言中的复合词、短语、单句(独词句除外)、复句等都具有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所以都属于"内部形式符号"。

这里的内部形式仅限于合成语言结构,把更为基本的单纯语言符号排除在外,探讨合成语言符号的结构和语义构成。虽然王艾录、司富珍(2002: 27)[①]表示"本书取洪堡特的'内部形式'观",但事实上这一观点离洪堡特把内在语言形式用于"基本词汇构成本身"的初衷也已经很远了。

综合起来看,学界对于"inner form"这一术语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以洪堡特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内在语言形式(inner form)是人类精神力量驾驭外在语言形式的活动。第二种是以布达哥夫为代表的观点,把内部形式的研究看做对词源理据的探讨,研究事物得名的缘由;第三种观点以王艾录为代表,将内部形式等同于合成符号的结构和语义构成。其中后两种观点都与洪堡特提出"inner form"概念的初衷相去甚远,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2.2.3.2 内部形式与理据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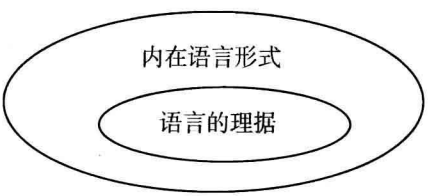
虽然语言学者对"内部形式"这一概念理解各不相同,但洪堡特、布达哥夫和王艾录对内部形式的阐释都与理据性密切相关。

洪堡特的"内在语言形式"指一种语言最核心和最根本的本质规律,与语言社团的精神世界、思维认知方式密切相关,是塑造和决定语言面貌的"内在力量"。语言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必须遵循其内在语言形式的规律。各种语言内在形式的不同,造成了世界语言惊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描绘了人类语言的版图,可谓人类语言的"基因"。正如同生物界个体之间巨大的形态、性状差异往往只是由于微小的基因差异造成的,人类语言内在形式某一因素的差异,也会使得各种语言呈现形式上、

①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27。

性质上的巨大差别。内在语言形式不是直观的、表象的，语言学者只能透过语言的外在形式逐步认识它。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外在语言形式的研究，描绘人类语言的“基因图谱”。

语言的理据性就是人类语言基因图谱上的一个“位点”，参与塑造了各种语言的外在形式，是内在语言形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仅以语言的词汇系统为例，一种语言的词库规模、各类词汇的比重和地位等重要特征，与该语言的理据程度密切相关。如理据程度低的英语，从其发展的早期就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各种外来语，英语词汇的发展差不多就是一部外来语吸收史；而理据程度高的汉语，对外来语汇表现出了相当突出的排斥倾向（赵宏，2009）①。各种语言在理据类型上的差异，更是其本质特点的决定因素之一。故而，理据性是内在语言形式的一部分，参与塑造了各种语言的基本面貌。



图表 2.2　语言理据和洪堡特定义的“内在语言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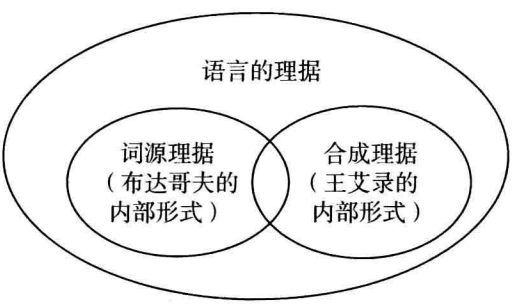
布达哥夫将词的内部形式界定为语音和词的最初意义之间的关系。研究内部形式也就是探求词的来源和事物得名的缘由，即词源理据的研究。词的来源和事物的命名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理据可循的，但是这种理据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隐没，逐渐不被人所知。例如，现代英语的单纯词 neighbor 在古英语中是一个复合词 nēahgebūr，表示 near dweller。又如地名“重庆”意为“双重喜庆”，其名称来自一段轶事：重庆古称“恭州”，1190 年南宋光宗赵敦封恭王，随后又登帝位，为庆贺此双重喜庆，将恭州改成重庆。词源理据的研究以历时为主，对我们研究语言

① 赵宏，2009，英汉外来语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1－26、76。

的演变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充满趣味，是很多学者感兴趣的课题。

王艾录认为内部形式是合成语言符号的形式和语义结构，主要探讨一种语言的单纯符号通过何种机制生成更高级别的符号，实现语言功能。语言由单纯符号生成合成符号的过程基本上都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有理可据。合成符号是理据性较强的语言符号，其理据就是索绪尔提出的“相对任意性”，如 fifteen 是由表示“五”的词素 fif-和表示“十”的词素-teen 组合而成。合成语言符号的理据研究着重语言的共时层面，但在追究其成词理据时也会涉及语言的发展和演变。例如，汉字“茎(莖)”由表示植物的形旁“艹”和声旁“巠”构成；而声旁“巠”在这里表示“直立”的意思，这个直立的意义又是从“巠”的本意是“水脉”中衍生而来的(“巛”是水的象形)。这样就需要把共时的研究与历时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词源角度探讨内部形式，还是从合成符号构成的角度探讨内部形式，都是理据研究的一部分。



图表 2.3　语言理据和布达哥夫、王艾录定义的“内部形式”

2.2.4　语义透明度与理据性

Ullmann (1962：80－115)[①]提出了“语义透明的词”(transparent

①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80－115.

word)和"语义隐晦的词"(opaque word)的概念。Ullmann 并未明确定义透明词和隐晦词,但以词的可分析性作为评判一个词语义是否透明的标准,认为不可分析的词是语义隐晦的,而可以进一步分析为词素的词是透明的。王春茂、彭聃龄(1999/2006:270)[①]和干红梅(2008:83)[②]明确定义了语义透明度(semantic transparency),认为语义透明度指合成词的整词语义可从其各个词素的语义推知的程度,其操作性定义是整词与其词素的语义相关度。例如,"钟表"就是钟和表的总称,其整体意义能从构词成分中直接推导出,属于比较典型的透明词;而"物色"、"东西"之类的词,其整体意义无法从构词成分中直接推导出,因此是语义隐晦词。

语义透明度是合成词汇的性质之一,与理据性关系密切。一般说来,在语言的共时系统中,语义透明的词汇成词理据也较为明晰,如"黑板"、"香水"、"绸缎"等语义较为透明的词,成词理据一目了然,是词汇中合成理据程度较高的部分。有些学者就此把语义透明度与理据性等同起来,如 Bussmann (1996/2000:316)[③]对"理据"这一词条的解释是:"如果能从一个词各部分意义的总和探知其整体意义,这个词就是有理据的。从共时的角度看,存在着完全有理据(如 wine cellar)、部分有理据(如 house coat)和完全词化(如 mincemeat)等理据程度不一的词。"这里,"完全有理据"的词就是语义完全透明的词,部分有理据的词语义较为透明,而完全词化的词则指那些语义隐晦的词。可见在 Bussmann 看来,语义透明度和词汇的理据性是一回事儿。

虽然语义透明度与理据性关系密切,但 Bussmann 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语义透明的词理据程度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语义隐晦的词理据程

---

① 王春茂、彭聃龄,1999/2006,合成词加工中的词频、词素频率及语义透明度[A],彭聃龄主编《汉语认知研究》[C](原文载于《心理学报》1999 年第 3 期:266-27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pp. 269-277。

② 干红梅,2008,语义透明度对中级汉语阅读中词汇学习的影响[J],《语言文字应用》(1):82-90。

③ Bussmann, 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316.

度就低。语义隐晦的词往往也是有理据的，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们的成词理据淹没在语言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在语言的共时系统中就显得理据模糊，甚至消失了。例如有些词中保留了词素比较古老的意义，当代语言使用者对这些义项比较陌生，就不容易看到理据的存在，从而使词义变得隐晦。像“冬至”的“至”是“极点”、“顶点”的意思；“牺牲”中的“牺”和“牲”都是古代祭祀用的祭品；英语中的“sweetmeats”中的“meat”并不表示“肉”，而是 meat 的古义“食物”。这些词汇的语义比较隐晦，但历时的追溯能够清晰地还原它们的理据。语义透明度与理据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我们大致上只在语言的共时系统内考察词汇的语义透明度，而对理据的探讨则既须关注语言的共时层面（如合成理据），同时又须研究语言的历时层面（如词源理据）。

另外，语义透明的词都是合成词。单纯词都是不可分析的，因而被看做是一种语言中词化程度最高、语义也最隐晦的词汇。但是许多单纯词都是有理可据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专门论述。

第三节　理据的定义和类型

2.3.1　理据的定义

在理据研究的历史上，学者们对“理据”这一概念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而提出了各种不尽相同的定义。我们的研究就由此开始。

2.3.1.1　从语言系统内部入手定义理据

现代语言学最初关注的理据现象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理据。索绪尔（1916/1980：181）[①]在单纯语言符号“绝对任意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任意性”概念，用以探讨语言系统合成符号的种种构成规律，承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181。

认合成语言符号的生成有理可据。索绪尔论证说：

> 符号任意性的基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把根本任意的，即不能论证的，同相对任意的区别开来。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别的符号中却有一种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任意性虽不能取消，却有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

随后，索绪尔(1916/1980：184)[①]表明语言的任意性/理据性构成一个连续体：

> 一切都是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在最少的组织性和最少的任意性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切可能的差异。

由此可见，绝对任意性只存在于单纯语言符号中，而所有的合成符号，包括通过词法、句法和篇章规则生成的各级语言符号，都是具有理据的。相对任意性这一概念，实际上就等同于“相对理据性”。

索绪尔的观点对后世的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大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将理据性作为任意性的对立面，从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关系入手，探讨合成符号的构成。例如，刘伶、王今铮(1985：53)[②]表示“词的理据就是词义构成的道理，是一个词的词素与词素之间的语义联系或一个词词义发展的逻辑根据”，并表示只有合成词和转义词才有理据可言，最早产生的根词是没有理据的；Hiraga (1994)[③]把理据看做“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非任意关系”；Bussmann (1996/2000：316)[④]指出，“如果能从一个词各部分意义的总和探知其整体意义，这个词就是有理据的”。从这

---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184.

② 刘伶、王今铮，1985，《简明语言学词典》[Z]，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p.53。

③ Hiraga, Masako K. 1994. Diagrams and metaphors: 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2: 5－21.

④ Bussmann, 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316.

样的角度研究词汇的理据，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合成词的构词法，如邵志洪（1997：1－5）[①]就将构词和理据放在一起探讨。一些认知派学者的理据观也没有超越语言系统的范围，如 Taylor（2004：57）[②]将语言看做一个生态系统，认为语言中的各种成分都是相互关联的，没有不和其他语言成分发生关系的孤立成分；语言成分在语言系统中的合理性和地位是由其与其他成分的联系决定的，故而“某一语言成分的理据就是它与语言系统中其他成分的联系”，与其他成分的联系越密切、越多，该成分的理据性就越强，反之亦然。

2.3.1.2 超越“语言系统”的理据定义

“语言系统”的概念产生于一个世纪以前，把理据作为语言系统内部的规律和关系来研究的传统也肇始于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在此之前，学者们将“理据”一词从字面上理解为“道理”和“根据”。理据研究就是探讨事物得名的缘由和语言结构获得意义的根据，今天仍有不少学者持这一看法。陆国强（1999：60）[③]指出：“词的理据（motivation）指的是事物和现象获得名称的依据，说明词义与事物或现象的命名之间的关系”。张永言（1981：9）[④]表示，“词的理据，指的是以某一语音表达某一意义的理由或根据”。梁守锵（1988：97）[⑤]也称“词为什么具有某个意义的理由和根据，称为词的理据”。伍铁平（1994：1）[⑥]认为，“构词的理据，也就是命名的根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理据研究，注重发掘语词的得名之由，往往从语源的角度探讨理据问题，明显地受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也非常重视对语源问题的探索，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

---

① 邵志洪，1997，《英汉语研究与对比》[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pp. 1－5。

② Taylor，John R. 2004. The Ecology of Constructions [A]. In Radden and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Mouton de Gruyter. pp. 49－73.

③ 陆国强，1999，《现代英语词汇学（新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60。

④ 张永言，1981，关于词的“内部形式”[J]，《语言研究》(1)：9－14、82。

⑤ 梁守锵，1988，《法语词汇学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 97。

⑥ 伍铁平，1994，论词义、词的客观所指和构词理据[J]，《现代外语》(1)：1－7。

从语源角度研究语言理据较为注重语言的历时层面，而从语言系统内部入手研究语言理据则较为注重语言的共时层面。这两种研究路径虽然各有侧重，但也往往会纠缠在一起。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情况下，单纯把合成词汇分析为各种词素并不能真正揭示其理据，往往需要借助词源学的知识进一步追溯词素的含义。如对“蟾宫”、“蟾光”进行共时分析即是月宫、月光，然而“蟾”何以与月亮联系在一起呢？原来古人认为月中有蟾蜍，进而以“蟾”代“月”。如果不对这样的词汇进行词源的追溯，是不足以揭示其理据的。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意义在语言系统的发展中也会经历一定的演变。例如，人们对于语言中的一词多义现象的看法就有共时视角和历时视角的不同：

[2.1] a. They *keep* the money.

b. They *keep* complaining. （此例来自 Heine，1997：4[①]）

如果采用共时的眼光，那么[2.1]a 和[2.1]b 中的两个 keep 就只能是两个没有相关性的词，它们形式上的一致仅是一种巧合而已；而如果采用历时的眼光，则[2.1]b 中的 keep（动作的持续）是由[2.1]a 中的 keep（持有、保持）引申而来的，两者有意义上的联系。某一语言形式本义产生在前，引申义受到本义促动而产生，故而是后起的义项，是有理可据的。语言本身就是共时因素和历时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实际的研究中很难将两者完全割裂开来。

虽然王艾录、司富珍（2001[②]，2002[③]）在具体的语言研究实践中（主要是汉语语词理据的研究）主要从构成和语源角度探讨合成词汇的理据，但他们给出的理据定义却是非常宽泛的。他们将语言看做一个自组织系统[④]，将理

---

① Heine，Bernd. 1997.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

② 王艾录、司富珍，2001，《汉语的语词理据》[M]，北京：商务印书馆。

③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④ 孙东川、林福永，2004，《系统工程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p. 102。自组织理论对自组织的定义为：在系统形成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扰，仅是依靠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来达到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干扰是指外界施加的作用与影响，它与系统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

据定义为“语言系统自组织过程中促动或激发某一语言现象、语言实体产生、发展或消亡的动因”，并将理据称为“语言生命的基因”。首先，这一定义突破了语言系统的共时层面，转而把理据研究关注的焦点放在语言现象和语言实体的发展变化上，即语言的历时层面。其次，虽然这一定义仍然排除了语言系统外部的诸多因素，但其涵盖的范围已然相当广泛，包括了语言的各级符号和各子系统，其中特别指明单纯符号也是可以从词源上论证的，故而也是有理据的。最后，这一定义指出语言理据是语言生命的基因，把理据看成语言符号发生发展的最根本动因，阐明了理据对语言的重要作用。

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兴起之后，语言学者不再满足于将语言看成索绪尔定义的封闭的、静态的、自治的系统，转而认为语言是人类实现交际目的的工具，是人类认知与现实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理据研究又成为语言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Heine（1997：3）[①]认为“语言形式是为了满足某些语言功能而产生的，故而并非任意而是有意义的”，指出语言使用和发展的理据都是外部的，从系统外部解释语言比从内部解释更有效。Radden & Panther（2004：2－4）[②]指出理据定义的三个要素：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非任意性关系、象似性（作为理据的一种）和解释（通过理据性解释语言现象），将理据看做一种非决定性的因果关系（non-deterministic causal relation），并提出了理据的工作定义：“如果一个语言单位的属性由另一语言结构（形式和/或内容）和其他语言外部因素塑造，它就是有理据的”。严辰松（2000/2009：67）[③]认为“语言理据是辨识或诠释语言符号意义的依据，反映能指与所指（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各种联系，或者体现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理据说明意义从何而来、

① Heine, Bernd. 1997.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

② Radden, Günter & Panther, Klaus-Uwe. 2004.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motivation [A].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1－46.

③ 严辰松，2000/2009，语言理据研究[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64－76。

形式何以如此”。以上的种种理据定义表明，当今语言学界，特别是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已经开始跳出索绪尔界定的共时语言系统，不仅关注语言系统内部的理据，而且开始注重研究语言系统外部的理据，对理据的理解也日趋全面透彻。譬如，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语言形式与经济理据的关系，发现一些语言现象是受经济原则驱动而产生的。使用频率越高的结构，其形式越是简略；一种语言如果吸收和同化外来语的“成本”很高，它就倾向于利用自己的资源表达新生的事物和概念。这种研究视角将语言现象与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联系起来，是对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

2.3.1.3 理据定义的再思考

在讨论了前人对语言理据的种种定义之后，我们将针对本研究的目标和任务，阐述我们对理据和理据研究的理解。

我们认为，人类自然语言是各种共时和历时因素、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一看法与索绪尔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一个封闭的、静态的、自治的共时语言系统有很大不同。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正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发展的时期，科学以其巨大的威力革命性地改造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科学也不可逆转地取代了宗教和神学的地位，开始在思想界占据主导。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迫不及待地将一系列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引发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科学主义”(scientism)[①]风潮，使得一大批新旧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得以建立或实现跳跃式的发展。现代语言学诞生于这股席卷全球的“科学主义”浪潮中，其标志

① 对于“科学主义”的理解各家说法不尽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1986 年美国出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对科学主义的定义：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主张，是一种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的信念。托姆·索雷将科学主义定义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的信念——特别是自然科学——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的、最严密的和最有益的。参见陈其荣，2005，科学主义：合理性与局限性及其超越[J]，《山东社会科学》(1)：35－39。

是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的建立。为了使语言研究科学化和客观化，实现研究对象的可控制性、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索绪尔确立了语言与言语、内部与外部、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二元对立，通过对人类语言生活的重重二分，确立了现代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索绪尔，1916/1980）[①]。陈保亚（1997：58）[②]将这一过程称为“同质化运动”，并指出其重要性：

> 从索绪尔的同质语言观看，抛弃言语、外部语言、历时因素以后，留下的是同质的语言系统，这样的系统才包含着集体意识中的语言规则，研究这样的规则，才可能在研究者之间达成共识标准，有了共识的标准，也就有实证的条件。

索绪尔学说将语言研究纳入了科学的轨道，极大地推动了语言研究的科学化进程，是当之无愧的“现代语言学之父”。但是，人类语言的属性是相当复杂的，语言除了其自身的自然属性外，还有人文属性。潘文国（2001）[③]搜集了自19世纪前叶始到当代的有影响的语言定义68种，通过对比后发现，虽然各家的语言定义在许多方面各有出入，但都无一例外地坚持一个原则，即语言是人所特有的，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从而得出“人文性才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结论。当今人文社会学科过度自然科学化的趋势业已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这足以提醒我们在语言研究中，既要坚持科学的原则和精神，同时又要超越科学主义的局限，对语言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

语言理据现象不仅存在于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之中，还涉及语言的历时层面和种种外部因素。在语言系统内部，理据主要体现为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非任意关系。譬如，杜鹃鸟在汉语中是“布谷”，在英语中是cuckoo，拉丁语中是cucullus，德语中是Kuckuck，法语中是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 陈保亚，1997，20世纪语言研究中的同质化运动——索绪尔语言观与博爱士方法论的殊途同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53－59。

③ 潘文国，2001，语言的定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108。

coucou；摹仿狗叫声，英语用 bow-wow，法语用 ouaoua，德语用 Wauwau，西班牙语用 guau-guau，葡萄牙语用 vauvau，日语用 wanwan，汉语用“汪汪”，不同语言的共通之处显然来源于现实中的声音。英语的 basketball 和汉语的“篮球”都由“篮子”和“球”构成，表示“往篮子里投的球”；汉语中的“芦席”即用芦苇编的席子，这些语言结构的构成都一目了然。语言系统中一词多义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如汉字“节”在下面各句中意义不同：

[2.2] a. 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 （郑板桥《咏竹》，指竹节）

b. 盘根错节 （指木节）

c.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杜牧《清明》，指季节、时节）

d.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白居易《琵琶行》，指节拍）

以上各例中“节”字的不同意义显然不是任意形成的，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其背后有某些因素驱动，因而是有理据的。

语言理据在历时层面则表现为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发生及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譬如说，历时理据研究常常对事物的得名之由和词汇的来源进行分析。在这一意义上，许多单纯词也是有理据的。例如，现代英语 book 是由古英语中的 boc（桦木）演变而来的，这是由于桦木是当时最重要的造纸原料；英语 duck 由古英语 ducan（潜水）发展而来，揭示了鸭子这种禽类的生活习性。印欧语因为历史上交往比较频繁，语言借用现象很多，在追溯词源时也往往需要进行跨语言研究。如英语中的 curfew 源自法语的 courve-feu（cover fire），据说中世纪时城市房屋多用木材建筑，故而防火尤为重要。城市晚上以打钟为号，主妇们听见钟声就会把家里的炉火灭掉。英语 dozen 一词则来自古法语 dozeine，而 dozeine 来自拉丁语复合词 duodecim，其中 duo 代表“二”，decim 代表“十”。在曲折的借用过程中，理据是很容易丧失的，即使合成语言符号的理据也会变得模糊不清。如英语一周中每天的名称都是根据日耳曼神话中的神命名的：Sunday 表示“太阳神的日子”；Monday 是“月神的日子”；Tuesday 是 Tiu's day，是“黑暗之神的日子”；Wednesday 来源于

Woden's day，是“战神的日子”；Thursday 表示 Thor's day，是“雷神的日子”；Friday 是 Freya's day，即“爱神的日子”；Saturday 则是“农神的日子”。语言系统在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往往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很多学者如王力(1957/1980：342－347)[①]、吕叔湘(1963/1990：415－444)[②]、梁光华(1995)[③]、徐时仪(2005)[④]都研究过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现象，并探讨其背后的理据，认为单音节词的使用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汉语语音的简化、口头交际中避免歧义的需要、汉民族喜欢双数对偶的文化心态、对外来语的引进和吸收等因素综合起来促成了汉语词汇的主体由单音节向双音节的转变。从历时角度探讨语言发展变化的理据，能比较深刻地反映一种语言的本质，帮助人们了解语言系统运作的机制和规律，使语言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从外部角度看，理据主要反映为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的环境等因素与语言之间的交互作用。语言理据往往与该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使用者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有很大关系，故而体现出突出的民族性。例如，蚯蚓这种动物，汉语得名于它出没于“小土丘”(丘)以及爬行时“屈伸”(引)的特点；某一古汉语方言中称为“歌女”，则来自于其鸣声[⑤]；德语 Regenwurm 和英语方言 rainworm 得名于它出现时的天气；英语 earthworm、英语方言 mudworm、法语 ver de terre、俄语 земляной червь 得名于它的生活环境；英语方言 fishworm、angleworm、angledog 得名于它作为钓鱼诱饵的用途。汉语的“笔战”表示以“笔”为武器作战，在俄语里则是 война чернилами，表示用“墨水”作战，英语里面是 paper war，则

① 王力，1957/1980，《汉语史稿(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pp. 342－347。

② 吕叔湘，1963/1990，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A]，《吕叔湘文集·第二卷》[C](原载于《中国语文》1963 年第 1 期)，北京：商务印书馆，pp. 415－444。

③ 梁光华，1995，试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形成原因[J]，《贵州文史丛刊》(5)：50－55。

④ 徐时仪，2005，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内在原因考探[J]，《语言教学与研究》(2)：69－76。

⑤ 崔豹，晋/1985，《古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p. 14。据崔豹《古今注·鱼虫第五》，“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之“歌女”，或谓之“鸣砌”。但是蚯蚓是否真能鸣叫，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成了“纸战”，法语的 guerre de plume 和德语的 Federkampft 或 Federkrieg 都表示用“钢笔(尖)”作战。由此可见，同样一个事物或概念，在各种语言、文化中的表达形式往往各不相同，反映了理据和文化、思维方式紧密联系的民族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理据所反映的可能只是人们认知事物或概念的一个角度或侧面，却不一定能反映本质特征。现实生活中甚至还存在着因语言使用者误解、误传而产生的俚俗理据。例如，五代吴越王钱镠用周公“一沐三握发”①的典故命名的“握发殿”却被老百姓说成“恶发殿”②；四川大学原来有一教员宿舍叫“涛邻村”，意为“与薛涛为邻”，后来被讹传成“桃林村”；杜甫的官号“杜拾遗”在民间讹变成了“杜十姨”，旧时有些祠庙里就理所当然地将“杜十姨”塑成女像。这些俚俗语汇的产生，并非语言系统自身规律和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使用者这一外部因素造成的。语言的外部因素如语言所处的自然世界和文化语境、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使用者的交际意图等诸多因素始终在影响甚或左右着语言的发展和变化，塑造语言的面目，成为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理据。

由此可见，我们所探讨的语言理据比索绪尔定义的“相对任意性”要广泛得多，涉及语言内部、外部、共时、历时层面的各种因素。语言理据广泛地作用于语音、文字、词汇、句法、篇章等各个层面；既表现为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静态联系，也表现为语言现象的演变发展与其原因之间的动态联系；它是塑造语言面貌的基本力量之一，语言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语言，与理据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总而言之，**语言理据是语言的形式及演变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联系**。

这一定义兼顾了语言的共时层面(即“语言的形式”)和历时层面(即“语言的演变”)，不仅静态地探讨语言形式背后的各种理据因素，也关注

---

① 韩婴，汉/1980，《韩诗外传集释》[M]，许维校释，北京：中华书局。据韩婴《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意为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

② “恶发”是当时口语词，表示发怒或生气的意思(参见张永言，1981：13)。

语言的动态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语言形式”不仅指西方语言学传统观照下的语音形式，也指在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中地位尤其重要的书写形式。文字的语言与声音的语言同样，是人类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语音中心主义的传统产生于西方文明发端的早期，经由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索绪尔等一代代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验证并不断得以加强，早已确立了其在西方语境里的统治地位。事实上，语音中心主义也反映了西方语言文字“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的实际情况。然而汉语和汉字的情况要比西方的语言文字关系复杂得多。汉语和汉字是具有不同来源的表意体系，两者在发展中逐渐融合到一起，都既受各自发展规律的独立作用，又受一部分语言文字共同规律的支配。汉字的离散性、单音节性和以形表意的特性渗透在汉语的各个层面，与汉语交互作用，形成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的独特魅力。至少从今天汉语汉字的局面来看，将汉语与汉字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固然不可取，但是在汉语研究中完全排除汉字这一重要因素也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必然是给汉民族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实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汉字在汉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语言学者认识和承认，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此外，“语言形式”涵盖了语言的各级形式，既包括一种语言的单纯符号，也包括合成符号、词素、词、短语、句子、篇章等语言各级符号都是理据研究探讨的对象。

定义中“语言的演变”则侧重从动态的眼光关注语言理据问题。我们认为语言的生成、发展和变化都不可能无缘无故，任意而为，而是必然受到语言内部规律的作用，也必然受到种种外部因素的推动。语言的发展和演变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小到一个词的创制或引进、某一语言结构的产生，大到某一语言历史上发生的大规模变迁，都可以成为理据研究关注的对象。譬如，石毓智(2002)[①]就探讨了汉语双音化的趋势对于动补结构产生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认为两者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赵

① 石毓智，2002，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J]，《语言研究》(1)：1－14。

宏(2009)[①]分析了英语词汇系统的低理据性特征和其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吸收外来语这一现象之间的联系,探究英语大规模吸收外来语的内在原因。

定义中"语言内外部因素"指影响语言系统的各种因素。我们参照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对作用于语言的各种因素进行划分:属于封闭的、静态的、共时的语言系统的因素,我们将其看做内部因素;而在这一系统之外的各种因素都看做外部因素。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语言系统中没有孤立的成分。各种语言成分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是由其与其他成分的相对关系决定的。由于索绪尔所界定的语言系统是一个有诸多限制条件的、纯粹完美的理想状态,而现实中的语言是各种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同一语言现象往往也受多个理据因素的共同作用,我们采用的标准比索绪尔的界定更为宽泛一些。譬如,外来语虽然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的接触,同时会涉及词汇系统变迁的历时因素、时代背景,但如果主要将其作为词汇系统的一个有机部分探讨其理据性,就视作语言系统内部的问题。

语言的外部因素主要指与语言系统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关的因素。一种语言中如果有大量描写沙漠状态的词汇,该语言社团必然生活在沙漠周围。自然语言与物质条件之间的这种关联是非常普遍的。然而对语言影响更大的是各种人文因素,这是由语言的人文属性决定的。每一种语言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人文条件,发源于特定的时期,经历了特定的历史沿革,成为特定文化的一部分,被特定的族群所使用。仅以使用者这一因素为例,使用者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认知特点、生活习惯、交际意图都会对语言产生影响。比如北京人打招呼要问"您吃了吗?",美国人则说"Hi! What's up!";中国人说"胆小如鼠",英国人却说 as timid as chicken (胆小如鸡);天体金星,中国人依道教传说称之为"太白",西方人按照希腊神话称为 Venus (维纳斯,即爱和美的女神)。

---

① 赵宏,2009,英汉外来语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1-26、76。

这些语言上的差异无法通过语言系统内部合理解释，必须诉诸各种外部因素。

2.3.2 理据的类型

2.3.2.1 前人对理据类型的研究

与理据的种种不同的定义一样，学者们对理据的分类也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Ullmann（1962：81－93）[①]认为理据探讨音义间的必然联系，最先将语言理据分为三类：语音理据（phonetic motivation）、形态理据（morphological motivation）和语义理据（semantic motivation）。语音理据主要探讨拟声现象，形态理据通过分析语言结构的形态构成获得其整体的意义，语义理据则关注语言形式的本义如何通过隐喻和转喻等机制获得引申义。Ullmann 把拟声理据称作“绝对理据”（absolute motivation），把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称作“相对理据”（relative motivation）。值得注意的是，Ullmann 考察的范围是西方语言的词汇理据，并且只针对语言系统内部的理据进行了分类。

许余龙（2002：123－124）[②]在 Ullmann 分类的基础之上结合汉语等语言的特点，提出了文字理据的概念，认为文字理据表现为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与词义间的联系，指出表音文字体系一般说来不具有文字理据，但是表意文字体系由于采用了象形会意的文字符号，“多少还留下一点理据性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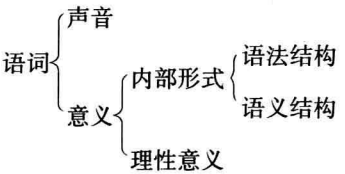
王艾录、司富珍（2002：57－58）[③]主要研究汉语语词理据，他们首先分析了语词的结构：

---

①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 81.

② 许余龙，2002，《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123－124。

③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p. 57－58。



图表 2.4　王艾录、司富珍(2002)提出的汉语语词的结构

然后根据语词的结构将理据分为语词外理据(主要探讨名实关系)和语词内理据,又对语词内理据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表层理据、中层理据和里层理据。他们对理据的分类如下表所示:

语词	语词外理据	语词——事物	
	语词内理据	表层理据	声音——意义
		中层理据	内部形式——理性意义
		里层理据	语法结构——语义结构

图表 2.5　王艾录、司富珍(2002)对汉语语词理据的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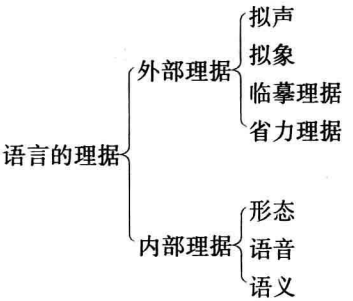
王艾录、司富珍还特别指出,单纯词由于不存在内部形式,所以只有语词外理据和语词内表层理据。另外,王艾录、司富珍(2002:158)[①]还依据原生词、派生词和句段词产生的先后顺序将这三类词汇的理据分别称为原生理据、派生理据和句段理据。这样的分类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严辰松(2000/2009:67-71)[②]采用索绪尔的语言系统作为标准,将语言理据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两大类。他认为语言的外部理据是语言符号具有的临摹性(iconicity),而"内部理据与语言符号的外部世界无关,它由符号系统赋予符号,是系统固有的性质。任何符号系统一旦成为系统,本身即能产生理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又进一步对内、外部理据分别进行细分,形成了语言理据的分类体系:

---

①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158。

② 严辰松,2000/2009,语言理据研究[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年第 6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64-76。



图表 2.6　严辰松(2000/2009)对语言理据的分类

严辰松认为,语言的内部理据是语言系统本身产生的理据,与语言所表述的外部世界无直接的关系,故而遵循了 Ullmann 对语言理据的分类方法。而语言的外部理据则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其中拟声和拟象属于语言符号产生之初的原生理据。原生语言符号和原生理据在语言系统中意义非同一般,严辰松(2000/2009: 70)[①]指出:

> 后选的符号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确定的,原先的语言符号为后起的符号提供了理据。尤其当符号形成系统的时候,系统就给符号赋予了内部理据。人们在选用新的符号时,必须遵循系统业已存在的理据。

这表明语言原生符号的理据性,往往对后起的次生符号以及整个语言系统的理据类型和理据程度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拟声理据和拟象理据处于词及词以下的层次,而词以上层次的外部理据则指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学派频繁讨论的临摹理据(iconic motivation)和省力理据(economic motivation),他们主要作用于句法和篇章层面。严辰松将语言理据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指出原生符号的理据性和次生符号的理据性在语言系统中的不同地位,都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

① 严辰松,2000/2009,语言理据研究[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年第 6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 70。

Radden & Panther (2004: 16 - 23)[①]采用动态的眼光，从理据过程的符号关系出发，将理据过程分成四种基本类型：(1)由内容激发形式的理据过程，如象似性和转喻，这是最典型的理据类型，包括象形文字、拟声词、结构象似性、邻近象似性、数量象似性等；(2)由形式激发内容的理据过程，语言同构(isomorphism)现象和俚俗词源都属于这种类型；(3)由某一内容通过其他关系的共同作用，激发另一内容的理据过程，如一词多义现象就是这个类型的典型；(4)由某一形式通过其他关系的共同作用激发另一形式的理据过程，如语音的变迁。此外还有(5)在以上四种基本类型上衍生出来的理据过程，即由某一形式 - 内容单元激发另一形式 - 内容单元的理据过程，如语法化现象。Radden 和 Panther 考察的角度独特，内容又相当全面深入，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和各种语言现象。

如果将广义的象似性作为理据的同义词，那么一些学者对象似性的分类也值得我们重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Haiman (1985/2009: D18 - 19)[②]。Haiman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象似性。第一种是同构象似(isomorphism)，指“形式的相像反映了意义的象似”；第二种是动因(motivation)象似，指“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本质方面的图示”。动因象似后来被归纳为“形式模仿意义”，指语言形式对现实世界的模拟，实际上等同于语言的外部象似性；而同构象似被归纳为“形式模仿形式”，指语言形式之间的象似关系，即等同于语言系统内部的象似性。Haiman 对象似性的分类产生的影响较大，如 De Cuypere (2008)[③]即采用了他的分类，将象似性分为“语言外部的象似性”(language external iconicity)和“语言内部的象似性”(language internal iconicity)。

---

① Radden, Günter & Panther, Klaus-Uwe. 2004.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motivation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 - 46.

②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p. D18 - 19.

③ De Cuypere, Ludovic. 2008. *Limiting the Iconic: From the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曾经采用各种标准对理据进行过分类，但大多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2.3.2.2 本研究对词汇理据的分类

此前我们引述的种种理据分类方法反映了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内部理据与外部理据的对立、原生理据与次生理据的分野、文字理据的存在等，对我们深入思考理据问题有重要的启发。由于本研究讨论的对象主要是词汇，因此我们的分类也主要针对词汇理据进行。但我们认为本节所讨论的分类系统对于整体语言系统和其他子系统的理据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共时的分类：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

与很多语言学者一样，我们对语言理据进行分类的主要参照标准是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系统”这一概念，从而可以粗略地将语言理据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内部理据即指封闭的、静态的、共时的语言系统内部呈现出的种种理据现象。典型的内部理据是 Ullmann（1962）[①]界定的“形态理据”，即通过分析语言系统内部合成符号的构成揭示其意义的理据机制，如 fifteen 由表示“五”的 fif-和表示“十”的-teen 构成，“球拍”就是“打球用的拍子”。形态理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认知事物的共同方式，存在于多种语言中。但是，“形态理据”这一术语只适用于印欧语这样的形态语言，世界上诸多非形态语言没有“形态”的概念，何来形态理据呢？我们认为这类理据出现在合成语言符号中，故而可以将其称作合成理据。

正如我们在探讨理据的定义（2.3.1.3）时指出的那样，语言系统事实上是各种内部外部、共时历时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严格按照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只在理想中存在。在探讨词汇系统内部理据现象的同

①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时，难免会出现难以完全排除系统外因素影响的局面。例如，在词汇系统内部探讨一词多义现象时，尽管语词的本义和各引申义都是共时地存在于语言系统中的，是词汇系统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某一词语的本义必然产生于引申义之前，而且不同的引申义一般说来也是次第产生的，这就是一种历时因素；另外，引申义往往是由语词的本义通过隐喻和转喻机制产生的，这中间就会涉及人类认知这一外部因素。故而对一词多义现象作内部理据方面的考察时，无法完全排除外部因素的影响。

语言的外部理据指受到语言系统之外的各种因素作用而产生的理据，这其中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历时因素和外部因素，即语言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如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历史沿革、生活习惯、风土民俗、思维方式、交际惯例、认知方式、民族构成等。例如在中西语言研究传统中有深厚积淀的词源研究，探索事物的得名之由和词的来源，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词源理据的研究。如果从文化和语言的共生关系入手讨论语词的理据性，就是文化理据研究了。另外，对经济性的追求是人类交际活动的共性，经济因素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都有所体现，形成语言中的经济理据现象；而语言社团出于对便捷记忆的要求，也常会为理据模糊的语词附会上新的解释，形成颇有趣味的俚俗理据现象。历时因素和外部因素自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造成了外部理据的多样性。

语言是复杂属性的杂合体：自然性、生物性、工具性、人文性、系统性、社会性、主体性等性质融于一炉；同时语言又是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虽已对语言探索了数千年，但所揭示的仍不过是冰山一角。以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将理据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两类，实际上并非完美的标准。例如，原生符号的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是人类语言与现实世界的接口，难以简单地归入内部理据或外部理据。我们之所以与诸多学者一样依照“语言系统”这一概念对理据进行分类，一方面因为索绪尔的理论体系是现代语言学理论完美的典范，为理据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平台。诸如转换生成语法、功能主义和认知语法等种种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派，虽然大张旗鼓地打出“革命”的旗号，事实上并未能也无法从根本上抛弃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打下的基础，反而纷纷

将自己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结构主义的根基之上。另一方面，整个现代语言学理论建立在索绪尔学说基础之上，完全脱离了索绪尔学说的一套术语和规范，现代语言研究就几乎没有多少成果可以借鉴。几乎所有现代语言学文献都有索绪尔的影子，可以说没有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就成了无法说话的"哑巴"。这也更充分地证明了索绪尔及其理论在语言研究领域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 历时的分类：原生理据和次生理据

既然我们用"语言系统"这一概念作为区分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的标准，这就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的区别产生于语言成为一个"系统"之后。我们自然会发问：语言在成为系统之前是什么样的呢？这就回到了许多语言学者都感兴趣的话题：语言的起源。最初的语言符号是如何产生的？语言来自现实世界还是人的心灵？文字如何能与语言走到一起？语言如何反映现实？这些问题都不是索绪尔的兴趣所在，在他的"语言系统"中无法找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又是古往今来无数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者深感不解并努力解答的问题，同时也是理据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遗憾的是，因为学者们能够得到的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直接证据非常之少，这一问题的种种解释到目前为止都还停留在假说的阶段。Aitchison（1996/2002：96－98）[①]认为"命名意识"（naming insight）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有了命名意识之后，人类就开始有意识地"发明"语词了。然而在人类掌握命名的奥秘之前，已经在使用各种来源的发音表达意义了。Aitchison（1996/2002：105）[②]列举了三种人类语言可能的来源：对自然界（首先是动物）声音的模仿、由于口唇喉舌的自然动作而发出的声音（如 ma、ba/pa 等被世界许多语言用作父母昵称的音节）和原始的歌声，并认为人类语言的起源是这些因素相互促进

① Aitchison, Jean. 1996/2002. *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p. 96－98.

② Aitchison，同上，p. 105。

的结果。在 Aitchison 之前，许多学者对语言起源的问题有过探讨，如赫尔德（1772/1998）[①]、卢梭（1775/2003）[②] 和 Jespersen （1922）[③]，Aitchison 与他们实际上都持同样的一种观点，即人类最初的语言是有现实基础的，而非来自凭空想象。虽然要找到直接证据明确地证实这种假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想要完全否定这一假说，主张原始人类没有依据或参照任何现实中的声音凭空创造出语词来，似乎更加荒诞。Aitchison（1996/2000：98）[④]指出，“即使今天，完全凭空创造的词仍然十分稀少：一位构词法专著的作者仅仅找到 6 个这样的词，其中还有几个是由计算机生成的”。所以，人类语言的初始状态，很可能主要是原始人类通过模拟种种现实世界的声音而产生的。在他们具有命名意识之后，这种模拟可能就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帮助他们创造出人类最早的词汇，即原生语言符号。原生语言符号所具有的理据性就是原生理据。一种语言里的原生符号往往代表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概念，如人及身体各个部分的名称、当时的主要食物名称、自然环境中和人关系密切的事物（如太阳、水、土、雨、动物、植物等）、当时使用的武器和工具、数目等等。这些语言符号的数量不多，但往往代表一个族群认知世界的核心概念，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相当稳定，流传下来的部分构成我们今天词汇的内核。

除了语音方面的原生理据之外，还有文字的原生理据。文字的产生晚于语言许多年，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农业化（畜牧和耕种）社会之后，才出现了比较原始的文字。人类最早成系统的文字，至今只有不过数千年的历史而已。对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起源于图画，原始文字最早的资料包括刻符、岩画、文字画和图画字（周有光，1997：4）[⑤]。原始文字一

---

① 赫尔德，1772/1998，《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 卢梭，1775/2003，《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 Jespersen, Ott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④ Aitchison, Jean. 1996/2002. *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98.

⑤ 周有光，1997，《世界文字发展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 4。

般采用表形和表意两种手段表示概念。例如，我国东巴文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象形文字，从文字形态发展的角度看，比甲骨文还要原始，属于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态。东巴文“靠”字，就是画一根竖线代表墙或树木，这是表意符号，再画一个做出倚靠姿势的人，这是表形符号。东巴文中的指事字也有不少，如表示 1～9 这些数字的文字，表示哪个数字就有几条短线构成，表示方位的上、中、下就通过一个小圆圈和其他线条的相对位置来表示。



图表 2.7　东巴文中的“爱”字①



图表 2.8　东巴文字举例②

世界上所有由本民族创制的文字都与东巴文字一样采用象形、指事等手段创制最初的文字，这些原始文字描摹现实的特征非常明显。文字在二维世界中表现意义，比起线性的声音来，能更多更好地保留现实世界的

① 图片来源：http://lijiang.abang.com/od/yxlj/a/dongbawen_p.1.htm，登陆日期 2010－2－4。

② 图片来源：http://www.djhuiyi.com/hyxts/200811/529.html，登陆日期 2010－2－4。

各种信息，故而理据程度高于语音。文字所具有的这种理据性，我们称之为文字理据。从当前的共时角度看，语言与文字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从文字发生的最初情况看，它并不是作为语音记录工具出现的，而是独立于语音的另外一套书面表意系统，与口头的语言没有直接联系。这一点从汉字以形表意而不直接表音的特点上看十分清楚。所以早期文字也是第一性的、原生的符号系统，其理据性也是原生理据。初民创制文字的时候，必然首先为那些与他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概念制造文字，因此原生文字符号与原生语音符号一样，反映的也是本民族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其生成蕴含着本民族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

原生语言符号和原生文字符号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可能呈现出比较缓慢的上升趋势。当增长的速度不足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时，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一些方法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如汉语的假借字），但是最后很多语言社团发现如果把原生符号通过种种方式组合在一起，就可以用来表达新的概念。这种在原生符号基础上产生的语言符号就是次生符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我们说的合成符号。合成符号可能基本上都出现在语言发展比较成熟的时期，这类后起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就是次生理据。

原生语言符号的研究在索绪尔的“语言系统”中并未受到重视，印欧语中较能代表语音理据的拟声词和感叹词甚至被当做语言的次要成分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但是我们认为，原生语言符号对于整个语言系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这是因为原生语言符号内包含了一个语言社团最初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他们对自身和现实思考的结果，也是一个民族对概念世界进行的最初的划分，其中蕴涵了这个语言社团一整套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如果我们承认语言、认知方式、思维模式甚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代传承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语言世界、概念世界、认知世界的雏形早已蕴含在原生语言符号之中了。原生符号系统甚至在一种语言的婴儿期就已为它今后的发展趋向定下了基调，因为在原生语言符号系统存在的前提下，后起的语言符号只能在不违背原生符号根本规律的原则下运作，超出了原生符号系统许可的范围，结果大概不外乎两种：(1)次生的符号被淘汰；(2)造成语言生活的混乱局面，严重的还有可能导致

一个族群文化身份的丢失甚至社会的动荡。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有的还以相当惨痛的代价和惨烈的结局收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原生语言符号系统生成的时候，人类语言的 DNA 就已经书写在其中了。不过，从我们对原生理据的讨论来看，相当一部分原生语言符号是人类通过模拟现实创制的，故而有理可据。

我们在索绪尔的“语言系统”之外再提原生语言符号和原生理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虽然没有明示他业已取消了这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问题不在索绪尔考量的范围之内。“语言能动地反映现实”似乎已经成为人文领域的常识，但是语言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却被现代语言学关在门外。试问，与现实无关的语言如何能反映现实？难道语言真的来自虚空而没有一点物质基础吗？原生语言符号的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是语言物质基础的直接证据，它们是人类语言系统和现实世界的接口。

综上所述，语言的理据既可以根据索绪尔的“语言系统”划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也可以根据理据产生的先后分为原生理据和次生理据。内部理据主要包括合成理据和语义理据，外部理据则类型繁多，如词源理据、文化理据、俚俗理据、经济理据等。原生理据主要包括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有些理据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如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核心概念词一词多义现象，从语言系统内部看各个义项以家族相似关系存在于语言的共时系统中；从外部看，词义的衍生涉及转隐喻认知操作的过程；核心概念词的本义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原生理据，而词义的引申和发展又是一个次第产生的历时过程。这说明，语言理据是复杂的现象和过程，语言面貌是各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

第四节　小结

本章系统阐述了和理据相关的理论问题，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

要内容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中西学术传统对语言理据问题的种种看法和观点。我们的讨论跨越了整个中西语言研究的历史，自人类文明早期的神话和宗教传说所反映的理据观起，直到当今的主要语言研究流派对理据问题所持的看法。中西方对理据问题的关注均开始于文明早期，这在西方的“语言神授”和中国的“仓颉造字”等说法中可见一斑。此后，在中西哲学繁荣发展的“轴心时代”，都出现了对语言理据问题的集中讨论：在西方是“自然论”和“约定论”的争论，在中国是先秦时期“名学”的出现。此时，语言研究尚未形成独立、系统的研究传统，对于理据问题的探讨也只散见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中。语言研究逐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在中古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和西方的语言理据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西方对于词源和语言起源问题的探讨成为语言研究和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中国则出现了《说文解字》、《释名》这样集中讨论语言理据的专著，并发展了从“右文说”到清学“音声求义”的一整套理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现当代的语言研究界呈现出西方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现代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认知语言学都对理据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此阶段中国传统语言研究虽然处于主流之外，但一方面吸收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坚持中国语言研究的特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本章在详细介绍西方语言理据理论的同时，特别注重挖掘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涉及语言理据的观点，这对于我们充分理解和继承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宝贵财富，从汉语汉字的角度修正当前“一元语言观”之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有重要的作用。

本章的第二节讨论了语言研究史上和“理据”概念关系密切的几个重要概念：任意性、象似性、内部形式和语义透明度。我们认为，理据性与任意性的关系，需要从语言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分别探讨：在语言共时系统内部，任意性和理据性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两股力量，从不同的方向共同塑造语言的基本面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一个局部适用的原则，并不能构成语言内部系统运作的唯一基础，语言系统是建立在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双重原则的基础上的；而如果从历史、文化、社会、交际、认知等外部因素看，就会发现人类所有的语言现象和语言活动几乎都是有理可据的。“象似性”概念的提出是近年来西方语言学界在理据

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目前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语言象似性理论脱胎于西方语言研究传统，主要建立在对西方语言事实的观察与归纳基础上，是语言理据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象似性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的句法、篇章层面和文学语言，要想得到主流语言学界接受和承认，还需寻求理论上的突破。语言学者对于“inner form”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内在语言形式”，二是作为事物得名的缘由，三是作为合成语言符号的构成。语言的理据是洪堡特定义的“内在语言形式”的一个部分，帮助构成语言的核心机制，塑造语言的基本面貌；而研究事物得名的缘由（词源理据）和合成语言符号的构成（合成理据）都是理据研究的一部分内容。语义透明度主要针对语言中的合成符号，语义透明度高的词，其合成理据程度就高，反之，其合成理据程度就低。

在讨论了理据研究的历史并澄清了语言研究中和理据纠缠在一起的一些概念之后，本章第三节提出了理据的定义并对理据进行了分类。我们认为，**语言理据是语言的形式及演变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联系**。这一定义将语言形式本身和语言形式的发展变化作为考察的对象，涵盖了影响语言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各种语内、语外因素，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理据定义。语言理据可以依据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这一概念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其中，内部理据主要指合成语言符号所具有的合成理据和探讨语义关系的语义理据；而外部理据的种类很多。另外，我们也可以依据理据产生的时间先后区分原生理据和次生理据。原生理据指语言的原生符号所具有的理据性，主要包括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两类。它们是语言与现实世界的接口，极大程度地决定和影响次生语言符号的理据类型和理据程度，对语言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章

词汇与理据性

第一节　词的概念

3.1.1　词和西方语言

西方对词的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问。钦定本《圣经》之《新约》之《约翰福音》的第一句即是“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西方人对“词”的重视可见一斑。人们往往难以给熟悉的东西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词”这一概念也是如此。目前，语言学者对“什么是词”，仍然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如 workman、workday 是单独的词，何以 work force 和 work house 却被认为是短语？Kith and kin、(rain) cats and dogs、pro and con 这样的结构，是一个词还是三个词？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还有一些争议。

但是即便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人们对西方语言的词，有天然的、直觉的评判标准，除了极少数边缘现象（如到底是 alright 还是 all right），词的确认在西方语言实践中，并不造成多大的困难。这是因为西方语言的词，在口语中有重音、语调等语音特征，在书面语中有空格的帮助，是

极容易辨认的。本研究采用“词”通行的定义：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自由形式，即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

3.1.2 汉语的“词”

“词”这一概念在汉语中造成的困惑比西方语言大得多。这首先是由于汉语学者直接借用了英语等西方语言中“词”的定义，以此为标准在汉语中确定词。王力（1944/1984：16）[①]在说明“我们对于中国的词，更感觉确当的定义实在不容易想出”之后，暂时把词定义为“语言中的最小意义单位”。孙常叙（1956：2）[②]指出“词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的语言最小单位”。高名凯、石安石（1963/1987：103）[③]将词定义为“一种语言建筑材料的单位，也就是造句的时候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教材《现代汉语》[④]则将词定义为“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这些定义实质上把西方语言词的概念照搬到汉语中来。这种先有概念和定义、后找实体的做法给汉语研究带来的困难是，很难在研究实践中，特别是面对真正的汉语材料时确定什么是真正的汉语词。葛本仪（2003：6－10）[⑤]在讨论“什么是词”这一问题时，指出“孤立静止地看一个成分是不是词，有时是不容易说清的”，“我们只能确定词是造句的最小单位，却难以从实践中证明”。从20世纪初汉语学者开始使用词的概念以来，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研究，词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仍然尚未得出一个在理论上令人信服、在实践上便于操作的结论。

“词”作为西方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在汉语中难以确定的局面，为

① 王力，1944/1984，《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国语法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p. 16。
② 孙常叙，1956，《汉语词汇》[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p. 2。
③ 高名凯、石安石，1963/1987，《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p. 103。
④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1993/2004，《现代汉语（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p. 190。
⑤ 葛本仪，2003，《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pp. 6－10。

深入研究汉语带来了诸多困难。例如，分词标准难以把握、难以统一，始终是建设大型汉语语料库的瓶颈问题。周上之（2006：自序）[①]指出，“经营百年的汉语语法大厦根基不牢、后院起火，正是由于语法体系的中心概念‘词’这个‘舶来品’被渐渐掏空了，仅仅剩下一个空壳子，填在里面的东西与它的原产物风马牛不相及。”造成这一困惑局面的根源在于，“词”不是汉语自身固有的、天然的语言单位，而是西方语言的概念。

3.1.2.1 字和词

在“词”这一概念进入汉语学者视野之前，汉语社团和中国传统语言研究讨论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字”。而在引进西方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后，许多语言学者在构建汉语语法理论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颇费笔墨地探讨字和词的区别，如章士钊（1907：1）[②]、王力（1944/1984：12－17）[③]、吕叔湘（1942/1990：6－8）[④]。然而，字是汉语中固有的、明晰的语言单位，在汉语社团中根深蒂固，想要弃字而用词，是颇为不易的事。

事实上，“词”这一概念如果理解成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那么并非所有语言中的“词”都必然与印欧语的词面目一致。Bauer（1983：9）[⑤]指出，“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并不是同一件东西。”赵元任（1975/2008：63、75）[⑥]指出，“词”是汉语中不存在的实体，“在说英语的人谈到 word 的大

---

① 周上之，2006，《汉语离合词研究——汉语语素、词、短语的特殊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② 章士钊，1907，《中等国文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p. 1。

③ 王力，1944/1984，《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国语法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pp. 12－17。

④ 吕叔湘，1942/1990，《吕叔湘文集第一卷·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pp. 6－8。

⑤ Bauer, Laurie. 1983.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9.

⑥ 赵元任，1975/2008，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A]，潘文国主编《共性·个性·视角——英汉对比的理论与方法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60－75。

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吕叔湘（1980/2004：40）[①]在《“词”的今昔》一节中指出，“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他认为：

> 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

吕先生明确地告诉我们，讲汉语语法可以不要词这个概念，那么“词”对于汉语研究的意义何在呢？紧接着，吕先生如此回答这一问题：

> 讲汉语语法，也许“词”不是绝对必要，可是从语汇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语汇显然不能再以字为单位。用汉字写汉语，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显露；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了。

可见，“词”这一概念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废除汉字，实现汉语拼音化的目标。今天我们对汉字的看法，已经不同于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了。“词”在今天看来，的确如吕先生所说，在汉语研究中并非绝对必要。

如果印欧语意义上的“词”对汉语来说并不必要，那么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什么呢？我们的答案是“字”。潘文国（2001a[②]；2001b[③]）指出，“字”是汉语的天然单位，是汉语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单位，是汉语各个平面研究的交汇点，在语法上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是字法与句法的交接点。该文从这四方面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汉语的字和西方语言 word 的对应性，得出字是汉语基本结构单位这一结论。我

① 吕叔湘，1980/2004，字、词、句[A]，《吕叔湘文集第五卷·语文常谈》[C]，北京：商务印书馆，pp. 36－45。

② 潘文国，2001a，字与 word 的对应性（上）[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3）：42－51、74。

③ 潘文国，2001b，字与 word 的对应性（下）[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4）：26－29、40。

们认为这一结论是非常有见地的。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语言单位，具有封闭的语音结构、独立的形体和完整的意义。除了把字作为记音符号来使用的特殊用法（如假借字、写音外来语等），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汉语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是和西方语言的“词”地位功能相当的语言单位。字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构成了汉语词汇大厦的基石。将字作为语素或词素看待是不符合汉语事实的。

3.1.2.2 词和语

当代认知语言学认为，词库、词法和句法构成一个连续体，三者没有清晰的界限（Langacker，2007：xiii）[①]，词和短语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地带。英语词的概念较为清晰，和英语等印欧语比起来，汉语词和短语之间的界限尤其模糊。如果参照严格的句法标准，“吃饭”、“关心”这样一般人感觉是词的结构都应属于短语，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归于一类；而“同步稳相回旋加速器”、“北京春节晚会演员休息室”这样的结构，则会被划入词汇层面，和我们的语感大相径庭。词和短语如何区分，“读书”、“回家”、“谈话”、“北京大学”、“新编英语大词典”这样的结构，到底属于词汇层面还是短语范畴，虽然经历了数个年代的讨论，目前仍然众说纷纭，无法达成共识。

很多汉语学者以词化程度作为区别词和短语的标准。从理论上讲，词化程度高的表达法，即脱离句法控制、具备特异性特征的语言结构，就成为一个整体，进入语言的词汇层面了。葛本仪（2003：8）[②]在谈到词的特征时指出，“词在具体的言语句子中是一个凝固的整体”。例如，“白布”、“白马”可从字面上直接理解为“白色的布”和“白色的马”，说明这两个表达法受到句法的控制，词化程度不高，应该纳入短语范畴。然而，“白字”则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白色的字”；“白领”也已经通过转喻机制

---

① Langacker, 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cke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xiii.

② 葛本仪，2003，《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p. 8。

脱离了“白色的领子”这一意象，转而成为“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了，因而属于词汇范畴。不过，汉语词化程度比较高的、成为一个“凝固的整体”的、比较典型的词有不少也是可以拆开的。例如，“幽默”、“体操”、“慷慨”、“鞠躬”可以拆分为“幽它一默”、“体了一堂操”、“慷他人之慨”和“鞠了三个躬”，而“白布”、“白马”、“吃饭”、“打球”这样词化程度不高的表达法，在绝大多数说汉语的人看来无疑是词。这说明仅以词化程度来判断某一表达法是否属于词汇层面是不够的。

汉语的组织不仅受到语义、语法因素的限制，还受到韵律的制约。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是，在汉语中“种树”、“植树”和“种植树木”是可以接受的，但“种植树”却不能被接受。冯胜利(2000：77－78)[①]提出了“韵律词”的概念，认为“汉语里介乎字和句之间的那个中级单位是‘韵律词’”，将其定义为“最小的语流片段”，并指出“汉语的‘标准韵律词’只能是两个音节”。我们认为“韵律词”的概念能够比较好地解释大批词化程度不高的双音节结构，如“念书”、“走路”等依照严格的句法标准来看不能称作“词”的结构，何以在汉语社团的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词的现象。本研究认为，汉语中惯常使用的双音节结构，虽然词化程度不高，但符合“韵律词”的概念，也属于词汇层面。

本研究对多音节的表达法采用较为严格的词化标准评判其是否属于词汇层面，即只有词化了的多音节表达法，才属于本研究所讨论的对象。依照这条标准，我们所讨论的多音节词汇大多是写音外来语和一些固定的名称，如“巧克力”、“布尔什维克”和“仙人掌”等。这是因为如果不采用严格的标准，则“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等学校入学考试”这样明显不符合中国人对词的感觉的表达方式也会被纳入词汇范畴加以讨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探讨的汉语词汇包括字、双音词和少量词化程度高得多音节结构。

①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p. 77－78。

第二节　英汉语的词汇系统

3.2.1　英汉词汇系统的发展：原生词和派生词

从历时角度看，一种语言词汇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王文斌（2005：11）[①]在讨论了前人对英语发展史的几种分期之后，将英语的发展划分为古英语（499～1066）、中古英语（1066～1476）、早期现代英语（1476～1755）和现代英语（1755 至今）四个时期。我们利用这一分期，简单陈述英语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

古英语	449～1066	449 年，日耳曼人征服大不列颠（the Germanic Conquest），朱特人（Jutes）、撒克逊人（Saxons）和盎格鲁人（Angles）三个生活在英格兰的日耳曼部落语言相互渗透融合，形成英语本族语。古英语的基本词汇是西日耳曼语的共同词汇（李赋宁，1991：3）[②]。据 Hogg & Denison（2006：202，217）[③]，古英语的词汇总量约为 2.5－4 万之间，业已基本包括了现代英语的核心部分（the common core），借词数量很少，仅占词汇总数的 3%。
中古英语	1066～1476	1066 年，诺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使得法语长期成为此后英格兰政府的官方语言。英语词汇开始大量吸收罗曼语成分。英语词汇在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借入了大量的法语词，同时也有部分拉丁语借词进入英语。一些借词成为当代英语的核心词汇，如 age、city、noise、flower 等。这使得英语词汇开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同一个概念往往有来自古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的三个不同的词，如 rise—mount—ascend、fire—flame—conflagration 等。

① 王文斌，2005，《英语词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11。

② 李赋宁，1991，《英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p. 3。

③ Hogg, Richard & David Denison. 2006.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02, 217.

（续表）

早期现代英语	1476～1755	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22－1491）引入了印刷术，使得分布于英语各种方言的词拼写逐步得到规范和统一。这一时期，英语词汇总量快速增长，借词成为扩大词汇最有效的手段，大量拉丁语、希腊语词汇进入英语，其中学术和技术词汇的增长尤为迅速。同时，英语本族语词汇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在这一时代的莎士比亚作品和标准圣经译本（the Authorized Version）这样的典范著作中，英语本族语词汇的使用超过90%（李赋宁，1991：11－12）①。
现代英语	1755至今	1755年，Samuel Johnson 编纂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面世，对英语词汇正字法起到了很好的规范和统一作用。这一时期，随着语言接触日益频繁、英语全球扩张以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英语词汇继续稳步增长。借词和构词法均成为增加词汇的重要手段。

图表 3.1　英语词汇的发展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到，英语词汇的发展大约经历了1500多年。英语词汇量从最初的数万增加到目前的一两百万；词汇的构成从单一的日耳曼语词汇为主，逐步演进成目前多种来源词汇并存的格局。Storkwell & Minkova（2001：53）②对英语最常用的10 000词的来源进行了统计，将这10 000词依照词频高低每1 000词分为一级，其词源构成如下表：

Sources of the most frequent 10,000 words of English					
Decile	*English*	*French*	*Latin*	*Norse*	*Other*
1	83%	11%	2%	2%	2%
2	34	46	11	2	7
3	29	46	14	1	10
4	27	45	17	1	10
5	27	47	17	1	8
6	27	42	19	2	10

① 李赋宁，1991，《英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pp. 11－12。

② Stockwell, Robert & Donka Minkova. 2001. *English Words: History and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3.

（续表）

Sources of the most frequent 10,000 words of English					
Decile	*English*	*French*	*Latin*	*Norse*	*Other*
7	23	45	17	2	13
8	26	41	18	2	13
9	25	41	17	2	15
10	25	42	18	1	14

图表 3.2　英语最常用 10 000 词的来源构成

汉语有记载的历史比英语长得多，从甲骨文算起已有 4 000 年。潘允中(1989：1－16)[①]将汉语词汇的发展也分为四个时期，即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史存直(1989：38)[②]将汉语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即甲骨文时代、周秦时代、汉魏六朝时代、隋唐宋时代和元明清时代。我们将两者的分析综合起来，考察汉语词汇在这几个时期展现出的不同特点。

上古汉语	甲骨文时代	甲骨文时代的汉语已大约有三千个字，基本上都是一字一词。和渔猎、畜牧有关的词汇很丰富，和农业有关的词汇也已形成较大规模。汉语此时存在较多合文现象，即单字符多音节的词汇模式，但至秦时这一现象已消失(潘允中，1989：2－3)[③]。此时汉语存在大量假借字，形声字仅占词汇总量的 20%。汉语的基本词汇，在上古时期就已形成大部分。
	周秦时代	周秦时代汉语词汇比甲骨文时代大大丰富，有些方面形成了词化程度很高的词汇群，如和农耕、畜牧有关的词汇。汉代所作的《尔雅》被广泛地看做周秦时代的词汇集(并不是词汇全集)，共收字 3 200 多个。《诗经》里已有不少双声词、叠韵词和一般的复音词。双音词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成批出现，这一时代也是汉语联绵词产生和使用较多的阶段(冯胜利，2000：107－108)[④]。假借字的使用也较为普遍。

① 潘允中，1989，《汉语词汇史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p. 1－16。
② 史存直，1989，《汉语词汇史纲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38。
③ 潘允中，1989，《汉语词汇史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p. 2－3。
④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p. 107－108。

（续表）

中古汉语	汉魏六朝时代	汉语词汇继续增加。作于东汉的《说文解字》共收字 9 353 个，而作于魏的《广雅》已收字 18 150 个。农业、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词汇有长足发展。《说文解字》共举象形字 364 个，指事字 125 个，会意字 1 167 个，其余基本为形声字，占 82%强。这个时期假借字的使用已大大减少。单音词模式不足以应对词汇发展的需要，开始出现大量复音词。和西域往来增多，出现了吸收外来语的高潮。
	隋唐宋时代	出现大量关于工商业和市民生活的新词，并且出现了变文和话本这样贴近口头语言的文体，其词汇已和现代的口语词汇相当接近。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在这一阶段出现，大批引进和佛教有关的外来语。
近代汉语	元明清时代	口语词汇更接近现代，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词汇进一步发展，科学的发展也带动了词汇的增加。这一时期修撰的《康熙字典》收字 4 万多个，号称“集汉字之大成”，其中形声字约占 90%。外来语随着和西方接触的频繁而大量增加。
现代汉语	五四运动前后至今	外来语占新词的比重很大，复音词空前发展，占据了词汇系统的优势地位，口语词汇取代了文言，成为学术和文学语言。形声字在现代汉字中的比例超过了 90%，现代汉语词汇量已达 40 万左右，而外来语的规模大约为 1 万左右。

图表 3.3　汉语词汇的发展

汉语词汇系统与英语相比，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1)由于有汉字这一特殊的载体，汉语词汇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文字和语言、口语和书语之间的融合和冲突。这是由于汉语和汉字最初是来源不同的两个独立的表意系统，其融合的过程漫长曲折。这种冲突在汉语汉字合流的早期更为突出，上古汉语时代大量存在的合文和假借字就是这种冲突的具体体现。(2)词汇的发展较为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字的增加为主，后一阶段则以双音词的急剧增长为主要特点。(3)虽然前后出现了几次吸收外来语的高潮，但是真正被汉语接受而稳定下来的写音外来语数量并不多。

英语和汉语词汇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语词由少到多，词汇规模由小到大的过程。我们可以将某一语言的词汇依据其产生的先后分为原

生词和次生词两个部分。原生词是语言最初产生的词汇。我们推测，人类初民总是最先将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那些事物概念化为词反映到语言系统中来，所以原生词一般代表了某一语言社团认知和表达世界的核心概念，构成了该语言最重要的概念范畴，包含了语言社团认知世界并将现实世界转化成语言的基本方式。Storkwell & Minkova（2001：31）[①]表示，英语最古老的词汇多为表达自然现象、植物、动物、亲属关系的名词、表达人类基本活动的动词、表示重要属性的形容词、数词和代词。另外，原生词往往也是形式最简单的词汇，如英语 sun、man 和汉语“日”、“人”。在初民尚未有发达的认知能力和文明水平，而且需要表达的概念数量并不很多时，用最简单有效的形式表达那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概念，无疑是明智的做法。原生词数量一般不大，但是相当稳定，保存在共时系统中的原生词构成了基本词汇的核心，往往能反映一种语言的本质特征，具有很高的能产性，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原生符号之后产生的符号是次生符号。次生词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两条：(1)以原生词为材料，将原生词组合生成新的符号，如英语派生词、复合词和汉语形声字、双音词；(2)使用语言的外部资源，从其他语言中吸收新的词汇，如英语中大规模存在的借词和汉语的写音外来语。无论以哪种方式产生的次生符号，其生成方式必然受到语言中业已存在的原生符号制约，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偏离原生符号为其划定的轨道。次生词往往数量庞大，成为词汇的主体部分。

3.2.2 英汉词汇系统的构成：单纯词和合成词

3.2.2.1 英语的单纯词与合成词

词汇系统可以从历时角度分为原生符号和次生符号，还可以从共

---

① Stockwell, Robert & Donka Minkova. 2001. *English Words: History and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1.

时角度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英语单纯词是那些不通过构词法得来的词。它们只含有一个词素，无法继续分割为更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具有不可分析的性质，如 man、great、run 等。现代英语单纯词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古英语词汇，二是英语从其他语言中吸收的借词。古英语词汇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单音节性，而单音节的英语词必然是单纯词，所以由古英语时代保留至今的词基本都是单音节的单纯词。而借词即使在借出语中是可分析的，在借入语中也往往体现出强烈的不可分析倾向而成为单纯词。如 karate（空手道）在日语中由 kara（から，即"空"）和 te（て，即"手"）两个部分构成，但在英语中显然是不可分析的单纯词。夸克等（1985/1998：2116）[①]指出，"如果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借用了大量的词（如英语从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借用了大量的词），可分析性就进一步减少。"这说明数量庞大的借词是英语单纯词的重要来源之一。

合成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通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的词汇。英语的合成词主要是通过加缀法构成的派生词（如 goodness）和通过复合法形成的复合词（如 blackboard）。合成词是英语利用本族语资源生成新词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英语很早就开始从各种语言中吸收借词，不少借词和借词的词缀同化程度相当高，甚至已经成为核心词汇，所以也成为生成合成词的资源，如来自拉丁语的 cook 合成了 cooker 和 cookware 等。夸克等（1985/1998：2117）[②]指出，英语中"大多数有构词力的词缀基本上是外来的"。这说明大量的外来词缀在英语中已经取得了和本族语词汇相当的地位。

3.2.2.2 汉语的单纯词与合成词

单纯词在汉语中一般被定义为"只含有一个语素的词"（北大中文

① 伦道夫·夸克、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1985/1998，《英语语法大全》[M]，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116。

② 夸克等，同上，p. 2117。

系，1993/2004：195）[①]。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所谓“最小”，即指语素无法继续分割为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这一特征。和“词”相同，语素也是一个西方语言概念，将其移植到汉语中，也存在着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

汉语研究界目前普遍认为单音节的汉字不可分析，是汉语语素即单纯词的主体。这一观点只适用于部分汉字，大量的汉字可以进一步分析为更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齐冲天、齐小乎（2010）[②]指出，从词源上看，约三分之一的汉字是由两个词源、两部分音义构成的。如“馨”，从香，从殸（即磬，声之远闻者）。馨香双声，馨磬叠韵，馨即香之远闻者。当然，由于语音的变迁较为显著，不可能所有这类字在词源上的可分析性，都能像“馨”这样在现代汉语系统中得以保存。汉语符号和西方语言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汉语符号内部起作用的不仅是音义关系，还有形义关系（参见本书 4.1 和 4.2）；很多字不仅可以从音义关系上分析，还可以从形义关系上分析。“木”和“林”、“松”、“李”、“沐”在汉语社团看来显然分属于不同的层级和类别。占汉字绝大多数的合体字都可以被进一步分析为更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如“理”由“玉”和“里”构成，表示“治玉”（即分解加工玉石），后引申为“纹理、条理、道理”；“据”由“手”和“居”构成，表示“杖持”，引申为“依仗、凭借”。合体字的这种可分析性和语素的“最小”特性是相矛盾的，故此我们认为，合体字不是单纯词，是合成词，而独体字属于汉语单纯词的范畴。

字的标准模式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汉语联绵词（也称联绵词或联绵字）和写音外来语由于具有“两（多）个字·两（多）个音节·一个概念”的独特模式，一直以来被分析为汉语单纯词。写音外来语是具有异质性的外来成分，其构成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而非形义关系，故而和汉语词汇标准模式产生冲突。而联绵词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联绵词由两个音节连缀而成，典型联绵词的两个音节往往有叠音、双声或叠韵的关系；即使没有双声叠韵关系的，也有可能蕴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1993/2004，《现代汉语（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p. 195。其他文献的定义也基本如此。

② 齐冲天、齐小乎，2010，《汉语音义字典》[Z]，北京：中华书局。

含着某种语音上的联系，即声相转或韵相近（詹鄞鑫，2005/2006：69）[①]。联绵词盛于春秋上下的一段时期，绝大多数产生于六朝以前（周荐，2001：34）[②]，由于年代久远，对其生成的原因有各种推测，但尚未有确论。周荐将联绵词的产生从总体上归因于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复音节发展的趋势。冯胜利（2000：103－110）[③]认为，联绵词“急言用单，缓语用偶”的特性，源于远古汉语音节的简化，使得远古汉语的音素音步（音节长短的对立）转变为音节音步（音节数量的对立），进而产生了将单音节词一延为二的联绵词。王云路（2007：25）[④]指出，联绵词的来源除了有单音词扩展的方式，还可由双音词音变而产生。其中单音节扩展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音节缓读，理同反切，如“浑”变为“囫囵”；（2）音节延展，如“澜”（河水的大波）向前延长为“涣澜”，“径”（河水的直波）向后延长为“径涎”。这些都是由单音节发展为双音节的例子。而在探讨双音节音变的模式时，王云路以“零丁”一词从动宾结构的“丢失人”词化为“寻找丢失者的招贴”，进而词化为表示“孤独”的联绵词为例，表明联绵词可由合成结构词化而来。但是，通过双音节音变而产生的联绵词文献中尚不多见，联绵词形成的这一机制在汉语中是偶然现象还是规模现象，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有不少联绵词本身就是写音外来语，如葡萄、琵琶、苜蓿、蘑菇、玻璃、骆驼等。可见绝大多数联绵词形成的过程中，汉字多作为记音手段使用，起到决定作用的是音义关系，即联绵词乃是“义存乎声”[⑤]，这和写音外来语形成的机制是一致的。这一突显音义关系的机制和汉字标准模式不同，从而生成了“两（多）个字·两（多）个音节·一个概念”的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

---

① 詹鄞鑫，2005/2006，联绵词与单字词音近义同现象的思考[A]，《华夏考——詹鄞鑫文字训诂论集》[C]（原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pp.150－156），北京：中华书局，pp.69－78。

② 周荐，2001，联绵词问题零拾[J]，《语文建设》(2)：34－35。

③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p.103－110。

④ 王云路，2007，释“零丁”与“伶俜”——兼谈联绵词的产生方式之一[J]，《古汉语研究》(3)：25－28。

⑤ 参见汪寿明、潘文国，1992，《汉语音韵学引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259。

联绵词拆用的现象，在汉语中早已存在。如《诗经》中的“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是“玄黄”的拆用；《老子》中的“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是“犹豫”的拆用（何九盈、蒋绍愚，1980：29）[①]。而现代汉语中，由于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的特殊结构违背了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常规模式，不少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体现出由特殊模式向标准模式靠拢的倾向，即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中某个用以记音的字发展了一定的意义，出现“字化”[②]现象，如：

联绵词的字化		写音外来语的字化	
骆驼	驼峰	巴士	大巴
蝴蝶	化蝶	葡萄牙	葡式蛋挞
蜘蛛	蛛网	的士	打的
狰狞	狞笑	模特	名模
芙蓉	芙帐	摩托	轻摩
痉挛	解痉	蘑菇	香菇

图表 3.4　字化现象

有的外来语出现了多个字的字化现象，如用“涤纶”的“涤”可指“涤纶”，如“毛涤”；而“纶”则发展了“合成纤维”的意义，如“氨纶”、“腈纶”等。有些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发展了“离合词”形式，如“慷他人之慨”（慷慨）、“幽它一默”（幽默）、“滑天下之大稽”（滑稽），这是汉字离散性作用的结果。

我们认为，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主要是将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使用而产生的语言结构，和汉字的标准模式不同。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的“字化”现象，实际上是这种偏离汉语常规的“两（多）个字·两（多）个音节·一个概念”的成词模式，向汉语优势的“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标准模式靠拢。我们将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这种以汉字记音而产生的结构看做不典型的单纯词。

---

① 何九盈、蒋绍愚，1980，《古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p.29。

② 也有文献称为“语素化”现象，如秦炯灵、胡常熟（1997：22－24）。见秦炯灵、胡常熟，1997，联绵词音节语素化问题说略[J]，《汉语学习》(3)：22－24。

此前在讨论汉语“词”的概念时(3.1.2)曾经指出,汉语词和短语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故而采用冯胜利(2000:77-78)[①]提出的“韵律词”作为评判汉语词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一标准既符合汉语社团的语感,又提供了形式上的依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由此,汉语双音节词除了少量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外,都属于合成词;而三音节及以上高度词化的结构,除写音外来语外也都属于合成词范畴。

综上所述,典型的汉语单纯词是独体字,如“日”、“人”、“水”等。它们不能被继续分割为更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并且能够通过各种组合和聚合关系生成更高级别的汉语符号。汉语独体字的数量很少,仅有数百个,但是参与组合生成了数以万计的合体字和数十万双音词,地位十分重要。汉语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不同于“字”的标准模式,但仍表达一个概念,故属于不典型的汉语单纯词。汉语合成词是合体字和除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以外的词(主体是双音词),它们是由独体字通过各种方式合成的语言结构,占汉语词汇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不少已成为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成分。

第三节 词汇和理据

词汇从历时角度可以分为原生词和次生词,从共时角度则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如果不考虑外来语这样的异质成分,我们发现原生词和单纯词、次生词和合成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叠现象。这是因为语言符号产生之初,人类先民会以尽量简单的方式创造所需的符号;同时在当时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水平下,先民只要将为数不多的概念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就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所以用简单的方式创制的单纯符号虽然为数不多,但完全能够适应先民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需要用语言表达的概念日益丰富,简单的符号无法满足语言表达的需

①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p.77-78。

要，便采取各种途径和方式增加语言符号的数量。这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各种简单符号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较为复杂的合成语言符号随之产生。词汇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规模由小到大、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是词汇共时分类和历时分类出现很大程度重合现象的原因。

词汇的理据模式随着词汇系统的发展而变化。原生词和次生词、单纯词和合成词在理据类型、理据方式等方面有许多差异，值得深入研究。外来语作为英汉词汇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吸收和同化也受借入语理据类型和理据水平的制约，了解其中的机制对我们认识语言本质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语言系统的种种外部因素，如语言交际的经济性和人类认知活动对语言的作用，也会影响词汇层面，成为塑造词汇系统面貌的理据力量。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依据本章讨论的词汇分类，对英汉语（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语言符号、合成语言符号和外来语的理据性分别对比，并探讨经济和认知这两种外部因素作用于词汇系统而形成的理据现象。

词汇理据现象受共时、历时、内部、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我们对词汇理据的讨论是多角度、多侧面的，不局限于共时语言系统。但是，由于希望本研究对当前的语言理论建设和语言实践发挥更大作用，本研究尽可能选取那些对共时词汇系统影响较为显著的理据现象和理据因素加以分析。例如，本研究对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语言符号进行理据研究，虽然涉及原生理据和语言的产生，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保留至今的原生理据对共时语言系统有何意义和影响。本论文对前人研究较多的词源理据，仅讨论对共时系统有较大影响的部分，而对经济和转隐喻这样显著影响当代语言的理据因素，则有专门章节充分讨论。

第四节　小结

本章主要对英汉语词汇系统进行简要的描写，澄清一些理论上的问

题，为后续的研究做好铺垫。本章内容主要分为三小节。第一小节通过讨论“词”这一源于西方语言的概念在汉语中的种种理论困境，相对清晰地界定本研究的对象。在前人探讨颇多的字词关系上，我们采用潘文国（2001a[①]；2001b[②]）的观点，认为“字”是和西方语言“词”相对应的概念，构成汉语词汇系统的基础。在词和短语的区别上，本研究采用冯胜利（2000：77－78）[③]提出的“韵律词”概念，将符合汉语基本音步模式的双音词都作为词汇研究的对象。而多音节的语言结构，除少数外来语及词化程度较高的专门名称，如“巧克力”、“仙人掌”等，则不作为本研究的对象。

第二节对英汉词汇系统分别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描写。英汉语词汇从历时角度可分为原生词和次生词。原生词是语言中最早产生的词汇，虽然数量很少，但代表某一语言社团认知世界的基本概念，并对其后产生的语言符号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是词汇系统地位最为重要的语言符号。次生词产生于原生词之后，多由原生符号通过各种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生成，或者从其他语言借入。英语最为典型的原生词是古英语的单音节词，次生词为合成词（主体为派生词和复合词）和借词；汉语典型的原生词是独体字，次生词则是合体字、双音词和外来语。词汇系统从共时角度可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单纯词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往往是结构最为简单的词汇。合成词由两个或多个词素组合构成，可以进一步分析，结构较为复杂。英语中最为典型的单纯词是单音节词和大量的借词，典型合成词是派生词和复合词；汉语中典型的单纯词是独体字，合成词的主体是合体字和双音词。汉语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一般也看做单纯词，但两者突显了音义关系的形成机制，与字的标准模式不同。

第三节讨论词汇系统历时和共时分类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重合的现象，即如果不考虑外来语这一异质成分，英汉词汇系统中大量原生词

① 潘文国，2001a，字与 word 的对应性（上）[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3)：42－51、74。

② 潘文国，2001b，字与 word 的对应性（下）[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4)：26－29、40。

③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p. 77－78。

是单纯符号，大量次生词是合成符号。这一现象和词汇系统规模由小到大、词汇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相吻合。在此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以共时分类为主要立足点，对英汉语（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符号、合成符号和外来语进行理据类型和理据程度的探讨，但同时也注意利用共时分类和历时分类大致重合的现象，将原生符号和次生符号的理据问题一并纳入我们考察的视野。另外我们的理据研究也关注种种外部因素和词汇层面的交互作用，主要对比研究那些对当今语言有显著影响的外部理据因素。

第四章

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理据性对比研究

本章讨论的对象是具有原生词性质的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类型和理据程度。这类符号是一种语言最早形成的词汇，往往代表语言社团认知世界的核心概念，具有相当稳定和能产的特点，是最为重要的词汇。本章的理据研究较多涉及单纯语言符号历时发展、外部世界及语言社团的情况，但研究的最终目的仍是阐明这类语言符号的理据情况对英汉语共时系统和当代语言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为行文简洁和凸显本部分研究的意义，我们将本章的研究对象称为“单纯语言符号”。

第一节　文字对语言的能动作用——以汉语汉字为例

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文字的基本观点是：至少在文字产生数万年以前，语言就已经产生了。所以，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

的功能是记录语音。亚里士多德(古希腊/1957：55)[①]认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这一论断被归纳为文字的“符号之符号论”，自希腊时代就已根植于西方思想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1916/1980：47－48)[②]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

>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

西方长久以来将文字看做“仅仅是语言的替代品”，其作用是“将语音视觉地呈现出来”(Harris，2000：xii)[③]。文字第二性的论断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西方拼音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但是，汉字是表意文字的代表，绝非被动机械地记录语音，它对汉语和汉文化产生了巨大的能动作用。以下我们将分几个方面，对比中西文字的异同，说明汉字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性质和作用。

4.1.1 汉字的来源和特点

4.1.1.1 汉字的来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种种说法。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叙》[④]有一段解释汉字起源的话，综合了几种流传广泛的汉字起源论：

>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

---

①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1957，《范畴篇 解释篇》[M]，方书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55。

②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p.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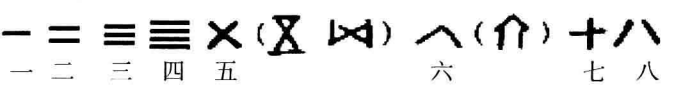
③ Harris，Roy. 2000. *Rethinking Writing* [M]. London：Athlone，p.xii.

④ 许慎，约100/2004，《说文解字叙》[A]，宋易麟注《说文解字今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pp.1－2。

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 汉字起源于八卦

许慎认为，八卦和汉字的起源颇有关系。庖牺氏（伏羲）根据天象地法、鸟兽之文、近身远物等创制了八卦，用来表示“宪象”，即反映客观世界的符号。八卦用阴爻和阳爻的简单排列组合形成各种符号，表示一定的意义，但这与成熟复杂的汉字体系尚有相当的距离，是与汉字体系不同的符号系统。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汉字，特别是数字，与八卦却颇有渊源。甲骨文八以内的数字似乎都是以若干根八卦演算用的算筹摆成，如下图：



图表 4.1　八卦和数字（李梵，2008：23）①

这种现象表明，进行八卦演算的算筹（如蓍草或小竹棍等），当时很可能已经成为通用的计算工具。另外，一些和占卜有关的汉字，也和八卦关系密切。其中最典型的“爻”字从形象上看，正像四根蓍草交叉摆放而成。

※ 汉字起源于结绳

结绳记事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古代中国人认为，神农氏创造了结绳记事的方法，用以超越语言的时地限制。结绳只能起到帮助回忆的作用，不能独立地记录事情，本身并不具备文字的性质。但是，一些汉字却明显和结绳有关，其中最典型的是“十”和十的倍数。在商周金文中，“十”写作“  ”，“廿”写作“  ”，“卅”写作“  ”，“卌”写作

① 李梵，2008，《汉字简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 23。

“卌”，像若干打了结的绳子，其中每个绳结代表“十”这一概念（李梵，2008：25）[①]。但是，结绳仅能解释个别汉字的起源问题。结绳这种简单的辅助记忆手段，显然不能作为整个汉字系统的来源。

※ 仓颉造字

神农氏结绳记事的方法到了“庶业其繁”的时期，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就不敷使用，进而“饰伪萌生”了。许慎认为，到了黄帝时代，史官仓颉根据地上各式各样的鸟兽脚印，创造了汉字。仓颉创造的汉字有两类。其中“文”即独体字，是依据“依类象形”的原则创制的；而其后又根据“形声相益”的原则，创造了“字”即合体字。仓颉造字的故事被赋予了浓厚的神话色彩，中国历来就有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说法（参见本书 2.1.1.2）。汉字的产生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显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仓颉一人。但仓颉很可能为汉字的整理和规范作出了重要贡献。章太炎（1915/1984：390）[②]也认为，“仓颉者，盖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这样评价仓颉，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这段影响广泛的话，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总的说来臆测的成分比较多，并不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下面我们讨论现代文字学对汉字起源问题的认识。

※ 汉字起源于图画

文字学家普遍认为，文字的起源和图画大有关系。陈梦家（1939/2006：18）[③]认为“文字既不起于八卦结绳，而实起源于图画”，并认为图画发挥文字的功用，始于古人“以画记名”和“以画记史”的习俗。唐兰（1949/2005：50）[④]指出，“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

---

① 李梵，2008，《汉字简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 25。

② 章太炎，1915/1984，检论[C]，《章太炎全集（第三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 349－628。

③ 陈梦家，1939/2006，《中国文字学》[M]，北京：中华书局，p. 18。

④ 唐兰，1949/2005，《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 50。

画”。周有光(1997：23)[①]认为“原始的文字性资料”包括刻符、岩画、文字画、图画字等。李梵(2008：32)[②]从世界上几种古老文字的原始形式都是图画性的事实，得出“人类文字起源有共同的规律，都是脱胎于图画”的结论。早期的文字具有明显的图画色彩，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图表中看到从彩陶图画过渡到早期汉字的过程：



图表 4.2　从彩陶图画到早期汉字(李梵,2008：36)[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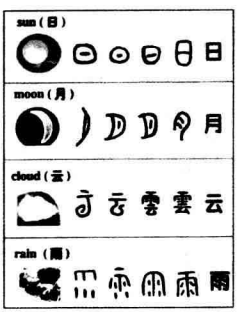
汉字中直接来源于图画的部分，比较典型的是“文”即独体字。“文”的本意即“花纹；图像；图案”，“天文”、“水文”中的“文”即是此意。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文者，物象之本”。文就是通过模拟事物形象而产生的文字，早期的文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图画特征。合体字通过独体字组合而成，早期自然也有明显的图画性。周有光(1997：94)[④]认为：

> 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有明显的图形性。为了书写方便，文书人员(隶人)把图形性的线条改成“笔画”，就成了“隶书”。从篆

① 周有光，1997，《世界文字发展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23。
② 李梵，2008，《汉字简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32。
③ 李梵，同上，p.36。
④ 周有光，1997，《世界文字发展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94。

书到隶书的变化叫做“隶变”。隶变使汉字的图形性完全消失。

隶书是汉朝的通用字体，距今约两千年。可见汉字脱离图形性的历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并不十分久远。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字学理论“六书”论，将象形和指事列为六书之首，可见这两种通过字形直接模拟现实的造字法，在汉字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汉字，仍能较为明晰地看出早期图画的痕迹。例如：



图表 4.3　现代汉字的图画痕迹

汉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无疑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不仅可以从早期汉字体现出的图画性和现代汉字保留的图画痕迹上看出，还可以从世界其他文字的起源上得到印证。周有光（1997：64）[①]列举了北美印第安部落、西伯利亚峪家集部落、四川凉山尔苏人、云南纳西族、贵州水族、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古代埃及人所使用的各种文字所具有的象形特征，总结出“一切古文字都是以图形开始”的观点。可见，通过图画和图形表达意义是世界范围内文字起源的共同特征。人类先民通过描画身边的各种事物创造了记录辉煌文明的文字符号。

4.1.1.2　汉字的特点

吕叔湘（1977/1990：21）[②]表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

① 周有光，1997，《世界文字发展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64。

② 吕叔湘，1977/1990，通过对比研究语法[A]，杨自俭、李瑞华主编《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21－33。

较才显出来……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潘文国(1997/2002：102)[①]在讨论“特征”的特征时指出，“特征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讨论汉字的特点，主要是把汉字和西方使用的拼音文字(特别是拉丁字母文字)相比较而得出的。之所以选择汉字和拉丁字母作为比较的对象，是因为它们分别是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使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代表性文字，来源、性质和作用迥然不同，其差异具有重大的语言类型学意义。

※ 自行创制

世界各种文字有些是语言社团的先民自己创制的，可以称为自源文字；有些则是语言社团借用别族的文字记录本族语言，这样的文字称为他源文字。

自源文字脱胎于图画，世界上最早形成系统的文字如汉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和古埃及圣书字都经历了最初的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阶段，形成于公元前几世纪的中美玛雅文字也是一种图画文字。早期自源文字不直接表音，是与口头语言并行的、独立的表意系统，并不直接为语言服务，与语言的关系也不密切。自源文字在语言社团的生活实践中与语言逐渐融合，两者经历了漫长的适应和磨合过程，最终走到了一起。自源文字的创造者通过文字反映现实世界，记录生活实践，表达经验思想。自源文字包含了本民族认知世界和进行表述的基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创制者认知世界和进行思维的方式，反映了创制者的世界观。

汉字是汉族先民自行创制的文字，反映了汉语社团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孟华(2004)[②]提出汉字是“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的观点。申小龙(1995：96)[③]认为，汉字集中体现了汉民族“不把客观世界和思维主

① 潘文国，1997/2002，《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p.102。

② 孟华，2004，《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 申小龙，1995，《汉字人文精神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p.96。

体对立起来，不以外部事物及其客观性质作为思维对象，而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的“主体思维”。这与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到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方法是一致的。例如，“人”像侧面的人形，“大”字是正面的人形，“小”是孩子的身形，“身”像大腹之人，这些都是汉族先民依据自身的形体创造的文字。此外，先民还依据自身对现实的认知，选取造字所模拟的对象，如“牛”以牛头为模拟的对象，而“虎”则描摹了虎的全身。汉语社团的主体性和人文性，则在取舍之间充分地体现在汉字之中。世界上其他主要的自源文字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埃及圣书字、中美洲玛雅文字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中断了使用和发展，成为博物馆的藏品。目前汉字是唯一还在大规模使用的自源文字。

借用其他民族文字记录本族语言的他源文字则不是由本民族创制的。目前他源文字在世界上使用广泛，如拉丁字母、印度字母、斯拉夫字母、阿拉伯字母、假名等，其中以影响波及大半个地球的拉丁字母使用人口最多，影响最大。我们以拉丁字母为例，说明他源文字复杂的借用过程。古代使用楔形文字的两河流域和使用圣书字的尼罗河流域经济发达，因而在文化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楔形文字和圣书字合流形成了塞母字母，经腓尼基商人传播应用，形成了腓尼基字母。希腊人通过与腓尼基人的贸易交往了解了腓尼基字母，将其借用过来并加以改造以适应希腊语，于是形成了希腊字母。古希腊文明衰落后，罗马人继承了希腊字母，再将其改造发展为目前普遍使用的拉丁字母（参见蔡勇飞、王之光，2005：18）①。在拉丁字母曲折的借用过程中，楔形文字和圣书字所蕴含的创造者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早已丧失殆尽。

他源文字与自源文字最大的区别是：自源文字记录语言的同时还反映了语言社团对世界的认知，是语言社团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对该语言社团来说，是文化内核的重要内容，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

① 蔡勇飞、王之光，2005，《汉英文字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p. 18。

他源文字在辗转借用的过程中，蕴涵在文字中的世界观往往磨灭殆尽；即使能够保留一部分，也难以与借用民族自身语言所反映的世界观一致，故而仅能记录借用民族的语音。这也是西方思想传统始终将文字看做“符号之符号”的根本原因。潘文国（2002：91）[①]对此有深入的解释：

> 为什么在拼音文字的语言里，文字只能是符号的符号，因为这种文字都是他源的，并不是本民族认知世界的表述方式，而是借用了其他民族认知世界所表述的符号。对于最初使用这种符号的民族来说，这一符号可能是第一性的，直接反映了其对世界的认知，但对借用民族来说，口头语言表述了他对世界的认知，而借用这些符号只是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音，因而不得不是第二性的，是符号的符号。

对于使用他源文字的民族来说，文字只是一种工具，使用哪种文字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或动摇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有一个关于拼音文字的比喻非常形象贴切，即拼音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是靴子与脚的关系，语言是脚，拼音文字是随时可以换掉的靴子。历史上曾有多个民族成功地进行了文字的改革，将其使用的一种他源文字改成另一种他源文字。例如，蒙古国的文字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多次变革，从13世纪初至20世纪末的七百年里，蒙古已先后使用过回鹘文、方块字、索云宝、竖体蒙文、西里尔文等近十种文字，平均每七十年文字更新一次。20世纪初蒙古国独立之前，使用的还是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样的老蒙文；30年代以后，按照苏联老大哥的建议，使用了斯拉夫民族通用的西里尔文字；90年代中期，蒙古国内又发出了要将西里尔文字改为拉丁文字的呼声。前苏联历史上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文字改革，1936至1941年期间，前苏联使用拉丁字母或阿拉伯字母的少数民族几乎在一夜之间就都改用了斯拉夫字母。朝鲜改汉字为谚文，越南改汉字、喃字为拉丁字母，都推行得比较顺利（参见潘文国，2008：267）[②]。这些成功进行了文字改革的

① 潘文国，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91。
② 潘文国，2008，《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p.267。

语言社团，使用的都是他源文字。在这样的语言中，文字具有透明性和工具性，使用这套文字还是那套文字，只要能实现记录语音的功能，从本质上来说差别并不很大。这与汉字这样代表语言社团世界观的自源文字有根本的区别。

※ 模拟现实

关于汉字的起源的种种观点众说纷纭，分歧很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汉字产生的原理是以汉字模拟现实世界。

模拟现实这一特征在作为汉语单纯词汇的独体字中尤其明显。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汉字大体上分为“文”和“字”两大类，即独体字和合体字；其中独体字是“依类象形”的，而合体字从总体上说来是“形声相益”的。唐兰(1949/2005：61)[①]提出了“三书”说，将汉字分为三类：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和形声文字，指出“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认为象形文字一定是独体字，象意文字是图画文字的主要部分，也有很多是独体字。文字中最早生成的独体字多为象形字和指事字，是汉族先民通过模拟现实而产生的语言符号。例如，象形字“日”最初写成⊙，“月”写成☽，“水”写成𠙵，“牛”写成Ψ(牛头的图像)；“山”最初就是画一座有三个山峰的山，“木”就是一棵有树根和枝干的大树，“自”模拟人的鼻子，“而”模拟鱼鳍的形象。指事字是在象形这种具象的造字方法不便使用时，辅以抽象符号来表示概念的造字法。如数字“一”、“二”、“三”以笔画的数量代表数的抽象概念；“上”、“下”两个字是用横线“一”为界，在横线上用一点或较短的短线指出上方的位置就是“上”，而在横线下面画符号则是“下”；“凶”字以“凵”代表深坑，以中间的“×”象征掉下坑的那种惊吓的感觉和危险的情形。还有一类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提示语义的符号，如“木”字增加一个短横而成为“本”，表示树的根部；“刀”在一侧增加一点成为“刃”，表示刀刃；“口”中增加一点成为“甘”，表示口中含有甘美的食物。下面两幅图表中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象形字和指事字：

---

① 唐兰，1949/2005，《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 61。



图表 4.4　汉语象形字举例



图表 4.5　汉语指事字举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象形字和指事字这两类构成独体字的造字法明晰地模拟现实世界，符合汉字是自源表意文字的属性，同时也符合文字来源于图画的事实。汉字这种模拟现实的性质，是使用他源性拼音文字的印欧语所不具备的。

※ 以形表意

汉字是以字形模拟现实的方式来表达意义的，与意义直接发生关系，而不像印欧语使用的拉丁字母那样，通过语音的中介和意义发生联系。李思维、王昌茂(2000：13)[①]认为：

> 所谓的表意体系的文字，就是不直接表示词的读音，而用特定的符号标志语义，来记录词或语素的文字。汉字起初正是从语义着眼，“因形示意”，在字形结构上不同程度地体现词义，

① 李思维、王昌茂，2000，《汉字形音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p.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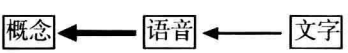
来书写语言的词。

曹念明(2006：53)[①]指出，自源文字一开始最原初的造字法是“象形”，即表达人们对客观指称对象形态特征的认知，而不是为了记录口语，其后随着文字的发展与增加，添加了表音成分，但并未改变其直接表意的本质功能。汉字是自源性表意文字的典型代表，突出体现了“以形表意”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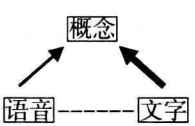
汉字“以形表意”与拼音文字“以形记音”有根本的区别。潘文国(2002：89)[②]表示：

> 人类认识世界，形成概念，再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可以有不同的途径。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正体现了两条不同的途径。一条走的是曲线，是从概念经过语音的中介再到文字，也就是说，与概念直接联系的是词的读音，然后再用文字把读音记下来；另一条走的是直线，从概念直接到文字，或者说，使用文字直接表示概念，语音只是在这过程中的附加物，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附加物，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字。

赵宏(2009：23)[③]将中西语言的两种语言文字关系归纳成下面的图表(此处引用时稍作修改)：



图表 4.6　印欧语言文关系



图表 4.7　汉语言文关系

① 曹念明，2006，《文字哲学》[M]，成都：巴蜀书社，p.53。
② 潘文国，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89。
③ 赵宏，2009，英汉外来语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1－26、76。

在英语等印欧语中，与概念直接发生关系的是语音，文字仅是声音的外壳。而在汉语中，语音和文字都直接指向概念（或意义），而语音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这就解释了，同一个汉字何以在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时代存在读音上的巨大差异：各时各地无论在语音上差异有多大，只要这些语音形式都指向同一个概念，在汉语中就可以用同一个汉字来表示。

※ 超越时空

在现代录音设备发明以前，语音的传播与传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不便保存和规范，这就使得歧异现象成为语音传播与传承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以有约1500年历史的英语为例说明这一点。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专家学者能够读懂古英语时代的文献；当代英国人要想学习古英语，其难度不亚于学习一门外语。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恐怕是古今英语除了语法上的一些变化以外，词的拼写随着古今读音的变化而面目全非。然而，汉语不仅通过口头的语音形式，同时也通过书面的文字形式传播与传承。刻画书写的文字在共时层面上便于规范、统一和传播，在历时层面上便于保存和传承，因而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稳定性。

在共时层面上，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南北东西各绵延数千公里。如此广阔的地域上，各地方言千差万别，时有隔一条江河或一座山头就言语不通的情况出现。中国民族和文化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不直接表音而以形表意的汉字。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欧洲的情况，汉字超越空间的局限，将各地方言纳入其治下的作用更为显著。欧洲历史上虽然曾经数度出现疆域辽阔的强大帝国，但都难以保持长久统一。欧洲各国使用的拼音文字记录方音，无法形成通用的书面语，难以使帝国的臣民，特别是人数庞大的普通民众产生文化上的归属感，这与当前欧洲众国林立的局面恐怕是休戚相关的。所以，虽然从语音上看汉语北方方言与粤方言、闽方言的差异甚至比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异还大，但是“书同文”跨越了方言歧异带来的障碍，成为凝聚汉语社团和汉文化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汉语语音同英语一样，从古至今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古音与今音之间差异显著。然而当代中国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则不必

像英国人那样先学一门如同外语一样的古英语。这是因为，汉字在历时层面上也体现了相当大的稳定性。安子介先生指出汉字的发展具有“化石化”倾向（李敏生、李涛，1994：63）①，指的就是汉字在时间上的稳定性。汉字虽然在字体上经历了由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种种变化，但都是成系统的演进，并未改变汉字构成的模式。汉字的稳定性在经历了隶变之后尤为突出，“从汉朝至今，汉字字形没有太大的变化”（李敏生、李涛，1994：63）②。汉字稳定不仅是字形稳定，同时字义也相当稳定。一方面，语言的核心概念词本身具有十分突出的稳定性，这些概念凝固在形体结构不易变化的汉字中，更增强了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另一方面，汉字本身蕴含了汉民族认知世界和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反映了汉语社团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汉字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核也不会轻易改变。安子介“撼山易，撼汉字难”的论断并非没有道理。余秋雨曾经说：“我们现在读2 500年以前孔子、孟子的书，如果有一点文言文水平，就会像读乡下的外公给我们写的信一样亲切”③。今天，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中国人就能够读懂《论语》这样轴心时代的著作，而同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果未经翻译为现代语言的话，恐怕对当今的希腊人来说如同天书了。

汉字自行创制、模拟现实、以形表意、超越时空的特性使得汉字成为迥异于西方拼音文字的文字体系，在汉语系统中的地位远非“符号之符号”那么简单，对汉语、汉民族和汉文化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4.1.2 汉字对汉语的能动作用

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框架下，文字在语言系统中是透明性的工具，扮

---

① 李敏生、李涛，1994，《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63。

② 李敏生、李涛，同上。

③ 余秋雨，《中华文明的过去和今天——余秋雨教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节选）》[Z]，信息来源：白马湖在线，http://www.bmhzx.net/jiaosjx/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7，登陆日期：2010年7月27日。

演着“符号之符号”的角色，文字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一思想从总体上说与西方语言文字的事实是一致的，在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影响广泛。但是，汉字在汉语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第二性的“外在符号”和“工具”，其产生虽然晚于汉语，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汉语的面貌和发展，对汉语起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4.1.2.1 共时层面上汉字对汉语的能动性

字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言单位。吕叔湘(1985/1992：126)[①]指出，“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的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结合”。这表明，汉语单纯符号内部同时存在着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形式——意义关系。从汉语符号的共时层面看，汉语形义关系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超越了音义关系，成为汉语符号内部最重要的关系。

首先，汉语音节封闭、结构简单，音节数量不含四声只有 400 多个，算上四声也只有 1 300 余个(卢偍，2001：28－34)[②]，与英语至少上万个音节数量相比，语音区别意义的功能较弱，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不如西方语言。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发展不曾中断并且还在大规模使用的表意文字，是汉民族根据“象形取义”原则创造的文字，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字形和意义的联系十分明确，并且基本上实现了字形与意义之间的一一对应。我们不难发现，汉语社团即便在口头交际中，也往往需要借助字形的分析和解释来区别意义，如在口头介绍自己的姓氏时，说明是“弓长张”、“三横王”、“干钩于”、“言午许”的现象非常普遍。

汉字系统在经历了长期发展后确立了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格局。与我们一般认为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不同，形声字的声旁也表义。形声字的实质就是以“声”为基础，通过给“声”添加不同的“形”实现对意义的分化，由此产生一个同源字族。例如，给表示“小”的“戋”增加不同

① 吕叔湘，1985/1992，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A]，《吕叔湘文集·第四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p.126。

② 卢偍，2001，现代汉语音节的数量与构成分布[J]，《语言教学与研究》(6)：28－34。

的形旁，形成“线”（丝缕之小者）、“笺”（竹简之小者）、“贱”（价值之小者）、“浅”（水之小者）、“践”（轻踏为践）、“饯”（小饮为饯）等一系列形声字，其意义相关，声音相同或相近。在这一系列形声字中起区别意义作用的不是语音，而是语形。形声字占汉字总数的90%以上，构成大大小小的同源字族。可以说汉字系统（也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的主体是通过这种以“形”分化“义”的方式得来的。

形声字在汉字系统的绝对优势地位形成了汉语词汇的独特面貌：大量的同音字和近音字。尹文刚（2003：5）[①]对1979年版《新华字典》中的1052个同音音节作了统计，得出汉字的平均同音度达到7.85的结论。这就是说，汉字系统中一个字音平均对应近8个字形。赵元任（1980：149）[②]曾经写过一篇“只能看不能读”的奇文，全文如下：

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后有人仿赵元任先生的方法，为这个故事续文，也有人用其他同音字和声调不同的近音字另作文数篇。这样的篇章在汉语中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也充分说明了汉语形义关系的重要性。

汉语吸收外来语，是一个用汉字转写外来语语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主导地位的本来应该是汉字的读音。从理论上讲，将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使用的过程，语音相同或相近的任何一个字都可以用来转写外来语。但是，由于汉语符号形义关系密不可分，汉语社团在转写外来语语音的过程中非常注意选择能提示外来语语义的汉字。例如，在朝鲜战争中，接替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Matthew B. Richway，最

① 尹文刚，2003，汉字同音率、同音度及同音字音节个数随同音度增加而递减的规律[J]，《语言科学》(4)：3-6。

② 赵元任，1980，《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p.149。

初被译为“李奇威”，但人们很快就察觉，这样的名字大有长敌人威风之嫌，于是立即贬为“李奇微”（何南林，2006：251）[①]。这说明，即使在转写外来语语音的过程中，汉语符号的形义关系依然难以忽视，形义关系在汉语符号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4.1.2.2 历时层面上汉字对汉语的能动性

文字的起源大大晚于语言。一般认为，较为成熟的汉字系统甲骨文距今约有3 500～4 000年的历史，而人类语言的历史则至少有数万年。汉字和汉语来源不同，虽然产生于汉语形成之后，但是在与汉语逐渐磨合的漫长过程中，无疑受到汉语的重大影响。反过来，汉字也会不断影响和改变汉语，在汉语发展的道路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关于汉语与汉字相互适应的直接证据，由于年代久远和书面语系统发展不成熟等原因，保存至今的非常有限。但这些有限的证据也告诉我们，汉字塑造了汉语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发展的道路。

汉字的单音节性在汉语发展的过程中至少改造了部分汉语词汇的读音，强化了汉语的孤立语特点。据潘允中（1989：2－3）[②]，甲骨文、金文里有相当数量的合体文字（合文），从其结构来看，当时人们把这种合体文字的内容作为整体的概念，用“复音”形式来记录它们，如  （小山）、  （上下）、  （一牛）、（武丁）。合文最大的特色在于单字符多音节，但是这种模式与汉字为汉语划定的“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标准词汇模式相抵触。所以，合文现象至秦时已经消失，留存下来的合文也都变成了单音节，如廿（niàn，二十）、卅（sà，三十）、俩（liǎ，两人）、甭（béng，不用）、勹（fiáo，勿要）。合文一字多音节模式最终被单音节模式所取代，可说是汉字的单音节性对语言反作用的一个例证。

汉语历史上曾经历了以假借字为主要造字模式的阶段，如商代后期的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假借字，形声字仅占20%。这是在已有文字不敷使用而创造新字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自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假借字的实

① 何南林，2006，《横行的英文》[M]，济南：齐鲁书社，p.251。

② 潘允中，1989，《汉语词汇史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p.2－3。

质是忽略汉语符号的形义关系，用汉字表示语音相同的另一个概念，与拼音文字只有“一步之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称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北”，本指“二人相背”，北方的“北”无形可象，就借语音相同的“北”来表示北方的意思。“莫”本义为“昏暮”，假借为表示“没有谁、没有什么”的否定性无定代词。后来为了区别“没有”的“莫”和“日暮”的“莫”，人们又造了“暮”来表示后者。

假借字的整体发展趋势是上古时代多，而随着汉字系统的发展逐步减少。据统计，在殷代甲骨文里，假借字占了74%左右；属于西周早期的《利簋》铭文，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自西周时代起，假借字逐渐减少，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铭文，共有291个字，假借字约70个，约占总数的24%；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文，共有284个字，假借字约60个，约占20%；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有497个字，假借字约有70个，占16%；春秋时代的《栾书缶》铭文，共有40个字，假借字5个，占12%强；战国时的《鄂君启节》，总字数164个，假借字3个，仅占2%；秦汉时的帛书《老子》乙本共有5 500个字，假借字320个，占6%；帛书《经法》约5 000字，假借字320个，也占6%；现有的《老子》假借字30多个，不足1%；现有的《荀子》首三篇，共有5 700多个字，假借字54个，占1%弱[①]。假借字广泛使用的后果是汉语符号形义关系的混乱，到春秋战国以后，汉语已经淘汰了假借字这一词汇方式，发展了既注重形义关系又相当能产的形声字。这说明忽视形义关系而把汉字作为记音符号来使用的假借字与汉语的内部机制是抵触的。

汉语发展史上同样遭到淘汰的还有大量突显音义关系、忽略形义关系的写音外来语。中国历史上曾屡次受到外来文化大规模的影响，进入汉语的写音外来语规模庞大，仅通过佛经翻译就吸收了超过35 000个词。大量的写音外来语如“马杀鸡”、“德律风”被淘汰，保留下来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同时，汉语还努力地改造进入其中的写音外来语，使它们向形义结合的方向发展，如采用音义兼译的方法吸收外来语（芒果、俱

① 参见《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信息来源：孔子学院网站，http://www.kzxy.com.cn/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20714，登陆日期：2010年7月27日。

乐部)和字化现象(的哥、超模)等。

1977年,我国政府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推行不久即遭废除。二简字大量使用突显音义关系的"同音合并"原则,将大量通过形声机制分化而来的同音字合并为一个字,例如:

规范简化字	二简字
芭·粑·笆	巴
糊·葫·蝴·猢	胡
汊·杈·汉·衩	叉

图表 4.8 二简字的同音合并

同音合并的原理和假借、写音外来语将以形表意的汉字作为记音符号使用是一致的,违背了汉语符号重形义关系、轻音义关系的性质,容易造成用字混乱的局面。过度的同音合并会妨碍语言的交际功能,不能被汉语社团接受。历史表明,汉字以形表意的性质已经与汉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1.2.3 从认知科学看汉字对汉语的能动性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实验手段的进步使得人们对汉字的认知加工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代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脑科学对汉字的研究证实了形义关系在汉语符号中的突出地位。

认知心理学对印欧语的研究表明,语音在书面词汇识别中比语义激活得更早,人们在理解单词的意义时,往往要借助单词的读音来完成。这一结论符合西方语言符号突显音义关系的事实,证实了拼音文字记录语音的"符号之符号"地位。然而,对汉语的实证研究结论则有所不同。Hoosain (1991: 12)[①]指出,"汉字以形表意,无须经过语音的中介",表明"高频汉字形、义的联系可能比形、音的联系要强"。彭聃龄等(2003/

① Hoosain, Rumjahn. 1991. *Psycholinguisic Implications for Linguistic Relativit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M].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2006：151）[①]认为，“从知觉上讲，从汉字提取语义要比提取语音更容易。”陈宝国、彭聃龄（2001/2006：61）[②]分别采用基于语义的和基于语音的启动范畴判断作业，考察高频汉字形音义激活的相对时间进程。实验结果表明，“高频汉字形音义激活的时序为字形—字义—字音的顺序。这一结果揭示，高频汉字可以直接由字形通达字义，高频汉字的语音存在着自动激活，但语音的激活可能发生在词义通达之后。”

按照西方语言学的言文关系理论，只有当字形与语言中一定的语音相联系时，才能表达意义。所以，语音的激活是词汇通达的必要条件，没有语音的激活就没有语义的激活。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汉语和汉字的情况与这一推论不尽一致，体现出了相当的复杂性。这是因为，与西方语言对意义的理解往往必须通过语音的中介不同，汉语符号同时存在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形式—意义关系，同时字形与语音之间又存在间接的联系，情况远比拼音文字语言复杂。汉语符号既可以通过语音通达语义，也可以汉字直接表意，语音在语言系统的地位固然重要，但形义关系的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视。

4.1.2.4 从汉语研究传统看汉字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语言研究有两千多年独立发展的历史，是现今世界上唯一能够和印欧语研究传统比肩的语言研究传统。传统汉语研究立足汉语本质，发展了切合汉语事实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研究方法。

传统汉语研究训诂、音韵、文字并举，以对意义的研究为核心，采取“因声求义”和“以形求义”的方法，既注重音义关系，也注重形义关系。以字的音、形、义为对象的语言研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发达的。唐兰（1949/2005：3）[③]指出，“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但是，中国人

---

① 彭聃龄、徐世勇、丁国盛、李恩忠、刘颖，2003/2006，汉语单字词音、义加工的脑激活模式[A]，彭聃龄主编《汉语认知研究》[C]（原文载于《中国神经科学杂志》2003年第5期：287－291），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pp.150－157。

② 陈宝国、彭聃龄，2001/2006，汉字识别中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的研究（I）[A]，彭聃龄主编《汉语认知研究》[C]（原文载于《心理学报》2001年第1期：1－6），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pp.61－69。

③ 唐兰，1949/2005，《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3。

利用文字统一了古今的殊语，也统一了东南西北无数的分歧的语言，所以，从纪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学，而且一直在发展。”与西方语言研究重语言、重口头表达不同，中国语言研究体现出强烈的重文字、重书面表达的倾向。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史籀篇》、《仓颉篇》等字书流传；汉代又出现了《说文解字》、《尔雅》、《释名》等研究汉字音、形、义关系的著作。魏晋以后，为了适应诗赋的需要，韵书大量产生并日渐成熟，如《切韵》、《广韵》、《集韵》等。清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出现了“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杰出。清代金文出土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1899 年甲骨文发现以后，对古文字的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可以说，对文字的音、形、义系统深入的研究，始终是传统汉语研究的主旋律。王力(1981/2006：129)[①]认为，重形不重音的观点，统治了从许慎到段玉裁、王念孙时代一千七百年的汉语研究。叶秀山(1991：27)[②]指出，中国文化在其深层结构上是以“字学”为核心的。

传统汉语研究在两千多年独立自主发展的状况下，形成以文字和书面语研究为核心的格局，发展了汉字音、形、义互求的研究方法，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献资料。传统汉语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三者联系密切，黄侃(1983：34)[③]阐释了三者的关系：

> 音韵之学，最忌空谈音理，必求施之文字、训诂，则音韵不同虚设；而文字、训诂亦非以音韵为之贯穿，为之钤键不可。两者有一不明，则不足以论小学，不足以谈古籍。

这种音、形、义并重的治学格局，立足汉语汉字的特点，很值得今天语言学者借鉴。汉语研究传统对汉字的重视充分说明了，汉字在整个汉语系统的地位和语音同样重要。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创造了辉煌文明的古代中国人何以对汉字孜孜不倦地进行了两千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

---

① 王力，1981/2006，《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 129。

② 叶秀山，1991，《美的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p. 27。

③ 黄侃，1983，音韵与文字训诂之关系[A]，《文字声韵训诂笔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p. 34－47。

4.1.2.5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之反思

从理论角度对汉字的重要性和能动性进行探讨之后，我们不得不提到，历史已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自19世纪晚期开始，中国主流知识界普遍接受了“汉字落后”的观点，如钱玄同(1918/1998：463)[①]认为汉字：

> 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汉字落后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知识精英普遍接受。瞿秋白指出“这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转引自李敏生、李涛 1994：277)[②]；鲁迅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呐喊；毛泽东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在1951年发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见詹鄞鑫，2003)[③]。20世纪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各界精英，如傅斯年、黎锦熙、赵元任、蔡元培、吴玉章、林伯渠等都主张废除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以推广普通话、整理和简化汉字、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为主要内容，以实现汉语拼音化为最终目标的文字改革运动，演变成一场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

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世界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和文字的“符号之符号论”，这些理论均是西方的舶来品。文字的“符号之符号论”主张文字是语言的外壳，是具有透明性的工具。此前我们已有较

---

① 钱玄同，1918/1998，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A]，《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C]，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p.463。

② 李敏生、李涛，1994，《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277。

③ 詹鄞鑫，2003，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A]，《中国文字研究·第四辑》[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为详细的介绍(如本书 4.1.1.2),此处不再赘述。下面我们主要对世界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世界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在欧洲有悠久的传统。卢梭(1775/2003:25-27)[①]认为"语言的年龄与其文字的完善程度成反比,文字愈简陋,语言愈古老";他将文字分为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三类,并指出象形文字适合于原始民族,像汉字那样的表意文字适合于野蛮民族,而使用字母的拼音文字,适合于文明民族。19 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了生物世界发展的进化论,引发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进化论产生之后,不仅在自然科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还用进化论思想解释社会和人文现象的发展。持三阶段论的学者认为,世界上的文字也与生物界一样,是不断发展和进化的,有古老传统的文字都是野蛮和落后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了解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不少人为中国当时落后挨打的局面找到了根源——中国落后的文字造成教育落后,教育落后导致国家文化和制度的落后。世界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周有光(1997:4)[②]就曾采用类似的说法,将世界文字发展的时期分为原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和字母文字时期,将汉字归入"古典文字"一类。周有光(1961/1979:2-3)[③]指出:

> 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绝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

可见在三阶段论者看来,汉字由意音文字向拼音文字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代表了文字发展的先进方向。这一论断成为文字改革运动最有力的理论支撑。世界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论将自然科学规律附会到

① 卢梭,1775/2003,《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25-27。

② 周有光,1997,《世界文字发展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4。

③ 周有光,1961/1979,《汉字改革概论(第三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pp.2-3。

语言领域来，并且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詹鄞鑫(2003)[①]归纳了五四时期到1949年对汉字的各种批评意见，总结起来有以下四点：

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

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

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

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这些“缺点”，除了汉字的确较为难写之外，均已被历史和实践证伪。事实上，不论是汉字还是拼音文字，都各有利弊。讨论汉字改革，不能只讲拼音文字的优点而不讲缺陷，也不能只讲汉字的缺点而不讲优点。章太炎(1908/1996)[②]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的说法，并指出，“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参见王宁，1997：155[③])。唐兰(1949/2001：9)[④]指出：

> 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在学习时虽然不如拼音的方便，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中国文字不仅是由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唯一的仅存的重要材料，也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是研究文字学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中国的汉语拼音化运动进行了一个世纪，虽然取得了推广普通话、推行简

---

① 詹鄞鑫，2003，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A]，《中国文字研究·第四辑》[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② 章太炎，1908/1996，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pp.594－609。

③ 王宁，1997，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153－167。

④ 唐兰，1949/2001，《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9。

化字和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等重大成果，但从总体上说，实乃造成今日国人语言生活种种问题的根源之一，弊大于利（参见潘文国，2008）[①]。汪学文（1983：276－283）[②]指出中国文字改革可能有两种结局——停滞或缓进，并表明："文字改革的演变，无论处于停滞性或缓进性，势将趋于僵局，难以达到拼音化的目标"。汉字能否废除，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明晰的答案。

汉字不是工具性的、外在的、透明的"符号之符号"，而是汉语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我们以李敏生（2000：148）[③]的一段话作为本节的结尾：

> 在文字与思维、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中要看到其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能把汉字看成只是被动地、孤立地记录语言，而要将其看做是意识的能动性的重要体现。

第二节　单纯语言符号的结构

单纯语言符号是词汇系统最小的成分，同时，不少又具有原生词的性质，在词汇系统的地位尤其重要。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研究，要从分析单纯符号的结构入手。

4.2.1　单纯语言符号的二元结构观

索绪尔（1916/1980：100）[④]认为，"语言单位是一种由两项要素联合

① 潘文国，2008，《危机下的中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② 汪学文，1983，《中共文字改革之演变与结局》[M]，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pp. 276－283。
③ 李敏生，2000，《汉字哲学初探（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 148。
④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00。

构成的双重的东西”，并将其比作一张纸的正反两面。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的两个要素概念和音响形象分别称作“所指”和“能指”。为了说明语言是一个与自然实在无关的自治体系，索绪尔将这两者定义为心理实体，从而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二元符号结构观念。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二元结构观念，在西方语言研究传统中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可追溯到希腊时期就已形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据说苏格拉底因为鄙视文字而不愿将自己的思想著述成文，故而未给后世留下一本他自己的著述，其思想均由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记录整理才得以流传后世。柏拉图将文字与口语的关系比作绘画与实物的关系，认为正像绘画无法真实地再现实物一样，文字无法真实地再现口语、精确地记录语音。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字是口语的虚饰，故而比口语低劣（参见 Harris，2000：17－18）①。可见语音中心主义思想在西方文明早期就已深入人心。德里达（1967/2005：40）②指出，“语言科学最终将语言的不可还原的单纯本质确定为语音、词汇和逻各斯的统一体”，而“文字始终是派生的、偶然的、特殊的、外在的，它是能指即语音的再现。亚里士多德、卢梭和黑格尔将它称为‘符号的符号’”。

语言符号的二元结构观念因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势地位和索绪尔的巨大影响被当今语言学界全面接受。所有现代语言学文献提及语言符号的“形式—意义”关系时，“形式”这一术语几乎毫无疑问地指语音形式。如 Langacker（1987/2004：328－368）③将语言符号看做由“语音极”（phonological pole）和“语义极”（semantic pole）组成的形式—意义结合体（form-meaning pairings），符号结构即是语义结构和语音结构的配对。

语言符号的二元结构观念的前提是：文字不属于语言系统。索绪尔（1916/1980：47－48）④指出：

---

① Harris，Roy. 2000. *Rethinking Writing* [M]. London：Athlone，pp. 17－18.

② 德里达，雅克，1967/2005，《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p. 40。

③ Langacker，Ronald W. 1987/2004.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pp. 328－368.

④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p. 47－48。

>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

这一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为语言学毋庸置疑的“常识”。

语言符号由概念和音响形象构成的二元结构模式源于西方语言思想，基本符合西方语言事实。长期以来，由于西方语言理论在语言研究领域的强势地位，语言符号的二元结构模式被广泛地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成为“普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可是索绪尔(1916/1980：51)[①]讨论语言与文字关系时，明确地将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排除在外，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文字)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作为一位严谨而睿智的语言学者，索绪尔深知只有加上这一限制条件，他的语言理论才能严密完美。不幸的是，汉语汉字的独特之处并未引起后世治语言学者足够的重视。

4.2.2 单纯语言符号的三元结构观

从汉语的角度看单纯语言符号的结构，我们会发现构成语言符号的基本要素除了语音和语义外，还有语形(即文字)，即汉语符号是由音、形、义这三个要素构成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形”即文字，但不是文字学意义上的文字，而是一个抽象的语言学概念，指某一意义或概念的书面表达形式。正如同一个“音”在物理上可体现为多种具体的读音；同一个“形”在现实中也可能有诸多表现形式，如篆、隶、楷等不同的字体，或存在数个异体字，或有繁简之分等。汉字，特别是作为单纯语言符号的独体字，以形体直接模拟现实世界，表达意义，是与语音来源不同的表意系统。汉字产生之后与汉语逐渐融合，并在融合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汉语的面貌，对汉语和汉文化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成为汉语系统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性质完全不同。索绪尔之所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51。

以将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排除在其理论体系外，正是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属性以及其在汉语系统中的特殊地位，索绪尔(1916/1980：51)[①]指出

> 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

索绪尔指明汉字是“观念的符号”，与口语同样具有一级表征的地位；汉语形义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具有比语音更强的区别意义的功能；汉字不直接记录语音，能够超越空间的局限。汉字的这些特点使得索绪尔将其定性为汉语社团的“第二语言”，这一评价公允而有见地。

字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汉语基本结构单位，其标准模式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汉语符号音、形、义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符号内部结构和内部关系远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印欧语符号复杂。如果抛开语形只研究汉语符号的音义关系，则许多独特的汉语现象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承认汉语符号的三元结构模式，实际上彻底颠覆了一个普通语言学通行已久的观念：文字是符号的符号(或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近些年来，汉语独特的语言文字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三元符号结构，已经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在西方，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1967/2005)[②]和英国牛津大学语言学系前系主任、索绪尔论著的英译者 Harris (2000)[③]均以汉语汉字为主要证据，颠覆了西方延续两千多年的“语音中心主义”观念。Harris (2000)更进一步提出，文字作为编码系统，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口头语言。在汉

---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51。

② 德里达，雅克，1967/2005，《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③ Harris, Roy. 2000. *Rethinking Writing* [M]. London: Athlone.

字的故乡中国，一大批语言学者，如申小龙（1995）[①]、徐通锵（2001[②]；2007[③]）、孟华（2004[④]；2008[⑤]）、曹念明（2006）[⑥]、严辰松（2002[⑦]；2009[⑧]）、杨自俭（2008）[⑨]、鲁川、王玉菊（2008）[⑩]、李如龙（2009a[⑪]；2009b[⑫]）、潘文国（2002[⑬]；2009[⑭]）等等，立足汉语汉字自身的特点，探讨汉字对汉语、汉文化发挥的重大作用，重新定义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及其在汉语系统的地位。潘文国（2009：93）[⑮]明确提出“汉字是汉语之魂”的口号，表示：

> 正是有了汉字，才使汉语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汉语；没有汉字，也就没有今天的汉语。汉字、汉语已融成了一个生命的整体，彼此不可或缺。基于他源文字的语言理论把汉字看作外衣，可以爱脱就脱，爱改就改的主张，已经为历史所否定。而百余年来在学习、掌握、研究、运用汉语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告诉我们，轻视汉字就要受惩罚，只管在理论上追求自我满足结果让社会和后代子孙在时间上付出代价。汉字在汉语中实在应处于核心地位，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这样重要的

① 申小龙，1995，《汉字人文精神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② 徐通锵，2001，《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③ 徐通锵，2007，《语言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 孟华，2004，《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⑤ 孟华，2008，《文字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⑥ 曹念明，2006，《文字哲学》[M]，成都：巴蜀书社。
⑦ 严辰松，2002，论“字”对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影响[J]，《现代外语》(3)：231－240。
⑧ 严辰松，2009，“字”作为基本结构单位的“音、形、义、法”[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1－7。
⑨ 杨自俭，2008，《字本位理论与应用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⑩ 鲁川、王玉菊，2008，《汉字信息语法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⑪ 李如龙，2009a，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108－116。
⑫ 李如龙，2009b，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及相关的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4)：9－17。
⑬ 潘文国，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⑭ 潘文国，2009，汉字是汉语之魂——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再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75－93。
⑮ 潘文国，同上，p.93。

东西，不叫“灵魂”，实在无以名之。

李泽厚、刘再复(2009)[①]也从哲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批判西方将口头语言视为观念和心灵的产物这一观点，提出源自历史和经验积累的文字(汉字)具有实在的物质基础，比源于观念和心灵的口头语言还“根本”的观点[②]。哲学家这一违背语言学“常识”的观点，应该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和思考。

4.2.3 单纯语言符号三元结构模式的普遍价值

语言符号的三元结构模式是文字文明时代具有普遍价值的语言符号结构理论。不仅汉语符号是三元结构的，在具有文字文明水平的文化中，语言都同时具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都包括音、形、义三个方面。从总体上说来，拼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拼音文字也会直接表达意义。例如，眼镜店招牌上的“O I C”，形象地构成一副眼镜的图案，同时读音上与“Oh，I see!”构成谐音，将语言的形、音、义三个要素十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英语中 T-shirt、U-turn、X'mas (X 代表十字架)、zigzag、a Y in a road (三岔路口)等表述，都利用了文字的形象性表达意义。可见语言符号的三元结构而非音义结合的二元结构，才是文字文明时代人类语言符号真正的共性特征。

既然语言符号包括音、形、义三大要素，何以在英语等西方语言中，单纯语言符号主要呈现出音义结合的二元结构模式？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西方使用的拼音文字是外来的他源文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最初都来源于图画，通过摹写现实世界将概念凝固成书面表达。在由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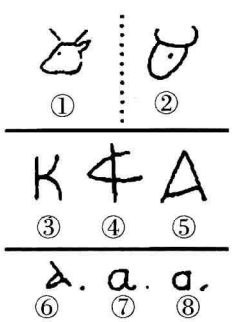
---

① 李泽厚、刘再复，2009，存在的“最后家园”——对谈录[J]，《读书》(11)：25－28。

② 这里的“语言”指西方语言思想中“语言源于心灵”或“语言是心灵的符号”的观点。李泽厚、刘再复(2009)对此提出批判，他们的观点应解读为：源自历史和经验的、有现实和物质基础的汉字，比纯粹源于观念和心灵的口头语言更根本。事实上，口头语言必然也有其存在的现实和物质基础，也是历史和经验的积累，只是这种积累的证据不易保存而已。

到文字的过程中，其创制者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本民族核心文化特征也一并融汇到文字符号中凝固下来，成为稳定的、超越时空的文化内核保留在文字里。拼音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以图画、象形为主的阶段。我们以蔡勇飞、王之光(2005：129)[①]所示的英语字母 A 的演进为例，说明拼音文字如何由最初的象形符号成为记录语音的工具：

> A 的发展过程可追溯到牛头形。如图表 4.9，①是古埃及圣书字；②是闪米特语字母；③是公元前 1000 年左右腓尼基、迦南地区所用的字母，形式上已将线条拉直，它是所有后世形式的根源。闪米特语中，它的名称是 aleph(意思是牛)。古希腊人将它拿来表示元音 a，并改称 alpha。他们所使用的字母形式有多种，其中包括英语大写字母 A 的先导④。罗马人把这种形式借用到拉丁语，英语字母即来源于此。英语小写的 a 在希腊手写体中写作⑤，类似于现在的英语大写字母。公元四世纪字母出现圆化，并拖出了尾巴⑥。英语手写体⑦和印刷体小写 a ⑧即源于此。



图表 4.9　A 的演进

英语字母 A 在辗转借用的过程中，其中蕴含的创造者的认知模式和价值

① 蔡勇飞、王之光，2005，《汉英文字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p. 129。

观念等文化内核丧失殆尽，无法进入借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故而丧失了一次表征的地位，成为外在的、透明的、工具性的二次表征，即记录借入民族语音的“符号之符号”。印欧语等使用他源性拼音文字的语言，由于文字在借用过程中失去了构建语言、文化的作用和地位，使得形、音、义的三元结构模式呈现出以音义关系为绝对主导的二元结构模式。

综上所述，英语最典型的单纯符号是单音节词。英语是拼音文字语言，文字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很小，单音节词呈现出语音和语义结合的二元结构模式，音义关系在符号内部居绝对的主导地位。汉语最典型的单纯符号是独体字，它们绝大部分是象形字和指事字。汉字是表意文字，在汉语系统中地位十分重要，对塑造汉语和汉文化的面貌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故而汉语单纯符号呈现出语音、语形与语义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三元结构模式，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同时在符号内部发挥作用，呈现出比英语符号结构更为复杂的状况。包含音、形、义的三元符号结构模式，是文字文明时代具有普遍价值的语言符号结构理论。

第三节　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

单纯语言符号内部呈现三元结构模式，有音、形、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形成两对形式—意义关系，即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故而，单纯语言符号有两种不同的理据类型：由音义关系构成的语音理据和由形义关系构成的文字理据。Ullmann（1962：80－93）[①]把词的理据分为三类，即语音理据、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语音理据是由语言符号语音和语义的联系产生的理据性；形态理据指语言符号在形态构成方面的可分析性；而语义理据则指语言符号的基本义通过转喻和隐喻获得比喻义和引申义的过程。许余龙（2002：123）[②]在讨论词汇的理据性时引用了

①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80－93.

② 许余龙，2002，《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123。

Ullmann 的分类，随后他又补充道："如果我们考虑到词的文字书写形式与词义的联系，那么似乎还有一种理据性，这便是文字理据。"在语音理据、文字理据、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这四种理据类型中，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都属于后起的次生理据，(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语言符号所体现的理据是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

4.3.1 英汉语音理据对比

4.3.1.1 英汉语的拟声词

语言首先是由语音表现的，语音和语义结合的可论证性就是语音理据。拟声词、感叹词和语音象征等可以论证的音义关系，是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英语的 cuckoo、法语的 coucou、德语的 kuckuck 和汉语的"布谷"指的是同一种鸟，其得名源自该鸟的叫声。"妈妈"这一概念在许多种不同的语言中都表现为唇音[m]和元音[a]的组合。不同语言在拟声词上的共通之处显然是由于自然界和现实中的各种声音是超越语言和文化的。

拟声词生动形象，富有趣味，在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广为使用，如英语儿歌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就以农场动物的叫声入歌，欢快有趣。现将歌词摘录如下：

[4.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And on this farm he had some chicks,
With a chick-chick here, and a chick-chick there.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And on this farm he had a cow,
With a moo-moo here, and a moo-moo there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And on this farm he had some ducks,
With a quack-quack here, and a quack-quack there.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And on this farm he had some pigs,
With an oink-oink here, and an oink-oink there.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And on this farm he had a dog,
With a bow-wow here, and a bow-wow there.

歌中以 chick、moo、quack、oink、bow-wow 等拟声词模拟了不同动物的叫声，帮助孩子们熟悉母语的基本韵律和节奏。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歌谣：

[4.2] 小鸡叫叽叽叽　　教我擦鼻涕
小鸭叫嘎嘎嘎　　教我剪指甲
小猫叫喵喵喵　　教我把脸洗
小狗叫汪汪汪　　教我换衣裳
小朋友爱清洁　　大家都欢喜

这类儿歌已经成为英汉语社团幼儿早期语言教育的一部分，这说明拟声词在模拟自然界声音的同时，也能较为清楚地体现一种语言自身的特点。

4.3.1.2 英汉语的语音象征

除了对自然界各种声音的直接模拟，语言中还存在不少语音象征现象。如英语以 sn-开始的词往往与鼻息有关，如 sneeze（打喷嚏）、sniff（嗅）、snore（打鼾）等；sl-则象征与湿物有关的平滑，如 slide（滑动）、slippery（打滑的）、sleek（油滑）等。英语用圆唇辅音[r]表示圆形，如 round、circle 等；汉语用圆唇元音[ü]表示圆形，如“圆”、“圈”、“卷”等。

英语中的语音象征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对其进行合理运用，能够增添作品的色彩，使作品表达的意境更加生动形象。下面是 19 世纪

英国诗人 Alfred Tennyson 的 *The Brook* 中的一节：

[4.3] I chatter over stony ways,
In little sharps and trebles,
I bubble into eddying bays,
I babble on the pebbles.

诗中采用了一连串含有唇音[p]、[b]的单词：sharps、trebles、bubble、bays、babbles、pebbles 等。这些单词把流水的音响充分展现出来，绘声绘色，使人仿佛听见溪水长流不息的汩汩声。

汉语中的语音象征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汉语的声调往往与一定的意义相联系，古代学者对这一现象早有研究，归纳了一些口诀，如唐人释处忠《元和韵谱》中记载："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明人释真空《玉钥匙歌诀》中说："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清代江永《音学辩微》中记载"平声音长，仄声音短；平声音空，仄声音实；平声如击钟鼓，仄声如击木石"（参见杨振淇，1991：196－197）[①]。况周颐（1924/2009：13）[②]也说："入声字用得好，尤觉峭劲娟隽"。中国古代文人常用平稳悠长的平声表现平静、哀怨、缠绵之情，用高亢的上声表现强烈的感情，用清晰分明的去声表现缠绵悱恻之情，而用急促的入声表现决绝激昂，或欲说还休的情怀。声调的语音象征可以增添作品的意境和感染力，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不胜枚举。例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开篇用 14 个字勾画出作者悲哀凄惨的心境，历来为世人称道：

[4.4]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作者采用了入声韵和大量急促的入声字，再配合较多的齿音和舌尖音，愁苦孤寂的心情跃然纸上。

---

① 杨振淇，1991，《京剧音韵知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pp. 196－197。
② 况周颐，1924/2009，《蕙风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 13。

4.3.1.3 英汉语音理据的程度

虽然各种语言起源理论都停留在假说阶段，但很多语言学者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或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Jespersen (1922)[①]把有关语言起源的理论归纳成四个学说，即摹声说、感叹说、声像说和喘息说。通过这些方式产生的词汇，与自然的联系十分明显。庄和诚(1999：57)[②]指出，现代英语中大多数联觉语音出现在单音节词中，而且这类单音节词多源自日耳曼语。英语古老的本族语词汇中语音象征现象相对较多，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口头语言起源于摹声的假设。如果这些语言起源的假设能够成立，则语言符号的初始形式可能具有较高程度的语音理据。但是，语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法精确地保存，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标准加以规范，产生各地方言歧异的现象。同时，语音变异的速度相当快，有时几代人之间的口音就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差异。同一概念即使在同一语言中，各时各地语音差异巨大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即使语言产生之初语音理据程度较高，也很容易模糊甚至丧失，呈现出显著的低理据性特征。

从总体上说，现代语言中的拟声词、感叹词和语音象征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相对数量很少，并且处于语言系统的边缘地位，在系统中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绝大多数地位重要的单纯语言符号在共时层面上呈现出音义之间不可论证的特征。单纯语言符号音义之间任意性居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拟声词和感叹词都是次要的，认为它们源出于象征，有一部分是可以争论的”(索绪尔，1916/1980：104－105)[③]。从这个意义上讲，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无疑是适用的。

---

① Jespersen, Ott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② 庄和诚，1999，英语中的语音象征[J]，《外国语》(2)：56－60。

③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p. 104－105。

4.3.2 英汉文字理据对比

语言除了以语音形式表现，还可以文字形式表现；语言除了有音义结合的理据性，还有形义结合的理据性。形义结合的理据性就是文字理据。

汉语单纯词的文字理据程度很高。汉字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起源于汉族先民对身边事物的刻画摹写。汉族先民依据“依类象形”、“象形取义”的原则，模拟现实世界种种现象和概念，用文字将它们表达出来。“象形”和“指事”是汉语社团的基本造字法，天象地法、鸟兽之文、近身远物等都是汉字产生的理据，字形与意义的联系十分明确。主要由象形字和指事字构成的汉语独体字，在造字之初就具有程度很高的理据性。

刻画书写在各种材料上的文字能够长久保存，不像语音那样容易产生歧异；同时文字比语音更便于传播、规范和统一，具有明显的超时空性，故而文字理据容易保留下来。另外，自源文字中蕴含了本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是其文化内核的表现之一，不容易发生变异。汉字数千年来字形虽然逐渐脱离图画，但并没触及其创制的原理。即使在目前使用的汉字系统中，象形字和指事字如“日”、“木”、“水”、“一”、“上”等，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造字时的文字理据，摹写客观世界的特征依然十分突出。今天，汉字形义关系的理据原理仍在幼儿识字、对外汉字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直观性和趣味性使得学习者能很快掌握汉字的字形和字义。

英语使用的拉丁字母，也有最初的文字理据，如“A”代表牛头，“E”代表双臂举起的人。但是拉丁字母不是英语社团自己创制的文字，英语在向别的民族借用文字的时候，仅用其记录语音，背后的理据不会一并借用，故而字母的理据在曲折的借用过程中丧失殆尽，拼音文字成为“符号之符号”。目前，英语只有极少数的词汇利用了字母的字形表示意义，如 T-shirt、U-turn、V-neck、S-bend（S 形弯管）、I-steel（工字钢）等（参见

李晓燕、李光群，2007：67－69)[①]，这些词汇基本上都是合成词，而英语单纯的语言符号是基本上没有文字理据的。

4.3.3 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音义关系决定的语音理据，二是由形义关系决定的文字理据。具有语音理据的单纯词汇如拟声词、感叹词模拟自然界的种种声响，具有文字理据的单纯词汇刻画现实世界的种种形态，两者都来自于人类先民对现实世界的摹写。

英语最为典型的单纯符号是单音节词，其中有极少一部分是拟声词、感叹词，或具有语音象征的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语音理据。由于具有语音理据的词在词汇系统中处于极边缘地位，故而英语单纯词整体呈现出极弱的语音理据，音义关系以任意性为绝对的主导，符合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英语采用的拉丁字母除极个别以形表意的特例外，总体上不具备文字理据。这符合拼音文字“符号之符号”的地位。总之，英语单纯符号呈现出极其微弱的理据性，是任意性的语言符号。

汉语最为典型的单纯符号是独体字。独体字不直接表音，远古时期的语音理据即使存在也无法保留至今；部分有关独体字的声训材料，如“月，缺也”、“日，实也”等，目前还缺乏有力的材料加以佐证。故而我们认为，汉语单纯符号的音义关系从总体上说来也是任意的。而在形义关系上，独体字多为象形字和指事字，字形和意义之间联系明确，具有很高程度的文字理据。汉语形义关系在语言系统中地位重要，故而单纯符号整体的理据程度很高。

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理据性情况见下表：

---

① 李晓燕、李光群，2007，英汉象形文字的应用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67－69。

	典型形式	语音理据	文字理据	整体理据
英语单纯符号	单音节词	极其微弱	极其微弱	极其微弱
汉语单纯符号	独体字	极其微弱	很高	高

图表 4.10　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理据类型和程度对比表

由于语音理据即使曾经存在也难以在语言共时系统中保存，单纯语言符号体现的理据主要是不同于语音理据的文字理据，存在于使用自源表意文字的语言中。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大规模使用的表意文字，是文字理据的代表，具有类型学上的重大意义。

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语言符号具有的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同时也是一种语言的原生理据，蕴含了人类先民将现实世界转化为语言世界的方式，表明人类语言具有物质和现实基础，是人类语言与现实世界的接口，意义尤为重要。

第四节　理据观和任意论：中西不同的主流语言观

单纯语言符号不仅是语言共时系统的基本粒子，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是语言的原生符号，衔接共时和历时两个系统，历来受到语言学者的关注。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与任意性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不仅反映单纯符号本身的理据情况，更对整个语言系统的理据程度有决定性的影响。西方语言单纯符号在共时系统中呈现高度任意的特征，成为任意论的事实基础——任意论成为两千余年来西方语言思想的主流；汉语单纯符号具有高度摹写现实的理据性，孕育了中国语言思想的理据观。索绪尔任意性理论是任意论之集大成者，本节将从其限制条件入手，对比任意论和理据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观念。

4.4.1 任意论及其限制条件

4.4.1.1 完美的任意性理论

现代语言学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核心命题即单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该原则是语言系统的“第一个原则”(索绪尔,1916/1980:102－104)①,近百年来几乎统治整个语言研究领域。

任意性原则问世之后,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挑战。有语言学家从词源的角度论证语言符号并非任意,指出某些单纯词有成词理据。例如,现代英语单纯词 neighbor 在古英语中是一个复合词 nēahgebūr,表示 near dweller; nest 由原始印欧语中分别表示 sit 和 down 的两个词素构成,lord 由古英语时期的 loaf 和 warden 词化而来。近数十年来,功能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蓬勃发展,对任意性原则的挑战和抨击也尤为猛烈。Halliday (1994/2000: F43－45)②主张,功能语法本质上是一种“自然”语法(natural grammar),语言的意义可以从语言社团对经验的理解和语言交际活动中得到解释。认知语言学旗帜鲜明地主张将理据性作为语言的常态,只有理据无法解释时才诉诸任意性原则(Lakoff, 1987: 346)③,并将语言的理据归因于人类认知这一语言活动必不可少的因素(Radden & Panther, 2004: 23)④。但这些观点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任意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p. 102－104。

② Halliday, M. A. K. 1994/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F43－45.

③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346.

④ Radden, Günter & Klaus-Uwe Panther. 2004.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motivation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 23.

性原则的根基。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是一个共时的、内部的、语言系统的原则，是在排除了语言和语言社团的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历史发展、思维认知等各种外部因素之后抽象的、理想化的语言系统的原则。如果将语言理据看做是“由认知结构、交际需求等外部因素驱动的”（Brdar-Szabó，2004：325）①，或者认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问题是个历时语言学问题”（李葆嘉，2009：36）②，从词源、文化、交际、认知等角度着眼反证，都无法有力地驳斥任意性原则。一些持认知语言学观点的学者也承认，从语言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角度看，索绪尔的理论在其二元符号世界中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赵彦春，2001/2009：102③；朱长河，2005/2009：130④）。

另外，有学者从语言系统内部出发，着眼于合成语言符号理据性的研究。认知语言学对诸如 Haiman（1985⑤；1985/2009⑥）等大量句法、语篇“象似性”的研究以及王艾录、司富珍（2002）⑦对汉语语词理据（主要是合成词的理据问题）的探讨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事实上，索绪尔本人对合成符号的理据性从未产生过怀疑，只不过他将这种理据性称为

---

① Brdar-Szabó, Rita & Mario Brdar. 2004. Predicative adjectives and grammatical-relational polysemy: The role of metonymic processes in motivating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321 - 355.

② 李葆嘉，2009，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三论[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9 - 52。

③ 赵彦春，2001/2009，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问题的辨析[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1 年第 4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95 - 102。

④ 朱长河，2005/2009，语言的象似性问题：外界的质疑与自身的应答[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5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24 - 132。

⑤ Haiman, John (ed).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⑥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⑦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相对任意性",以区别于"绝对任意性"(索绪尔,1916/1980:181)[①]。张绍杰(2004:135-151)[②]表明,索绪尔定义的语言系统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1)由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差别决定的纯价值层面;(2)受组合关系、聚合关系限制的关系层面。在纯价值层面产生的符号(即单纯语言符号)是不能进行组合关系分析的,其任意性是绝对的;而在关系层面产生的符号(即合成语言符号)则是相对任意的或者说相对有理据的。由此可见,绝对任意性只存在于单纯语言符号中,而所有的合成符号,包括通过词法、句法和篇章规则生成的各级语言符号,都具有理据性。明确反对任意性原则的 Halliday (1994/2000: F43)[③]承认单纯语言符号大体上是任意的。王艾录(2009:105)[④]也指出,"目前为止的象似性研究基本限于句法平面,个别文章也注意到词平面,但只限于句段词(合成符号),其实质仍然属于句法平面。对于揭示单纯符号的理据,象似说就往往显得束手无策"。

有些语言学者注意到了语言中的拟声词、感叹词和语音象征现象,据此认为语言符号存在象似关系,质疑任意性原则。索绪尔(1916/1980:104-105)[⑤]虽然承认这些符号的可论证性,但认为语音与意义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次要的,并不对语言系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就连反对任意性原则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单纯语言符号所体现的语音理据是"弱理据性",或者说是"个别性的'偶然理据性'"(陆丙甫、郭中,2005)[⑥]。

单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石,奠定了他在

---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81。

② 张绍杰,2004,《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135-151。

③ Halliday, M. A. K. 1994/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F43.

④ 王艾录,2009,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A],王寅主编《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pp. 103-123。

⑤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p. 104-105。

⑥ 陆丙甫、郭中,2005,语言符号理据性面面观,《外国语》[J],第6期,pp. 32-39。

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领域无人比肩的地位。近百年来，任意性原则在众多的质疑和驳斥声中屹立不倒，充分显示了其完美的魅力。

4.4.1.2 索绪尔任意性理论的限制条件

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是西方语言思想两千多年不断发展的必然成果，成功地实现了语言研究对象的客体化和均质化，为“科学的”语言研究创造了条件，具有严谨、精密和理想化的独特魅力，是现代语言理论的典范。任意性理论无可挑剔的严密性是建立在三个限制条件基础上的。这三个条件是：

（1）“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拼音文字语言（索绪尔，1916/1980：51）[①]；

（2）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索绪尔，1916/1980：101－102）[②]；

（3）拟声词“从来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而且它们的数量比人们所设想的少得多”，拟声词和感叹词都是“次要的”（索绪尔，1916/1980：104－105）[③]。

我们认为，单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有条件的，这些限制条件反映了任意论的局限，但往往被人忽视。汉语单纯符号所体现的理据观恰好从这三个方面和任意论形成互补，从汉语汉字的角度为语言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限制条件（1）反映了任意论的文字观（即文字是符号之符号）和西方语言符号的二元结构观念，我们已在4.2中已予以充分讨论，指出汉语理据观观照下的言文关系不同于西方语言，文字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符号是音、形、义结合的三元结构。这一语言符号的三元结构模式具有文字文明时代跨语言的普遍价值。下面，我们将就限制条件（2）和（3）展开任意论与理据观间的对比研究。

---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51。
② 索绪尔，同上，pp.101－102。
③ 索绪尔，同上，pp.104－105。

4.4.2 任意论和理据观不同的语言哲学取向

4.4.2.1 任意论拒斥意义和现实的倾向

索绪尔(1916/1980：101－102)[①]将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特别强调“音响形象”不是物理的声音，而是一种心理现象。任意论观照下的“语言”不是现实的、具体的语言，而是抽象的“心理实体”。将语言符号看做心理实体是开展科学语言研究的必然要求。现实中的语言纷繁芜杂，具有自然、社会、人文的不同属性，涉及物理、生理、心理、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是多种因素、多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无法天然地成为实证科学研究的对象。陈保亚(1997)[②]指出，现代语言学的建立首先经历了对语言的“同质化”操作，使语言成为抽象的、均质的、理想状态的客体，即封闭的、自治的、任意的符号系统。将语言符号看做“心理实体”是同质化操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以研究范围的缩小换取客观描写和实证研究的可能，排除了异质的、复杂的现实因素对科学语言研究的干扰，将语言研究推入了科学的轨道，引发了语言研究的“哥白尼革命”。陈嘉映(2003：19)[③]认为，“语言学，或至少语言学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构成一门标准的实证科学。”这足以说明任意论语言观带给现代语言研究的惊人转变和辉煌成就。

语法是语言中同质性最强的部分，现代语言学对语法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形式化程度最高的句法研究成就尤为突出。而最具异质性的语义连接着整个文化并且指向语言外部的现实世界，任意论观

---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p.101－102。

② 陈保亚，1997，20 世纪语言研究中的同质化运动——索绪尔语言观与博爱士方法论的殊途与同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53－59。

③ 陈嘉映，2003，《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照下的语言学显示出对语义问题较为强烈的排斥倾向。陈保亚(1997:58)[①]指出"不正面回答意义问题,是结构主义同质化运动的核心",认为同质化操作牺牲了对意义的研究,缩小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布龙菲尔德和乔姆斯基构建其语言理论体系时,均将语义问题排除在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乔姆斯基接受了笛卡儿和莱布尼茨唯理论,将人类语言作为天赋能力的一部分,甚至将语言学作为心理学或人类心灵研究的一个分支。

语义问题是语言哲学和语言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任意论观照下的"语言系统"拒斥语义问题的同时,也切断了"语言系统"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将语言的物质和现实基础排除在"语言学"之外。保罗·利科(1980/1988:353-354)[②]指出,现代语言学研究途径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现代语言学取消了"语言和现实之关系"这一语言哲学关心的根本问题:

> 如果语言对于语言学家说来是专门的对象,甚或完全是内部互相依赖的自足系统(用叶尔姆斯列夫的话说),那么关于语言的一整套基本问题就被排除于语言学之外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问题: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指示自身以外的某事物,这个范围广阔的问题可列在指称(reference)项目下讨论。然而这个问题也引起一个矛盾:语言学越纯化,越被归入语言科学,它也就越多地从自己领域中排除掉每一种有关语言与他自身之外它物的关系的问题。[③]

代表西方语言观的任意论是"语言源自心灵"或"语言是心灵的符号"这一西方古老思想的自然延续和发展,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唯心论色彩。同时,西方"语音中心"的事实本身较少地反映语言与现实之间的直接联系,语言符号自古以来就视为社会"约定"的产物。任意论和西方近现代

① 陈保亚,1997,20世纪语言研究中的同质化运动——索绪尔语言观与博爱士方法论的殊途与同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53-59。

② 利科,1980/1988,《哲学主要趋向》[M],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p.353-354。

③ 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思想发展关系密切，产生了超越语言研究的广泛影响。例如，“约定”(convention)概念始终是西方思想传统和社会文化的重要概念，成为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对象(刘易斯，1969/2009)[①]。以任意论为基础的语言科学成为20世纪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陈嘉映，2003：16[②]；刘艳茹，2007[③])。20世纪西方哲学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将语言作为世界的本体和存在之家，主张研究语言就是研究思想和现实。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语言”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作为“心灵符号”的口头语言。“语言转向”认为表述和交流比认识更基本，超出表达的认识和不能借助语言交流而使人理解的思想，不能叫认识或思想(徐友渔，1996：102)[④]。这种“语言优先于认识”的观点同样具有较为强烈的唯心论色彩。对此，李泽厚、刘再复(2009)[⑤]认为，源自历史和经验积累的物质文明才是真正的本体，把口头语言看成本源和存在之家，是20世纪的一大问题。

4.4.2.2 理据观与意义、现实的紧密联系

汉语理据观探讨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心理实体，而是具体的语言现象，与现实世界联系密切。理据观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对语义问题和名实关系的重视。传统“小学”研究发展了以训诂学为中心，以文字学、音韵学为两翼的格局，其中训诂学的任务就是对意义的探索。传统汉语研究从“字”的形和音入手研究字义，发展了“以形求义”和“因声求义”的方法，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均指向意义和意义背后的现实世界。对意义的研究始终是汉语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古代语言学者也特别关注名实之间的联系。东汉刘熙的《释名》既是一部语言研究的著作，同时也是阐释事物得名之由的专书。在刘熙看来语词即名称指向现

---

① 刘易斯，1969/2009，《约定论：一份哲学上的考量》[M]，吕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② 陈嘉映，2003，《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6。

③ 刘艳茹，2007，索绪尔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J]，《外语学刊》(4)：17－21。

④ 徐友渔，1996，二十世纪哲学中的语言转向[J]，《读书》(12)：100－106。

⑤ 李泽厚、刘再复，2009，存在的“最后家园”——对谈录[J]，《读书》(11)：25－28。

实中的具体器物，语言与现实通过名实关系而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社会自古就有“正名”的观念和传统，对名实关系异常重视，要求“名实相宜”、“名正言顺”。这种观念体现在语言的发展和使用中就是汉语社团普遍的“顾名思义”、“望文生义”的诉求，对那些无法反映所指事物特点和本质的语词，汉语社团有强烈的排斥倾向。“巴力门”、“马杀鸡”、“密陀僧”等译名难以为汉语接纳，就是汉语社团“语言密切联系现实”观念作用的结果。

汉语理据观观照下的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预设了“语言源自现实”这一前提，与西方任意论“语言源自心灵”的观念大相异趣。汉语符号的自然实在性（或现实和物质基础）集中体现在独体字“文”和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上。“文”的本义是“形象”，即“花纹”、“纹路”中的“纹”。汉语社团创造“文”的方法是“依类象形”，所以许慎说“文者，物象之本”，“文”就是现实世界在语言中的图景。在“文”孳乳成“字”的过程中，“文”即“部首”成为徐通锵（2005：107－108）[①]所说的“义象”或“义类”，指向现实世界的一类事物。汉语社团不仅认为字形与现实联系密切，而且认为字音与客观世界也有一定联系。中国古代研究语言文字使用的声训、声转等理论和方法，就是从语音入手探求语义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语音有易变的特征，缺乏直接的证据，臆测和附会就难以避免。突出反映汉语社团名实观念的《释名》就有不少声训内容（如“日，实也”，“月，缺也”）缺乏有效的资料支持和验证手段。王宁（2001：31）[②]指出，“传统词源的大家们订了一些条例，诸如‘旁转’、‘对转’、‘同纽’、‘同类’……不一而足，可一旦操作以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不可避免‘无所不转’”。

汉语社团“语言源自现实”的观念是由汉语符号的特点决定的。独体字的象形特征无疑为这一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而合体字与独体字在意义和声音上的联系又为汉语社团发展因声求义或音形义互求的方法创造了条件，促使汉语社团发展了“声象乎义”的观念，进而

①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pp. 107－108。

② 王宁，2001，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30－34。

在语音与现实之间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有一定的臆测色彩)。葛兆光(1998/2007：42)[①]指出,"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长期的延续和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中国文明的连续意味恰好就在这里。"汉语符号"字"和意义、外部世界间明显的关联为理据观的发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索绪尔将语言系统界定为与自然现实无关的心理现象,显然与汉语符号的事实相距甚远。

李泽厚、刘再复(2009)[②]提出"源于历史和经验积累的文字比语言还根本"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说的"语言"指的是西方意义上源于心灵的语言,而"文字"则是有现实和物质基础的汉字。这一观点乍看之下和"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的语言学常识背道而驰,实则切中了现代语言学架空"语言系统"的要害。事实上,不论是语言的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都必然有物质和现实基础,是历史和经验积累的产物,而不可能完全发生于心灵和观念。语音容易歧变的特性使得"音核心"的西方语言符号基本无法体现与自然实在之间的联系,故而形成西方任意论的语言观念;而汉语符号(尤其是原生符号)虽然音义关系也难以论证,但形义关系理据确凿,形成了认同现实基础的语言理据观。

4.4.3 任意论和理据观的不同研究路径

4.4.3.1 任意论的科学方法

现代科学以数理科学为基础,使用运算、推理、实验等方法,其研究过程可重复,研究结论可验证,能够对物质世界进行精确的计算和预测。建立在任意论基础上的现代语言学是科学的语言研究,体现了科学精确、缜密、理想化的独特魅力,实现了语言科学跨越式的发展,在语言研

① 葛兆光,1998/2007,《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42。

② 李泽厚、刘再复,2009,存在的"最后家园"——对谈录[J],《读书》(11)：25－28。

究(如语音和句法等)和各种应用领域(如机器翻译、语言自动识别和处理等)成绩斐然,充分展现了任意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从这一点上看,任意论是西方语言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

科学方法要求研究客体明确、均质,必然要对自然现实进行高度的抽象和简化,如物理学忽略空气阻力、摩擦力和滑轮质量,化学忽略试剂杂质。这类操作之所以可行,经典的解释是小量只能产生小的结果,因而是可以忽略的。我们此前提到的"同质化",就是从复杂、零散的语言现象中,抽象出可供形式化实证研究的"语言系统"。索绪尔将地位"次要"、数量很少的拟声词和感叹词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避免它们对理论的严密性产生干扰,这种忽略小量的做法正是科学方法赋予研究者的权力。科学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抽象和简化使研究结论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约瑟夫·劳斯(2004:74-135)[①]指出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产生于实验室的地方性知识。陈嘉映(2003:22-23)[②]指出:

> (科学结论)是由高度形式的方法确定的,它们作为科学结论严格地约束于获得它们的方法系统,因此它们缺乏弥漫性,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事实或科学结论转移去为不受这个方法系统约束的现象领域提供解释……科学的系统方法把结论的意义限制在系统之内,限制在这门科学内部,不允许它们弥漫开来加深对其他现象的理解。

正因科学方法既充满魅力又存在一定局限,我们对任意性理论发出由衷赞叹的同时,仍然有必要讨论它的限制条件——那些"语言系统"外的边缘现象和小量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应该成为"非科学"的语言研究关注的对象。拟声词和感叹词是口头语言残存的理据现象,证明口头语言存在现实和物质基础,与单纯符号的文字理据共同构成连接人类语言和现实世界的桥梁。揭示任意论在"语言系统"外的局限性和"语言系统"内的有效性,对于我们理解中西语言和语言观念的共性和特点,有同

① 劳斯,2004,《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74-135。

② 陈嘉映,2003,《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22-23。

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任意论的语言观本身就是西方科学思想的一部分。任意论严格区分了语言和文字，精确界定了语言和言语、内部和外部、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二元对立。该理论背后深入分析和严密推理的科学方法，尤其值得没能孕育现代科学的中国文化思索和借鉴。

4.4.3.2 理据观的人文路线和经验方法

理据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发展了系统论的综合方法，力争将作用于语言的种种社会和人文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体现了语言研究的人文路线。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路线是被现代语言学称为“非科学”或“前科学”的理论方法，其研究主要针对“个人的思维现象或精神现象，而不是直接研究物质现象。它所处理的现象之可以理解，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具有与我们象似的思维结构”(哈耶克，1955/2003：21)①。人类语言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属性的复杂体系，既有静态的、可精确分析和测量的、可验证的自然科学属性，也有动态的、系统的、综合的人文学科属性。王骏(2006：15)②指出，“语言的人文属性使我们很难依靠一些通过归纳或演绎论证所取得的科学规律来概括全部的语言事实”。人文主义的方法提供的“解释性”要素，虽然是“非科学”的，但对于我们认识语言的人文属性，却是必不可少的。中西传统语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发展了人文主义的语言研究，但却出现了研究路线和方法的不同发展趋势。西方的人文主义语言研究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内未能取得主流地位；而中国在接触西方现代语言理论前则主要崇尚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在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广泛系联各种语言要素的人文方法指导下，古代语言学者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如清代的考据学传统考证精密全面，备受接受了现代学术训练、事事讲求“拿证据来”的胡适推崇(转引自姜义华，1993：21)③。音、形、义互求的训诂学研究“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

① 哈耶克，1955/2003，《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p.21。

② 王骏，2006，科学主义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J]，《中国外语》(1)：11－16。

③ 姜义华，1993，《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C]，北京：中华书局，p.21。

触类，不限形体”，王力（1980/2006）[①]赞其“精彩”。被陈寅恪（1986：183）[②]称为“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的“右文说”[③]，既立足于文字又不拘泥于文字的限制。这些自成体系的理论成果系统全面，立足汉语汉字特点。如何充分利用而不简单斥之为“前科学”或“不科学”，仍是当今中国语言学者的一大任务。

注重直觉体悟的经验方法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强调对资料全面搜集、整理和归纳。古代语言学者做了大量艰苦的田野工作，为今天的语言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和资料，其观察之全面、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庞大完全可以与西方语言研究比肩。汉语理据观产生于对汉语汉字直观的观察和体验，与西方高度抽象的语言研究方法有很大区别。汉语单纯符号的理据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山”、“水”、“人”、“月”等基本概念字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非常明显。虽然今天的汉字早已经历了隶变而具有较多的抽象特征，但是象形性仍是汉语符号突出的特征。

但是经验方法的缺点是难以形成抽象思辨的现代科学精神。罗素（1922/1996：39）[④]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有一个弱点：缺乏科学。”中国思想传统“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观念和“格物致知”的经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古代语言研究向抽象的理论探索方向发展。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传统强调对现实生活的执着追求，不鼓励对自然作纯粹抽象的思辨。理性精神与实用目的的结合使得“小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停留在“通经书”上，难以生发出超越现世功利目标的探索和思辨精神。相比之下，格物致知就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接触来获得有关这一对象的知识（陈炎，2009：117）[⑤]，具有经验性和实用性特征。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常以感性常识为依据，加入简单的归纳和分类，较少抽象的理论探索，缺少思辨和实证精神。例如，古代语言学者的研究虽然涉及语言、

① 王力，1980/2006，《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② 陈寅恪，1986，陈寅恪先生来书[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p.183。

③ 此时的“右文说”已经发展为突破字形限制、与“声转”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④ 罗素，1922/1996，《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p.39。

⑤ 陈炎，2009，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6－126。

文字、思维、现实等对象，但未能对这些重要概念做出细致的分析和清晰的界定，容易引起概念的混淆。经验方法还容易掺杂主观臆测的成分，如果缺少有效的材料和方法加以验证，就会导致一些缺少理论价值的说法广为传播。受认识水平的限制，这种穿凿附会在声训研究中较为多见。注重直觉体悟的经验方法无法生发出现代科学和技术，这也使得中西语言思想和方法间的交流借鉴显得格外重要。

4.4.4 中西语言观念的会通与整合

理据观和任意论代表中西语言研究传统不同的主流语言观，来源于中西语言社团对自身语言文字的实践活动和细致观察，符合中西语言各自的特点，对汉语和西方语言的事实各自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任意论所代表的语言研究传统以西方音义结合的二元语言符号和抽象的“语言系统”为对象，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排除意义和现实问题对形式化的干扰。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是西方语言思想两千多年不断发展的必然成果，成功地实现了语言研究对象的客体化和均质化，为“科学的”语言研究创造了条件，具有严谨、精密和理想化的独特魅力，是现代语言理论的典范和现代语言学的基石。现代语言学成果卓著，许多富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和实践活动，都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器翻译、语料库建立、大规模语言信息自动处理、自动语音播报技术等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也都以现代语言学为依托。

理据观所代表的语言研究传统以汉语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言符号为对象，主要采取具象的经验方法，以对意义的探索为核心，承认语言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承认语言和文字是人类经验和历史的积累，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关注文字对语言的巨大能动作用，切合汉语实际，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被索绪尔体系排除在外避而不谈的理论问题。基于理据观的传统汉语研究历史悠久、文献丰富，发展了独特的人文方法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具有重大价值。理据观深入到任意性理论所不能及的领域，不是对任意论的颠覆，而是对任意论的补充。

任意论和理据观分别根植于西方和中国不同的语言事实和思想传统，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任务、不同目标的语言研究，各有优势和局限，并无高下之分。任意论代表的科学方法为现代语言学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理据观观照下的中国传统语言研究则立足汉语汉字特点。对“科学的”任意性理论的全面认识，不应忽视其限制条件所承载的理论意义；而对于传统的汉语理据观，既要重视其体现的汉语汉字特点，也应注意其研究方法的局限。人类语言研究的整体发展，必然得益于理据观和任意论所代表的不同语言观念和研究路线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两者不可偏废其一。在当今西方语言理论主导语言研究的情况下，对植根于传统汉语研究的理据观给予充分的重视，必然能为语言研究开辟更为宏大的视野，为发现具有普世价值的语言规律提供新的启示。

第五节　小结

本章主要以英汉语言为例，通过语言间的对比研究，探讨中西语言单纯符号的理据问题。本章主要内容分为四小节。第一节介绍关于汉字起源的种种推测，说明汉字起源于图画，具有鲜明的写实特征；汉字具备自行创制、模拟现实、以形表意、超越时空的特点。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大规模使用的表意文字，从共时层面、历时层面、认知科学和研究传统四个方面看，汉字对汉语系统和汉文化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参与塑造了汉语独特的面貌。中国近代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出现的“废除汉字”思潮和以此为目的的汉语拼音化运动，为汉语和汉文化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也说明汉字是汉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分析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的内部结构，分别介绍了源自印欧语传统的二元符号结构观和源自中国传统的三元符号结构观。二元符号结构观将单纯语言符号看做由语音和语义两个元素构成的整体，语形（即文字）在符号中仅起到记录语音的作用，故而常被作为极其次要的因素排除在语言符号之外。三元符号结构观认为单纯语言符号有三个要

素：语音、语形和语义。汉语符号的语音和语形在符号使用的不同场合和情况分别发挥作用，两者地位同等，汉字具有“第二语言”的性质。拼音文字的他源文字性质造成了其在印欧系语言中功能和作用有限的局面，使得印欧语单纯符号呈现出二元结构模式。三元符号结构模式是文字文明时代具有普遍价值的语言符号结构观念。

第三节探讨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的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单纯语言符号由音、形、义三个要素构成，内部存在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形式——意义”关系，分别构成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这两种不同的理据类型。英汉语的语音理据均体现在拟声词、感叹词和语音象征等现象中，属于语言共时层面的边缘现象，音义关系整体上符合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从形义关系上看，独体字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摹写，语形与意义之间联系明确，并且相当稳定、不易灭失，具有很高的文字理据性。而对英语这样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拼音文字语言来说，文字是“符号之符号”，在语言系统中仅记录语音，对语言系统的作用十分有限，故而英语单纯符号文字理据性极其微弱。英语单纯符号理据程度极其微弱，汉语单纯符号则具有较高的理据程度。英汉单纯语言符号的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具有原生理据性质，是人类语言与现实世界的接口。

第四节对比在西方和中国语言研究传统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任意论和理据观。任意论所代表的语言研究传统以西方音义结合的二元语言符号和抽象的“语言系统”为对象，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排除意义和现实问题对形式化的干扰，其严密性有一定限制条件。理据观所代表的语言研究传统以汉语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言符号为对象，主要采取系统的人文方法和具象的经验方法，以对意义的探索为核心，承认语言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关注文字对语言的巨大能动作用，切合汉语实际，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被索绪尔体系排除在外避而不谈的理论问题。理据观和任意论是中西不同的主流语言观，源自中西不同的语言事实和思想传统，各有优势和局限，并无高下之分；两者的会通和整合必然能为语言研究开辟更为宏大的视野，提供新的启示。

第五章

英汉合成语言符号理据性对比研究

第一节　英语复合词和派生词的理据性

语言中的合成符号规模庞大，数量众多，一般说来是构成词汇系统的主要部分。本章所讨论的合成符号，主要指英语派生词和复合词，以及汉语合体字和双音词。

5.1.1　英语复合词的理据性

英语构词法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构词法是派生法（即借助词缀构成新词，如 goodness）和复合法（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构成新词，如 mailbox）。据曩洪汉、李长庚（2008：11）[①]，派生

① 曩洪汉、李长庚，2008，《英语构词法字典》[Z]，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p. 11。

法生成的词占新词总数的30%～40%，复合法占所有新词的28%～30%。派生词和复合词都是英语词素通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生成的词汇，故而是英语词汇系统中典型的合成词。它们可以被进一步分析成词素，具有很高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属于Ullmamm（1962：80－93）[①]和许余龙（2002：123）[②]提到的“形态理据性”，即词汇在形态构成方面所体现的可分析性。

5.1.1.1 英语复合词的形式

英语复合词（compound）就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合在一起构成的一个新词。构成复合词的各个部分，必须是单纯词即自由语素，而不能是黏着语素。由于目前英语中能产的黏着语素大多来自其他语言，故而相比派生词，英语复合词的构成较多地利用了英语的基本词汇。汪榕培、卢晓娟（1997：40－41）[③]指出，复合法是英语最古老的构词法之一，复合词是古英语词汇的一大特色；中古英语时期，由于受法语影响，复合法用得不多；但到16世纪以后，这个古老的构词方法又逐渐兴起，通过复合法构成的新词与日俱增。

复合词的鉴别历来是语言学者重视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词，可以构成一个受词法控制的复合词，也可能构成一个受句法控制的自由短语。在复合词和自由短语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能将两者截然分开，如下面的复合词和自由短语在形式上是非常接近的：

复合词		自由短语	
greenhouse	玻璃暖房	green house	绿色的房子
grandpiano	三角钢琴	grand piano	大钢琴

①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80－93.

② 许余龙，2002，《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123。

③ 汪榕培、卢晓娟，1997，《英语词汇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40－41。

（续表）

复合词		自由短语	
darkroom	暗室	dark room	黑暗的房间
blackboard	黑板	black board	黑色的木板

图表 5.1　英语复合词和自由短语的界限

语言学者以种种标准对复合词和短语进行区分。这些标准包括语义标准，即两个词的结合如果不是原来词义的简单叠加，而引申出新的意义，就构成复合词；形式标准，即两个词中间如果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就尚未构成复合词；语音标准，即一般词只有一个重音，有两个重音的就是短语。但是，它们各自都有难以解释的语言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语言的词法和句法是一个连续体，其间本来就没有一条明晰的界限能将两者截然分开。

5.1.1.2　英语复合词的构成

大多数英语复合词由两个单纯词构成。组成英语复合词的同一个词素，既可以出现在复合词的前位上，也可以出现在复合词的后位上，如 stone 可以构成下面两组词汇：

A 组		B 组	
footstone	基石	stonepit	采石场
tombstone	墓碑	stonework	砖石部分
sandstone	砂岩	stoneboat	运石雪橇
grindstone	磨石，砂轮	stoneman	石匠
mudstone	泥石	stonecrop	景天(植物)
cutting stone	切割(玻璃)刀	stone-leek	葱
blue stone	蓝宝石	stonecast	一(投)石之遥
falling stone	陨石	stone-jug	石罐
float stone	磨砖石；浮石	stone-deaf	完全聋的

（续表）

A组		B组	
copper stone	黄铜矿	stone-hearted	铁石心肠的
pillar stone	奠基石	stone-still	一动不动的
arch stone	拱石	stone-ground	研磨石的

图表 5.2　英语复合词的构成

在这两组复合词中，词素 stone 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A 组中的 stone 是复合词的核心成分，表示“石头”这一物质本身，其前面的成分从某个侧面或角度对 stone 进行修饰和限制。而 B 组的 stone 是复合词的修饰限制成分，表示“石头”这种物质的某个特征或属性，对后面的核心成分进行修饰。

英语复合词数量很多，但在整个词汇系统中比重有限，处于次要地位，词化程度也不高（如 A 组词汇有很多是短语形式，尚未词化）。但是，复合词成词的理据比较清晰，便于语言社团理解和掌握。近年来英语词汇总量不断膨胀，语言使用者记忆的负担越来越重，复合词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成为当代英语最重要的构词法。现当代英语新词里，新复合词占绝对的优势，其能产性之强，超乎人们的想象。复合法也已成为英语词汇中新词产生的最大来源，也是最为重要的来源（王文斌，2005：302）[①]。在 1961 年《韦氏国际词典第三版》出版后的 12 年中，该词典的出版公司梅里安记录了 6 000 个新词，其中约 20% 用派生法构成，约 30% 用复合法构成（夸克等，1985/1998：2115）[②]。根据语法学家杰弗里·利奇（G. Leech）1980 年提供的材料，二次大战以后出现的新词，由复合法、派生法、转化法三种构词法生成的占 55%，其中复合词占 27%，派生词占 17.5%，转化词占 10.5%（转引自李平武，2003：2）[③]。复合词

① 王文斌，2005，《英语词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302。

② 夸克，伦道夫、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1985/1998，《英语语法大全》[M]，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115。

③ 李平武，2003，《英语词缀与英语派生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 2。

在现当代英语词汇中的比重有明显提高，正是因为其理据程度很高，语义较为透明，便于语言社团理解和掌握。

5.1.2 英语派生词的理据性

5.1.2.1 英语派生词的形式

派生法是通过词根和词缀的组合构成新词的方法，在英语的发展史上始终是最能产的构词法之一，生成了数量庞大的派生词。

词根是派生词构成的基础，在同一词根上缀加不同的词缀，表示不同的意义和词类。英语词汇系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一个基本概念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符号表示，一个是能够独立运用的单词，而另一个是不能单独使用的非自由词根（参见王文斌，2001：92－93[①]；曩洪汉、李长庚，2008[②]）。王文斌（2001：93）[③]列举了不少这样的概念：

基本概念	单词	非自由词根
日	sun	sol
月	moon	lun/luni
星	star	astro
水	water	hydro/hydr/hydric
石	stone	lith/litho
色	colour	chrom
花	flower	antho
鸟	bird	avi/av/avar

① 王文斌，2001，《英语词汇语义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pp. 92－93。
② 曩洪汉、李长庚，2008，《英语构词法字典》[Z]，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③ 王文斌，2001，《英语词汇语义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p. 93。

（续表）

基本概念	单词	非自由词根
书	book	biblio
人	man	anthrop/anthropo
头	head	cephal
脚	foot	ped
手	hand	chiro
牙	tooth	dent
音	sound	phon/phono/phe
词	word	dict
时	time	chron
世界	world	cosmo/cosm
生命	life	bio/bi
杀	kill	cide

图表 5.3　表示基本概念的英语词素

显然，表示基本概念的英语单词主要属于英语本族语词汇，而相应的非自由词根则主要来自其他语言，这与英语历史上大量吸收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词汇有关。这些非自由词根主要用来与各种词缀结合，构成派生词。

英语除了词根，还有词缀。英语词缀分为前缀（prefix）和后缀（suffix），其中前缀一般以语义为基础，主要作用是改变词根的语义；后缀的语义作用很小，它的主要职能是改变词根的语法功能（如词类）。现代英语保留的古英语词缀很少，只有数十个，其中还在参与新词生产的词缀为数更少，如-ness、-ly、-less、-ful、-er 等。很多古英语词缀已经不再参与新词的构造，如-th（warmth）、fore-（foreread）、-ledge（knowledge）等。英语绝大多数词缀，特别是前缀都来自其他语言，主要的来源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其中不少是通过法语吸收的。

英语词汇的数量非常庞大，被认为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的语言之

一，词汇总量据估计已达二百万以上。英语词根和词缀只有数百个，称得上是扩大语言使用者词汇量的钥匙。了解英语的词根和词缀，有利于人们迅速便捷地掌握更多的单词。派生词历来是英语最为能产的构词法之一，我们以表示“发送”(send)之意的词根 mit/mis 为例，说明派生构词法的能产性：

permit	允许	transmit	传送
permission	许可	transmission	传送
permissive	容许的	transmissive	能传送的
permissiveness	容许性	transmissiveness	富有传送性
permissible	可允许的	transmissible	可传送的
impermissible	不可允许的	intransmissible	不可传送的
permissibility	可允许性	transmissibility	可传送性
impermissibility	不可允许性	transmittal	传送
permittee	被允许的人	transmittance	传送
permitter	允许者	transmitter	传送者
permittable	可许可的	transmittable	可传送的
admit	允许	commit	表态
admittance	进入的权利	commission	委任
admissible	可接受的	commissioner	政府特派员
admission	允许	commitment	表态
omit	省略	committee	委员会
omission	省略	committal	交托
omissible	可省略的	committor	表态者
omissibility	可省略性	committable	可以表态的
		commissar	政委

图表 5.4　含有词根 mit/mis 的英语派生词

含有 mit/mis 的词还有 demit（辞职）、dismiss（解散）、emissary（间谍）、emission（发出）、emit（发出）、intermission（间歇）、intermit（间歇）、intromit（插入）、manumission（释放）、manumit（释放）、pretermission（遗漏）、pretermit（遗漏）、promise（诺言）、remiss（疏忽）、remit（宽恕）、submission（屈从）、submit（屈从）等等。英语派生法构词能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5.1.2.2 英语派生词的构成

英语派生词能产性很高，占英语合成词的大部分。与复合词多由两个词素构成不同，英语有不少含有两个词素的派生词，也有不少派生词含有多个词素。这里，我们以两个词素组成的派生词为例，说明英语派生词构成的方式。含有三个或三个以上词素的派生词，其构成方式和两个词素的派生词是一致的。我们仍以表示“石头”这一概念的 lith/litho 为例：

A 组		B 组	
aerolith	陨石	lithology	岩石学
entomolith	昆虫化石	lithograph	石印品
megalith	巨石	lithophyte	石生植物
monolith	独石柱	lithiasis	结石病
neolithic	新石器时代的	lithotomy	结石切除
paleolithic	旧石器时代的	lithoscope	结石检查器
antilithic	防结石的	lithify	石化
trilith	三石塔	lithofacies	岩相
urolith	尿石	lithosol	石质土
zoolith	动物化石	lithocyte	石细胞
carpolith	果实化石	litholatry	拜石教

图表 5.5 英语派生词的构成

在由两个词素构成的派生词中，词素可以出现在派生词的前位，也可以出现在后位。以上 A 组词中，词根 lith/litho 处于语义的核心位置，表示“石头”这一物质，大致相当于图表 5.2 中 A 组复合词中的 stone；而 B 组的词根 lith/litho 属于语义上的修饰限制成分，表示与“石头”有关的特征，大致相当于图表 5.2 中 B 组复合词中的 stone。

派生词的构成也有比较高的理据程度，其中由英语本族语词素构成的派生词理据更为清晰，如 goodness。这是因为，英语本族语词素多为自由词素，其本身就是可以独立使用的单词，所以结构明晰清楚，语义透明度高，理据方式往往一目了然。但是由本族语词素构成的派生词在英语中数量十分有限。此外，英语吸收了大量拉丁语和希腊语词素，并不断仿照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模式构造大量的派生词。由外来词根和词缀构成的派生词，理据性不如本族语派生词那么明显。这是因为绝大多数拉丁、希腊词根和词缀在英语中不能单独成词，不少词根词缀有多种异体，也有许多词根词缀的含义不明显，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如果不经专门的学习和训练无法迅速识别它们，其理据有一定的模糊性。由拉丁和希腊词素构成的派生词数量十分庞大，成为英语派生词的主体，在各类专业领域的使用尤为普遍。

英语的合成词汇主要是复合词和派生词，数量十分庞大，其构成具有较高程度的形态理据性，其中复合词和本族语派生词的理据方式尤为明显。

第二节　汉语合体字和双音词的理据性

汉语词汇系统在历时层面上基本上沿着“独体字（象形字为主体）——合体字（形声字为主体）——词（双音词为主体）”的脉络发展。本书前文 3.2.2.2 讨论了汉语合成词的范围，认为合体字和双音词是汉语最典型的合成词，也是合成词的主体。

5.2.1 汉语合体字的理据性

汉语最初的造字方法是象形和指事，前者描摹事物的形象，后者也以形象的手段表现一些抽象的概念。象形和指事造字能力有限。清朝朱骏声统计了《说文解字》中 9 353 个字的构成方式，按照六书分门别类作了统计。按照他的统计，《说文解字》有象形字 364 个，指事字 125 个（转引自汪寿明、潘文国，1992：249）[①]，两者加起来不过数百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象形字和指事字不敷使用，于是汉族先民就把两个或以上的独体字合在一起，用以表示新的概念和意义，造出了数以万计的新字，这就是合体字。汉语合体字主要有两类，一是会意字，一是形声字。

5.2.1.1 会意字的理据性

会意字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物形体会合起来，从它们的联系或配合上表示出一种新的、通常是抽象的意义。会意是为了补救象形和指事的局限而创造出来的造字方法，可以表示很多抽象的意义，有比较强的造字功能。《说文解字》中收有会意字 1 167 个，可见会意造字法的能产性大大高于象形和指事。

大多数会意字的理据很明显，构成方式很好理解。例如“从”表示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众”表示很多人，下大上小为“尖”，不好就是“孬”，日月同辉就是“明”，房子里养了猪就成了“家”（远古时人猪共室）。理据明晰的会意字很容易掌握。但也有一些会意字由于字形的变化太大，现在已经很难看出它们的字源了，这在简化字中尤为明显。如“东”繁体写为“東”，由“日”和“木”组成，表示太阳从树后面升起的方向正是东方；“习”繁体写为“習”，“羽”指鸟的翅膀，“白”是“自”的变体，合起来指小鸟自己用翅膀反复练习学飞。

目前会意已经不是汉语造字的主要方法，新造的会意字十分有限。

---

① 汪寿明、潘文国，1992，《汉语音韵学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49。

5.2.1.2 形声字的理据性

※ 形声字地位的确立

最早产生的汉字多为独体字，但是独体字的能产性有限，数量只有几百个，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象形字和指事字大多表示普通名词和动词，对于内容十分抽象的概念就无能为力了，如时间和空间概念、颜色、人称（例如“你”、“我”、“他”）就很难用象形和指事的手段表达。

汉语最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假借字”。假借字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许慎，约公元 100/2004：3）[①]，其原理就是把汉字看做只表音不表义的语言符号，在已有的字中选取声音相同的记录新概念。刘又辛（1984/1993：43）[②]认为，“假借字的特点，是把形意字当作记音符号来用，只标音，不标形”。例如，“自”本来是鼻子的象形字，假借为“自从”的“自”；“北”本意是二人相背，假借为“东南西北”的“北”；“我”本是一种武器，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

假借字的出现，说明当时的汉字体系偏离了象形、指事和会意这样以形表意的轨道，开始向表音方向发展。这一方法在象形、指事和会意这三种造字手段无法满足记录语言的要求时，为汉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吴长安（1995：129－134）[③]认为：

> 在汉字形成完整体系的过程中，假借字起了决定作用……假借一出现，原来三种造字的“穷途”[④]一下子变成了“坦途”。
>
> 假借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假借产生后，才保证了文字与语言的充分结合，凡不易造或不能造的字，只要借一个同音字来使就行了。

---

① 许慎，约 100/2004，说文解字叙[A]，宋易麟编著《说文解字今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p.3。

② 刘又辛，1984/1993，论假借[A]，《文字训诂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pp. 37－61。

③ 吴长安，1995，《文化的透视——汉字论衡》[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pp. 129－134。

④ 指象形、指事、会意。

人们发现所有难以通过象形等手段表达的概念，不用专门造字，只要借一个同音的字，就可以记录下来。所以，假借字一经出现，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据李梵(2008：55)[①]，我国最早的文献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有大量的假借字，而形声字仅占20%。刘又辛(1984/1933：42－44)[②]记载，据吉林大学古文字教研室的统计，甲骨文常用字中假借字占80%以上，形声字只占百分之十几。

但是，汉字体系最终没有走上完全表音的道路，假借字在汉字体系中曾经的优势地位被形声字所取代。到春秋战国时期，假借字在文献中的使用比重，已经下降到百分之几的低水平了，到了秦汉以后，假借字出现的比例就很低了。而同期形声字的数量，则大幅度上升，从甲骨文时期的百分之十几，到《金文编》正编中的百分之四十多，到《说文解字》中的82%强，再发展到宋代的90%(刘又辛，1984/1993：43－44)[③]。现代汉字形声字所占比例在90%以上，可谓占据了汉字系统的统治地位，成为汉字的主体。

假借字在汉字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被形声字取代，主要是由于假借字实际上是把汉字这样以形表义的高理据性符号，当作单纯表音的低理据性符号来使用，与汉字的内部机制背道而驰。吴长安(1995：122)[④]认为假借是对“汉字性质的反动”，可谓一语中的。假借字的大规模使用，容易造成用字的混乱局面。例如，假借字的使用难以规范，如果使用量一大、时间一长，形义就脱节了，往往使人分不清文献中假借和非假借的用法，也很难搞清楚借来的字是用来表示什么意义的。研读古籍的最大障碍就是假借字，不仅今天的中国人如此，可能几千年前的中国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假借字使用的增多，使得人们能以同一个字表达发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数个概念，同时也容易造成书面语音同义不同的概念相互混淆。这

---

① 李梵，2008，《汉字简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p.55。

② 刘又辛，1984/1993，论假借[A]，《文字训诂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pp.37－61。

③ 刘又辛，同上。

④ 吴长安，1995，《文化的透视——汉字论衡》[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p.122。

说明纯表音文字体系无法圆满地解决区别意义的问题，于是汉字体系的发展走上了形声这一形义、音义共同作用以明晰地区别意义的道路。形声字的实质，是通过给一系列语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概念添上区别性的标志，使其在书面语的使用中不致混淆，既利用了假借表音的优势，同时又避免了用字混乱的弊端。刘又辛(1982/1993：80)[①]表明，秦以后大量出现的形声字，多是从殷、周时期的假借字或象形、会意字演变来的。此外，形声字通过字与字的组合构成，具有相当高的能产性，能在短期内造出大量新字，以满足社会生活不断发展，需要词化的概念迅猛增加的需求。所以，随着汉语词汇的不断扩大，形声字逐渐确立了汉字系统的主体地位。

※ 形声字的构成

形声字取代了音义关系主导的理据程度很低的假借字，确立了汉字系统的主体地位。这标志着汉字的发展由音义关系突显的低理据模式向形义关系突显的高理据模式的回归。这一回归不是简单重复早期汉字象形、指事的造字方式，而是结合了表音和表意的新模式，成功地解决了象形、指事的低能产性和社会文化发展对词汇量增长的高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又符合汉语固有的高理据词汇模式。

我们一般认为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构成，其中形旁表义、声旁表音，所构成的整体兼具提示语义和语音的双重功能。其实不少形声字的声旁不仅表音，同时也具有表义的功能(参见徐通锵，2001[②]、2005[③]；张其昀、谢俊涛，2008[④]；张海媚，2007[⑤] 等)，如：

---

① 刘又辛，1982/1993，“右文说”说[A]，《文字训诂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pp.62－89。

② 徐通锵，2001，《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③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④ 张其昀、谢俊涛，2008，论音义关系与训诂之因声求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67－72。

⑤ 张海媚，2007，义素分析在“因声求义”中的合理运用[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1)：116－118。

戋	小	農	浓厚
线	丝缕之小者	襛	衣厚貌
笺	竹简之小者	醲	厚酒
贱	价值之小者	濃	露多
浅	水之小者	膿	肿血
践	轻踏为践	穠	草木茂盛
饯	小饮为饯	噥	味道浓厚

叚	红	肖	末/顶端渐小处
瑕	玉小赤谓之瑕	稍	禾苗叶末端渐小处
騢	马赤白杂毛谓之騢	艄	船尾端渐小处
鰕	鱼之赤者谓之鰕	宵	云霞顶端视之觉渐小处
霞	云气之赤者谓之霞	鞘	革类顶端而细小处
椵	赤色谓之椵	梢	树木末端渐小处

此	小	青	精明
雌	雌之受名，盖以其小也	晴	日之无障蔽者
柴	小木散材	清	水之无浑浊者
赀	小罚以财自赎也	睛	目之能明见者
娄	妇人小物也	精	米之去粗皮者
疵	小病也		
髭	口上须也		

图表 5.6　汉语形声字的构成

由此可见，一个声旁可以通过增添不同形旁，孳乳出一个声音相近、意义相通的同源字族。我国古代语言学者早在千年以前就发现了汉字孳乳的这一规律，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传统汉语研究的“右文说”，又经后世学者不断发展，成为音、形、义相结合探求汉语词源

的有效途径。清代的语言学家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把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峰，也利用了声旁表义的原理，如段玉裁(1815/2006)[①]就倡导“以声为义”的研究方法。王力(1982)[②]根据语音通转原理联系了3 163个字；殷寄明(2007)[③]根据126个声符线索，联系了2 071个字。可见通过以形旁分化声旁的形声字方式发展而来的汉字为数众多。

徐通锵(2001：104－107[④]；2005：119－121[⑤])认为，形旁代表语义关系中的一个上位概念，称为“义类”；而声旁除了与字的语音有联系之外，还是义类在某一角度、某一侧面的具体化，表示“义象”；形声字字义的生成是“一个字义＝一个义类＋一个义象”，体现汉语社团“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吴长安(1995：129)[⑥]表示：

> 绝大部分的同源字都是以同一声符而孳乳的形声字。这些形声字的词义由两个义素构成：一个是声符所标志的核心意义，另一个是形符所标志的类别意义。现代汉字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形声字，如果我们能从形符和声符的两个义素去理解，就可以做到纲举目张。

汉语形声字构成的方式就是：以声为基础，通过为声添加不同的形分化声的意义，产生一个同源字族，形成“义类＋义象”的构词方式。义类和义象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同一个构词成分，如果出现在声旁位置上，就成为义象，如果出现在形旁位置上，则充当义类。所以，形声字不仅可以以声为纲生成一个个同源字族，也可以通过“形”整理成系列，如“松”、“柏”、“桃”、“梅”，“江”、“河”、“湖”、“海”等。中国古代字书

① 段玉裁，1815/2006，《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② 王力，1982，《同源字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③ 殷寄明，2007，《汉语同源字词丛考》[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④ 徐通锵，2001，《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 104－107。
⑤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pp. 119－121。
⑥ 吴长安，1995，《文化的透视——汉字论衡》[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p. 129。

大多依照形旁编排,《说文解字》就是其中的代表。徐通锵(2005:120)[①]将以声为纲和以形为纲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总结出了汉语字法的规律:"以声为基础而生成字族的方法是向心造字法,而以形为基础而将形声字整理成系列,则可以总结出离心造字法。"同一个基本字,既可以做形旁,成为"义类",也可以做声旁,充当"义象",如:

A组	B组	A组	B组
础	炟	酿	酒
砖	鼤	醪	酋
砌	祏	醇	茜
砍	鈻	醋	盾
斫	魬	酣	輴
磐	佑	醉	栖
碍	祐	醫	槚

图表 5.7　汉语形声字法

汉语形声字的构成大都有理据可循。但是,也有不少形声字在长期使用中,语音和语义发生了改变,最初成字的理据变得模糊甚至丧失。例如,"農"表示"浓厚"就发生了声的借用;"醋"本意指客人向主人敬酒,与我们今天的用法有很大不同。繁体字的简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汉字理据的系统性,如"派"本意指江河的支流,"脈"指遍布全身的血管,两者有共同的声旁,语义上的联系十分明显。然而,"脈"简化后成了"脉",与"派"的联系就不容易看出来了。但即使经历了数千年的时代变迁,我们今天使用的形声字体系仍然保持了形旁、声旁对语义和语音很强的提示作用,有很高的理据性。

---

①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p.120。请注意徐通锵先生此处的"向心"、"离心"概念,和布龙菲尔德等西方语言学者使用的"向心结构"、"离心结构"意义不同,参见该书140页的解释;徐先生还创造了另一个术语"同心",用以指汉语"人人"、"左右"等词汇的构成方式。

※ 形声字体系的发展和稳定

形声字是非常能产的造字法，在汉字系统的地位确立以后，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新字，满足了社会发展对词汇量的需求。人们可以为每一个需要在语言中表达的概念专门造一个字，汉语词汇量迅速扩大。汉语词汇的增加使得词化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每个有细微差别的事物都有一个专名。仅以基本颜色词为例，据张永言(1984/1999：177－216)[①]考证，上古汉语中表“黑”的字有 98 个，表“白”的 85 个，表“赤”的 65 个，表“黄”的 29 个，表“青”的 25 个，其中每一个字都指某一颜色的物件。“马”这一概念，仅因毛色的差异及所在位置的不同，在《尔雅》中就有 35 个汉字作为专名加以区分，如“騢”即“颈毛和尾毛黑色的红马”(参见徐朝华，1987：345)[②]。高度词化的词汇系统具有表达精确简洁的优点，如《说文解字》“牛部”就列有诸多字以表示不同种类、年龄、颜色的牛，现举例如下：

牡	公牛	犗	阉割过的牛
牝	母牛	牻	黑白杂毛的牛
犊	小牛崽	犥	白色脊背的牛
牰	二岁牛	犉	嘴唇黑色的黄牛
犗	三岁牛	犥	黄色发白的牛
牭	四岁牛	牲	用于祭礼的完整的牛

图表 5.8　高度词化的形声字体系

高度词化的词汇系统大大增强了语言的精确度和表现力，但是这些意义区别细微的字需要人们逐个记忆，无疑也增加了使用者的负担，只有少数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才能掌握，容易造成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隔阂。另

① 张永言，1984/1999，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A]，《语文学论集(增补本)》[C]，原载《汉语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22 辑，北京：语文出版社，pp. 177－216。

② 徐朝华，1987，《尔雅今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p. 345。

外，以形旁分化声旁意义的形声字虽然在书面语里容易区别，但是由于同一字族的许多字有相同或相近的读音，形成了大量的同音字、近音字，“声”的负担过重，不利于口头交际。所以，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求词汇量进一步增加时，继续以形声字的方式增加词汇，就会给汉语社团带来无法承受的记忆负担。汉语保有的形声字数量虽然从理论上讲，远未达到造字能力的极限，但是汉语社团已停止使用创造新字的方法来增加词汇了。双音词转而取代形声字的地位，成为汉语词汇增长的主要手段。

5.2.1.3 合体字的音韵理据

汉语词汇系统不是一盘散沙，有一定的内部联系和清晰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词汇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保留在了语言的共时系统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探讨合体字和原生独体字、合体字自身音、形、义的关系，不仅可以从形义关系入手，还可以从音义关系入手。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双声字与叠韵字往往有密切的语义联系，并在声训中广为运用。例如，《尔雅》对“休”的解释是“息也”，《说文》解释为“息止也”，“休”、“息”二字双声义通，二字连用则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又如“全”字，《说文》训为“完也，纯玉曰全”，“完”、“全”二字元部叠韵，“纯”、“全”二字从母双声，“全”的本义就指玉体的完整和玉色纯粹不杂。齐冲天（2004：128）[①]指出，有些字“除了字形上能表音义之外，还能一分为二，既表声母和声母方面的音义，又表韵部和韵部方面的音义，既分又合，天衣无缝”。例如，“懿”表示“专久而美”，从壹从恣。懿、壹二字影母双声，懿具有壹“专一”的义项；懿、恣二字脂部叠韵，懿具有恣“纵情奔放”的义项。“懿”从壹、恣二字各取了一部分语音和语义，表示“在专一的境界里纵情奔放”这样美好的品德。这些现象表明，汉语社团可能在创制部分合体字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原有汉字的音韵和意义进行分析和组合，再通过新的字形表现出来。齐冲天、齐小乎（2010：3）[②]将这类字称为“有两个语源，由两部分音义构成”的字，指出在《汉语音义字典》所列

---

① 齐冲天，2004，一字之形声韵兼备、音义俱全者十例[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4)：128－133。

② 齐冲天、齐小乎，2010，自序[A]，《汉语音义字典》[Z]，北京：中华书局，p.3。

的9 000多个字中，有三千略多一点的字是由两个语源、两部分音义构成的，约占汉字总数的三分之一。《汉语音义字典》的9 000多个字只有很少量的古僻字，涵盖了现代汉语的7 000个常用字。故此合体字音韵可以分析的现象在今天的汉语系统中仍然较为普遍。

合体字在语音上通过音韵分析而产生的理据称为音韵理据，是汉语独特的理据类型。这一理据类型主要属于词源理据，但由于汉字形体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语音的变迁又有一定规律可循，故而音韵理据在今天的汉语共时词汇系统中仍有一部分留存。合体字的音韵理据与拟声词的语音理据有本质的区别：语音理据以现实世界的声音为基础；音韵理据则以已有符号的语音为基础。音韵理据与英语合成词汇的形态理据也有一些区别：具有形态理据的词是将两个（或多个）词素直接拼合，不涉及对词素的音节内部进行语音拆分；音韵理据则很可能是语言社团造字时对语源字进行音韵分析和组合的结果。西方语言的单音节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不能进一步分析为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而单音节的合体字在语音和字形上都有进一步分析的可能。

5.2.2 汉语双音词的理据性

本研究对汉语词汇的认定参照了冯胜利（2000：77－78）[①]提出的“韵律词”概念（参见3.1.2.2），在考虑语言形式的语义和结构因素之外，将是否符合汉语基本音步的双音节模式作为确定“词”的重要标准之一。双音词是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讨论的双音词，一般不包括双音节的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

5.2.2.1 汉语双音词地位的确立

双音词在汉语中出现得很早。史存直（1989：93－95）[②]认为，双音

①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p. 77－78。

② 史存直，1989，《汉语词汇史纲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p. 93－95。史存直原文使用的术语是“复合词”，以与联绵词相区别，专指非联绵词的双音词。

词在西周的金文中已经出现，春秋时代数量更多；两汉以后，双音词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多了，而且在构词方式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到了宋代，双音词的构词方式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备。高名凯（1962/1990：523）认为[①]，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双音词，汉语双音词的大量产生是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演变过程中的一条内部规律。冯胜利（2000：107）[②]认为，双音词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前零星地出现，到战国之后才开始成批出现；到了东汉，双音词呈现翻倍增长、突飞猛进的势头。石毓智（2002：1－14）[③]认为汉语双音化的趋势主要出现于五至八世纪。邱冰（2010：32）[④]统计了上古时期和中古时期汉语双音词的使用情况：

	书名	总字数(万)	双音词比重
上古文献	《论语》	1.6	36.4%
	《孟子》	4.9	38.7%
	《韩非子》	10.8	35.9%

图表 5.9　上古文献双音词使用情况(邱冰,2010：32)

	时代	书名	总字数(万)	双音词比重
中土文献	东汉	《论衡》	21.1	40.6%
	西晋	《三国志》	36.6	43.3%
	刘宋	《世说新语》	6.1	41.1%
佛经文献	东汉	《中本起经》	2.1	48.1%
	姚秦	《妙法莲华经》	7.1	52.7%
	北凉	《悲华经》	9.0	55.6%

图表 5.10　中古时期双音词使用情况(邱冰,2010：32)

① 高名凯，1963/1990，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与外来词[A]，《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p.523。

②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107。

③ 石毓智，2002，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J]，《语言研究》(1)：1－14。

④ 邱冰，2010，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0－33。

现代汉语中，双音词已成为词汇的优势部分。北京语言学院（1985：1075）[①]对大量汉语语料进行统计，在覆盖的 31 159 个不同的词中，单音节词占 12.2%，双音节词 73.6%，三音节词 7.6%，四音节词 6.4%，五音节以上的词占 0.2%。吴为善（2003：14）[②]对《普通话 3 000 常用词表》中单双音节的各类词的比重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使用频率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单音词	双音词	单音词	双音词	单音词	双音词
1 000 个词内	136	170	172	60	57	24
	77%	23%	71%	29%	70%	30%
2 000 个词内	254	438	343	184	96	86
	37%	63%	65%	35%	53%	47%
3 817 个词内	242	1397	368	573	140	311
	15%	85%	39%	61%	31%	69%

图表 5.11 《普通话 3 000 常用词表》单双音节比重统计表（吴为善，2003：14）

马西尼（1993/1997：144－145）[③]指出，在《水浒传》（约 1649 年）、《红楼梦》（约 1765 年）和《儿女英雄传》（1840 年）、《骆驼祥子》（1935 年）中，多音节词和单音节词的比例大约为 1∶1。但在 1949 年以后，文学著作中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百分比分别是 14.2% 和 85.8%，其中双音词为 73.7%。双音词从古至今逐渐增加的趋势十分明显，并且逐渐确立了在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优势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中古时代双音词大量增加，这与汉语语音结构的简化有直接关系。冯胜利（2000：103－111）[④]指出，汉语双音节音步的建

①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1985，《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 1075。

② 吴为善，2003，双音化、语法化和韵律词的再分析[J]，《汉语学习》，pp. 8－14。

③ 马西尼，1993/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黄河清译，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审定，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pp. 144－145。

④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pp. 103－111。

立与汉语历史上音节简化和声调建立几乎同步发展。董秀芳(2002：38)[①]也支持冯胜利的看法，认为汉语出现双音化的趋势，是上古汉语的复杂音节结构显著简化的结果。高名凯(1963/1990：523)[②]指出："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之间所以大量产生双音复合词的现象，因为声母和韵母的单位减少了，语音形式与语义内容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语音简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同音字增多，导致单音节模式的词汇结构区别意义的功能减弱，汉语势必通过增加词的音节数量进行补偿，故而造成了汉语词汇自中古开始显著的双音化倾向。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势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梁光华(1995)[③]认为，古代汉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词多义现象，影响了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同时汉民族喜爱骈偶的审美心理和外来词汇的双音节模式对原来的单音节模式也有显著的影响，故而汉语词汇逐渐发展了以双音词为主体的词汇模式。皮鸿鸣(1992)[④]表示，汉语出现双音化的趋势主要是为了降低古代汉语的词化程度，减少一词多义现象。邱冰(2010)[⑤]认为，中古时期佛经文献的双音化程度明显高于同时期的中土文献，说明语言接触对双音化存在一定的影响。梁晓虹(1994：174－193)[⑥]也认为，佛教词语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

王力(1957、1958/2004：397)[⑦]指出汉语语音简化和外来语的吸收，是促进汉语双音化趋势发展的外部原因，而双音化现象的主要推动力，

---

① 董秀芳，2002，《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p.38。

② 高名凯，1963/1990，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与外来词[A]，《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p.523。

③ 梁光华，1995，试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形成原因[J]，《贵州文史丛刊》(5)：50－55。

④ 皮鸿鸣，1992，汉语词汇双音化演变的性质和意义[J]，《古汉语研究》(1)：56－59。

⑤ 邱冰，2010，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0－33。

⑥ 梁晓虹，1994，《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pp.174－193。

⑦ 王力，1957、1958/2004，《汉语史稿(第二版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p.397。

是汉语系统内部的原因：

>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必然越丰富越纷繁；即使语音不简化，也不吸收外来语，汉语也会逐渐走上复音化的道路的，因为这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不过由于有了这两个重要因素，汉语复音化的发展速度更快了。

汉语出现双音化趋势的根本原因，是词汇系统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造成的。在词汇总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语言需要区分度更高的词汇形式，双音化自然而然成了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方向。可见，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趋势是由汉语内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

5.2.2.2 汉语双音词的构成

双音词由前字和后字构成，沿袭了形声字“义象 + 义类”的方式，由双音词的后字表示一个宽泛的意义范围即“义类”，其作用相当于形声字体系的形旁，而前字表示“义象”，代表一种语义特征，限制后字的意义范围，相当于形声字体系的声旁(参见 5.2.1.2)，如：

A 组	B 组	A 组	B 组
山石	石板	白酒	酒吧
巨石	石匠	春酒	酒宴
顽石	石刻	薄酒	酒钱
陨石	石蜡	稠酒	酒令
化石	石青	苦酒	酒窝
结石	石林	美酒	酒盅
卵石	石油	醉酒	酒意
砂石	石料	喜酒	酒精

图表 5.12 汉语双音词的构成

以上是以“石”、“酒”两字为核心字分别组成的两组双音词。A 组的双音词，“石”、“酒”两字都是双音词的后字，分别指“石头”和“酒”这种物质，是双音词的核心成分，前字则从某一角度或侧面对后字进行修饰和限制；B 组的双音词，“石”、“酒”两字都是双音词的前字，分别指和“石头”

与“酒”有关的一种特征或性质，是后字的修饰成分。徐通锵（2005：139）[①]认为，双音词前字和后字体现了不同的语义功能，“核心字居后，构成向心性字组……居前，构成离心性字组”；并指出，“这种向心、离心的生成字组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以形声结构为特征的单字编码格局时期的向心、离心造字机制的延续。”

大多数汉语双音词的构成方式明晰，理据程度很高。董秀芳（2004：24）[②]指出，“汉语合成词大部分都具有比较清晰的内部结构（internal structure）。笔者在参与编写一本汉语的词源词典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汉语双音词的内部语义都是透明的，其造词理据一目了然，无需过多解释，真正需要解释其语源的双音词只占很小一部分。”李晋霞、李宇明（2008：64）[③]也认为，“只有少量词意义完全隐晦，其形式与意义间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而大部分词，词义均不同程度地具有透明性，内部结构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具有可分析性。”这说明汉语双音词沿袭了独体字和合体字高理据程度的构成模式。双音词明晰的构成理据不需要语言社团逐个记忆，比较利于人们对语言的学习和掌握。

第三节　英汉语合成符号构造的共性特征

5.3.1　英汉语合成符号的共同构造

在讨论了英语复合词、派生词和汉语形声字、双音词的构成之后，我

①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p. 139。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徐通锵先生定义的“向心”和“离心”概念不同于布龙菲尔德的“向心”和“离心”概念，此处的A、B两组词都是西方语言学意义上的“向心结构”。

② 董秀芳，2004，汉语的词库与词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 24。引言中的“合成词”即双音词。

③ 李晋霞、李宇明，2008，论词义的透明度［J］，语言研究(3)：60－65。

们看到这些合成符号在结构上有共同的地方，即英汉语中的合成符号多由前位和后位两部分构成，其中后位成分一般表现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宽泛的概念或意义，而前位成分则一般表示一种语义特征，对后位概念起到修饰和限制的作用①。

这种合成词汇的生成方式，很早就引起了语言学者的注意。布龙菲尔德(1933/1980：249－250)②将这种结构式称作“特性——实体”(character-substance)的向心式结构，该结构的中心语大致作为某一种属的事物，结构中的修饰语作为中心语的向心式短语。张志公(1982：34)③用“组合”这一术语定义汉语各级符号的构成方式，认为汉语各级语言单位在组合方式、手段和组合关系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具有一致性。徐通锵(2005)④则称之为“义象＋义类”的构成方式，其中，义象指在语义上起修饰限制作用的成分；而义类则表示抽象的核心概念。吕必松等(2007：14)⑤将语言符号的这一结构模式称为“1＋1＝1”的二合机制，认为汉语各级结构单位的组合生成，基本上都遵循“1＋1＝1”的法则。Langacker (1987/2004：409－425)⑥和 Langacker (2007：91－137)⑦则将这种构成方式称为“语法结构式”(grammatical construction)。Langacker 认为，语言的词素、词、词法和句法是一个连续体，语法结构式分布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可以对语言各层面作出统一的解释，是语言理论中真正的最简方案(王寅，2007：319－

① 一组同源形声字中的声旁相当于前位，表示属性和特征；而形旁相当于后位，表示核心概念，如“霞”表示“红色的云”，“笺”表示“小竹简”。

② 布龙菲尔德，1933/1980，《语言论》[M]，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p. 249－250。

③ 张志公，1982，《现代汉语(适用本)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p. 34。

④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p. 120。

⑤ 吕必松、赵淑华、林英贝，2007，《组合汉语知识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p. 14。

⑥ Langacker, Ronald W. 1987/2004.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409－425.

⑦ Langacker, 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cke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p. 91－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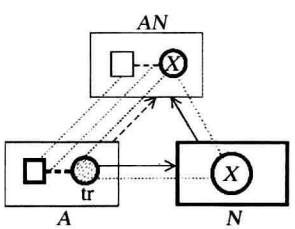
328)[①]。Goldberg (1995/2007: 6)[②]也提出,“词库和句法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词汇构式与句法构式的内部复杂性有所不同,在语音形式的表述上也有所不同,然而词汇构式和句法构式实质上是同一类明确表达的数据结构:两者都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

英语复合词、派生词和汉语形声字、双音词存在共同的构成模式,以及不同层面语言符号之间的同构现象,反映了人类语言不同形式背后的共同规律。

5.3.2 英汉语合成符号结构式共性的原因

英汉语合成符号构成的共同模式,不仅说明英汉合成符号都具有较高水平的理据性,并且这种理据的构成反映了英汉语社团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从英汉语合成词构成的共同模式和不同级别语言符号的同构现象来看,“特性 + 实体”的向心结构式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合成符号构式。

当代认知语言学对这一结构式的形成有如下解释:这一结构式的典型形式由前位的特性 A 和后位的实体 N 两个结构成分构成;其中结构成分 A 指向(profile)一个关系,结构成分 N 指向一个实体。名词的指向 X 和关系 A 中的射体 tr (即 trajector,关系中的核心参与者)相对应,构成结构式 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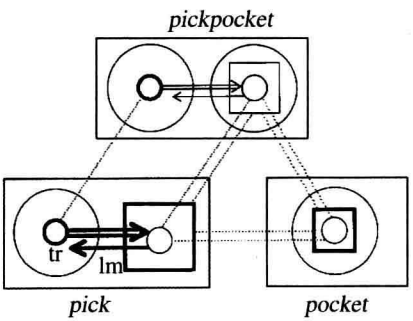
图表 5.13 英汉合成语言符号典型结构式 AN (Langacker, 2007: 128)

① 王寅,2007,《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319 - 328。

② Goldberg,1995/2007,《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吴海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6。

Langacker (2007: xiv、129)[①]以 smart woman 为例说明这一典型结构式 AN 的特点:(1)含有两个结构成分;(2)其中一个结构成分指向关系,另一个结构成分指向事物;(3)名词性的指向与关系中的核心参与者(focal participant)相对应;(4)核心参与者是图示性的,由名词成分来详细说明;(5)复合结构从其中的一个结构成分中继承指向。

英汉语都存在大量符合 AN 模式的典型合成词,如 greenhouse 和"黑板"。但是 Langacker (2007: xiv)[②]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结构都是典型结构,事实上,上述五个特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变动,形成非典型构式,如复合词 pickpocket 明显不符合第(5)点,其构式如下:



图表 5.14 Pickpocket 的结构式(Langacker, 2007: 131)

然而 Langacker 指出,无论结构式如何变化,各种结构式始终有两点是相同的:(1)它们都是象征性结构;(2)它们之间都通过对应来进行组合。英汉合成词的构成,正是两个结构成分之间的对应和组合。

综上所述,"特性 + 实体"这一结构式是英汉语合成词汇共同的理据模式。由这一模式形成的理据类型称为合成理据,属于语言内部的理

① Langacker, 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cke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129.

② Ibid, p. xiv.

据。Ullmann (1962: 80)[①]所说的形态理据是英语等形态语言的合成理据。汉语是非形态语言，因此本文采用“合成理据”这一术语。

第四节 小结

本章讨论了英汉合成符号的理据性，对英汉语合成词构成的个性和共性进行对比研究，力图揭示英汉不同表层形式背后的共同机制。第一节探讨英语合成词的主体——复合词和派生词的理据性。复合词是由自由词素组合而成的合成词，较多地利用英语本族语词素和同化程度较高的外来词素；而派生词主要是由非自由词素组合而成的合成词，对外来词素的利用比较多。两者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在构词的方式上有共同之处，即同一词素既可以出现在合成词前位表示特征，也可以出现在后位表示实体。由此产生的合成词都具有较高的理据程度，由自由词素组成的复合词尤其如此。

第二节讨论汉语合成词的理据性。汉语合成词的主体是形声字和双音词，两者分别是现代汉字系统的主体和现代汉语词汇的优势成分，并且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上，代表前后相承的两种主要造词模式。形声字作为主要造字模式的确立，代表着汉语词汇系统由假借这一向表音发展的趋势，回归到以形表意的高理据性模式，同时大大提高了汉字作为词汇手段的能产性。形声字典型的构成模式是“形旁 + 声旁”，其中形旁多表示一个实体，而声旁多表示该实体的某一特征。这一结构模式具有很高程度的理据性。相当一部分汉语合体字还有音韵上可分析的特征，形成汉语独特的音韵理据。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倾向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如汉语音节结构的简化造成同音字大量增加，不利于口头交际；形声字的词化程度较高，大量使用会给语言社团带来沉重的记忆负担；汉

①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 80.

语双音节音步取得汉语韵律的基本音步地位；汉语社团喜欢骈偶、对称、成双成对的审美心理；以及外来语的影响等等。双音词的前字一般多表示特征，而后字一般表示实体，其构成模式也是“特征 + 实体”，绝大多数双音词的语义透明，理据程度较高。

第三节着重探讨英汉语合成符号表层差异背后的普遍规律。通过研究英语复合词、派生词和汉语形声字、双音词的构成方式，我们发现英汉语合成词具有共同的构造，即“特征 + 实体”的结构模式。这一结构式在英汉语不同类别的合成词中均有体现。同时，各级语言符号之间存在普遍的同构现象，“特征 + 实体”结构式可能是英汉语各级合成符号共同的结构模式。我们采用 Langacker (2007)[①]提出的合成语言符号典型结构式模型对英汉合成词的构成加以解释，认为这一结构式由合成词结构成分的对应和组合形成。

① Langacker, 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cke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第六章

英汉外来语及理据性对比研究

外来语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产物。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语言和文化，只要有与外界交流的需要，就会产生外来语现象。萨丕尔(1921/1985：177)[①]说："研究一种语言在面对外国词时起怎样的反应——拒绝它们，翻译它们，或是随便接受它们——很能帮助我们了解这种语言内在的形式趋势。"不同语言如何吸收外来语这一异质成分，非常突出地反映了该语言的内部机制，成为我们了解语言本质的窗口。各种语言共同的外来语现象为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以英语和汉语吸收和同化外来语的主要方式和机制为例，探讨它们在吸收外来语方面的差异，揭示英汉语对外来语的吸收、同化和其理据程度之间的关系，了解差异背后英汉语言系统运作的共同机制及其理据。

① 萨丕尔，1921/1985，《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77。

第一节　英汉外来语概况

6.1.1　英语外来语概况

6.1.1.1　英语外来语的数量

英语有“最开放的语言”之美誉，在英语形成的早期，就从其他语言中吸收了大量词汇。关于英语词汇外来语的比重，不同文献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黎昌抱(2001：92)[①]表明，现代英语词汇总量已经达到100万，其中80%为外来语，享有“世界性词汇”(cosmopolitan vocabulary)的美称。熊文华(1997：171)[②]认为“英语中有许多外语借词，从历史上考证其数量可能占英语词汇总数的56%～70%(有的学者认为占80%)，所吸收的语源多达数十种。”高瑛(2001：60)[③]认为“英语在较短的1 500年里吸收了50万个外来词”。夸克等(1985/1998：2205)[④]指出“英语词汇是一种混合词汇，它以日耳曼语的词汇为基本核心，并从外国语言(主要是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吸收了数量更多的词汇”。Stockwell & Minkova (2001：50)[⑤]给出了现代英语最常用10 000词的来源：古英语词汇占31.8%，法语词汇占45%，拉丁语词汇占16.7%，其他日耳曼语词汇占4.2%，其他语言占2.3%。可见，即使在英语高频词

① 黎昌抱，2001，英汉外来词对比研究 [J]，《外语教学》(5)：92－96。

② 熊文华，1997，《汉英应用对比概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p.171。

③ 高瑛，2001，英汉外来词的对比研究 [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4)：60－62。

④ 伦道夫·夸克、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1985/1998，《英语语法大全》[M]，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2205。

⑤ Stockwell, Robert & Donka Minkova. 2001. *English Words: History and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0.

中，本族语词汇所占的比例仍比较有限。以上各家的数据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可以认定的事实是：英语外来语数量庞大，词汇的大部分是外来语。以最保守的估计看，英语外来语数量已达数十万之多。

6.1.1.2 英语外来语的来源

英语外来语来源十分复杂，含有向数十种语言借用的词汇，是当今国际性最强的语言。英语外来语按照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来自印欧语系内部和其他拼音文字语言的外来语，如来自法语的 camouflage（伪装）、govern（统治）、enemy（敌人）、lace（花边）等，来自拉丁语的 equilibrium（平衡）、turnip（萝卜）、altar（祭坛）、prosody（诗体学）等，来自希腊语的 hepatitis（肝炎）、technology（技术）等，来自意大利语的 alfresco（在户外的）、opera（歌剧）等，来自德语的 blitzkrieg（闪电战）、quartz（石英）等。其中法语和拉丁语词源的词构成英语外来语的主体，使得英语词汇呈现出一个特别的现象：同一个概念往往有本族语、法语借词和拉丁语借词三个不同来源的词表示，例如：

英语本族语	法语	拉丁语
tell	inform	acquaint
rise	mount	ascend
teach	guide	instruct
time	age	epoch
belly	stomach	abdomen
holy	sacred	consecrated
weak	frail	fragile
explain	elucidate	explicate

图表 6.1 英语表示同一概念而来源不同的词

这三种不同来源的英语词汇虽然表示的基本意义一致，但具有不同的语体色彩。英语本族语词汇多用于日常交际，代表较为通俗的语体；来自法语的借词多用于重要和正式的场合，代表正式的语体风格；拉丁语词

汇则较少用于口头交际，多出现在学术、公文和法律文本，代表极为正式的语体风格。在多数情况下，这三种词汇是不能随意交替使用的。

英语外来语的另一类来源是汉语、日语等汉字文化圈语言，如来自日语的 genro（元老）、bonsai（盆景艺术）、sushi（寿司）等，来自汉语的 fengshui（风水）、kungfu（功夫）、ginseng（人参）等。英语外来语中来自印欧系语言的外来语占了绝大多数，而来自汉语、日语等语言的外来语数量则少得多。Katamba（1994/2005：143）[①]引用了 Bliss（1966：27）的表格，显示了英语发展的各个时期，不同来源的外来语在外来语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百分比）：

	Medieval	16 c.	17 c.	18 c.	19 c.	20 c.
French	16.7	12.2	24.8	47.7	52.3	58.6
Classical	78	69.4	55.3	25.9	23.4	13.2
Italian		7.6	7.2	15.1	6.4	8.1
German		0.6	0.3	0.6	4.1	12.7
Spanish		3.8	2.1	2.1	3.4	1.7
Other European	3.5	2.9	1.9	3.3	3.5	2.8
Non-European	1.8	3.5	8.4	5.3	6.9	2.9

注：c. 表示“世纪”，表中数字均为某一来源的外来词在某一时期占所有英语外来语的百分比。

图表 6.2　英语外来词的来源构成（Katamba，1994/2005：143）

可见，超过 90% 的英语外来语来自印欧语系内部，英语从非印欧语借入的外来语数量十分有限。汪榕培（2000：79－89）[②]的研究表明，英语中收入语言学史和外来语词典的汉语借词仅为数十个，许多来自汉语的借

① Katamba，Francis. 1994/2005. *English Words: Structure, History, Usage (Second Edition)* [M]. London：Routledge. p.143. 据 Kambata（1994/2005），该文献为：Bliss，A. J. 1966. *Dictionary of Foreign Words and Phrases in Current English* [Z].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② 汪榕培，2000，英语中的汉语借词[A]，《英语词汇学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79－89。

词并未成为英语词汇体系稳定的成分。

6.1.2 汉语外来语概况

6.1.2.1 汉语外来语的历史

汉语从很早就开始吸收外来语。史有为(2000：27－97)[①]和钟吉娅(2003：11－14)[②]将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历史追溯到汉语发展的远古时期和上古时期(先秦两汉)。远古时期关于汉语词源的可靠证据比较少见，但上古时期，特别是汉代，和匈奴、西域交往频繁，为汉语留下了不少外来语，如“胡”、“单于”、“骆驼”、“狮子”、“苜蓿”、“石榴”、“箜篌”、“琵琶”等。在其后的发展中，汉语从佛教文化、境内少数民族、西方和日本语言文化中不断吸收有益成分，大大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发展。

汉语发展中曾经出现过数次吸收外来语的高潮。除了秦汉时期较多引进西域词汇，赵爱武(2005：45－49)[③]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语还有三个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佛经翻译时期，大量佛教语汇进入汉语，其中很多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如“佛陀”、“罗汉”、“僧伽”、“菩提”、“世界”、“慈悲”等；外来语第二次大量进入汉语，始于19世纪末开始的“西学东渐”，大量涉及科学技术、军事、政治、历史、文学、音乐、哲学、经济、医学等领域的新词进入汉语，如“民主”、“咖啡”、“浪漫”、“乌托邦”、“葛郎玛”、“蒙太奇”等，影响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浪潮催生了汉语引进外来语的第三次高潮，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现代汉语中新的外来语也层出不穷，如“丁克”、“迷你裙”、“桑拿”等，成为汉语新语汇最能产、最具活力的来源之一。万红

---

① 史有为，2000，《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pp.27－97。

② 钟吉娅，2003，《汉语外源词——基于语料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p.11－14。

③ 赵爱武，2005，从外来语引进之三大高峰看其特征[J]，《语言与翻译(汉文)》(1)：45－49。

(2007：29－41)[①]、杨锡彭(2007：166－186)[②]在列举了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几种主要类型之后，均以较大篇幅特别介绍近年来广泛应用在汉语中的字母词，如“X光”、“T恤衫”、“DIY”、“GDP”等，字母词成为汉语吸收外来语的新现象。

6.1.2.2 汉语外来语的范围

汉语外来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对于外来语的范围，历来也存在较大争议。潘文国(1993/2004：326－347)[③]、钟吉娅(2003：15－33)[④]对各家确定的外来语范围有全面的介绍，此处我们着重讨论近年来有代表性的观点。

杨锡彭(2007：32)[⑤]认为汉语外来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外来语“专指音译词，也包括含有音译成分的语词”，并指出这一范围内的外来语历来都是无争议的；而广义的外来语包括两大类：(1)日源词汇的形译词，特点是借形借义不借音；(2)意译外语词而形成的词语，包括两种方式产生的新词：①仿译词(如将 honey moon 称为“蜜月”，blackboard 称为“黑板”，generation gap 称为“代沟”等)和②重新命名词(如将 vitamin 称为“维生素”，angel 称为“天使”等)。

潘文国(2008：61－78)[⑥]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实质是用汉字对异质语言成分进行转写，并将汉语外来语依照形、音、义三方面分为写形外来语、写音外来语和写义外来语三大类，并再细分为若干小类：

---

① 万红，2007，《当代汉语的社会语言学观照——外来词进入汉语的第三次高潮和港台词语的北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pp. 29－41。

② 杨锡彭，2007，《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 166－186。

③ 潘文国，1993/2004，《汉语的构词法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p. 326－347。

④ 钟吉娅，2003，《汉语外源词——基于语料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p. 15－33。

⑤ 杨锡彭，2007，《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 32。

⑥ 潘文国，2008，外来语新论[A]，《中国语言学·第一辑》[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pp. 61－78。

类别			例词
写形外来词	日语汉字词	纯日语词	场合;景气
		汉字日语词	科学;主观
		汉语回归词	革命;民主
	字母词	纯字母词	WTO;OK
		字母基础词	T恤;B超
	引进词		PowerPoint
写音外来词	纯写音词		沙发;坦克
	写音兼造字		氛;硼;咖啡
	写音加义类词	义类在后	卡车;啤酒
		义类在前	酒吧;车胎
	写音加写义词	音前义后词	因特网;剑桥
		义前音后词	冰淇淋;苹果派
	写音兼译义词		引得;俱乐部;拖拉机
	写音附义词	语义相连	可口可乐
		语义恍惚	幽默;逻辑
		精选字义	康乃馨;雪碧
		习惯译名	夏娃;耶稣
写义外来语	写义外来词		牛津;蜜月
	写义外来语		一石两鸟

图表 6.3　汉语外来语结构分类表(此处略作修改)

本研究所讨论的汉语外来语,仅包括写音外来语,也即狭义外来语。写音外来语用和借出语读音相近的汉字转写语音,如用“沙发”转写sofa,用“坦克”转写 tank。这一引进外来语的方式主要用来吸收西方语言文化中的新概念,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汉语汉字固有的内部机制存在很大差异,历来被看做非常典型的汉语外来语。

写义外来语(意译词)是使用汉语本身的材料引进其他语言和文化

中的概念，其实质是翻译。王力（1957、1958/2004：587）[①]严格区分了“借词”和“译词”这两个概念，指出借词是“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即音译词），而译词是“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中来”（即意译词）。王力主张“只有借词才是外来语，而译词不应该算作外来语”。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合理的。写义外来语在语言形式上并不具备异质性，“外来”的是其所表达的概念，而不是语言形式本身，应该划入翻译的范畴。如果把所有表达外来概念的词都看做外来语的话，那么“世界博览会”、“摩天大厦”、“计算机”、“机器人”、“人工智能”、“细胞”、“法官”、“钢笔”等汉语社团一般认为不具有异质特征的语词，也会被当作外来语看待，因为这些概念无一不是外来的。下面一组语词的两种汉语表达，在汉语社团绝大多数人看来有本质区别。

insurance	燕梳	保险
laser	莱塞/镭射	激光
telephone	德律风	电话
empire	英拜尔	帝国
coup d'état	苦跌打	政变
dictator	狄克推多	独裁
picnic	匹克匿克	野餐
bus	巴士	公共汽车
engine	引擎	发动机
angel	安琪儿	天使

图表 6.4　汉语外来语的写音和写义

相比之下，写音的第二列词具有明显的异质特征，应该列入外来语的范

① 王力，1957、1958/2004，《汉语史稿（第二版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p. 587。

围；而第三列词则因为不具备语言形式上的外来特征而应看做对外来概念的翻译。如果将写义外来语列入外来语范围，则会混淆上表两类汉语语词之间的差异。

写形外来语（形译词）主要指汉语中来自日本语言文化的日源外来语，这类语词数量非常庞大。李兆忠（1998：31）[①]指出，“在我们现今使用的人文科学名词中，约有70%的词汇，都是在本世纪初，在学习西方的浪潮中经由日本传入的。”雷颐（1997：101）[②]也认为，汉语中的日源词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他者”与“我们”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把日源词统统清除，我们将变成失语症患者。王彬彬[③]表示，“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以上这些观点说明，日源语词与汉语自身词汇之间，在形式上难以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日本在译介西方文化时，直接用汉字创造新词汇来表达西方概念。这些和制汉语词汇绝大多数完全符合汉语构词法的原则，而且较多来源于汉语典籍的固有表达（意义常有不同）。日源词汇利用了中日两种语言文化“同文”的便利，得以在短时间内大规模进入汉语。日源语词带给汉语社团的感觉，也常常是亲切而非陌生的。此外，从汉语特点和日源语词的机制看，汉语从日语引进语词，是借形借义而不借音的，这与汉字以形表意而不直接表音的特点完全吻合。所以，在汉语社团看来，那些来自日本的语词，如“文学”、“阶级”、“革命”、“民主”、“艺术”、“文化”、“文明”、“封建”、“国家”、“自由”、“经济”、“社会”等等，毫无一般外来语所应具有的异质特征而显得格外亲切。本研究“汉语外来语”这一概念一般情况下不包括汉语中的日源形译词，我们将仅在特别需要之处援引日源语词作为参照。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讨论的外来语，主要是指写音外来语，包括音译词和音义兼译词。

---

① 李兆忠，1998，汉字的圈套[J]，《东方艺术》(1)：30－33。

② 雷颐，1997，“黄金十年”[J]，《读书》(9)：97－103。

③ 王彬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A]，《〈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C]，引自http://www.zhaojun.com/youci/riyu.htm，登陆日期：2009年2月21日。

6.1.2.3 汉语外来语的数量和来源

汉语虽然从上古时期就开始吸收外来语，近年吸收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但是和英语数十万计的外来语比起来，数量悬殊。王芳姿（2001：110）[①]、黎昌抱（2001：93）[②]表明，“汉语大约有 37 万个词，而《汉语外来词词典》[③]收录了古今汉语外来词一万余个”，其中“包括某些外来词的异体或略体”，故而外来语占汉语词汇比例很小。高瑛（2001：60）[④]认为汉语外来语的数量约在一万个左右。据周荐统计，《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的音译词有 6 213 个（转引自杨锡彭，2007：44）[⑤]。

汉语外来语的来源也非常广泛。钟吉娅（2003：38－39）[⑥]对《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的 7 971 个词（除异形词）的来源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结果表明这些外来语来自 83 种语言，其中向汉语输出外来语最多的前十种语言是英语（3 602）、梵语（915）、日语（850）、俄语（417）、蒙语（399）、藏语（258）、法语（178）、鲜卑语（44）、彝语（39）、德语（35）。周振鹤、游汝杰（2006：195－213）[⑦]认为，汉语外来语主要来自中亚（西域）文化、佛教文化、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包括经由日语吸收的西方外来语）和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蒙语、满语）。这说明汉语在发展过程中与这些语言文化交往接触较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在本研究主要讨论的写音外来语中，源自西方语言的数量最多，涉及范围也最广。

---

① 王芳姿，2001，英汉外来词比较[J]，《嘉兴学院学报》，(4)：107－111。

② 黎昌抱，2001，英汉外来词对比研究 [J]，《外语教学》(5)：92－96。

③ 刘正琰、高明凯、麦永乾、史有为，1984，《汉语外来词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④ 高瑛，2001，英汉外来词的对比研究 [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4)：60－62。

⑤ 杨锡彭，2007，《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 44。据杨锡彭（2007），周荐的统计数据见：周荐，1991，汉语外来成分译借方式之我见[J]，《语文教育学院学报》（香港），第 8 期。

⑥ 钟吉娅，2003，《汉语外源词——基于语料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p. 38－39。

⑦ 周振鹤、游汝杰，2006，《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 195－213。

第二节　英汉语对外来语的引进

语言吸收外来语的过程有两个部分：引进和同化。这里我们首先讨论作为异质成分的外来语，是如何进入英汉语言系统的。

6.2.1　英语引进外来语的方式——“借贷”

外来语在英语中称作“借词”(loanword)，这一术语形象地描述了英语引进外来语的模式“借贷”，即直接从其他语言中引进所需词的形式，保留其在拼写上的异质特征。萨丕尔(1921/1985：174)[①]说：“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就是词的‘借贷’。只要有文化借贷，就可能把有关的词也借过来。”Matthews (1997/2000：211)[②]对借词的定义是：“从其他语言借入某一语言的词，有时直接按照借入语的语音规则发音，但经常是在借入之后逐步向借入语的发音规则转变，或者部分转变。”

绝大多数英语借词来自印欧系语言内部(参见 6.1.1.2)。西方诸语言虽然语音各异，但文字都是字母形式。即使是不同的字母系统，如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相互转换也很容易。英语在吸收外来语时，最简捷的途径是从其他语言直接“借”过拼写形式，再以本族语的语音规则改造其读音。印欧系来源的外来语在进入英语时，往往是整词借用，即“除在语音上略有变动，形式和意义上全盘借入”(黎昌抱，2001：92)[③]。大多数借词在进入英语时拼写形式无需多作改动，只需按照英语

① 萨丕尔，1921/1985，《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74。

② Mathews, P. H. 1997/2000.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③ 黎昌抱，2001，英汉外来词对比研究 [J]，《外语教学》(5)：92－96。

发音规则改变读音即可。但是也有少数借词在拼写上做了一些适合英语的改变，如 consultare（拉丁语）改为 consult，exclusioneum（拉丁语）改为 exclusion，exoticus（拉丁语）改为 exotic，politique（法语）改为 political。借词这一术语，很好地体现了西方语言之间词汇互借“保留语形、改变语音”的特点。

6.2.2 汉语引进外来语的方式——“转写”

汉语引进外来语的实质是用汉字转写外来语语音。与英语借词“保留语形、改变语音”不同，转写是“模仿语音、改变语形”。英汉语在外来语引进方式上的这一差异很好解释：汉语和印欧语分属不同语系，采用不同文字体系。如果说西方各语言在语形（文字）上有比较大的通约性，汉字与拼音文字之间语形互通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只能在语音上模仿西方词汇的发音，以汉字记音。但是，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字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言基本单位。汉语在用汉字转写外来语语音时，与字形紧密结合的语义因素无法被排除在转写过程之外。所以，以汉字转写外来语语音这一由音义关系主导的过程，附着在汉字字形上的语义因素也会参与进来，在语音背后起作用。

汉字总量有数万个，汉语音节总数（含四声）只有 1 300 余个（卢偍，2001：28－34）[①]，形成汉语普遍的同音字、近音字现象，使得汉语社团用汉字转写外来语语音时，对字的选择有比较大的余地。即使是纯写音外来语或外来语的纯表音部分，汉语也会尽量使语义成分渗透其中，使得汉语在用汉字转写外来语语音时，有以下两个强烈倾向：

（1）选用能起到提示该外来语意义的汉字。例如：

① 卢偍，2001，现代汉语音节的数量与构成分布[J]，《语言教学与研究》(6)：28－34。

蹦极	bungee
康乃馨	carnation
芒果	mango
俱乐部	club
敌杀死	decamethrin，又称 decis

图表 6.5　提示外来语意义的写音汉字

（2）选用一些寓意美好的汉字，以符合汉人喜欢吉祥、美好字眼的审美情趣。这一倾向在转写人名、地名、商品名时尤为突出。例如：

美利坚	America
太妃	toffee
奔驰	Benz
托福	TOEFL
金利来	Goldlion
香槟	champagne

图表 6.6　寓意美好的写音汉字

这种偏好有时甚至以对语音的偏离为代价，如“的确良”（Dacron）、“百事可乐”（Pepsi-cola）等。中国人对带有不祥字眼的外来语往往有排斥心理。如“马杀鸡”（massage）一词虽然出现很早，但始终没被汉语社团广泛接受，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按摩”这一翻译形式。

另外，汉语在转写外来语语音时，往往会给写音外来语添上表义成分。例如：

啤酒	beer
因特网	Internet
芭蕾舞	ballet
迷你裙	miniskirt
保龄球	bowling
摩托车	motorcycle

图表 6.7　写音外来语的表意成分

这样的写音外来语就是很多学者提到的“音意兼译词”，比较利于汉语社团接受。

6.2.3 英汉引进外来语的共同机制及其理据

语言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其核心问题是音、形、义三者的关系，在外来语吸收上也不例外。各种语言吸收外来语是为了引进新概念，填补本族语语义上的缺项。吸收外来语只能在语音和语形两方面做文章：英语以语形为契合点引进外来语；汉语以语音为契合点引进外来语。造成这种差别的直接原因，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提及（参见 6.2.2），此处不再赘述。

英汉语言系统音、形、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英语音、义结合紧密，是典型的“声音语”。作为语形载体的文字，在西方语言系统里的作用是“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索绪尔，1916/1980：51）[①]。西方语言由于音义关系紧密、形义关系松散，形成了“语音中心主义”传统，音义关系是语言的核心机制，而语形是语言系统中处于次要地位的要素。英语音、形、义三者关系可描写如下图：



图表 6.8 英语符号的音、形、义关系

（注：粗箭头表示语言符号的核心机制，赵宏，2009：23[②]）

汉语的音、形、义关系和英语不同。汉语基本单位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字，集音、形、义三大语言要素于一身。汉语符号的语音是概念的表征，文字（语形）同样也是概念的表征，而文字和语音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汉语符号有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符号内部关系，语音和语形都与语义联系密切，但如果说音义关系与形义关系哪一个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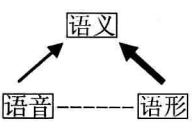
① 索绪尔，1916/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51。

② 赵宏，2009，英汉外来语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1－26、76。

汉语系统来说更重要，我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是形义关系。潘文国（2002：89）[①]表示：

> 人类认识世界，形成概念，再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可以有不同的途径。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正体现了两条不同的途径。一条走的是曲线，是从概念经过语音的中介再到文字，也就是说，与概念直接联系的是词的读音，然后再用文字把读音记下来；另一条走的是直线，从概念直接到文字，或者说，使用文字直接表示概念，语音只是在这过程中的附加物，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附加物，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字[②]。

我们在4.1.1和4.2.2以较大篇幅论证了语形（文字）在汉语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汉语词汇层面符号形义关系的重要性往往超过音义关系，居于主导地位，而语音则居于次要地位。可以说，汉语相对英语而言是一种“视觉语”。汉语符号音、形、义三者关系可描写如下图：



图表 6.9　汉语符号的音、形、义关系

（注：粗箭头表示语言符号的核心机制，赵宏，2009：23[③]）

在理清了英汉语言符号音、形、义之间的不同关系之后，我们发现：语形是英语三大要素中居于次要地位的要素，英语以语形为契合点引进借词；语音是汉语三大要素中居于次要地位的要素，汉语以语音为契合点引进写音外来语。外来语作为一种异质成分，均从语言系统音、形、义三个要素中处于次要地位的环节进入英汉两种语言，对语言系统的其他既有成分和既有关系干扰比较小，可以把语言系统自身和语言社团为引进外来语所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英汉语以对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者

① 潘文国，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89。

②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③ 赵宏，2009，英汉外来语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1－26、76。

干扰最小的方式引进外来语，符合语言系统运作的经济原则。这一引进外来语的经济原则可能是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规律。

第三节　英汉语对外来语的同化

从理论上讲，任何能用拉丁字母和汉字转写的语汇都能作为外来语进入英语和汉语。但是，外来语作为一种异质成分，在进入一种语言后，还存在着是否能被该语言接受的问题。有些外来语能够向接受语本身的机制靠拢，甚至成为该语言活跃能产的核心成分。同时，也有一部分外来语最终没能与接受语融合而渐渐被淘汰。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语言的内部机制如何作用在进入其中的外来语上，并决定外来语是否能最终被这种语言接受。

6.3.1　英语同化外来语的机制

Bussmann (1996/2000：287－288)[①]指出，西方语言的借词有狭义和广义两个不同的定义。狭义借词指“来自其他语言，但在借入语中完全词化了的词”，即已经完全被接受语同化的词，如源自拉丁语 pictura 的 picture，已经成为英语常用词汇的一员。广义借词则包括了狭义借词和“外国词”(foreign word)；其中，“外国词”指“源自其他语言，但尚未在借入语中完全词化的词”，即那些同化程度很低、使用频率不高、不被语言社团熟悉的借词，如 *Gemütlichkeit*。Bussman (1996/2000：169)[②]同时指出，狭义借词和外国词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评判标准具有很大的

① Bussmann, 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p. 287－288.

② Bussmann，同上，p. 169。

任意性。英语借词的情况也是如此。

英语中狭义借词、外国词及两者间模糊范围的存在，正好反映了英语对外来语同化的过程：外来语由异质的语言成分“外国词”，逐步转变为完全同化的“狭义借词”，成为英语活跃的成分。完全同化的借词往往丧失异质性，摆脱了词汇系统的边缘地位，发展了与典型词汇一样的功能，甚至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已经无法辨认其外来语的身份。但也有一部分借词在进入英语后，没有完成同化过程，始终保持其“外国词”的身份，或停留在同化过程的某一阶段，甚至遭到淘汰而为语言社团遗忘。

Bussmann（1996/2000：288）[①]指出，借入语对借词的同化从三个方面进行：书写形式、语音和语法。英语借词书写形式变化不大，同化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语法两方面，而以语音的改变最为显著。萨丕尔（1921/1985：177）[②]认为，“借用外国词总要修改他们的语音。一定会有外国音或重音上的特点不能适合本地的语音习惯。他们会改变得尽可能地不破坏这种习惯。时常会出现语音的妥协”。例如，来自法语的 garage ['gærɑːʒ]进入英语后，第一个元音的法语发音[ɑ]被英语发音[æ]取代。英语语形（文字）虽然是记音的手段，但英语也允许语音与语形完全分离的现象，即词的发音与拼写形式不一致，如 schlock [ʃlɒk]、chutzpah ['khʊtspə]这样违反英语音位规则的词在当代英语中也占了一席之地（李冬，1988/1996：126）[③]。借词的大量存在也是造成当代英语发音和拼写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因（何南林，2006：302）[④]。

英语借词语法上的同化，主要体现在借词的词根化和词缀化上，成为英语活跃的构词成分，参与英语新词的生产。例如，英语从法语“借”了足够多的带有后缀-ible 和-able 的形容词，如 agreeable、excusable、variable，并把这一构词方式与英语本族语动词组合，产生了 bearable、

---

① Bussmann, 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288。

② 萨丕尔，1921/1985，《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77。

③ 李冬，1988/1996，汉英词语理据比较[A]，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原载于《外国语》1988 年第 6 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123－130。

④ 何南林，2006，《横行的英文》[M]，济南：齐鲁书社，p. 302。

eatable、drinkable 等词汇。“英语词干 + 法语后缀”的例子还有 breakage、hindrance、murderous、bakery（布龙菲尔德，1933/1980：560）[①]。夸克等(1985/1998：2102)[②]表明，绝大多数英语前缀都来源于拉丁语、希腊语或法语。借词还可以作为词根和英语的前缀或后缀构成新词，如 humanness（拉丁语借词 + 英语后缀）、gently（法语借词 + 英语后缀）等。借词进入英语后，其词性也会灵活转化。例如，garage 刚进入英语时为名词“车库”，后来发展出动词用法，意为“存入车库”或“放入车库”。这也表明该借词的同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总的说来，英语借词的同化程度很高，英语核心词汇有相当一部分是借词，大量活跃的词素都是外来的构词成分。

6.3.2 汉语同化外来语的机制

汉语写音外来语和英语借词有很大不同，其同化机制也较为特殊。写音外来语在汉语的同化，体现出了下面一些显著的特点：

6.3.2.1 汉语对纯写音外来语的排斥和淘汰

虽然汉语存在不少写音外来语，但作为一种语义型语言，汉语对引进外来语的纯写音方式有强烈排斥的倾向。很多外来语在进入汉语之初，采用的都是纯粹记音的方式，但最终都被翻译形式所取代，如：

parliament	巴力门	国会
violin	梵婀玲	小提琴
president	伯里玺天德	总统

① 布龙菲尔德，1933/1980，《语言论》[M]，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560。

② 伦道夫·夸克、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1985/1998，《英语语法大全》[M]，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102。

（续表）

ink	因克	墨水
bank	版克	银行
Esperanto	爱斯不兰托	世界语
kangaroo	更格卢	袋鼠
inspiration	烟士披利纯	灵感

图表 6.10　汉语对纯写音外来语的淘汰

汉语外来语所谓“音译”、“意译”之间的竞争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王力（1938/1984：440）[①]注意到了汉语对纯写音外来语的排斥倾向，表示“中国是不大喜欢走音译的路的；许多舶来的词，起初是音译的，后来都被改为意译了”。王力（1957、1958/2004：601）[②]认为尽量利用意译是现代汉语新词产生的特点之一，并指出“意译是汉语的优良传统，因为它简单易懂，容易记忆，所以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意译和汉字的特性可能也有点关系”。万红（2007：5）[③]认为，汉语在吸收外来语的时候，“不习惯只把汉语的音节和汉字当作没有意义的记音符号来使用，也就是不习惯完全借音的借词形式。”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59：89）[④]和杨锡彭（2007：86－94）[⑤]认为写音外来语存在着较多的“歧异”现象，用汉字音译印欧语的词，往往一个词有若干种不同的译法，不容易统一。赵雄等（2001：32－33）[⑥]指出，汉语音译词与意译词之间的竞争“大多以音译词的失败而告终”。蔡基刚（2005：39）[⑦]统计了《新词新语词典》和《现代汉语新词词

① 王力，1938/1984，《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国语法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p.440。

② 王力，1957、1958/2004，《汉语史稿（第二版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p.601。

③ 万红，2007，《当代汉语的社会语言学观照——外来词进入汉语的第三次高潮和港台词语的北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p.5。

④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1959，《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p.89。

⑤ 杨锡彭，2007，《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86－94。

⑥ 赵雄、魏家海、吴新华，2001，汉英词的互借及同化[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6)：31－33。

⑦ 蔡基刚，2005，英汉词化对比与综合表达法[J]，《山东外语教学》(5)：35－40。

典》中收录的外来词，其中的音译词不足 1.5%。可见同化程度较高的写音外来语数量相当有限。

当然，也有很多写音外来语被沿用下来。但写音形式在有翻译形式存在的情况下得以沿用，往往有其特定的原因和背景。例如，“逻辑”(logic)一词曾被译为“论理”、“名学”、“理则”等，但这几个翻译形式均脱胎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无法精确全面地传达原词的内涵。经过几十年的竞争，“逻辑”最终被汉语社团广泛接受。又如，近年来“血拼”(shopping)一词在报刊网络等媒体广泛流行，而其翻译形式“购物”则受到冷落，似乎是逆流而动。但是“血”、“拼”二字所蕴含的语义，是对疯狂购物形象的描写，其语义效果新奇，反而更胜“购物”一筹，有助于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此外，陈光磊(2008：156)[①]认为，汉语社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趋洋趋雅的社会心理，而写音外来语带来的异国情调正好迎合了这种心理。因此，一些音译词在有意译词的情况下，又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如“的士”、“巴士”、“迷你”、“麦克风”等。甚至不少中国商家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崇洋心理，便于开拓国际市场，创制了一些“国产”写音外来语，如“雅戈尔”西装、“先施”百货公司、“嘉登道”大酒店等。

6.3.2.2 在纯写音外来语上添加或更换表义的构字部件

很多外来语最初进入汉语时使用纯表音方式转写，选用的汉字和引进的概念间并无任何联系。但是，随着这些外来语使用逐渐广泛，不少接受了汉语造字法的改造，逐步增加或改换了表义的构字部件。下面是一些写音外来语最初进入汉语的形式和同化后的形式：

最初形式	同化形式
师子	狮子
蒲陶	葡萄
流离/留离	琉璃

① 陈光磊，2008，《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 156。

（续表）

最初形式	同化形式
虎魄	琥珀
目宿	苜蓿
颇黎	玻璃
留连	榴槤(莲)
乌拉(鞋)	靰鞡
空侯	箜篌
末利/末丽	茉莉
披把	琵琶
马脑	玛瑙

图表 6.11　纯写音汉字表义部件的添加或更换

汉语密切的形义关系造成了独特的“望文生义”现象，上表最初形式的字面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外来语应该表达的概念，容易使人费解。它们都在融入汉语的过程中改变了纯粹写音的转写方式，添加或改换了表义的构字部件。这种转变有利于汉语社团的接受。

到了近现代，汉语在吸收外来语时直接“造字”，给现有汉字添加表义的组字部件，以实现对原词的音义兼写。潘文国(1993/2004：320)[①]指出，引进写音外来语时直接“造字”的方法运用得最多的是化学界、轻纺部门、动物学界等。大量的化学元素名称如“氖”、“氧”、“硼”、“钛”、“钠”，化合物名称如“氨”、“苯”、“烃”、“酚”，织物名称如“涤纶”，动物名称如“鲨”、“鸸鹋”、“猛犸”，植物如“柠檬”，药品如“吗啡”，日常用品如“咖啡”，都是通过给记音的汉字加上形旁，提示该外来语的语义信息，使得这些外来语被汉语社团广泛接受。王宗炎(1984/1997：120)[②]指出通

① 潘文国，1993/2004，《汉语的构词法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320。

② 王宗炎，1984/1997，评陈原《社会语言学》[A]，王宗炎《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C]（原载于《读书》1984 年第 12 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111－121。

过“造字”方法引进外来语的优点，其中一条就是：

> 看见了 tritium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液体？气体？固体？胶体？）；看见了“氚”，就知道跟“氢”、“氧”一样是气体。“氚”的信息量大，表达法较明确，这是无可争辩的。

6.3.2.3 汉语外来语写音成分的“字化”

徐通锵（2005：146）[①]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它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有一些与这种对应关系不一致的字或字组，因经历了特定方式的改造而实现了这种对应关系，这就产生了字化。”写音外来语大多是用“多个字·多个音节”表示一个概念，违背了汉字“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标准模式，所以不少写音外来语在进入汉语后，逐步向汉字标准的音、形、义模式靠拢，出现了外来语写音成分“字化”的现象。写音外来语字化的实质，就是外来语中本来只记音不表义的汉字，逐步发展了表义的功能，甚至成为汉语活跃的构词成分。如：

引进形式	同化后的功能
佛陀（Buddho/Buddha）	佛教、佛法、佛经、佛缘、佛手、立地成佛
巴士（bus）	大巴、小巴、冷气巴、豪华巴
酒吧（bar）	网吧、话吧、泳吧、氧吧、泡吧、吧台、吧女、吧街
啤酒（beer）	黑啤、干啤、鲜啤、扎啤、青啤、哈啤、啤吧
迪斯科（disco）	迪厅、蹦迪、迪妹
咖啡（coffee）	冰咖、清咖、奶咖
黑客（hacker）	红客、闪客
奥林匹克（Olympics）	申奥、奥委会、奥数、特奥、冬奥

①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汉语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p.146。

（续表）

引进形式	同化后的功能
的士(taxi)	的哥、的票、摩的、面的、残的
胎(tyre)	车胎、轮胎、爆胎、前胎

图表 6.12　写音外来语的字化

汉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参见徐通锵(2005：145－155)[①]、朱一凡(2007：7)[②]和万红(2007：54－55)[③]。完成了字化的外来语表音成分，就彻底接受了汉语的改造，取得了音义兼表的汉字地位。

6.3.2.4　写音外来语的韵律化

汉语词汇常规的韵律形式是单音节和双音节，多音节的语词往往要能分解为 1＋2(“小提琴”、“踩高跷”等)、2＋1(“词汇学”、“乒乓球”等)和 2＋2(“虎视眈眈”、“草木皆兵”等)的音节模式才能满足韵律上的稳定性。不少写音外来语进入汉语时，与汉语固有的韵律模式并不一致，韵律上的异质特征非常明显。它们在韵律上的同化表现为朝汉语固有的韵律模式转变，如：

最初形式	同化形式
阎摩罗(阇)	阎罗/阎王
阿罗汉	罗汉
僧伽蓝摩	伽蓝
波剌斯	波斯
苏尔奈	唢呐

① 徐通锵，2005，《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汉语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pp. 145－155。

② 朱一凡，2007，音译字字化的机制和动因 [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6－10。

③ 万红，2007，《当代汉语的社会语言学观照——外来词进入汉语的第三次高潮和港台词语的北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pp. 54－55。

（续表）

最初形式	同化形式
安石榴	石榴
频婆罗	苹果
波那娑	波罗蜜/木波罗
阿芙蓉	阿片/鸦片
助木剌	祖母绿/子母绿
多罗贝勒	贝勒
包衣阿哈	包衣

注：本表的用例多引自史有为(1991/2004)①

图表 6.13　写音外来语的韵律化

上表写音外来语的最初形式虽然更直观地反映了它们在输出语的读音，但同时也较多地偏离了汉语自身的韵律模式。它们在进入汉语之后，受到双音节基本音步的影响，逐渐改变了韵律模式，形成较为稳定的双音结构或 1 + 2、2 + 1 模式，成为被汉语社团广泛接受的语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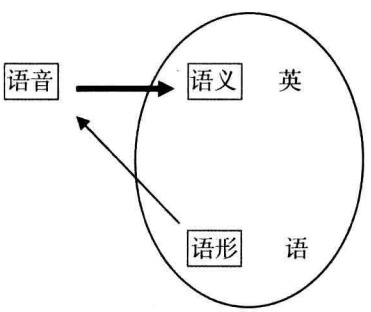
总的来说，写音外来语在汉语中的同化比英语借词困难得多。大量进入汉语的写音外来语最终被翻译形式取代而遭到淘汰，保留下来的写音外来语有一部分经过了构词法和造字法的改造，完全实现字化的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现代汉语中虽然活跃着为数不少的写音外来语，但是处于词汇系统核心地位、和语言社团生活密切相关的写音外来语占词汇系统的比重不大，而以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等领域的专业词汇居多。

6.3.3　英汉外来语同化的理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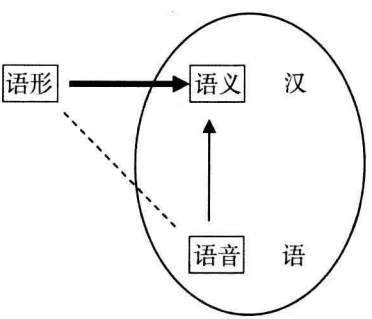
外来语的同化作用，本质是语言按照核心机制和内部规律对外来异

① 史有为，1991/2004，《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质成分进行的筛选和改造；同时，同化过程也是外来语由词汇系统的边缘成分向典型成分逐步靠拢的过程。英语核心机制是音义关系，同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借词音义关系的改造上，使借词向英语自身的音位规则靠拢。汉语符号内部同时存在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形式—意义关系，写音外来语的同化同时受到两者的作用，既要调整形义关系，又要调整音义关系。汉语词汇层面形义关系的重要性往往超过音义关系，成为汉语符号的核心机制。故而，写音外来语的同化主要体现在对形义关系的改造上，使写音外来语向形义结合的方向发展。此外，汉语的韵律模式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充满异质性的写音外来语朝着汉语固有的韵律模式发展。英汉语引进和同化外来语的机制如下：



图表 6.14　英语吸收借词的模式(左图)



图表 6.15　汉语吸收写音外来语的模式(右图)

(注：两图中粗箭头表示语言符号的核心机制，也是同化作用发生的理据)

语言同化外来异质成分的过程是由语言符号的核心机制决定的。英语符号核心机制是任意性的音义关系，在对外来语同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对异质成分较弱的排斥倾向，允许违反音位规则的外来语存在。汉语符号的核心机制多为形义关系，汉语的形义结合具有很高的理据性，体现出对异质成分强烈的排斥倾向，淘汰了大量的纯写音外来语，对保留下来的纯写音外来语也尽可能多地向形义结合的方向加以改造。英汉语言符号理据程度的差异造成了两者同化外来语的不同情况。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大规模使用的“象形取义”的自源性表意文字，具有很强

文字理据性。李冬(1988/1996：128)[①]指出，“对于通晓汉语书写形式的人来说，大多数汉字不仅是音节的符号，而且是意义的标记。当新词出现时人们习惯地期待这一新词语应有一定的理据”。这就是汉语社团普遍的“望文生义”、“顾名思义”现象。汉语高度的文字理据使得人们总要想“巴力门”是什么“门”，“马杀鸡”是什么“鸡”，使得汉语呈现出对写音外来语强烈的排斥倾向，而在同化过程中使不少写音外来语记音成分发展了表意功能。

影响英汉外来语同化速度和程度的另一因素是外来语使用的频率。那些使用频繁的外来语，同化的速度比较快，同化的程度也比较高。事实上，语言系统的很多现象都与使用频率有关，如语法化过程中“使用频率高的语言成分在形式上缩略”(Haiman，1985)[②]；词化过程“一般说来一个词语越是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越是容易词化”(蔡基刚，2005：39)[③]。这些相关的语言现象，很能启发我们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当代认知语言学发展了“语言使用模型”理论(Usage-Based Model)(Croft & Cruse，2004/2006：291－327)[④]，认为“语言使用和语法知识之间的关系在图式化的各个层面都受到语法构式的使用频率的影响”(束定芳，2006：导读 25)[⑤]。另外，由于外来语进入语言系统时间不同，每个外来语同化速度、程度不一，从共时角度看，语言中分布着处于同化过程各个阶段的外来语。它们是我们了解词汇系统内部机制的窗口。

① 李冬，1988/1996，汉英词语理据比较[A]，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原载于《外国语》1988 年第 6 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123－130。

② Haiman，John.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③ 蔡基刚，2005，英汉词化对比与综合表达法[J]，《山东外语教学》(5)：35－40。

④ Croft，William & D. Alan Cruse. 2004/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291－327.

⑤ 束定芳，2006，导读[A]，Croft & Cruse《认知语言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 25。

第四节　小结

本章对比英语借词和汉语写音外来语在引进和同化方面的特点和共同机制，揭示这些异同背后的理据因素，以及英汉外来语现象和其理据程度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介绍英汉外来语的概况。英语借词和汉语写音外来语分别是英汉语最重要的外来语形式。英语自发展早期就开始大规模吸收借词，借词占词汇总量的比重超过一半，数量则至少达到数十万。英语借词绝大多数来自印欧系语言内部，以法语和拉丁语最多。汉语外来语形式多样，主要有写音、写形和写义外来语三大类，本研究探讨的主要是写音外来语。汉语写音外来语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和西域的交往中就大量引进，后又借佛教文化的引进、与蒙满等少数民族的交往、近现代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的机会大量进入汉语。但是，汉语中保有的写音外来语与英语借词相比，数量相差悬殊，一般认为仅在数千到一万个左右，大多来自西方语言。

第二节对比英汉语引进外来语的方式及其共同机制。英语引进借词的方式是“借贷”，即引进借词在输出语的拼写形式，再按英语的发音规则改变借词的读音。汉语引进写音外来语的方式是用汉字转写外来语语音，但是由于汉字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汉语基本单位，附着在字形上的语义因素总是会渗透到语音转写的过程中，在引进外来语时尽量选用和外来语语义有联系的汉字及“音义兼译”。英汉语引进外来语的不同方式是由英汉语符号不同的音、形、义关系造成的。在构成语言符号的这三个要素中，语形和语音分别是英语和汉语较为次要的要素，而英语和汉语分别以语音和语形为契合点引进外来语。这种引进外来语的方式能使对语言系统既有的各种关系和使用者的影响降到最低，符合语言系统运作的经济原则。

第三节对比英汉外来语在进入语言系统后同化的不同情况。英语

对借词的同化主要体现在借词的语音改变和词素化方面；英语大量词根和词缀都是外来的，说明英语借词同化程度很高。汉语写音外来语的同化主要体现在对纯写音外来语的筛选和淘汰、为转写外来语语音的汉字添加或更换表义的成分、外来语写音成分的字化和写音外来语的韵律化这几个方面。汉语完全字化的写音外来语非常有限，总体上同化程度不高。决定外来语同化过程的理据因素是语言符号的核心机制。英语符号的核心机制是任意性的音义关系，故而对借词语音的改造十分容易。而汉语词汇层面起决定作用的符号核心机制多是理据性很高的形义关系，要求转写语音的汉字字义和外来语整体意义之间有一定的联系，造成大量写音外来语无法满足这一要求而最终被汉语淘汰，保留的写音外来语不少也要经过形义关系的改造。另外，使用频率也是外来语同化重要的理据因素，那些使用频繁的外来语，往往也是同化进程最快、同化程度最高的。

在对英汉两种语言在外来语数量、来源、引进方式、同化机制和理据因素这几个方面进行对比之后，我们将英汉外来语的主要异同列表如下：

对比项目	英语	汉语
外来语的主要形式	借词	写音外来语
外来语数量	占词汇总量比重大，至少有几十万个	占语汇总量比重小，约为数千至一万个
外来语来源	绝大多数来自印欧语系内部	大多来自西方语言
主要引进方式	“借贷”：直接借用语形	转写：用汉字转写语音，在模拟语音时尽可能考虑语义因素
主要同化机制	改造借词的音义关系	改造写音外来语的形义关系

（续表）

对比项目	英语	汉语
英汉外来语吸收的理据因素	1. 吸收的理据：引进新概念，填补语言词汇系统的语义缺项 2. 引进的理据：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外来语以对语言系统触动最小的方式进入接受语 3. 同化的理据：语言核心机制对外来语的筛选和改造；语言核心机制的任意性/理据性对外来语的同化起决定作用；同化的速度、程度和外来语的使用频率相关	

图表 6.16　英汉外来语对比表（赵宏，2009：26[①]，稍作改动）

从共时层面看，语言的词汇大体上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词汇；(2)合成词汇和(3)外来语。共时词汇系统整体的理据程度取决于这三部分在共时语言系统中保留的理据性及它们在词汇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和重要性。一般说来，一种语言词汇系统理据性高的部分占词汇总量的比重越高，在词汇系统中的地位越重要，该词汇系统整体的理据性就越高。反之，一种语言词汇系统中理据性低的部分占词汇总量的比重越高，在词汇系统中的地位越重要，该词汇系统整体的理据性就越低。在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比了英汉单纯词、合成词和外来语的理据性、数量、重要性之后，我们可以将英汉共时词汇系统的理据性总结如下：

	英语	汉语
（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词汇的理据性	本族语单纯词，处于词汇系统的核心地位，理据程度很低	独体字，有数百个，在词汇系统中地位重要，理据程度很高
合成词汇的理据性	复合词和派生词，数量虽然较多，但处于词汇系统的次要地位，有很高程度的合成理据	合体字和双音词，占词汇系统的绝大多数，有很高程度的合成理据

① 赵宏，2009，英汉外来语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21－26、76。

（续表）

	英语	汉语
外来语的理据性	借词，至少有数十万个，占词汇总数比重很大，不少已成为基本词汇，理据性很低	写音外来语，约为数千至一万个，占词汇总量的比重很小，基本处于词汇系统的边缘地位，理据性很低
词汇系统整体的理据性	理据性较低	理据性很高

图表 6.17　英汉共时词汇系统理据性对比表（赵宏，2009：68[①]；稍作改动）

如上表所示，英语共时词汇系统中理据性低的单音节词处于核心地位，借词数量庞大，很多借词已经成为基本词汇；而理据性较高的复合词和派生词虽然数量多，但处于词汇系统的次要地位，所以整体的理据性比较低。相比之下，汉语共时词汇系统中理据性高的字和词占词汇总量的绝大多数，理据性低的写音外来语不仅数量少，也多处于词汇系统的边缘地位，整体的理据性很高。语言是人类历史和经验的积累，是有现实和物质基础的人文现象，一切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的形成都有理可据，理据性是人类语言的根本属性。但是，从语言系统内部来看，英语词汇是一个任意性主导的共时系统，而汉语词汇则是一个理据性主导的共时系统。

① 赵宏，2009，英汉词汇系统理据性对比[J]，《华文教学与研究》(4)：68－79。

第七章

英汉词汇的经济理据

人类的语言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语言理据研究不仅要探讨语言系统内部的种种理据因素和理据关系，还要关注外部因素与语言系统、语言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影响语言的外部理据因素很多，语言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和语言社团都会对一种语言的词汇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历时角度入手的词源理据、社会因素造成的俚俗理据、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理据，都受到语言学者的广泛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我们在外部理据研究方面，选取对共时词汇系统影响较大、近年来又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经济理据和认知理据进行讨论，而对以往研究较多的词源理据等不再辟专章讨论。

第一节　语言的经济性

7.1.1　语言经济原则概述

对于语言经济性问题的探讨，最早出现在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

George Kingsley Zipf（1902－1950）出版于 1936 年[①]和 1949 年[②]的两部专著中。Zipf 认为，语言作为人类所有行为的一种，必然遵守人类行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姜望琪，2005：87）[③]的经济准则，这一原则称为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Zipf（1936：19）[④]指出：

> 人类语言行为中所有的言语要素和语言结构都由语言的经济性这一根本法则驱动和主导。经济原则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语言形式和语言行为的均衡。

Zipf 从词的使用上对省力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他认为，用词的经济性需要从说话人和听话人两方面考虑。从说话人的角度看，用一个词表达所有的意义是最经济的，他把这种力量称为“单一化力量”（the force of unification）；而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这种“单一词汇”力量是最费力的，因为他无法确定这个单一的词在什么场合下表示何种意义。对听话人来说，每个词都只有一个意义才是最省力的，这种力量叫做“多元化力量”（the force of diversification）。单一化力量和多元化力量相互冲突竞争，达到均衡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省力（Zipf，1949：20－22）[⑤]。Zipf 的理论一出现，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已经走出了语言学范围，进入了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等众多研究领域。

Zipf 之后对语言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Andre Martinet）。马丁内的《语音演变的经济原则》（*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etiques*，1955）将语言的经济原则作为

---

① Zipf，George Kingsley. 1936.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Philology* [M]. 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pp. 20－22.

② Zipf，George Kingsley.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 [M]. New York：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③ 姜望琪，2005，Zipf 与省力原则[J]，《同济大学学报》(1)：87－95。

④ Zipf，George Kingsley. 1936.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Philology* [M]. 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p. 19.

⑤ Zipf，George Kingsley.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 [M]. New York：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语音演变的基本规律提出，但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如马丁内(1962)[①]，经济原则则被视为“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principe de fonctionement)(参见周绍珩，1980：7[②]；徐志民，1994：64[③])。马丁内(1984：49)[④]把语言的经济原则看做理解语言运转和演变的一般框架，认为这一框架表现为一个语言的根本矛盾：

> 一方面，交际需要要求更为精确，更为专门的表达手段，另一方面，又存在一种经常性的在交际时减少力气消耗的倾向。这种倾向使交际手段变得不太精确，不太专门了，并使交际对语言交流的环境可以为听话人提供的信息具有更大的依赖性。这实际上就是人们曾经称之为“省力原则”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它并不像一些人有时假装认为的那样意味着惰性的胜利，而是力气和成效之间达到的平衡。

马丁内把 Zipf 提出的“单一化力量”称为“省力原则”，把“多元化力量”称为“交际需要”，认为两者是构成语言经济的主要因素(参见韩芸，2007：54)[⑤]。同时，他对语言经济原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深入到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层面，指出使用频率是语言重要的经济因素。

此后，经济原则由于较多地考虑了语言实际使用的情况，成为语用学家关注的对象。Grice (1978)[⑥]的会话含义理论、Leech (1983)[⑦]的篇

---

① Martinet, Andre. 1962. *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② 周绍珩，1980，马丁内的语言功能观和语言经济原则[J]，《国外语言学》(4)：4－12。

③ 徐志民，1994，马丁内及其语言理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3)：62－66。

④ 马丁内，1984，语言学中的功能和结构[J]，马新民译，《法国研究》(2)：45－50、52。

⑤ 韩芸，2007，“经济原则”发展概述[J]，《中国外语》(6)：53－56。

⑥ Grice, H. P. 1978. Further notes on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P. Cole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Pragmatic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13－128.

⑦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章修辞理论、Horn (1984)[①]的会话含义原则和 Sperber & Wilson (1986/2001)[②]的关联理论都论及语言的经济性和经济原则。向明友(2002:309－316)[③]认为传统的语言经济理论无法有效地指导和解释动态的、综合的言语交际活动,提出了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和配置最优化为目标的"新经济原则",用以指导现实的言语交际行为。

7.1.2 经济理据与英汉词汇系统

本研究主要关注经济性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理据因素,对英汉词汇系统的影响。经济性对语言系统产生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方面:(1)协调语言系统的各种成分和关系;(2)协调语言系统和使用者的关系。

经济性是语言调节各种结构和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语言系统的结构通过各种关系组合在一起,语言的运作和发展,就是这些结构和关系间的相互冲突和协调,使语言系统自身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例如,英语借词和汉语写音外来语均以语言系统最薄弱的环节为契合点进入接受语,以使外来异质成分对语言系统既有成分和既有关系的影响降到最低(参见本书 6.2.3),便是经济原则协调作用的一个例证。一般说来,一种语言不可能出现完全意义上的同义词,即两个意义和功能一模一样的结构;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其中一个必然会遭到淘汰,这也是语言经济性作用的结果。

语言使用者与语言系统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通过使用频率这一因素

① Horn, L. R. 1984. Toward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 [A]. In D. Schiffrin (ed.) *Meaning, Form and Use in Context: Linguistic Applications* [C]. pp. 11－42.

②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1986/2001.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③ 向明友,2002,论言语配置的新经济原则[J],《外语教学与研究》(5):309－316。

实现的。许多语言学者(参见 Haiman, 1985[①])都注意到了使用频率与语言形式的反比关系,即使用频率越高的语言成分,在形式上也往往更趋于简单。如英汉语表达基本概念的词大多是结构最为简单的单纯词;使用频率较高的语法符素的平均长度,要比使用频率较低的词汇符素短得多(参见徐志民,1994:64-65)[②]。在语法上,那些无标记的形式往往是使用频率高的结构。这些语言现象都是使用者与语言系统互动的经济原则造成的。

我们认为,经济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英汉词汇系统的面貌,是词汇系统重要的外部理据因素。Haiman (1985/2009: 157)[③]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语言的经济性,与其图式的经济性一样,与象似性背道而驰,加速了象似性的磨损。"Haiman 将语言的经济性和象似性对立起来,这似乎与我们把经济性看成理据因素的观点格格不入。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Haiman 所说的经济性和本研究作为理据因素的经济性并非同一个概念。Haiman 的经济性,指的仅仅是语言形式上的简化,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仅指语音形式的简化。由于主导英语等印欧语的音义关系呈线性排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形式上简化的结构必然象似性较低(拟声词等除外)。而我们所说的经济性,不仅指静态的语言形式上的简化,还包括了动态的语言系统内部关系的经济性,以及使用者和语言系统互动关系的经济性,范围比 Haiman 的经济性大得多。此外,汉语书面符号的二维结构不同于西方语言符号的线性排列,形式简单的符号象似性不一定很低。例如,独体字是汉语形式最为简单的符号,却多为象形字和指事字,是对现实世界的直观表征,象似性程度高于形式更为复杂的合成符号。

词化现象和外来语吸收,是受经济理据驱动的词汇现象。下面两节,我们将就这两种现象进行英汉语间的对比研究。

---

① Haiman, John.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② 徐志民,1994,马丁内及其语言理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3):62-66。

③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157.

第二节　英汉词化现象对比研究

7.2.1　词库

“词库”(lexicon)这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景和研究目标下，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最普遍的情况下，词库是词汇的同义词，指一种语言中所有词的总和，或指词典(含某一专业领域的术语)中词条的总和(参见Crystal，1992：227－228[①]；Bussmann，1996/2000：280[②]；均为两部辞书 lexicon 词条的第一个定义)。但是从理论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理解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Neef & Vater (2006：27－55)[③]梳理了“词库”概念在现代语言学中发展的轨迹，认为词库理论主要有两个流派：结构主义的词库理论和转换生成语法的词库理论。最早对词库进行论述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者是布龙菲尔德(1933/1980：338)[④]：

> 每一个词素的形类是任意地决定的。全面地描写一种语言需要把每一个形式列表，它的功能既不是由结构也不是由标记符号所决定的；因而，这个语言的描写要包括一个词汇

① Crystal，David. 1992.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Z].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27－228.

② Bussmann，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280.

③ Neef，Martin & Heinz Vater. 2006. Concepts of the lexicon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 In Dieter Wunderlich (ed.) *Advances in the Theory of the Lexicon* [C]. Berlin：Mouton de Gruyter. pp. 27－55.

④ 布龙菲尔德，1933/1980，《语言论》[M]，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表[①],或者词素的清单,这张单子要标明每一个词素的形类,并且还得列出所有复杂的形式,它们的功能怎么说都是不规则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将语言系统分为两个部分,即规则的部分和不规则的部分。规则的部分指通过规则(词法和句法)生成的结构;而不规则的部分则是任意的、特异性的(ideocratic),不能通过规则生成。词库就是不规则的部分。结构主义的词库定义影响很大,为很多学者接受。如Anderson (1985: 3-5)[②]将词库看做"语言中约定俗成的形式—意义结合体(或语言符号)的清单",故而词库中的词项具有特异性(idiosyncrasy)和不可预测(unpredictable)的典型特征。以结构主义的观点看,词库中的典型词项是由词素(morpheme)构成的,包括自由词素(即单纯词)和非自由词素(词根和词缀)。早期的转换生成语法沿用了结构主义的词库概念,但到了后来,则将词库的范围扩大到语法中的"前句法成分"(pre-syntactic component),至少包括了结构主义定义的"不规则的"词库以及词法和部分语音规则,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句法内容(Neef & Vater, 2006: 51)[③]。

近数十年来,心理语言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提出了"心理词库"的概念。心理词库不仅研究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将语言使用者的因素考虑进来,"研究词是怎样存储在记忆里和怎样被提取的"(桂诗春,2000: 250)[④]。董秀芳(2004: 10)[⑤]在定义词库时就参考了心理语言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词库是"一个语言中具有特异性的词汇单位的总体,存

---

① 即本文所说的"词库"。

② Anderson, Stephen R. 1985, Typological distinctions in word formation [A].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56.

③ Neef, Martin & Heinz Vater. 2006. Concepts of the lexicon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 In Dieter Wunderlich (ed.) *Advances in the Theory of the Lexic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27-55.

④ 桂诗春,2000,《新编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250。

⑤ 董秀芳,2004,《汉语的词库与词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 10。

储在语言使用者的头脑中，所以又称心理词库。词库中的项目都是语言中意义不可预测的成分，具有不规则性，表现出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任意性的或非常规的联系，所以需要以清单方式一个一个地存储，需要时就可以直接从这个清单中提取”。

各家对词库看法的不一致源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研究目的。但是由此造成的问题是，在划定词库范围时，对什么样的语言结构应该划入词库，也往往存在很大的争议。可能被作为词项划入词库范围的语言结构包括词素（morpheme）、词（word）、词位（lexeme）和成语（idiomatic phrase）。如果从具有特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角度来看，则只有词素（含单纯词）能成为词项；而如果从逐个记忆的角度看，则合成词和成语也能被列入词库的范围。目前认知语言学将词库、词法和句法看成一个没有清晰界限的连续体（Langacker，2007：xiii）[①]，为探讨词库范围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我们认为，词素、词和成语组成一个由典型词项过渡到非典型词项的连续体，特异性和可预测性逐步减弱，逐渐由不规则的语言成分转变为规则的语言成分。至于词位，它并不是语言的实体结构，而是一个抽象概念（如 find、finding、found 三个词构成一个词位）。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不关注词位与词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而将它们大体等同起来。

7.2.2 词化

7.2.2.1 词化的概念

“词化”这一术语与词库关系密切，有两层含意。从共时角度看，词化指“一个词作为常规成分被某一语言的词库接纳，可供使用时从词库

① Langacker, 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cke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xiii.

中提取"(Bussmann，1996/2000：279)[①]；或指"对概念范畴进行编码"(Briton & Traugott，2005：18)[②]；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范畴化的结果"(蔡基刚，2008：248)[③]。而从历时角度看，词化指"语言材料演变为词项或通过吸收语言材料形成词项"(Hopper & Traugott，1993/2001：223－224[④]；Packard，2000/2001：216－217[⑤]；王文斌、周慈波，2004[⑥])；或指"语义变动的过程(和结果)，完全词化后的语言单位，其最初的意义无法从其组成成分中直接看出"(Bussmann，1996/2000：279)[⑦]。由此可见，词化在共时层面指用词项对概念进行编码，在历时层面指各种语言材料演变成词项的过程和结果。

当代语言学界对词库和词化的看法已经和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认知语法认为词库、词法、句法构成一个连续体，三者没有清晰的界限(Langacker，2007：xiii)[⑧]。Briton & Traugott

---

① Bussmann，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279.

② Briton，Laure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8. 原文为：The coding of conceptual categories.

③ 蔡基刚，2008，《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 248。

④ Hopper，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2001. *Grammaticalization* [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p. 223－224.

⑤ Packard，Jerome L. 2000/2001.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p. 216－217.

⑥ 王文斌、周慈波，2004，英汉"看"类动词的语义及词化对比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6)：412－419。

⑦ Bussmann，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279.

⑧ Langacker，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cker* [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xiii.

(2005：18)[①]认为“词库不仅仅是一个离散的、完全固化的词项清单，而是一个由固化程度不一、约定俗成程度不一和能产性程度不一的词项构成的连续体”。词化过程具有多样性，可能发生在语言不同的层面：某一复杂的概念可以直接词化成词项，也可能在语言中表达为一个复杂结构，再渐渐词化成词项；词库外的各种语言材料可以词化成词项；而进入词库后的词项，自身还有可能进一步词化，形成词化程度更高的词项；或者与其他语言材料结合，进入新的词化进程。所以，词库中既有具备特异性特征，语义完全不可预测的高度词化的典型词项（如单纯词），也有词化程度较低的词项（如合成词甚至成语）。

7.2.2.2 词化程度的判断标准

词库中充满词化程度不一的许多语言结构，既有高度词化的单纯词，也有受词法支配的合成词，还有介于词法和句法之间的成语。另外，语言中还有受句法支配的词化程度更低的短语和句子。由于语言结构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判断某一语言结构的词化程度，往往颇令人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以下的几个标准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

※ 表达法标准

语言形式的某些特征有助于我们判断词化程度的高低，如可以看其属于“综合型表达法”（synthetic expression）还是“分析型表达法”（analytic expression）。许余龙（2002：127）[②]认为，“对于同样一个在语义上较为复杂的概念，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那么这种表达法称为综合型表达法；如果要用一个短语来表达，那么这种表达法称为分析型表达法。综合型表达法是一种词化了的表达法”。如英语 foul 是词化了的综合型表达法，而 cause ... to become dirty 是分析型表达法；同样汉语“驷”是词化了的表达法，而“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或“四匹马驾的车”则是分析型表达法。

---

① Briton, Laure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8.

② 许余龙，2002，《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127。

综合型表达法往往是句法上独立的表达法，即具有句法上的一体性，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王文斌(2005：67)[①]认为，“句法上独立的语言形式词化的程度，比中间能插入其他成分的语言形式词化程度高”。英语的词和汉语的字都具备了句法上的一体性，中间不能再插入其他成分，词化程度比短语等结构高。但是，汉语中有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即联绵词和写音外来语等虽然被普遍看做高度词化的表达法，但却存在一些由它们转化而来的“离合词”，如：

幽默	幽它一默
慷慨	慷他人之慨
咳嗽	咳了两声嗽(巴金)
滑稽	滑天下之大稽
荒唐	荒天下之大唐(梁羽生)
OK	O了K了

图表 7.1　汉语离合词

而具有内部形式、能够预见意义的合体字，却更具备句法上的独立性和一体性。音义关系主导的联绵词、写音外来语与形义关系主导的合体字内部机制不同，这表明汉语符号受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共同作用，体现出比西方语言更加复杂的符号关系，这种情况尚不能通过西方语言的词化理论得到圆满的解释。

※ 语义透明度标准

如果一个语言形式具有内部结构(internal structure)，可以进一步切分为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则可以用语义的透明度/隐晦度(transparency/opacity)作为判断词化程度的标准。由语法规则生成的语言形式，整体意义可以根据各部分意义推断出来，因而意义是透明的、可预测的。而发生了词化的语言形式，其词义透明度会降低，隐晦度上

① 王文斌，2005，英语词化探析 [J]，中国外语(5)：64－68。

升，渐渐脱离了语法规则的控制。王文斌(2005：68)[①]将“语义上的一体性”作为判断词化是否发生的标准之一；董秀芳(2002)[②]和李晋霞、李宇明(2008：60－65)[③]也主要以词义的透明度作为判断词化程度的标准。例如，“白字”并非白色的字，而“白衣”指白色的衣服，就说明“白字”的词化程度比“白衣”高。反观不具有内部结构的语言形式，其词化程度比具有内部结构的语言形式高，如英语单纯词和汉语独体字分别是两种语言词化程度最高的部分。

董秀芳(2002：40)[④]指出词化过程中语义变化最常见的几种形式：(1)部分语义弱化或脱落。如“窗户”，本来指窗和门，如“每室四户八窗，窗户皆相对”，后来“户”的意义逐渐弱化脱落，只保留了“窗”的意义。(2)发生了隐喻(metaphor)引申或转喻(metonymy)引申。如“牺牲”，本来指古代祭祀用的家畜，后来通过隐喻机制，转指受到损害的人或事物。又如“首饰”本来指妇女头上戴的装饰品，通过转喻机制而变为身上各个部位佩戴的装饰品了。(3)由转类(conversion)引起的语义转变。如“物色”，最初指祭祀用的牲畜的毛色，如“乃命宰祝，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礼记·月令》)，后来通过隐喻机制转而指人或事物的形貌特色，如“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汉书·逸民传·严光》)，最后又发展出动词的用法，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寻找”。

英语中也能找出很多通过这几种途径词化的例子。例如，“hot dog”并不是“发烫的小狗”，而是一种面包，其间就有隐喻机制的作用；“greenhand”不是“绿色的手”，而指缺乏经验的人，其词化受隐喻和转喻机制的共同作用。转类法是英语大量使用的构词法，其用例有时更是出人意料，往往有强烈的修辞效果。例如：

[7.1] Mother *onioned* the sausage.（用洋葱调味）

---

① 王文斌，2005，英语词化探析 [J]，中国外语(5)：64－68。

② 董秀芳，2002，《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p.40。

③ 李晋霞、李宇明，2008，论词义的透明度 [J]，语言研究(3)：60－65。

④ 董秀芳，2002，《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p.40。

They will *Haagen-Dazs*.（吃哈根达斯冰淇淋）

He *Shylocked* the poor people.（像夏洛克一样敲诈穷人）

英语似乎大多数名词都可以转为动词使用。

通过上面几种方式发生了语义改变的语言结构，其语义透明度均有所降低而趋向隐晦，词化程度则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使用频率标准

词化程度与使用频率密切相关。蔡基刚(2005：39)[①]指出，最常用的概念范畴最容易发生词化，使用频率高的语言形式词化程度也高。英语序数词中，first、second、third 使用频率最高，因而是词化程度高的单纯词；而其他序数词如 fourth、fifth 等则是具有内部结构的派生词。英汉语表达基本概念的词往往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形式一般说来也比其他词汇更为简单，词化程度更高。例如：

sun	日
moon	月
man	人
sky	天
dirt	土
talk	言
hand	手
mom	母
bird	鸟
water	水
hill	山

图表 7.2　英汉基本概念词

可以说，使用频率是影响词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① 蔡基刚，2005，英汉词化对比与综合表达法[J]，《山东外语教学》(5)：35－40。

此外，某一概念范畴如果和语言使用者关系密切，使用频率很高，体现在词汇系统上，就会形成一个词化程度较高的语义场，包括一系列能够细致准确地表达语义差别的词汇。例如，汉语社团历来重视宗族观念和宗亲关系，在早期就发展了高度发达的亲属词系统，细致地区分了种种亲属概念。《尔雅·释亲·宗族》中，对男性直系后代的称谓就有“子”（第二代）、“孙”（第三代）、“曾孙”（第四代）、“玄孙”（第五代）、“来孙”（第六代）、“昆（晜）孙”（第七代）、“仍（礽）孙”（第八代）、“云孙”（第九代）之多。目前汉语使用的亲属词系统仍然比英语等西方语言复杂得多。反过来，如果一种语言在某一范畴内发展了表达精细、区别度高的一系列词汇，则它在这一范畴的词化程度就比较高。例如，在表示“用热油烹制食物的方式”时，汉语有“煎”、“炒”、“炸”、“溜”、“爆”等的分别，而英语只有 fry 一词；在表示“在火上直接加工食物的方式”这一概念范畴时，英语有 toast、roast、bake、grill、barbecue、baste 等，而汉语仅有“烘”、“烤”和“焙”三词。这说明，汉语前一范畴词化程度较高，而英语后一范畴词化程度较高。英汉语的这一差异是由语言社团使用不同烹饪方式的频率造成的。

7.2.2.3 表达简约与记忆简约的互动

词化是受经济原则支配的语言现象。蔡基刚（2008：129）[①]认为“词化的根本动因是语言内在的经济原则”。故而词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表达的简约化，把复杂的概念用简约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词化程度越高，语言形式越简约。词化程度高的词汇，如英语中的 man、sun、walk、red 都是单音节词，汉语的“人”、“日”、“行”、“赤”构成简单，它们都是高度简约的表达法。

但是表达简约只是词化的一面。高度词化所形成的简约表达背后，是语言社团沉重的记忆负担。词化程度高的词项都具备语义隐晦、特异性强和不可预测的特征，需要语言使用者逐个记忆。例如，英语的单纯词，语音与语义之间的联系有很高的任意性，即使语义上有联系的词，如

① 蔡基刚，2008，《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 129。

pork、beef、mutton、venison，car、bus、jeep、van、truck、taxi 等，形式上也毫无关系。同时，由于词化程度高的语言更多通过增加词项（如单纯词）来扩大词汇，而较少利用现有词项产生分析型表达法，其词库也往往规模更加庞大。例如，表达一年的十二个月，汉语采用从一到十的数词和“月”这些原有的词项组成“一月”、“二月”等分析型表达法，没有向词库中添加新的词项；而英语采用 January、February 这样的综合型表达法，无疑增加了词库的规模，需要语言社团付出更多记忆加工。词化程度无限提高的词汇系统，必然会走向经济原则的反面，给语言社团带来沉重的记忆负担。

表达简约和记忆简约是两股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力量，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塑造着语言的词汇系统。一方面，语言社团要以简洁明晰的形式表达其生活和实践中的概念，特别是最重要最常用的概念；另一方面，语言社团要付出较少的记忆和认知加工便能掌握表达概念的词汇。一种语言的词化水平，实际上是表达简约和记忆简约这两个相反的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李晋霞、李宇明（2008：64）[①]认为，“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影响着词化进程，一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要素与词义之间的联系逐渐淡化乃至消失，词义越来越不透明，结构关系也随之模糊；另一种是，为便于理解与使用，减轻词义记忆负担，词义又要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词的内部结构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可分析性”。一个高效的词汇系统，一方面要提高词化程度，扩大词库规模，实现表达简约，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有效控制词化程度，降低语言社团的记忆负担，实现记忆简约，便于语言社团掌握和应用。可以说每一个成熟高效的词汇系统，都会将词化程度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实现表达简约与记忆简约的平衡。

当代英语和汉语词汇系统，都是经过长期发展的较为成熟的词汇系统。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表达简约和记忆简约如何影响英汉词汇系统的发展。

---

① 李晋霞、李宇明，2008，论词义的透明度［J］，语言研究(3)：60－65。

7.2.3 表达简约的作用

7.2.3.1 词项词化程度的提高

用更简单的语言形式表达更多的意义，是词化程度提高的原动力，英语和汉语词汇都出于表达简约的需要不断提高词化程度。以往的词化研究在这方面探讨颇多，这里我们仅举几例说明问题。

英语大量词汇的发展都经历了词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例如，现代英语单纯词 neighbor 在古英语中是一个复合词 nēahgebūr，表示 near dweller；nice 源自拉丁语的 nescius，其中 ne 表示 not，scire 表示 to know；nest 由原始印欧语中分别表示 sit 和 down 的两个词素构成；lord 是由古英语时期的 loaf 和 warden 两个词词化而来的。Bauer (1983：48－65)[①]将英语词化的类型分为 5 种，即音系词化、形态词化、语义词化、句法词化和混合词化。王文斌(2005：65－67[②]；2005：202－213[③])认为 Bauer 的句法词化未区分短语词化和句子词化，而混合词化概念含混，数量很少，故而将英语的词化现象分为音系词化、语义词化、形态词化、短语词化和句子词化 5 类。现各举一例如下：

	词化前	词化后
音系词化	fore + head	forehead
语义词化	black + mail	blackmail
形态词化	mob + -ive	mobile

① Bauer, Laurie. 1983.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8－65.

② 王文斌，2005，英语词化探析[J]，《中国外语》(5)：64－68。

③ 王文斌，2005，《英语词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202－213。

（续表）

	词化前	词化后
短语词化	plug + and + play	plug-and-play
句子词化	bring + your + own + bottle	a bring-your-own-bottle party

图表 7.3 英语词化类型(王文斌,2005)

汉语的词化现象也比比皆是。如从“叚”字(红色)分化出的“騢”(带红色杂毛的马)、“鰕”(红色的鱼)、“緋”(红色)、“霞”(红色的云)、“蝦”(红色的虫,虾烧熟后为红色,古人“虫”的概念比今天大得多)、“瑕”(玉上红色的斑点),均是通过“字”这种简约的综合型表达法表达复杂的概念意义。董秀芳(2002)[①]是一部研究汉语双音词词化现象的专著,其中列举了大量双音词词化的例子,如:

	词化前	词化后
责成	要求成功(委任责成,优劣已分。)	指定某人负责
地震	大地震动(日者地震,南阳由甚。)	一种自然灾害
学者	学习的人(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	学业上有成就的人
相信	相互信任(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	认为正确
鼓舞	击鼓跳舞(手执白拂,鼓舞而至。)	激发鼓动

图表 7.4 汉语双音词词化举例(董秀芳,2002)

英汉语的缩略语更是词化的极端表现,如 radar、UNESCO、北大、“七不”规范等等,为语言社团提供了大量经济简约的表达方式。

7.2.3.2 词库规模的扩大

世界各种语言从远古发展到现代,都经历了词汇量从少到多、词库规模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英语和汉语也不例外。古英语约有五万到六

① 董秀芳,2002,《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万个词(李赋宁,1991:13)[①],而当代英语词汇如果算上各学科的专门术语、俚语、方言和新词,远远超过200万个,是世界上现存的5 000多种语言中词汇最丰富的语言(汪榕培、卢晓娟,1997:1)[②]。汉语成熟的早期书面语甲骨文的词汇量有3 500到4 500个字,而"当代最发达的语言的词汇,现代的和历史的,加起来都有几十万"(符淮青,1985/2004:17)[③]。词汇量的增加和词库规模的扩大,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对世界的探索逐渐深入细致,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词汇产生以满足语言社团的需求。同时,词库扩大和词汇增加,表明越来越多的概念被整合成词项,可供语言社团使用的综合型表达法也越来越多。例如,在garage一词产生之前,人们只能用"停放或保管汽车的建筑物或户内空地"来表达相同的概念;garage的出现,使得人们能用简约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意思。我们认为词库扩大的过程,就是一种语言词化程度提高的过程。

7.2.4 记忆简约的作用

表达简约虽然为语言社团带来语言使用简洁、明确的便利,但是如果人们所需表达的所有概念都由一个(典型)词项以简约精确的方式表达出来,则语言社团就需要付出巨大的记忆和认知成本才能掌握这些词汇。所以,记忆简约总是从相反的方向发挥平衡表达简约的作用。

7.2.4.1 词化手段的低词化程度倾向

刘茁(2005:113)[④]认为,词汇系统存在词化程度沿"单纯词→派生

① 李赋宁,1991,《英语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p.13。
② 汪榕培、卢晓娟,1997,《英语词汇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1。
③ 符淮青,1985/2004,《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7。
④ 刘茁,2005,词化程度的英汉对比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113-117。

词→复合词→短语”序列逐步降低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一序列在汉语中也同样存在，具体表现为词化程度沿“独体字→合体字→词[①]→短语”序列逐步降低。此外，英语和汉语都有外来语。一个词即使在输出语中具有可分析性，语义透明，一旦脱离原来的语言系统进入接受语，多半体现出单纯词的特点。夸克等（1985/1998：2116）[②]认为，“如果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借用了大量的词，可分析性就会进一步减少”；很多汉语学者把“雷达”、“尼古丁”这样的外来语看成“语素”（如王理嘉等，1993/2004：191）[③]，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外来语不可分析，可以独立构成词项。一般情况下，外来语是语言系统词化程度较高的部分。蔡基刚（2008：94－95）[④]认为，“一个语言的词化程度与该语言中派生词、转类词、单纯词、复合词和借词的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单纯词、外来语是程度较高的词化手段，而英语复合词和汉语双音词无疑是程度较低的词化手段。英语和汉语在词汇总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采用词化程度比较低的手段来满足增加新词的需求，从整体上使词汇系统的词化程度有所降低。

※ 当代英语复合词的增长

英语在历史上始终较多采用低词化程度手段增加词汇，其中最典型的是大量引进借词。英语词汇的发展史几乎可以看做一部借词引进史，萨丕尔（1921/1985：174）[⑤]认为，“每一个文化浪潮都在英语上沉积下一层借词”。黎昌抱（2001：92）[⑥]表明，现代英语词汇中80%为外来语，享有“世界性词汇”（cosmopolitan vocabulary）的美称。英语本族语词汇多

① 本研究中所讨论的“词”以双音词为主。

② 伦道夫·夸克、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1985/1998，《英语语法大全》[M]，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116。

③ 王理嘉、陆俭明、符淮青、马真、苏培成，1993/2004，《现代汉语（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p. 191。

④ 蔡基刚，2008，《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p. 94－95。

⑤ 萨丕尔，1921/1985，《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 174。

⑥ 黎昌抱，2001，英汉外来词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5)：92－96。

单纯词，大多数借词也可作为单纯词看待。同时，一部分借词由于进入英语时间长，同化程度高，从中析出的词素成为英语活跃的构词成分，参与生成了大量派生词，如“新古典主义”词汇。这部分派生词的构成理据需要有一定语源学知识才能掌握，故而其语义对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来说透明度不很高。蔡基刚(2008：339)[①]认为，英语词化程度高的单纯词和派生词分别占到词汇总量的45%和24%左右；王艾录、司富珍(2002：166)[②]更是认为英语中60%以上是单纯词。而复合法这种由自由词素组合而成、理据明晰、词化程度较低的构词法，在英语词汇发展史上的能产性始终有限。*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2000版)中收录了5 000多个复合词，仅占该词典总条目的7%左右。可以说，英语词汇历史上的增长主要是以高词化程度的方式实现的。

近年来，英语虽然仍旧大量通过高词化程度的手段增加新词，但是复合法的能产性却有大幅度提高，复合词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成为当代英语最重要的构词法。在1961年《韦氏国际词典第三版》出版后的十二年中，梅里安出版公司记录了6 000个新词，其中约30%是用复合法构成的(参见夸克等，1985/1998：2115)[③]。根据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 Leech)在1980年提供的材料，二次大战以后出现的新词中复合词占到了27%(参见李平武，2003：2)[④]。张彦梅(2003：121)[⑤]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由构词法生成的新词中复合词的数量最多。王文斌(2005：281)[⑥]认为，“在现当代的英语新词里，新复合词占绝对的优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复合词已经到了比比皆是、层出不穷的地步，其构词

① 蔡基刚，2008，《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 339。
② 王艾录、司富珍，2002，《语言理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 166。
③ 伦道夫·夸克、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1985/1998，《英语语法大全》[M]，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115。
④ 李平武，2003，《英语词缀与英语派生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 2。
⑤ 张彦梅，2003，英语复合词浅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21－124。
⑥ 王文斌，2005，《英语词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281。

能力之强，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故此我们认为，当代英语在词汇极度膨胀、语言社团记忆负担日益沉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通过复合词这样词化程度较低的构词手段增加新词。

※ 近现代汉语词汇的双音化

潘允中(1989：16)[①]认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时期是字占压倒性优势的时期，上古汉语词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单音词占优势。例如，《尚书》中的《商书》五篇共 1 851 个字，其中双音词除去重现的，只有 30 多个；《离骚》全文用字 2 470 个，有双音词 40 多个。上古和中古时期，汉语增加词汇的方法主要是造字，发展了高度词化的汉字系统，每个有细微差别的事物都有一个专名，用一个汉字表达。仅以基本颜色词为例，据张永言(1984/1999)[②]考证，上古汉语中表“黑”的字有 98 个，表“白”的 85 个，表“赤”的 65 个，表“黄”的 29 个，表“青”的 25 个，其中每一个字都指某一颜色的物件。再如“马”这一概念，仅因毛色的差异及所在位置的不同，在《尔雅》中就有 35 个汉字作为专名加以区分，如“騂”指颈毛和尾毛黑色的红马，“驪”指黑色的马，“騅”指尾毛白的马，“駹”指毛杂色而面额白的马(参见徐朝华，1987：345)[③]。字是词化程度较高的词汇手段，虽然其构成大多有理据可循，但每一个字仍然需要语言社团单独记忆。数以万计差别微小的汉字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可能完全掌握，给语言社团带来了沉重的记忆负担。

近现代时期，汉语词汇出现了明显的双音化趋势，双音词取代了字，成为汉语词汇的主体。根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1985：1046)[④]对 52 万字的现代汉语语料进行的统计，双音词占词汇总量的

---

① 潘允中，1989，《汉语词汇史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p. 16。

② 张永言，1984/1999，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A]，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C]，原载于《汉语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22 辑，北京：语文出版社，pp. 177－216。

③ 徐朝华，1987，《尔雅今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p. 345。

④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1985，《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 1046。

73.6%，而单音字仅占 16.7%。蔡基刚(2008：340)[①]认为汉语复合词(和本研究中的双音词大致相当)在整个词汇中的比例约为 80%。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倾向出现以后，大量汉字退出了人们的日常语言生活，语言社团转而采用分析型表达法表达相应的概念。如前面提到的“騢”、“驪”、“騵”、“騅”、“鰕”和“赮”等，已经被各种低词化程度的分析性表达所取代，以方便人们掌握。此前我们讨论汉语词汇出现双音化趋势的种种原因(参见本书 5.2.2.1)时曾引述王力(1957、1958/2004：397)[②]的话，指出汉语语音简化和外来语的吸收，是促进汉语双音化趋势发展的外部原因；而双音化现象的主要推动力，则另有汉语系统内部的原因。我们认为，王力明确指出但又语焉不详的内部原因，就是继续增加汉语词汇的需求与汉语社团面对高度词化的汉字系统不堪重负之间的矛盾。汉语词汇双音化的根本推力是以语义透明、理据清晰的低词化程度手段替代词化程度较高的造字法，以使汉语实现记忆简约的目标。

然而，经济原则也受到一定限制，不能为所有双音词的生成提供解释。最能体现汉语特色的联合式双音词，如“窗户”、“鼓舞”、“孤独”、“一再”等，表达和记忆均不简约；另外双音词“老师”、“老虎”、“儿子”等含有不表示实际意义的字，也不符合语言经济原则。这些不经济的双音词满足汉语双音节的基本音步，是汉语韵律作用的结果。

7.2.4.2 有效控制词库规模

语言学者对于词库到底包含哪些语言形式还有没有达成共识，但英语单纯词、派生词和汉字都是比较典型的词项，而语义透明度较高、理据明晰的英语复合词和汉语双音词无疑都是较为边缘的词库成分。典型词项要求语言社团逐个记忆，而英语复合词和汉语双音词对记忆加工的要求比较低，扩大它们在词汇中的比例，有利于控制词库规模，减轻语言社团的记忆负担。

---

① 蔡基刚，2008，《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340。

② 王力，1957、1958/2004，《汉语史稿(第二版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p.397。

与英语相比，汉语对词库规模的控制更有效。当代英语词化程度高，词库规模庞大，词汇总量已达上百万，形成了显著的“大词库”特征。郎建国、李晋(2009)[①]表明，COBUILD 3 标注的英语词频最高的 14 600 个词覆盖率仅能达到 95%；母语为英语的大学毕业生，词汇量一般是 20 000个词族。相比之下，汉语通过词汇系统整体的双音化转向，降低了词汇系统的词化程度，有效控制了词库规模。因此，这里我们以汉语词汇系统为例，探索和了解记忆简约原则如何调控词库规模。

汉语双音词中真正发生词化的只是一小部分。董秀芳(2004：24)[②]指出，“汉语合成词[③]大部分都具有比较清晰的内部结构(internal structure)。笔者在参与编写一本汉语的词源词典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汉语双音词的内部语义都是透明的，其造词理据一目了然，无需过多解释，真正需要解释其语源的双音词只占很小一部分。”李晋霞、李宇明(2008：64)[④]也认为，“只有少量词意义完全隐晦，其形式与意义间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而大部分词，词义均不同程度地具有透明性，内部结构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具有可分析性。”所以严格说来，汉语词库中“词”的数量还比较有限，真正需要逐个记忆的词项主要是字。

汉语双音化以前，曾经发展了高度词化的汉字系统，汉字的总数达到数万。清代“总汇汉字之大成”的《康熙字典》收有 47 035 个汉字，目前中国最全的汉字字库共收入有出处的汉字 91 251 个[⑤]。虽然如此庞大的汉字体系也是通过数百个独体字组合而成，字的构成基本上都有理据可循，但还是给语言社团带来了过于沉重的记忆负担。经过双音化以后，这个庞大汉字系统中大部分词项成为非常用汉字，退出了活跃的语言生活，大大减轻了语言社团的记忆负担。据统计，国家语委和教委联合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之一“常用字”部分的 2 500 个汉字，在现

---

① 郎建国、李晋，2009，英语常用词与四部英语学习词典的词频标注[J]，《外语教学与研究》(1)：61－66。

② 董秀芳，2004，《汉语的词库与词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 24。

③ 即本文所讨论的双音词。

④ 李晋霞、李宇明，2008，论词义的透明度 [J]，语言研究(3)：60－65。

⑤ 汉字从《康熙字典》到目前数量激增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和简化字推广过程中的“类推简化”原则有关，而非产生了很多完全意义上的新字。

代汉语书面语中的覆盖率达到了 99.12%。1953 年政务院颁布的扫盲标准规定的识字量是：干部和工人认识 2 000 个常用字，农民能识 1 000 个常用字，城市劳动人民能识 1 500 个常用字。《骆驼祥子》共用了 2 413 个汉字，《毛泽东选集》1～4 卷用字量是 2 975 个，《红楼梦》的用字量是 4 462个。目前汉语社团为日常使用而需要掌握的汉字量约为 3 000 左右，这一数字与甲骨文时代、先秦时代人们需要掌握的汉字数量相比，基本持平。汉语词汇系统以数百个独体字组合形成了数千个常用汉字，这些常用汉字又组合形成了数十万语词。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实质是汉语词汇系统放弃了继续提高词化程度的发展道路，以使词库规模维持在便于语言社团记忆掌握的水平。

汉语之所以能更好地控制词库规模，是由于汉语词汇系统是依照理据原则构建起来的。汉语独体字的数量只有区区数百个，而且这些独体字结构简单，笔画很少，又具有非常高的理据性，便于语言社团学习掌握。这些独体字通过一定的理据原则和规律组合生成合体字，使得合体字也容易识认。况且由汉字构成的双音词和多音语词，大多具备很高的语义透明度，便于理解和学习。Haiman (1985/2009: D18)[①] 表示，“象似的记号(sign)比任意的符号(symbol)更易学习、储存和产出”。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在孩子入学的第一年，通过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可认识 2 000 个常用汉字，初步具备了学习古典文献所需的阅读能力，可以说是非常高效的。据我们的观察，学龄前儿童，只需要作适当的引导，无须正规的教学，到 4～5 岁时就能自然而然地习得 1 000～1 500个汉字，完全可以在入学以前具备阅读儿童读物和教材的能力。这说明汉语词汇系统的高理据水平以数百个独体字组合生成了数十万语词，有效地控制了词库规模，大大提高了学习掌握汉语词汇的效率。

①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D18.

第三节　英汉语的开放性与经济原则

外来语是不同文化交流交往的产物。各种语言吸收外来语的主要方式不同。西方语言的外来语称作借词(loanword),英语借词大多来自印欧语系内部,在进入接受语时往往是整词借用;而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实质是用汉字对异质语言成分进行转写(潘文国,2008:61－78)①。汉语外来语分为写形外来语、写音外来语和写义外来语,本研究所讨论的主要是写音外来语。英语借词的引进是"保留语形、改变语音",而汉语写音外来语则是"模仿语音、改变语形"。

从理论上讲,任何能用拉丁字母或汉字转写的外来语都能进入英语或汉语。但是,有些外来语能够成为接受语的有机成分,也有一部分外来语渐渐被淘汰。外来语由词汇系统边缘成分向典型成分逐步靠拢的过程,是接受语按照核心机制对外来异质成分进行筛选和改造的过程,称为外来语的同化作用。一种语言同化外来语的情况,往往被看做其"开放性"的标志。英汉语言吸收外来语的不同情况,反映了它们词汇系统不同程度的"开放性"。

7.3.1　英汉语的"开放性"

7.3.1.1　英语的"开放性"

英语从其他语言中吸收了大量词汇,被称为最开放的语言。黎昌抱(2001:92)②表明,现代英语词汇总量已经达到100万,其中80%为外来

① 潘文国,2008,外来语新论[A],《中国语言学·第一辑》[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pp.61－78。

② 黎昌抱,2001,英汉外来词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5):92－96。

语，享有“世界性词汇”（cosmopolitan vocabulary）的美称。夸克等（1985/1998：2205）[①]指出“英语词汇是一种混合词汇，它以日耳曼语的词汇为基本核心，并从外国语言（主要是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中吸收了数量更多的词汇”。总之，英语被看做“开放型”语言的典型代表。

英语对外来语的同化能力很强。中古英语时期，仅在 1250 年至 1400 年的 150 年间，约有一万个法语词进入英语，其中 75%一直沿用至今（秦秀白，1983：77[②]）。据汪榕培、卢晓娟（1997：293）[③]统计，英语最常用的2 000 词中，本族语词汇仅占 34%，最常用的 3 000 词中，本族语词汇仅占 29%，最常用的 4 000 词中，本族语词汇仅占 27%，其余都是外来语。Bussmann（1996/2000：288）[④]指出，接受语对借词的同化从三个方面进行：书写形式、语音和语法。借词语音上的改变最为重要，但英语也允许词的语音和语形完全分离的现象。英语借词语法上的同化，主要体现为借词的词根化和词缀化，然后参与英语新词的生产。夸克等（1985/1998：2102）[⑤]表明，绝大多数英语前缀都来源于拉丁语、希腊语或法语。

总之，英语吸收和同化了大量的借词，体现出了惊人的“开放性”，堪称世界上最为开放的语言之一。

7.3.1.2 汉语的“开放性”

汉语虽然也吸收了大量外来语，但与英语比起来，数量悬殊。黎昌抱（2001：93）[⑥]表明，“汉语大约有 37 万个词，而《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了古今汉语外来词一万余个”，其中“包括某些外来词的异体或略体，外

① 伦道夫·夸克、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1985/1998，《英语语法大全》[M]，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205。

② 秦秀白，1983，《英语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p. 77。

③ 汪榕培、卢晓娟，1997，《英语词汇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 293。

④ Bussmann, 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288.

⑤ 伦道夫·夸克、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1985/1998，《英语语法大全》[M]，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 2102。

⑥ 黎昌抱，2001，英汉外来词对比研究[J]，《外语教学》(5)：92－96。

来词在汉语词汇中所占比例很小。”周振鹤、游汝杰(2006：195－213)[①]认为，汉语外来语主要来自中亚(西域)文化、佛教文化、近现代西方文化(包括经由日语吸收的西方外来语)和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蒙语、满语)。其中源自西方语言的外来语数量最多，涉及的范围也最广。总体来说，汉语吸收的外来语不仅数量少，在汉语总体语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被很多学者看成“封闭型”的语言。

汉语对外来语的同化功能远不如英语。这首先体现在汉语对大量纯写音外来语的排斥和淘汰上。很多外来语在引进汉语之初，采用的都是纯粹的记音方式，如“巴力门”(parliament)、“梵婀玲”(violin)、“伯里玺天德”(president)等，但最终都被翻译形式所取代。蔡基刚(2005：39)[②]统计了《新词新语词典》和《现代汉语新词词典》中的外来词，其中音译词不足1.5%。当然，也有很多写音外来语被汉语接受，但它们在进入汉语时和进入汉语后往往朝着“音义兼表”的方向发展。例如，汉语尽量选用能提示写音外来语意义的汉字，如“蹦极”(bungee)、“芒果”(mango)。又如，给写音的汉字加上或更换表意的形旁，像“狮子”最初进入汉语时写为“师子”，“琉璃”写为“流离”，“琥珀”写为“虎魄”。或者通过“字化”的方式，使写音汉字发展了一定的意义，如“佛法”、“佛经”中的“佛”字，“面的”、“打的”中的“的”字。

总之，汉语对外来语体现出较为强烈的排斥倾向，被广泛地看做一种封闭型的语言。

7.3.2 英汉语的“开放性”与理据性

赵宏(2009)[③]系统对比了英汉词汇系统的理据性，认为英语地位重

---

① 周振鹤、游汝杰，2006，《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p.195－213。

② 蔡基刚，2005，英汉词化对比与综合表达法[J]，《山东外语教学》(5)：35－40。

③ 赵宏，2009，英汉词汇系统理据性对比[J]，《华文教学与研究》(4)：68－79。后由《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0年第3期(p.199)转载。

要、数量众多的单纯词和外来语理据性很低，而理据程度高的合成词所占比重和重要性有限，故而整体的理据性较低；汉语无论单纯词还是合成词的理据性都很高，理据性低的写音外来语不仅数量少，且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据化倾向（如字化现象），故而整体的理据性很高。

理据性是塑造词汇系统基本面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英汉语所体现的不同程度的“开放性”，与其理据程度有一定的关系。

7.3.2.1 英语的理据性与“开放性”

英语词汇系统具有典型的低理据特征，其低理据性既是英语大量吸收外来语的动因，同时也是其大量吸收外来语的结果。古英语词汇最突出的特点是单音节性，理据性非常低。英语借词的“不可分析性”与古英语自身词汇的“不可分析性”完全吻合，故而英语对借词的排斥倾向很弱。英语自古由于种种原因与外来文化接触频繁，从早期就开始大量吸收外来语。而大量借词进入英语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英语词汇的低理据性特征，有利于英语吸收更多的借词。同时，现代英语对与其音位规则不完全吻合的借词表现出了很大的包容性。这种变化的产生很可能与英语大量吸收借词有关。王文斌（2005：30）[①]认为，诺曼底人的入侵使得大量法语词汇进入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英语词汇屈折变化的简化”。但是这些变化反过来又促进英语继续大量吸收借词。英语词汇的发展史差不多可以看做一部借词吸收史，每一次文化交流的浪潮都在英语里留下一层借词的沉积。

如果我们用与英语亲缘关系很近的德语来做比较，则英语的“开放性”与其低理据性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直观。相比英语，德语对外来语表现出强烈得多的排斥倾向，德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规模抵制外来语的斗争，成立了很多有影响的语言协会，创造了大量德语词汇代替借词（周婧娟，2007：31－33）[②]。据估计，德语四十万词汇中约有十万来源于其

① 王文斌，2005，《英语词法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30。

② 周婧娟，2007，德国历史上反对外来词的斗争及外来词的德语化进程[J]，《德语学习》(1)：pp.31－33。

他语言(顾江禾、黄克琴,1995:83)[①]。

德语具有比英语更高的形态理据性。许余龙(2002:124-126)[②]认为德语的形态理据之所以比英语高有两点原因:(1)德语中的复合词数量远较英语多;(2)德语中派生词的数量也远比英语多,许多与德语派生词对应的英语词是无理据的单纯词。徐智儿(1997:27、43)[③]指出复合词多是德语的特点之一,复合法是德语中最常用的能产的构词法。萨丕尔(1921/1985:175)[④]对英语和德语吸收外来语的不同情况作了对比,认为德语的高形态理据性与德语对借词的排斥倾向密切相关,而英语对借词的欢迎态度则是由英语词汇的低理据性造成的:

> 一种语言能够接受外国词汇的程度很可能和他对本身的资料的心理态度有不少关系。英语好久以来就要求有完全统一的、不加分析的词,不管是单音节的还是多音节的。像credible、certitude、intangible这样的词,在英语里完全受欢迎,因为每个都表达一个单一的、简明的观念,并且它们的形式分析在无意识心理上是莫须有的事(cred-、cert-和tang-在英语里并不真正存在,不比goodness的good-)。像intangible这样一个词,一服了水土,就差不多跟任何单音节根本词一样,心理上是单纯的东西。可是,德语的多音节词要求分析成有意义的成分。因此几次文化影响高潮中大量借入的法语和拉丁语的词不能长久保持。拉丁—德意志式的词,如kredibel,和法—德式的词,如reussieren,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无意识心理吸收到他习惯用来体会词和掌握词的方法里去。无意识心理好像在说:"我完全愿意接受kredibel,只要你告诉我那个kred-是什么意思。"所以,当需要新词的时候,德语一般会觉得用自己的资源来创造它更为便当。

---

① 顾江禾、黄克琴,1995,德语外来词刍议[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3):pp.80-84。

② 许余龙,2002,《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124-126。

③ 徐智儿,1997,《德语词汇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27、43。

④ 萨丕尔,1921/1985,《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175。

英语词汇大多在“心理上是单纯的”，不要求把借词“分析成有意义的成分”，即理据性程度非常低，故而呈现出“开放”的特点。

7.3.2.2 汉语的理据性与“开放性”

不论是从共时的角度看汉语词汇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字”和“词”，还是从历时的角度看其“独体字→形声字→双音词”的发展主线，汉语词汇系统都体现出了很高的理据性。汉语词汇系统的高理据性要求进入汉语的外来语能被分析成为有意义的语言单位，这使得汉语社团普遍存在“望文生义”、“顾名思义”的心理预期，要求外来语能够符合汉语固有的理据模式。李冬(1988/1996：128)[①]指出，“当新词出现时人们习惯地期待这一新词语应有一定的理据”。写音外来语把汉字作为只表音不表义的低理据性符号使用，与汉字表意的高理据性本质相抵触；而写音外来语明显的异质性，使其与汉语自身的符号构成模式格格不入。例如，汉语社团总要想“巴力门”(parliament)到底是什么“门”，“马杀鸡”(massage)究竟是什么“鸡”，“密陀僧”(梵语 mudarasingu 的音译，一种无机化合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僧”，“花生骚”(fashion show)里的“花生”如何能“骚”，“没[②]爹虾罗”(马来语 mutihara，意为“真珠”)里“虾”又怎能“没爹”。故而，写音外来语在汉语中的数量和重要性始终相当有限。而对于确实有需要而不得不接受的写音外来语，汉语则尽可能使其向高理据性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英汉语所体现的“开放性”与其词汇系统的理据性密切相关：理据性高的汉语呈现出对写音外来语较强的排斥倾向，理据性低的英语对外来语的排斥倾向较弱。

7.3.3 经济原则视角下的语言开放性

语言学上的经济原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

① 李冬，1988/1996，汉英词语理据比较[A]，李瑞华主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原载于《外国语》1988 年第 6 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123－130。

② 此处“没”应读作 mò。

收益”(姜望琪,2005:87)[①]。语言吸收外来语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经济原则的作用,而一旦我们从经济原则的角度审视外来语,就会对语言的“开放性”有新的认识。

词化的本质是语言演变中语义成分整合成词的过程及结果(罗思明等,2007:415)[②]。新词产生主要是因为词汇系统存在语义上的缺项,而又必须通过词汇手段将缺项概念表达出来。新词的产生有不同的途径:可以借助语言内部的资源,如王文斌(2005:65-67)[③]提出的五种英语词化类型;也可以借助语言外部的资源,通过吸收外来语产生新词。吸收外来语是词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语言学家萨丕尔(1921/1985:177)[④]说:“研究一种语言在面对外国词时起怎样的反应——拒绝它们,翻译它们,或是随便接受它们——很能帮助我们了解这种语言内在的形式趋势。”这说明一种语言在需要生成新词以表达其他语言文化的概念时,外来语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它可以利用内部资源翻译这一概念,可以通过构词法创造一个新词,也可以借助外来语满足产生新词的需求。到底采取哪一种方式,往往取决于使用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成本”。

我们认为,词汇系统的理据性往往决定语言吸收外来语的难易程度,故而也决定其吸收外来语的“成本”。英语遇到外来概念时大量引进,借助外来语产生很多新词。这是因为,英语音义关系任意性居主导地位,英语借词的低理据特征与英语本族语词汇的任意性完全吻合,与汉语相比吸收外来语的“成本”极低。汉语理据性很高,汉语社团期望外来语也能像本族语词汇一样望文生义,具有较高的理据水平,因此,吸收外来语的“成本”很高。这也说明了汉语写音外来语是一种低理据水平的异质语言成分,很难满足汉语社团对其理据性的期待,受到汉语社团较多的排斥。故而汉语在需要引进外来概念时,较多地采用内部资源

---

① 姜望琪,2005,Zipf 与省力原则[J],《同济大学学报》(1):87-95。

② 罗思明、徐海、王文斌,2007,当代词汇化研究综合考察[J],《现代外语》(4):415-423。

③ 王文斌,2005,英语词化探析[J],《中国外语》(5):64-68。

④ 萨丕尔,1921/1985,《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p.177。

(即构词法和翻译)解决问题,而体现出对写音外来语较为强烈的排斥倾向。

在分析了英汉词汇的理据性和其"开放性"的对应关系后,我们认为,一种语言的"开放性"是该语言在需要填补词汇系统语义缺项时,在利用语言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中选择和平衡的结果。在需要填补语义缺项的情况下,如果一种语言吸收外来语的"成本"很高,就倾向于使用语言的内部资源(如构词法和翻译形式)来替代外来语的吸收;反之它就会较多地吸收外来语。语言的这种动态的词化手段选择机制,正是经济原则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把一种语言为吸收外来语所付出的"成本"也考虑进来的话,就会发现各种语言为满足其真正的需要而吸收外来语的能力是同等的。

第四节 小结

本章从经济因素这一语言系统的外部理据因素入手,对比分析了英汉语词化现象和词汇系统的"开放性",探讨经济理据和英汉词汇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一节简要介绍语言经济理论的发展。语言的经济原则最早由Zipf (1936[①]、1949[②])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将语言看做人类行为的一种,其发展必然受到经济因素的支配,实现语言形式与语言行为的均衡。该原则后经由马丁内、Grice、Leech、Horn、Sperber & Wilson、向明友等语言学者不断充实,得到了发展完善。目前,语言学界对经济原则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语用学领域。本研究讨论的是经济原则与词汇系统的互动

① Zipf, George Kingsley. 1936.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Philology* [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② Zipf, George Kingsley.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 [M].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关系，认为语言的经济性是塑造英汉词汇系统面貌的重要理据力量。

第二节从语言社团和语言系统的互动入手，探讨英汉词化现象的经济性。词化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其作用受语言经济原则驱动。经济原则对词化现象的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社团总是力图以简约的方式表达思想和进行交际，从而不断提高词化程度，扩大词库规模，这是表达简约的作用；另一方面，语言社团总是力图以较小的记忆加工掌握使用语言所需的词汇，所以会适当降低词化程度，控制词库规模，这是记忆简约的作用。表达简约和记忆简约从相反的方向同时作用于词汇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词汇系统的基本面貌。英语和汉语的词汇系统，都受到表达简约原则和记忆简约原则共同的作用。

第三节探讨英汉语“开放性”与理据性的关系，探究其间所体现的语言经济性。英汉外来语的吸收情况和词汇系统的理据性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理据性高的语言，呈现出对外来语较强的排斥倾向，吸收外来语的难度大，较多利用内部资源满足产生新词的需求；而理据性低的语言，对外来异质成分的排斥较弱，吸收外来语的难度比较小，较多利用外部资源产生新词。一种语言在有词化需求的时候，会依照经济原则在利用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之间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而语言在吸收外来语方面的“开放性”，本质上就是经济原则作用的结果。我们认为，各种语言为满足真正的需要而吸收外来语的能力是同等的。

第八章

英汉词汇的转隐喻理据

第一节　隐喻研究的认知视角

8.1.1　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

隐喻现象在东西文明孕育的早期就引起人们的注意，研究历史绵延两千多年，可谓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古希腊/2003：166－168、339－341）[①]探讨了隐喻的定义和作用，是西方最早的隐喻理论。中国古代对隐喻的关注始于先秦时期对“喻”、“比”、“兴”、“譬”、“依”等现象的论述（参见冯晓虎，2004：41－44[②]；王寅，2007：189－190[③]）。传统的隐喻研究，无论中西都把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认为隐喻是有效的雄辩术、诗

①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2003，《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M]，颜一、崔延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p. 166－168、339－341。

② 冯晓虎，2004，《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pp. 41－44。

③ 王寅，2007，《中西语义理论对比研究初探——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思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pp. 189－190。

性语言或解释说理的重要方法。例如，白人立、国庆祝(2000：8)[①]认为，对语义研究影响重大的《意义之意义》一书“最重大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记述功能和激情功能，或称所指功能和感情功能，或称描写性语言和表情性语言”。这种区分形象语言和普通语言的观点主张将两者截然分开。传统研究视野下的隐喻现象，无疑仅是一种实现语言“激情功能”的修辞手段，不属于普通语言。

林书武(1997：11)[②]指出，隐喻的归属问题非常重要，是“认知语言学和当今语言学研究主流派的分水岭”。认知语言学在隐喻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隐喻革命”(metaphoric revolution)，将隐喻看做普通语言的普遍现象，是人类观察世界、认识新概念、表达新思想、创造新意义的主要途径。这一看法和传统隐喻观有本质的区别。Lakoff & Johnson (1980)[③]是标志隐喻研究认知转向的代表性作品。该书认为，人的思维过程是隐喻的。人类需要通过参照熟知的、具体的、经历过的概念，来认识陌生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事物，形成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参照、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周易·系辞》“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想，也反映了人类从自身及熟悉的事物开始认知世界的过程。语言中广泛存在的隐喻，只不过是人类思维过程和概念体系中隐喻的表现形式而已(参见赵艳芳，1998：67)[④]。我们首先以隐喻化的概念思维，然后以隐喻化的语言表达，充满隐喻的人类语言是我们隐喻化思维的结果。王寅(2007：406)[⑤]指出：

---

① 白人立、国庆祝，2000，译者前言[A]，奥格登、理查兹著《意义之意义——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及记号使用理论科学的研究》[M]，白人立、国庆祝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p.8。

② 林书武，1997，国外隐喻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1)：11－19；收入束定芳主编《语言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412－427。

③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④ 赵艳芳，1998，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3)：67－72。

⑤ 王寅，2007，《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406。

当代认知科学普遍认为，隐喻在本质上不是一种修辞现象，而是一种认知活动，对我们认识世界有潜在的、深刻的影响，从而在人类的范畴化、概念结构、思维推理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隐喻本质的认识，语言学者开始探讨隐喻现象的认知机制。

8.1.2 隐喻的认知机制

8.1.2.1 概念隐喻理论

和传统隐喻理论将隐喻现象作为事物之间的比较或替代不同，认知语言学指出，隐喻是一个概念域（源域，source domain）向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target domain）映射（mapping）的结果。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 Lakoff 及其合作者。隐喻涉及的不仅是两种不同类别的事物，还包括事物所在的概念域，隐喻意义是由源域中的部分事物和关系向目标域映射产生的。束定芳（2000：170－171）[①]总结了 Lakoff & Turner（1989）[②]的隐喻映射过程：（1）源域图式中的空缺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空缺上；（2）源域中的关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关系上；（3）源域中的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上；（4）源域中的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中的知识上。

Lakoff & Johnson（1980）[③]将隐喻分为三种类型：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空间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和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我们以常见的结构隐喻为例，讨论隐喻思维是

① 束定芳，2000，《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170－171。

② Lakoff，George & Mark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③ Lakoff，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如何通过有形的、熟悉的、简单的、具体的源域概念，构建另一个无形的、陌生的、较为复杂和抽象的目标域概念。Lakoff（2007：153）[①]列举了一些英语关于婚姻的常见表达：

[8.1] The marriage is on the rocks.
The marriage is off the tracks.
We are spinning the wheels.
We are go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My marriage has been a long bumpy road.
We are at the crossroads in the relationship.

上述这些表达包括了“婚姻”和“旅途”两个不同的概念域，源域“旅途”中我们熟悉的概念、关系和特征等要素（如道路、旅行者、交通工具、旅途的困难等）被映射到目标域“婚姻”中来，就会产生 MARRIAGE IS A JOURNEY 的概念隐喻。概念隐喻生成的心理基础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相似性。理想化的认知模式（ICM）使得概念域的有关特征从源域向目标域传递，实现两个概念域的沟通。

8.1.2.2 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

除了 Lakoff & Johnson 的概念隐喻理论，Fauconnier 等学者提出的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Blended Space and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也能较好地解释隐喻发生的认知机制。Fauconnier（1985/2008：16－22）[②]提出了“心理空间”（mental space）的概念，认为心理空间是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的

① Lakoff, Goerge.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y George Lakoff*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 153.

② Fauconnier, Gills. 1985/2008.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p. 16－22.

信息集合(参见张辉,2008:D13[①];汪少华,2001:38[②])。心理空间依据语言信息构建,具有一定的结构,能根据情境的变化而变,如加入新的元素或产生元素间的新关系。苏晓军、张爱玲(2001:32)[③]简洁地介绍了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的内容:

> 概念整合就是将两个输入心理空间(input mental space)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现匹配起来,将两个输入空间有选择地投射到第三个空间,即一个可以得到动态解释的合成空间(blended mental space)。跨空间映现利用输入空间里共有的图式结构,或者发展其他的共有图式结构。这一共有结构包含在第四个空间即所谓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里。这四个心理空间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简称 CIN)。

概念整合理论能较为有效地解释隐喻的认知加工过程。我们可以通过 Fauconnier (1999:117)[④]的一个例句,了解概念整合理论是如何对隐喻现象进行解释的:

[8.2] Vanity is the quicksand of rea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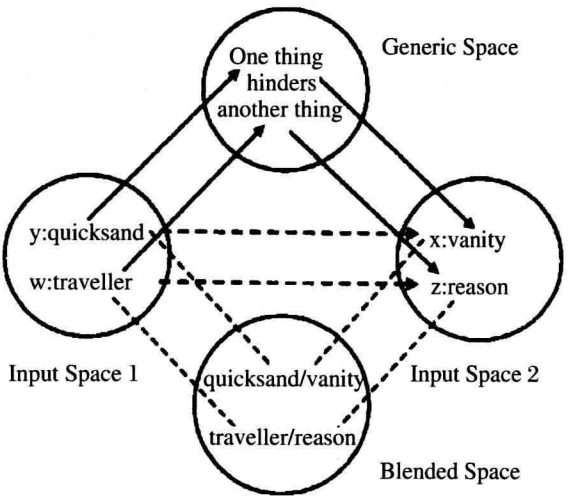
该例句建构的概念整合网络如下图:

① 张辉,2008,导读[A],Fauconnier 著《心理空间——自然语言意义建构面面观》[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p. D13。

② 汪少华,2001,合成空间理论对隐喻的解释力[J],《外国语》(3):37-43。

③ 苏晓军、张爱玲,2001,概念整合理论的认知力[J],《外国语》(3):31-36。部分术语汉译有变动。

④ Fauconnier, Gills. 1999. 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 [A]. In Janssen & Redek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 117.



图表 8.1　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机制的解释(朱永生、蒋勇,2003:28)①

该隐喻的源域是输入心理空间 1,含有流沙、旅行者、沙漠等和旅行有关的信息;目标域是输入心理空间 2,指虚荣和理智的关系。在理解这一隐喻时,首先从输入心理空间 1 中"流沙"和"旅行者"的关系抽象出 One thing hinders another 的共有图式结构,构建起类属空间,再和输入空间 2 中的"虚荣"和"理性"建立起间接的映现关系,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相关内容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形成相互匹配的关系,推导出"虚荣妨碍理性"的隐喻含义。这四个心理空间互有联系,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网络,实现隐喻的解读。

与从源域到目标域单向映射的概念隐喻理论相比,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建构了涉及多个心理空间的动态隐喻阐释机制。汪少华(2001:40-41)②指出,Lakoff & Johnson 的隐喻理论和 Fauconnier 的概念整合理论有不少共同之处,又各有特色。前者能够阐释固着度

① 朱永生、蒋勇,2003,空间映射论与常规含义的推导[J],《外语教学与研究》(1):26-33。

② 汪少华,2001,合成空间理论对隐喻的解释力[J],《外国语》(3):37-43。

(entrenchment)较高的空间隐喻和本体隐喻；后者具有较强的实时性，主要可以用于阐释实时隐喻过程(on-line metaphorical processing)中的隐喻现象，如笑话、新词、幽默言语、卡通漫画和日常对话中的隐喻，特别适合动态地建构意义和进行推理。这是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

8.1.3 转喻和隐喻的关系

转喻和隐喻是联系密切的认知和语言现象，在实际的语言认知加工中，两者往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8.1.3.1 转喻是隐喻的基础

Barcelona (2000)[①]认为，每一个隐喻映射都预设(presuppose)一个概念上更早的转喻映射，转喻为隐喻的发生提供了理据。例如，SADNESS IS DOWN 这一概念隐喻以 sadness 的行为效果指代这一感情，建立在转喻基础上。Radden (2000)[②]也持和 Barcelona 类似的观点，认为基于转喻的隐喻有四种情况：(1)概念域有共同经验基础；(2)概念域通过隐含义联系起来；(3)概念域涉及范畴结构；(4)概念域通过一个文化模式而相互联系起来。李瑛、文旭(2006：2)[③]指出，域是区分转喻和隐喻的关键，但"域"的界限模糊，较难界定，因此转喻和隐喻在词义的延伸中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出现相互交融的现象。张辉、卢卫

① Barcelona, Antonio. 2000. 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i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A].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 Moulton de Gruyter. pp. 31 - 58.

② Radden, Günter. 2000.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A].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 Moulton de Gruyter. pp. 93 - 108.

③ 李瑛 文旭，2006，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J]，《外语教学》(3)：1 - 5。

中(2010：45)[①]认为，邻近性和相似性没有明确的界限，而“当我们把隐喻和转喻都视为认知域间的映射时，可以把相似性视为邻近性的一个次类”，因而可以改变过去将转喻看成一个隐喻类别的做法，将隐喻看成转喻的一个类别。

隐喻的转喻基础在语言中大量存在。如 sandwich cake，先要通过转喻从 sandwich 激活的认知域中提取“双层夹心”这一抽象概念，形成 Fauconnier 概念整合理论中的类属空间，然后再通过隐喻投射到 cake 这一目标域中。而“扇贝”这一隐喻复合词，也先要通过转喻将“扇形”这一形状特征从源域“扇子”中提取出来，才能和目标域“贝”生成新概念“扇贝”。

8.1.3.2 转喻和隐喻构成一个连续体

转喻和隐喻没有清晰的界限，无法截然分开，而转喻是比隐喻更为基础的认知模式，由此不少学者(如 Radden，2000[②]；陆俭明，2009[③]；张辉、卢卫中，2010：47－50[④] 等)认为，转喻和隐喻分别构成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张辉、卢卫中(2010：49－50)引用了 Deignan 划分的“从转喻到隐喻的 5 个渐变类别”——**转喻→来自转喻的隐喻→隐喻中的转喻→基于转喻的隐喻→隐喻**，并举例如下：

类　别	用　例
非常规化转喻	*The ham sandwich* is getting impatient for his check.
常规化转喻	A new school exam for 16 year olds has been *shelved* by the government.

① 张辉、卢卫中，2010，《认知转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47－50。

② Radden，Günter. 2000.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A].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Moulton de Gruyter. pp. 93－108.

③ 陆俭明，2009，隐喻、转喻散议[J]，《外国语》(1)：44－50。

④ 张辉、卢卫中，2010，《认知转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p. 47－50。

（续表）

类　别	用　例
来自转喻的隐喻	... you should never *turn your nose up* at inexpensive plants ...
隐喻中的转喻	*bite one's tongue off*
基于转喻的隐喻	I found myself in *heated* argument the other day.
隐喻	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s.

图表 8.2　从转喻到隐喻的连续体(张辉、卢卫中,2010：49－50)

这五个类别不是离散的,而是构成一个相互交融的、渐变的连续体。

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转隐喻现象普遍存在于语言中,成为重要的理据因素。转隐喻理据属于外部理据,作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语法隐喻、语篇隐喻等现象已经引起认知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词汇中的转隐喻现象也成为研究的热点。下面两节将探讨受转喻和隐喻思维影响较为显著的英汉一词多义和名名复合词现象。

第二节　英汉"一词多义"现象的转隐喻理据

8.2.1　一词多义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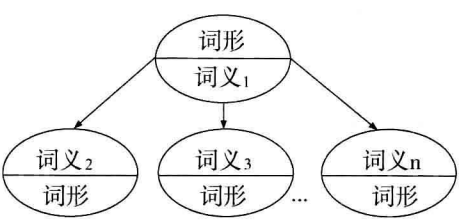
一词多义(polysemy)指一个词有两个或更多的意义。Ullmann (1962：159－175)[①]指出,一词多义现象是人类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认为比喻性用法(figurative language)是造成一词多义现象的重要原因之

① Ullmann, Stephen.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一。林正军、杨忠(2005：362)[①]指出，一词多义现象展现了人类语言的经济性原则，通过赋予同一词形更多词义减少词的数量，减轻人们记忆词汇的负担；多义化是人们进一步认知世界的简便而有效途径，优于造词、构词和借词等手段。一词多义现象在英汉语中均大量存在，反映语言社团认知世界核心概念的基本词更是发展了庞大复杂的语义网络。

一个词的词义根据历史演变可以分为本义和扩展义(或引申义)。本义是词汇的原义，一般来说是具体的、人类最初认识事物的意义。例如，“理”本义是“治玉”，即分解加工玉石；而 root 的本义是“根”。扩展义或引申义是从原义派生出来的词义，与原义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系统的、自然的、有理据的。如“理”由“按照玉上的纹路分解、加工玉石”引申出“纹理”之意，又转指“条理”、“道理”、“治理”、“管理”等意义。root 也从“植物的根”发展了“根状物”(如 the root of a finger nail)、“底部”(如 the roots of a mountain)、“根源”(如 the root of all evil)等词义。词的原义和扩展义构成一个语义的网络系统。

林正军、杨忠(2005：364)[②]认为，词义的衍生有两种方式：连锁和辐射。词义衍生的辐射方式指以一个词义为基础发展出数个与之相关的扩展义，扩展义与本义之间的联系往往十分密切。辐射衍生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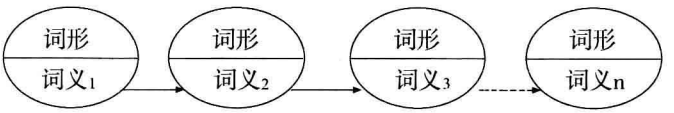
图表 8.3　词义衍生的辐射方式(林正军、杨忠，2005：364)

词义衍生的连锁方式则指以一个词义为基础生成第二个词义，又在第二

① 林正军、杨忠，2005，一词多义现象的历时和认知解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5)：362－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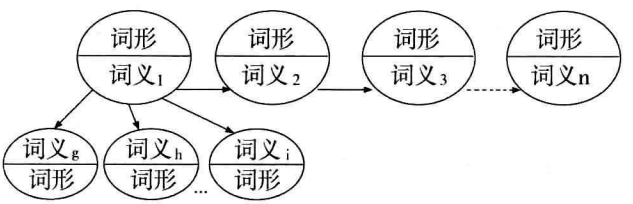
② 同上，364。

个词义的基础上生成第三个词义，以此类推。通过连锁方式衍生的词义，后一个词义往往与前一个联系紧密，但可能已经与本义失去了直接的联系。连锁衍生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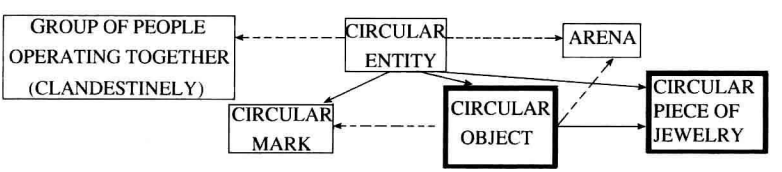
图表 8.4　词义衍生的连锁方式(林正军、杨忠，2005：364)

词义的辐射衍生和连锁衍生常能交互作用，形成复杂的词义网络，如下图所示：



图表 8.5　辐射方式与连锁方式的交互作用(林正军、杨忠，2005：364)

这样复杂的词义网络普遍地出现在英汉语核心词上，Langacker（1991/2002：3）[①]以 ring 为例，指出 ring 由“环形”这一本义引申发展了“戒指”、“(秘密的)团伙、帮派”、“(马戏等的)圆形表演场”等一系列衍生义，构成了一个意义网络，形成了词形与词意义间多对多的对应关系。下图为 ring 的语义网络(局部)：



图表 8.6　ring 的意义网络(Langacker，1991/2002：3)

① Langacker，Ronald W. 1991/2002. *Concept，Image and Symbol —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nd Edition)* [M]. Berlin：Mouton de Gruyter. p.3.

8.2.2 一词多义的转隐喻理据

词义引申的过程是对事物再次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过程，词复杂的语义网络是通过转喻和隐喻作用实现的。Taylor（1989/2001：99－105）[①]认为，多义词是具有多个离散而又相互关联的意义的范畴，该范畴是一个多中心结构（polycentric structure），含有多个类典型（prototype），这些类典型通过家族相似性实现相互关联。范畴拓展（category extension）就是词由原义这一单一中心（monocentric）向多中心结构发展。词义范畴拓展的认知机制是人类共有的转喻和隐喻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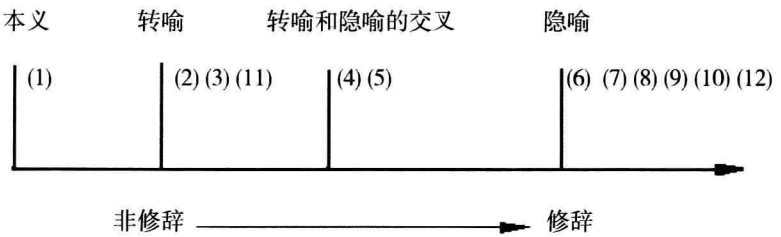
李瑛、文旭（2006）[②]以 head 和“头”的语义网络为例证实了 Taylor 的上述观点，认为词义的延伸受两种思维结构的作用，其一是以邻近性关系为基础的转喻思维，其二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思维。我们以李瑛、文旭（2006）对 head 的研究为例，说明转隐喻机制对词义扩展的作用。*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列举了 head 的 12 个义项：（1）头，头部；（2）表示人或动物的数量单位，头，只；（3）等于头部大小的长度或高度；（4）头脑，智力；（5）事物的上端、顶端或前面领头部分；（6）钉子或锤子大的一头；（7）植物茎梗顶部之花或叶长出的部分；（8）啤酒倒在杯中而形成的白色泡沫；（9）河流的源头；（10）皮肤上的脓包；（11）一个组织或群体的负责人或领导人；（12）录音机或录像机的磁头。其中第一个义项是 head 的原义，其他 11 个均为引申义。这些引申义中，有些通过典型的转喻机制产生。譬如，用 head 表示人或动物的数量，就是以最为凸显的头部来代替整体，喻体和本体之间呈现出“部分——整体”的转喻认知特征；而用 head 表示和钉子、锤子、啤酒、植物、

---

① Taylor, John R. 1989/2001.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pp. 99－105.

② 李瑛、文旭，2006，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J]，《外语教学》(3)：1－5。

河流、录音机等有关的概念，则是将 head 的某些特征投射到其他的认知域中，属于较为典型的隐喻认知。Head 的这些义项构成一个连续体：



图表 8.7　head 词义扩展的认知思维模式(李瑛、文旭，2006：4)①

我们可以看到，当词义通过转喻思维进行延伸的时候，各义项具有邻近性，联系紧密，属于同一认知域中的映射，词义以连锁方式拓展。而当词义通过隐喻思维延伸时，各义项具有相似性，与原义联系较为密切，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词义以辐射方式拓展。由于转喻和隐喻是一个无法截然分开的连续体，多义词的各个义项也构成一个连续体。具有转喻特征的词义和本义较为接近，而隐喻性越强的义项与本义的距离越大，体现的修辞性就越强。

8.2.3　英汉一词多义隐转喻理据的共性和差异：以 air 和“气”为例

气是人类生存的要素，同时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概念之一，自人类文明早期就引起了重视。古希腊有“气本原说”和由火、土、气、水构成的“四根说”(赵敦华，2001：13、23)②，认为气是万物的源头；古罗马人认为人的灵魂以气的形态储存在头颅中，打喷嚏的时候气态的灵魂会跑到身体之外。古代中国人认为气是世界的本源，万物都由阴阳二气调和

① 李瑛、文旭，2006，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J]，《外语教学》，p. 4。

② 赵敦华，2001，《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 13、23。

而生。air 和“气”发展了复杂的语义网络。由于名词认知域明确，句法语义关系简洁明晰，我们以 air 和“气”的名词性的义项为例，探讨英汉一词多义现象转隐喻理据的共性和差异。

8.2.3.1 air 的一词多义现象

air 一词有几个不同的源头[①]：中古英语的 air 意为“气体；空气”，这一义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表示“上升、呼吸和气体”的 wer-；air 的另一个源头是表示“品性、品质、产地”的法语词 air，这一意义和拉丁语的 ager（即 area，表示场所、田地）颇有渊源；而第三个源头是法语表示“曲调”的 air。来自这三个不同源头的意义构成了当代英语 air 一词的各个义项，本节的讨论以“空气、气体”作为 air 的本义，不考虑由其他词源发展起来的义项。

陆谷孙（1991/2007：39－40）[②]列举了与 air（空气）相关的义项：

〔1〕 空气；新鲜空气；大气。如 breathe air；let some air into the room。

〔2〕 压缩空气。

〔3〕 天空，空中，空间。如 in the open air；mastery of the air。

〔4〕 （微）风。如 a hot summer day without a breath of air。

〔5〕 气氛；外观。如 an air of festivity；give quite a different air to the room。

〔6〕 公开的表示。如 He gave air to his opinion。

〔7〕 传送无线电波的媒质；（无线电、电视的）广播。如 fill the air with advertising。

〔8〕【口】空军（指人员和装备）；飞机；航空。如 navy air；go by air；Air France。

〔9〕 航空邮票。

〔10〕 （橄榄球）向前传球的进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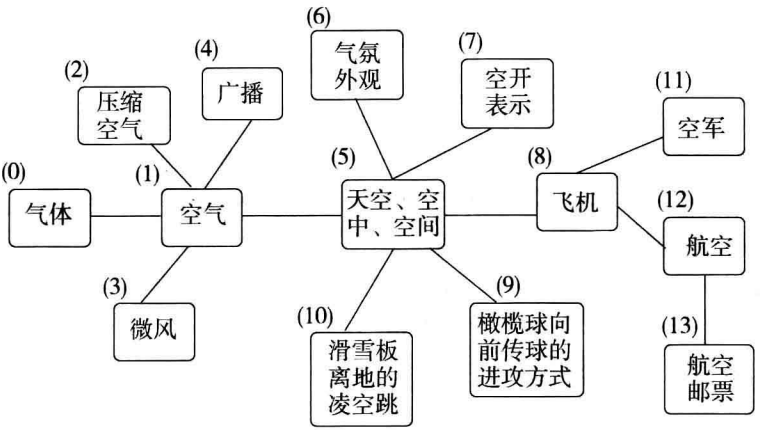
---

① 相关词源信息来自：http://odict.net/air/，登录日期 2011 年 1 月 30 日。

② 陆谷孙，1991/2007，《英汉大词典（第 2 版）》[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pp.39－40。

〔11〕(滑雪板离地的)凌空跳。

air 的诸多义项构成一个较为复杂的语义网络,如下图所示:



图表 8.8 air (空气)的一词多义现象

图中(0)是 air 语义网络的本源"气体"。由于人类先民在远古或上古时期不可能对各种气体的成分做出科学精确的分析,air 一词最初很可能指各种各样的气体。(1)是从气体概念中分离出来的"空气",这一过程的理据因素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转喻思维。(2)是封闭在容器中的压缩空气,(3)是流动的空气,(1)→(2)和(1)→(3)的意义扩展过程起作用的仍然是转喻思维。(1)→(4)同时涉及转喻和隐喻两种机制,首先通过转喻机制从 air 概念域中提取其"传送广播、电视信号的媒介"这一功能特征,再将这一特征投射到"广播、电视"概念域,形成跨越概念域的隐喻。(1)→(5)的意义引申是转喻和隐喻两种认知机制连续体的体现,既是由物质转指该物质存在空间的转喻思维,又有认知域的转移。(6)—(10)和(11)—(13)都分别是由(5)、(8)引申出来的扩展义,它们都是 air 通过隐喻机制产生的义项,显然和 air 属于不同的认知域,与本义"空气"之间的语义联系也极为松散。义项(9)、(10)、(13)涉及专门领域,较为冷僻。

air 的词义还在其构成的复合词中进一步引申发展。例如由空气看不到摸不着的性状特征通过转喻机制引申出"虚构;什么都没有"之意,如 aircastle (空中楼阁)、airhead (头脑空空的笨蛋)、air guitar (隐形吉

他，即模仿吉他手弹拨想象中的吉他）。可见 air 一词由“空气”的功能、性状、形态、存在场所等具体特征，通过转喻和隐喻机制的作用引申出了庞大复杂的语义网络，义项多为具体概念，其中不少涉及多次转隐喻操作。

8.2.3.2 “气”的一词多义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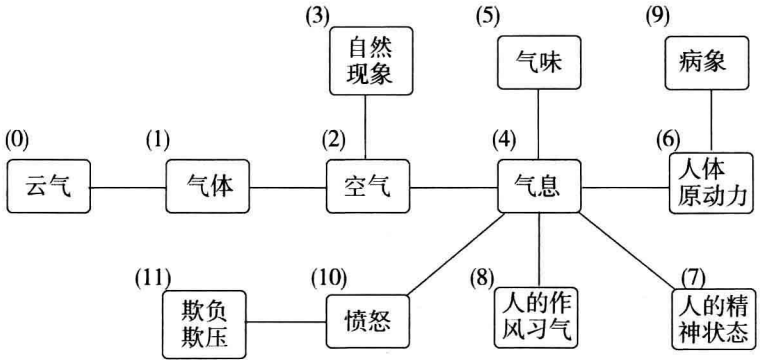
汉语和 air 大体对应的“气”是一个象形字，描摹气体上升的情状，本义指“云气”[①]，这可能是汉语社团借助“云气”这一有具体形象的气造字，泛指各种气体。齐冲天、齐小乎（2010：934）[②]认为“气又有乞求和给予的意思”，本研究只讨论从“云气”或“气体”引申而来的义项。“气”是中国古典哲学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是一切生命的本源，词义系统发达。《现代汉语词典》[③]“气”词条下共有 11 个具有名词特征的义项：

〔1〕气体。如“毒气”、“煤气”、“沼气”。
〔2〕特指空气。如“气压”、“打开窗子透一透气”。
〔3〕气息。如“没气儿了”、“上气不接下气”。
〔4〕指自然界冷热阴晴等现象。如“天气”、“气候”、“秋高气爽”。
〔5〕味儿。如“香气”、“臭气”。
〔6〕人的精神状态。如“勇气”、“朝气蓬勃”。
〔7〕人的作风习气。如“官气”、“娇气”。
〔8〕愤怒。如“生气”。
〔9〕欺负；欺压。如“挨打受气”。
〔10〕中医指人体内能使各器官正常地发挥机能的原动力。如“元气”、“气虚”。
〔11〕中医指某种病象。如“湿气”、“痰气”。

“气”的这些义项构成了一个意义网络，如下图所示：

---

① 见《说文》，段玉裁注“气本指云气，引申为凡气之称”。
② 齐冲天、齐小乎，2010，《汉语音义字典》[Z]，北京：中华书局，p. 934。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78/1983，《现代汉语词典（第 2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p. 903。



图表 8.9 “气”的一词多义现象

图中用(0)“云气”表示(1)“气体”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转喻过程，而(1)→(2)则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喻过程。(2)→(3)和(2)→(4)是兼有转喻和隐喻特征的意义扩展过程，所形成的概念(3)和(4)既与“气体”这一概念联系密切，又映射到“天气和气候状况”和“人的生理”这两个新认知域中。(5)—(8)和(10)均由(4)进一步引申而来，它们与“气”属于不同的认知域，是典型隐喻思维作用。(9)由(6)、(11)由(10)引申而来，进入新的认知域，也是由隐喻认知产生的扩展义项。

“气”的词义还在由其构成的双音词中有进一步的引申。譬如，“气”可喻指人的性格、修养、品德，构成“气度”、“气概”、“气量”、“气节”、“气魄”、“气质”、“脾气”、“气性”等词；“气数”、“运气”、“手气”等词中的“气”，则喻指命运；“气”还可以指社会生活的状态，如“风气”等；指力量和形势的情况，如“气势”、“气象(万千)”、“气焰”、“气宇(轩昂)”等；或指文章或书法绘画的意境和韵味，如“气韵”、“文气”、“诗气”等。可见“气”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少义项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涉及多次转隐喻机制的作用。例如，“气韵”一词的生成经历了“气体”→“空气”→“气息”→“人体器官机能运行的原动力”→“书画文艺作品的意境”这样复杂的转隐喻过程才得以生成。

8.2.3.3 air 和“气”一词多义转隐喻理据的共同特征

转喻和隐喻是人类共有的基本认知方式，具有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共性特征。从 air 和“气”的语义网络看，转喻和隐喻是英汉词汇意义衍生的理据力量，使这对基本概念词发展了庞大复杂的词义网络。

转喻和隐喻作为理据力量的共性突出地体现在词义衍生的最初阶段。air 和“气”都由涵盖各种“气体”的概念通过转喻衍生为人类呼吸吐纳的“空气”，说明早期生活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和认知水平极其类似。人类共同的生理机能、客观环境和认知机制导致不同语言发展了较为一致的核心概念词汇，并使它们经历了较为相似的语义衍生过程，成为人们跨越语言文化，实现交流互通的生理、物质和认知基础。由于转喻思维是比隐喻更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词汇转隐喻理据的共性特征在词义衍生的基础阶段，即转喻机制较为突出的阶段尤为明显。

转隐喻理据促成的词义衍生与词的使用频率高度相关：使用频率越高的词汇，越容易发生意义的转隐喻引申。air 和“气”是英汉语的基本概念词，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使用频率很高，词义系统复杂，用法多样，构词能力也特别强。一般说来，如果一个转隐喻义项收入词典，则意味着它凝固成为规约化语言的一部分（余红卫，2008：79）①。air 和“气”的转隐喻义项也因使用频率较高而出现语义凝固的现象，成为“死隐喻”，不必每次使用时都经过复杂的认知加工，大大提高了 air 和“气”使用的效率。对于那些经由多次复杂转喻和隐喻操作后产生的引申词义，如 air 的“航空邮票”义项和“气”构成的“气韵”概念，转隐喻义项的凝固尤为重要。

通过转隐喻机制扩展引申词义是语言系统高度发展的特征之一。一方面，转隐喻机制扩展了原有词汇的使用面，避免向语言系统大量引进新词项，实现现有词汇的最大效用。另一方面，通过转隐喻机制衍生

① 余红卫，2008，英语词汇意义拓展的隐喻理据[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78－79。

的词义，表达简洁，形象生动，修辞性强，理据性高，既便于语言社团掌握和使用，又能加强语言表达的效果，因而在英汉语中的应用都十分广泛。

8.2.3.4 air 和“气”一词多义转隐喻理据的差异

air 和“气”通过转隐喻机制形成的词义网络呈现出不同的倾向：air 衍生的义项数量较少且含义较为具体；“气”的引申义较多，且含义抽象而复杂。air 的语义网络共有 13 个名词性义项，这些义项基本都是具体概念，有些涉及较为生僻的专门领域，如体育运动和邮政。“气”在词典中单独列出的义项虽然只有 11 个，但在双音词中发展了较多更为抽象的含义，如“人的性格、修养、品德”，“命运”，“文章或书法绘画的意境”等义项，另外还有表示“一定环境中给人某种强烈感觉的精神表现或景象”的“气氛”、表示“某种吸引人的力量”的“气场”、表示“诗文中贯穿前后的思路、脉络”的“气脉”等义项。“气”似乎能随着语境和搭配（collocation）的不同变化衍生出无穷的意义，而且这些意义大多抽象程度很高，使用模糊而灵活。

隐喻是以人的体验为基础的认知活动，其主体是在一定自然、社会和人文条件下生活的人。语言社团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展和形成了特定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使得作为基本认知方式的隐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定文化的烙印。Lakoff & Johnson（1980：22）[①]指出，“一种文化中的最基本的概念隐喻结构和这种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陈家旭（2007：74）[②]认为，概念隐喻具有“文化一致性”。air 和“气”构成的语义网络也体现了英汉民族不同的信仰和观念。

air 通过转隐喻机制形成的各种引申义项基本都是表示具体客观事物的概念，与人的主体性无关。然而，“气”发展的转隐喻义项大多与人有关，如表示人的气息、人体机能、精神面貌、作风习气、性格修养、命运、社会风气等；一些表示客体的概念，也先经由转隐喻机制映射到主体认知域后，再映射到客体认知域形成。“气”在表示中医“病象”概念时，首

①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2.

② 陈家旭，2007，《英汉隐喻认知对比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先将气视为“人体机能运行的原动力”,“病象”是气在人体内运行不畅造成的结果。用“气”表示“病象”意义的引申过程是:自然界的气→人体的气→疾病,通过人这一主体形成“疾病”的客体概念。说“文气”时,我们将文章看做与人体类似的机体,文气与人体之气的功能一样,维系文章结构,保持脉络清晰,其概念也经由主体的中介形成。

张世英(1991:69)[①]指出,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是“主客二分”,中国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air 与“气”语义网络的这一差别,正体现了中西语言社团观察世界的不同角度和观念。西方文化将自然与人对立起来,认为人与对象世界是两个极端,将人的外部世界对象化、客体化,发展了追求严格逻辑和精密推理的形式思维。这一倾向在词汇方面体现为 air 这样的核心概念词,词义衍生过程与认知主体关联甚少,转隐喻思维投射而成的义项基本均指向客观世界。中国文化传统将宇宙看做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天”、“地”、“人”之间有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葛兆光,1998/2007:74)[②]。中国文化始终强调道器合一、体用不二的观念,发展了以人体感知世界的体悟思维。以“气”为代表的核心概念词衍生的转隐喻义项大都以“人”作为认知世界的参照点,通过人的体验和感悟观照世界,形成了迥异于 air 的语义网络。

第三节　英汉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

合成词构成了英汉词汇系统的主体,而复合法是最为重要的构词法之一。本节所讨论的汉语“复合词”指双音词,为行文方便采用与英语一致的术语。汉语不是形态语言,故而严格说来没有派生这一构词法[③],绝

① 张世英,1991,“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J],《哲学研究》(1):68-72。

② 葛兆光,1998/2007,《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p.74。

③ 汉语和英语派生法较为类似的构词法是形声。汉语所谓的“词缀”如“现代化”的“化”是西语词缀的翻译,而“老师”的“老”和“儿子”的“子”,多出于韵律上的需要。

大多数双音词都可算作本节所讨论的“复合词”。

名名复合词($N_1 + N_2 \rightarrow N$)在英汉语中都是重要的词汇形态。从整体上看,英语虽然派生词占合成词比重最大,但近几十年来产生的新词却以复合词为多,其中 90% 的新生复合词都是名词(参见黄洁,2008:25)[①]。董秀芳(2004:129 - 130)[②]也注意到“名词性成分与名词性成分组合成名词是现代汉语词法结构里最能孳生新词的格式”,指出虽然“在句法层面,形名组合是定中式短语的主要样态,但在词法层面,定中复合词的原型样式是名名组合”。由于组成名名复合词的 N_1 和 N_2 都是具有明确概念结构的名词,故而不论是 N_1、N_2 还是 N,所激活的认知域都简洁清晰,边界清楚,有利于语言研究的开展。名名复合词虽然结构明晰,但 N_1 与 N_2 之间,N_1、N_2 与 N 之间却暗含复杂的语义关系,其中不少涉及转喻、隐喻及两者的交互作用,较为突出地体现了转隐喻机制的理据作用。故此我们以名名复合词为例,探讨转隐喻机制如何成为复合词构成的理据因素。

8.3.1 英汉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类型

传统语言研究往往以组成成分的句法和语义关系为标准对合成词进行分类,如将英语合成词分为向心式和离心式,将汉语双音词分为并列式、偏正式、述补式等。这样的分类未能体现转隐喻合成词的认知特点。近年来,不少学者将认知视角和结构标准相结合,探讨复合词的类型和生成机制,如 Packard (2000/2001)[③]等。本研究也采取类似标准,

① 黄洁,2008,汉英隐转喻名名复合词语义的认知研究[J],《外语教学》(4):25 - 29。

② 董秀芳,2004,《汉语的词库与词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p. 129 - 130。

③ Packard, Jerome L. 2000/2001.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并参照黄洁(2008[①]；2010[②])和周先武、王文斌(2010)[③]的分类，将英汉语转隐喻名名复合词分为半喻式、全喻式和双层比喻式三类。

8.3.1.1 半喻式名名复合词

半喻式名名复合词只有一个构成成分为比喻性用法，转喻或隐喻可能发生在 N_1，也可能发生在 N_2 上。这样的名名复合词在英汉语中都大量存在，如：

N_1型半喻式名名复合词		N_2型半喻式名名复合词	
蜜月	*head*lamp	心扉	eye*lid*
鱼雷	*foot*note	风口	eye*ball*
枕木	*gold*fish	祸根	flower*bed*
门牙	*silver*birch	水珠	finger*tip*
锦霞	*sword*fish	匪巢	arrow*head*
墨镜	*net*work	鼻翼	stress *puppy*
梯田	*frog*man	脑桥	work*flow*[④]
柳眉	*package* tour	雨丝	phone *tree*[⑤]
扇贝	*flash* mob[⑥]	海狗	organ *bank*
耳房	*anchor* store[⑦]	墙裙	career *coach*

图表 8.10 英汉半喻式名名复合词

---

① 黄洁，2008，汉英隐转喻名名复合词语义的认知研究[J]，《外语教学》(4)：25－29。

② 黄洁，2010，基于参照点理论的汉语隐喻名名复合词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5)：64－71。

③ 周先武、王文斌，2010，英语名名复合词中独立框架与复合框架关系研究[J]，《中国外语》(3)：36－41。

④ Workflow (工作流)即业务过程的部分或整体在计算机应用环境下的自动化。

⑤ 电话联系网。

⑥ Flash mob (暴闪族)指出没于全球各大城市，追赶时髦，能爽快地表达内心所想随即迅速散去的城市新兴群体总称。

⑦ Anchor store (锚店)购物中心或大型卖场中最吸引人潮的主要零售店、超级店铺、主力店铺等。

N_1型半喻式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现象发生在构成复合词的第一个名词即N_1上。N_1激活概念域的某些特征，如形状、颜色、位置、功能等，与N_2概念整合在一起，形成复合词。如“梯田”激活了梯子的形状特征，与另一概念“田地”合成了“梯子形状的田地”这一新的概念；“锦霞”激活的则是锦缎的颜色特征，再映射到“云霞”概念域上，形成“具有锦缎颜色的云霞”这一概念。N_1型半喻式名名复合词的喻体名词一般仅具有描述性，没有指称性。黄洁(2008：2－3)[①]认为，名名复合词的形成是复合结构N的构式义压制成分结构N_1和N_2词汇义的结果，使N_2保留指称功能，N_1发生由指称功能向描述功能的转变。

N_2型半喻式名名复合词的隐喻现象发生在构成复合词的第二个名词即N_2上。N_2概念的某一特征被激活，与N_1概念整合后形成新的概念N。例如bottleneck中的neck激活了“脖子”的形状和位置特征，在与“瓶子”这一概念整合后形成新概念“瓶子靠近瓶口的较细的部位”；而eyelid则以lid激活了盖子的功能特征，用以指“眼睛的盖子”即眼皮这一概念。与N_1型复合词不同，N_2喻体名词具有来源于比喻的指称意义，而且喻体的比喻义往往已经固化(黄洁，2008：28)[②]。

半喻式名名复合词由于只有一个构成成分发生了隐喻，最终形成的新概念N一般具有较高的语义透明度，N的整体意义多能从构成成分N_1和N_2直接推知，是理据明晰的复合词。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复合词生动形象，便于理解和记忆，在英汉语中均大量存在，是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主体。

8.3.1.2 全喻式名名复合词

全喻式名名复合词两个构成成分都呈现比喻用法，或复合词整体为比喻用法，故而出现整体语义偏离字面义的状况。该类名名复合词有三种类型：并列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分别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和整体的

① 黄洁，2008，名名复合词内部语义关系多样性的认知理据[J]，《语言教学与研究》(6)：1－7。

② 黄洁，2008，汉英隐转喻名名复合词语义的认知研究[J]，《外语教学》(4)：25－29。

全喻式名名复合词。

并列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	分别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		整体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	
唇齿	生手	gerbil tube①	佛手	sand castle②
甘苦	秒杀	phoneneck③	虎穴	poison pill④
胃壤	脚夫	mother tongue	猴头	Wall Steet⑤
爪牙		green hand	布衣	wallflower⑥
手足		firedog⑦	牛皮	doghole⑧

图表 8.11　英汉全喻式名名复合词

并列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是汉语较为特殊的一类全喻式名名复合词，构成复合词的 N_1 和 N_2 是两个意义和功能对等或对立的名词，两者同为喻体，且地位相当、功能对等。如“唇齿”以嘴唇与牙齿的关系喻指“密切的关系”；而“爪牙”则用爪子和牙齿的形象比喻“坏人的党羽”。汉语中这类名名复合词数量较多，比较典型的还有“领袖”、“喉舌”、“榜样”、“标准”、“彪炳”⑨、“尘芥”、“心腹”、“规矩”等。并列式复合词在印欧语中非常少见，即使是在复合词比重很大的德语中也很罕见。汉语与印欧语的这一区别是由汉语双音节的基本音步造成的。董秀芳（2002：107－108）⑩认为：

---

① gerbil tube 指两幢建筑物之间起连接作用的管型玻璃通道。
② sand castle 指缺乏实质或重要性的一切事物。
③ phoneneck 指因长时间打电话引起的肩颈疼痛。
④ poison pill 指现代公司为避免被对方兼并而向对方索取极高代价的阻挠措施。
⑤ Wall Street 指美国金融投资界。
⑥ wallflower 指坐着作壁上观的人。
⑦ firedog 指壁炉护栏。
⑧ doghole 指像狗洞一样凌乱的住所。
⑨ “彪”是老虎身上的斑纹，“炳”指光明、光辉；“彪炳”即“文采”之意。
⑩ 董秀芳，2002，《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pp. 107－108。

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有一些人为创造的因素在里面。因为当双音节音步建立以后，为满足韵律的要求，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单音形式换成双音形式以达到某种辞气顺畅的效果。双音并列形式由于可以不改变原来单音形式的语义而成为一个音步，从而构成一个韵律词，因而备受语言使用者的青睐。

分别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指构成复合词的 N_1 和 N_2 分别发生转隐喻后再复合的名名复合词，N 的两个构成成分多呈现向心关系，即中心词为 N_2，N_1 对 N_2 起修饰限制作用。例如，在 mother tongue 中 mother 喻指“自己的民族和国家”，tongue 喻指语言，两者复合后表示“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语言”。

整体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在英汉语中都有不少，即构成复合词 N 的 N_1 和 N_2 先合成为一个整体，随后这一整体发生转隐喻现象。譬如，“猴头”整体发生隐喻后指一种长得类似猴子头部的食用菌，Wall Street 作为一个整体喻指“美国金融投资行业”。

由于涉及的转隐喻过程更多、更复杂，全喻式名名复合词语义透明度总体上说来低于半喻式复合词。全喻式名名复合词的语义较为隐晦，难以从字面上看出，会给识解造成一定困难。例如，“牛膝”并不是牛的膝部，而是一味中药，因为其茎上有节，节部膨大状如牛膝，故而得名。无论是母语学习者还是外语学习者，涉及全喻式名名复合词时都要注意避免望文生义，方能正确理解和掌握它们。

8.3.1.3 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

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涉及连续两个层次的转隐喻过程，即构成复合词的词素先在 N_1、N_2 或 N 这一层面发生一次转隐喻过程，再进一步发生整体的词义引申。英汉语中都有这样的复合词。譬如，“鳌山”先用“鳌”的形状喻指“像鳌一样的山”，然后“鳌山”整体喻指“元宵节时扎的鳌形大型彩灯”；housewife 本来喻指“a wife who keeps house”，后来又进一步发生隐喻，指“能像家庭主妇那样妥帖精心的便携式缝纫工具”。

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	
鳌山	housewife
窠臼①	bottleneck
银河	
车笠	
板眼②	

图表 8.12 英汉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

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的解读要涉及不同层次的多次转隐喻识解，复合词 N 的意义十分隐晦，很难从构成成分 N_1 和 N_2 直接推知，往往让人产生词汇形式和意义间毫无联系的印象。例如，“车笠”一词表示“地位相差悬殊的人之间很深的交情”，令人十分费解。事实上，古时富贵的人乘车，贫贱的人戴笠，故用“车”转喻富贵的人，用“笠”转喻贫贱的人，两者构成复合词时语义再次引申，通过隐喻机制由“人”的概念域投射到“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概念域中。双层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理据虽然存在，但由于涉及多次转隐喻作用往往难以探求，所以英汉语中的这类词比重不大，其中活跃的常用词数量更少。但是，这类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高度的人文性、趣味性、修辞性，集中体现语言社团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往往也能吸引语言学习者和研究者较多的关注。

8.3.2 英汉名名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认知解释

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可从认知角度做出合理解释，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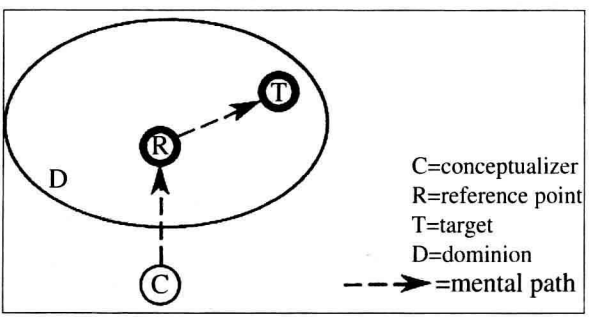
---

① “窠”指动物的巢穴，“臼”是一种中间凹下的舂米用具，本用“窠”和“臼”的外形特征喻指中国传统建筑门上承受转轴的臼形小坑，后指现成的格式或固有的模式。

② 古代戏曲的节拍，节拍强处击板，节拍弱处击鼓，前者曰“板”，后者曰“眼”，“板眼”指音乐的节拍，后喻指办事的条理、步骤。

8.3.2.1 认知参照点模型

Langacker (2000：171－202)[①]提出了认知参照点理论，认为我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时，往往要借助另一个事物作为基础，这就是参照(reference)活动。参照活动是以一个事物为心理通道通达另一事物的认知过程，是人类基本的认知方式之一。下图所示即为人类认知参照活动的模型，即识解者 C 以认知域 D 中的参照点 R 为基础，实现对目标 T 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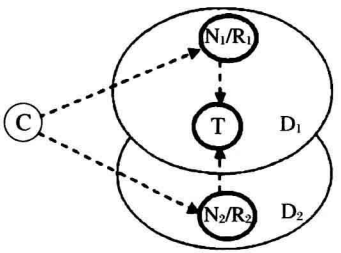
图表 8.13 认知参照活动模型(Langacker, 2000：174)

黄洁(2010)[②]用 Langacker 的认知参照点理论解释汉语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识解过程，认为对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识解是以喻体为参照点，通达本体目标的认知参照活动，并将理解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参照活动分为四种：(1)直达式参照活动，用以理解半喻式名名复合词；(2)并联式参照活动，用以理解并列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3)链式参照活动；用以理解分别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和部分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4)阶梯式参照活动，用以理解整体的全喻式名名复合词和部分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词。下图是识解“爪牙”一词的认知参照活动，由 N_1“爪”和 N_2

① Langacker, Ronald W.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71－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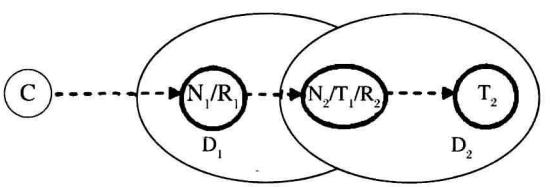
② 黄洁，2010，基于参照点理论的汉语隐喻名名复合词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5)：64－71。

“牙”作为参照点，均指向同一目标 T“坏人的党羽”。



图表 8.14 “爪牙”识解的认知参照活动(黄洁，2010：68)

识解“鳌山”的认知参照活动则先以 N_1“鳌”为参照点通达本体 N_2，形成目标 T_1“鳌形的山”，再以 T_1 为参照点通达 T_2“元宵节活动中扎的鳌形大型彩灯”。



图表 8.15 “鳌山”识解的认知参照活动(黄洁，201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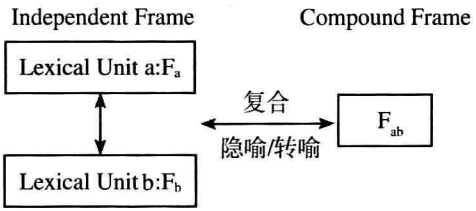
认知参照活动的实现以百科知识为基础，参照点 $R(N_1)$ 激活的认知域 D 包含了和 $R(N_1)$ 有关的所有概念特征，如形状、颜色、外观、功能、结构等。识解者提取哪一特征以识解 $T(N_2)$，取决于该特征的凸显度和该特征与 N_2 所指概念的匹配程度。

8.3.2.2 框架语义学视角

Fillmore & Atkins (1975)[①]将框架这一概念引入语言研究，指出框

① Fillmore, C. J. 1975.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R]. In Gogen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C].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123 - 131.

架是特定而统一的知识结构和概念结构。周先武、王文斌(2010)[①]用框架概念解释英语名名复合词的生成,将 N_1 和 N_2 所代表的语义框架定义为独立框架 F_a、F_b,N 所代表的语义框架定义为复合框架 F_{ab},将英语名名复合词的复合模式描写如下:



图表 8.16 名名复合词识解的框架复合模式(周先武、王文斌,2010: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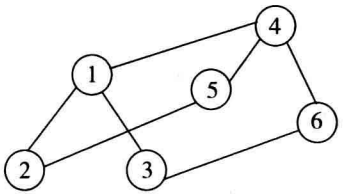
同时,他们将英语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独立框架与复合框架之间的关系依照转喻和隐喻的不同机制分为五种:(1)隐喻作用下的复合框架语义部分偏离型,(2)转喻作用下的复合框架语义部分偏离型,(3)隐喻作用下的复合框架语义整体偏离型,(4)转喻作用下的复合框架语义整体偏离型,(5)隐转喻共同作用下的复合框架语义整体偏离型。其中,前两种类型针对半喻式名名复合词,后三种为全喻式名名复合词。他们的研究表明,语义框架的复合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隐喻和转喻是激活框架转移,形成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重要手段。这一框架复合模式也能较好地解释汉语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构建和识解过程。

8.3.2.3 棱柱形模式

Geeraerts (2002)[②]用棱柱形模式(Prismatic Model)解释复合词的语义,也可以较好地解释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该模式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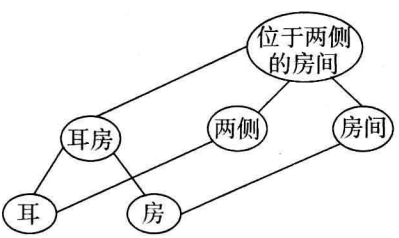
① 周先武、王文斌,2010,英语名名复合词中独立框架与复合框架关系研究[J],《中国外语》(3): 36 - 41。

② Geeraerts, D. 2002.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osite Expressions [A]. In Dirven & Pörings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 Moulton de Gruyter. pp. 434 - 465.



图表 8.17　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棱柱形模式(Geeraerts, 2002: 438)

图中①表示名名复合词 N 的字面义,②为 N_1 的字面义,③为 N_2 的字面义,④表示 N 的比喻义,⑤是 N_1 的比喻义,⑥是 N_2 的比喻义。该图形构成一个棱柱体,故称"棱柱形模式"。例如,"耳房"一词的识解如下图所示:



图表 8.18　"耳房"识解的棱柱形模式

其中转隐喻过程发生在由"耳"发展出"两侧"义的过程中。

8.3.2.4　认知理论对英汉名名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解释力

当前认知语言学蓬勃发展,各种理论模型层出不穷,已成为语言研究的"显学"。认知语言学的转隐喻理论将转喻和隐喻作为人类共有的基本认知方式,各种理论模型有较多互通之处,如 Lakoff 的理想化认知模型(ICM)、Fauconnier 的心理空间、Langacker 的认知域、Fillmore 的框架等概念,在转隐喻的构建和识解中均指由某一概念激活的、具有特定结构的、含有种种相关特征的心理网络。名名复合词 N 的转隐喻过程发生在其构成成分 N_1、N_2 激活的一个或数个心理网络中,涉及相关特征的网内或网际转移、投射和互动。认知理论对涉及较多人类认知共性的

转喻和隐喻机制有较强解释力，能较为合理地解释英汉名名复合词内部较为复杂的转隐喻关系。

但是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认知理论对名名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解释仍不尽完美。例如，认知隐喻理论强调概念意义是以人类经验为基础产生的，但是在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构建和识解过程中，人的经验如何参与到具体的认知过程，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起到多大的作用，要充分说明这些问题还有待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又如，某一概念激活的认知域中含有大量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和特征，而一般仅有一两个特征参与复合词的建构。目前转隐喻理论对这一特征筛选机制仅以凸显度和匹配度加以解释，其中精细的认知加工过程仍然不为人所知。另外，目前认知理论仅能解释转隐喻复合词涉及的部分语义关系，而正如王军(2008)[①]所指出的，名名复合词的生成还涉及诸多非语义特征，如韵律、重音、词序等因素的影响。语义因素和非语义因素等理据因素如何影响互动，共同塑造转隐喻复合词的面貌，仍是研究继续深入的方向。

8.3.3 英汉文化和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

转喻和隐喻认知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认知能力，其作用机制具有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共性，英汉名名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共同机制就是转隐喻认知普遍性的体现。此外，不同语言社团的转隐喻思维还与语言所处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那些在某一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概念较易通过转喻和隐喻机制发生语义引申，同时反映重要概念的词汇(词素)也具有较高的能产性，能够生成数量众多的复合词。大量经转隐喻认知生成的复合词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成为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互动的最好注脚。

英语社团和汉语社团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诸多

① 王军，2008，英汉复合名词的非语义特征及其相关认知阐释[J]，《外国语》(2)：33－39。

差异反映到词汇上，往往表现为表示同一概念的词发展了不同的转隐喻义项，或相同的转隐喻意义借助不同的意象表示。例如，面包是西方人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主食，bread 一词发展了“生活必需品”的含义，合成词 breadline 即表示“最低生活标准”；而汉语社团以大米为主食，对面包的需求很小，故而汉语用“柴米”表示“生活必需品”之意。一旦涉及文学、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内核部分，英汉复合词的转隐喻意义则更受到文化的影响和限制。例如，“草圣”在汉语中特指东汉张芝、唐代张旭这两位以草书闻名的大书法家；“东家”指雇主或主人，是因为周礼有“客人就西阶、主人就东阶”之说。

文化因素对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影响首先体现为，文化因素作为百科知识的一部分积极参与认知域的建构，通过影响转隐喻认知活动而影响或决定词义的引申和发展。例如，《庄子·逍遥游》中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之句，故而“椿”成为长寿的象征。《论语·季氏》有“鲤趋而过庭”，“趋庭”就发展了受父亲教训的意思。在这两个典故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了“椿庭”一词指父亲。可见中国古代经典中的词句成为“椿庭”二字词义引申的背景，进入“椿庭”一词所激活的认知域，进而促成该词“父亲”这一引申义的发生。

文化因素对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转隐喻引申义进行识解的过程中。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转隐喻复合词的意义引申往往涉及复杂的文化因素，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对这类具有深层文化内涵的复合词进行识解就会遇到困难。这一问题在识解全喻式和双层比喻式复合词这样涉及多次转隐喻操作的词汇时尤为突出。在“春日山容，其色如黛”中，汉语以“春山”喻指女子的眉毛。又如，古代婚礼新郎到女方家里迎亲时，献雁以为贽礼，故而以“奠雁”喻指婚礼。这些转隐喻复合词富有文化意味，其识解需要从转隐喻理据形成的文化因素入手方能成功。一种语言背后的历史越悠久，文化越厚重，文化因素对词汇转隐喻理据的影响也越明显。

文化因素不仅具有独特性，同时也能在不同语言和文化间交流。文化的这一互通性成为不同语言文化理解和沟通的基础，如汉语“瓶颈”、“蜜月”、“马力”、“代沟”等词，是英语 bottleneck、honeymoon、

horsepower、generation gap 等转隐喻复合词的翻译，在进入汉语时将其背后的转隐喻理据也一并带入。转隐喻理据跨越语言文化的互通往往为一种语言注入新鲜的表达方式，起到丰富语言表达的作用。同时，文化影响的语际转移虽然是双向的，但强势语言文化对弱势一方的影响远胜于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的影响。

第四节　小结

本章讨论转喻和隐喻这两种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作为理据因素对英汉词汇系统产生的影响。

第一节从认知这一不同于修辞学研究的新视角介绍转隐喻现象。概念隐喻在普通语言中广泛存在，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认知语言学者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能较好地解释隐喻的认知机制，说服力强，影响广泛。概念转喻是与隐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认知现象，比隐喻更为基础，普遍存在于非修辞性语言中，与隐喻构成一个连续体。

第二节讨论英汉词汇系统广泛存在的一词多义现象及其转隐喻理据。转喻和隐喻思维是英汉词义衍生的认知基础和驱动力量，通过辐射和连锁两种词义衍生方式，形成英汉语普遍的一词多义现象。air 和“气”是英汉语大体对应的核心概念词，它们的语义网络反映了英汉一词多义转隐喻理据运作的共性和差异。air 和“气”的衍生义项由其本义经过转喻和隐喻机制发展而来，在转喻为主的初始阶段都经过了由“气体”到“空气”的衍生过程，但随后的意义衍生过程则差异很大。air 的语义网络多含表示客体的具体概念，“气”的语义网络多为与主体有关的抽象概念，两者的差异反映了英语社团“主客二分”与汉语社团“天人合一”的不同观念。

第三节讨论英汉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英汉转隐喻名名复合词分为半喻式名名复合词、全喻式名名复合词和双层比喻式名名复合

词。目前认知语言学发展的认知参照点模型、框架语义学模型和棱柱形模型这三种认知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名名复合词的转隐喻理据机制进行解释，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文化因素作为认知域百科知识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到转隐喻认知过程中，对英汉转隐喻名名复合词的建构和识解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第九章

结　论

语言理据问题是一个世人已经探究了两千年的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富有无穷魅力、常谈常新的问题。对语言理据的看法，反映了语言社团基本的语言观，是语言研究关注的根本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从英汉词汇系统的诸多异同和英汉语言符号理据类型、理据程度之间的种种内在联系入手，论证了三个要点：(1)英语共时词汇系统的根本属性是任意性，汉语词汇则是一个理据性居主导地位的系统；(2)英汉语有诸多共同的理据机制，但理据类型和程度的不同也是导致英汉词汇系统诸多差异的根源之一；(3)理据是塑造词汇系统基本面貌的重要力量之一。

“理据”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既是语言符号结构上的可分析性，也是语言符号生成的机制和动因；既是语言系统内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种种关系，也是语言系统与语言所处的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之间的互动。研究理据现象，不能仅将语言作为单一的、静态的、封闭的符号系统，还要将语言看做多元的、动态的、开放的符号系统；不能仅将语言作为客体的、均质的、理想的对象进行研究，还要将语言作为主体的、复杂的、现实的对象进行研究；不能仅关注语言当前的状态，还要注意语言的历史、传统和发展；不能仅从西方的理论视角观察语言，还

要从中国的传统语言理论出发观照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质。这也就是说，语言理据的研究必须跨越语言系统内外，兼顾共时历时，包容中学西学，融会科学人文。

中西学术对语言理据问题的研究历史悠久。流传已久的宗教传说和神话故事就反映了人类社会早期的语言理据观念。及至哲学空前繁荣的“轴心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哲学著作中都出现了针对语言理据问题的探讨和争论。这种对语言理据问题的关注，穿越了整个古代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当代。因而中西语言研究传统在各自独立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理据观和理据研究传统：西方自希腊文明开始就以任意论、约定论为主，而中国的传统语言研究则以理据研究为核心，堪称一部理据研究史。

我们认为，**语言理据是语言的形式及演变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联系**。语言理据从共时角度可以分为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从历时角度可以分为原生理据和次生理据。内部理据关注语言系统各级符号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外部理据讨论语言系统所处的各种环境因素与语言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原生理据反映了人类先民认知现实世界，并将现实世界转化为语言世界的方式；而次生理据则反映了语言社团利用原生符号创造其他语言符号的规律。

英汉词汇系统从共时角度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从历时的角度可分为原生词和次生词。如果排除外来语这样的异质成分，我们发现，单纯词和原生词、合成词和次生词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现象。故而，我们将英汉词汇系统大致分为（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词、合成词和外来语三个部分，分别讨论其理据类型和理据程度。英语单纯符号主要是（来源于古英语的）单音节词，汉语主要是独体字；英语合成符号主要是复合词和派生词，汉语主要是合体字和双音词；英语外来语主要是借词，汉语主要是写音外来语。

理据因素和理据现象的复杂性使得理据研究必然涉及词源、历史、文化、交际者等语言系统外部的因素。但为使研究成果对当前语言理论建设和语言实践活动有更大的启发，本研究主要关注英汉共时词汇系统的理据现象和对共时词汇系统影响较大的理据因素。本研究对词汇理

据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对词汇系统内部种种理据因素与理据关系的探讨，其中包括对(具有原生符号性质的)单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合成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和外来语的理据性进行英汉对比研究；(2)对词汇系统与外部理据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主要针对经济理据和转隐喻理据这两种对英汉共时词汇系统影响较为显著的理据因素进行英汉语间的对比研究。

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以“单纯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为核心，在理论语言学界确立地位已近百年，影响广泛而深远；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三个限制条件却往往为人忽视，它们是：(1)排除了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的干扰；(2)将语言学的对象确立为音义结合的抽象心理实体；(3)忽略拟声词和感叹词。第一个限制条件排除了对语言系统发挥作用的表意文字(特别是汉字)对任意性理论的干扰；第二个限制条件排除了拼音文字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同时切断了人类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第三个限制条件扫除了语言系统中仅存的语音理据的残痕对任意性理论体系的干扰。索绪尔的任意性理论是科学语言理论的完美典范，充满了理想化的魅力，是西方语言研究及思想传统两千多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如果我们以根植于西方思想传统和语言事实的任意性理论来观照汉语汉字和中国传统语言思想，就不得不承认两者格格不入的事实。汉字在汉语系统中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不是“符号的符号”，故而不能被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参照第一、第二个限制条件)；语言符号，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必然是人类历史和经验的积累，存在现实的和物质的基础，而不可能完全来源于心灵(参照第二个限制条件)；科学研究中被忽略的小量甚至是痕量，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非无关紧要(参照第三个限制条件)。

我们的研究和论证表明，汉字在汉语系统和汉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故而文字应被视作语言符号的要素之一。英汉单纯语言符号都具有**三元符号结构**，由语音、语形和语义三个要素构成；语言符号的三元结构模式是文字文明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符号结构理论。语言符号内部有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两对“形式—意义”关系同时发挥作用。音义关系体现的形式和意义联系称作**语音理据**，而形义关系体现的形式

和意义联系称作**文字理据**。语言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均来源于人类历史和经验的积累，有现实和物质基础，其产生必然有一定水平的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语音具有不稳定、易变异的特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迁渐渐磨损丧失，故而在共时语言系统中仅有痕量保存。文字便于规范统一，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容易在语言中保存下来。英汉语单纯符号均有残存的语音理据，拟声词和感叹词就是具有语音理据的词汇；而在文字理据方面，英语与汉语则体现出很大的差别。英语使用的文字是他源性的拼音文字，仅用来记录语音，文字理据在辗转借用的过程中丧失殆尽。虽然在后来的使用中，发展了一些以字形表示意义的词汇，如(T-shirt、zigzag)，但是数量非常有限。英语单纯符号仅有十分微弱的文字理据性。汉语使用的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独体汉字多为象形字和指事字，来自对现实的直接摹写，反映了汉语社团认知世界的基本概念，具有很高程度的文字理据。英语系统由于文字要素地位的缺失，呈现出音义关系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从这一角度看，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无疑是适用的。汉语系统受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的共同作用，语言符号的内部关系更为复杂。但是，汉语符号形义关系的作用往往比音义关系更重要。

西方任意论是将人类语言经过客体化、均质化处理之后，在理想状态下进行科学的语言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的理据观是将语言连同语言所处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与人这一主体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系统的人文研究而得出的结论。理据观和任意论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观，源于不同的语言事实和思想传统，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中西方语言观念和研究方法的会通和整合，必然能为今后的语言研究带来更多启示。

相比单纯语言符号，英汉语通过各种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的合成符号具有更多共性。典型英语合成词由两个词素构成，其中复合词由自由词素构成，派生词主要由非自由词素构成。其构成的典型方式为：前位词素多表示特性，后位词素多表示实体。典型汉语合成词也由两个成分构成。其中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构成，声旁多表示特性，形旁多表示实体；双音词由两个汉字构成，前字多表示特性，后字多表示实体。可

见**“特性＋实体”的合成符号向心结构式**，是英汉语合成词汇共同的构成模式，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合成符号结构模式，反映了人类将简单语言符号组织成复杂语言符号的共同机制。这一模式使得合成符号语义较为透明，具有较高水平的理据程度。由于英汉语各级合成符号都具有同构特征，“特性＋实体”的典型结构式是英汉语各级合成符号构成的基本模式。此外，汉语合成符号的构成明显受到音韵规律的影响，如合体字的音韵理据和韵律词的双音节音步对汉语合成词构成起到重要作用。

英语外来语主要是“保留语形，改变语音”的借词，主要来自印欧语系内部，数量庞大，占英语词汇系统的大部分。汉语外来语主要是写音外来语，其实质是用汉字转写外来语的语音。写音外来语主要来自印欧语系，数量约为数千至一万，占汉语词汇的比重不大。一种语言对外来语的吸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引进和同化。英语以语形为契合点引进借词，汉语以语音为契合点引进写音外来语。语形和语音分别是英汉语符号结构中相对较为次要的要素，以这种方式引进外来语，能把对语言系统既有结构和既有关系的触动降到最低，符合语言系统运作的经济原则。英汉语对外来语同化的实质，是语言核心机制对外来语这一异质成分进行筛选和改造的过程。同化后的外来语，异质性降低，由词汇系统的边缘成分向典型成分靠拢。英语对外来语的同化主要调整音义关系，使其符合英语的发音规则；汉语对外来语的同化主要使写音外来语向形义结合的方向发展，是一个使写音外来语**理据化**的过程。完全同化的外来语，具备了与本族词汇同样的性质和特征，具有很高的能产性，能积极参与新词的构造。但从总体上说来，外来语是典型的低理据性词汇。

在分析了英汉词汇系统各主要部分的理据性之后，我们对英汉共时词汇系统整体的理据程度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英语理据性极低的单纯词和借词（两者有很大的交叉部分）数量庞大，地位重要（如基本概念和核心概念多由单纯词表达）；而具有较高形态理据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在词汇系统的重要性相对次要（较多使用频率较低的专业词汇）；故而**英语共时词汇系统的理据性较低**。汉语独体字、合体字和双音词都具有很高的理据性，占词汇总量的绝大部分；而音义关系主导的联绵词和写音

外来语是词汇系统的边缘现象，数量很少；所以**汉语共时词汇系统的理据程度很高**。

语言系统所处的各种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人文因素都会和语言系统发生互动作用，影响语言的结构和使用。在对词汇系统产生影响的各种外部理据因素中，本研究主要讨论对共时词汇系统影响较为显著的经济理据和转隐喻理据，而对以往讨论较多的词源、文化因素则不再辟专章讨论。

经济理据既作用于词汇系统和语言使用者之间，成为语言词化现象的主要驱动因素，又作用于词汇系统内部，成为调节语言“开放性”的重要机制。词化指将概念（或语义材料）表达成词的过程和结果，是各种语言中受经济原则驱动的普遍现象。经济原则对词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社团总要使用较为简约便捷的方式表达所需的概念，这种倾向称为**表达简约**。表达简约与语词的使用频率有密切的关系，那些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词，往往词化程度也较高，在形式上多使用较为简约的方式；而使用频率低的概念，则较多地通过复杂的结构表达。另一方面，由于词化程度高的语词需要语言社团付出更多的记忆和认知加工，语言社团总是试图通过减少词项而将词库规模控制在便于记忆和使用的范围，这一趋势称为**记忆简约**。表达简约和记忆简约同时从相反的方向作用于词汇系统，使得词汇系统同时存在提高词化程度和降低词化程度的需要。任何一个成熟高效的词汇系统，都是两者共同作用，相互平衡的产物。英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从历时看，都经历了词汇量不断增加、词库规模由小到大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词化程度逐步提高的过程。同时英汉语也都通过增加合成符号的比重达到降低词化程度、控制词库规模的目的。在控制词化程度和词库规模方面，汉语词汇系统的高理据性使得需要语言社团较多记忆加工的常用汉字，几千年来始终保持在3 000左右；而英语由于任意的单纯词比重很高，词库规模比汉语大得多。总的说来，英语的词化程度比汉语高。

英语由于外来语数量庞大，被称为“开放型”语言的典型；而汉语写音外来语数量相当有限，则被作为“封闭型”语言的代表。英语与汉语在开放性方面的差异，与各自的历史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由语言的内部

机制造成的。英语核心机制音义关系呈现出任意性占绝对优势的状态，对进入其中的借词排斥很少，借词较易被英语接受，成为稳定的词汇成分，甚至积极参与新词的生成，变为典型词汇的一部分。汉语理据程度很高的形义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发挥主导作用，要求新词能够符合汉语固有的理据模式，故而对写音外来语体现了强烈的排斥倾向。汉语历史上也曾大量引进写音外来语，但是这些语词中的大部分最终遭到淘汰。外来语是词化手段之一。一种语言需要通过语词将一个新的概念表达出来时，可以采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语言材料创造一个新词或将这个概念翻译过来，也可以从其他语言中引进一个外来语，而经济因素决定这种语言最终会采用哪种方式。如果这种语言吸收外来语的成本很低（如英语），它就会大规模地通过吸收外来语来满足词化的需求；如果它吸收外来语的成本很高（如汉语），就会较多地采用自身的语言材料创造一个新词或翻译这个概念。一种语言所体现的开放性，就是这种经济选择机制作用的结果。各种语言为满足其真正的需要而吸收外来语的能力是同等的。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转喻和隐喻的看法脱离了传统修辞学的视角，而将它们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日常语言普遍具有转隐喻特征。以 Lakoff、Fauconnier、Langacker、Fillmore 等学者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派对转喻和隐喻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解释力较强的理论模型，如概念隐喻理论、合成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认知参照点模型等。转喻是比隐喻更为基础的认知方式，与隐喻构成一个连续体。英汉词汇系统的转隐喻现象主要表现为一词多义和转隐喻名名复合词。转喻思维和隐喻思维是词义衍生的认知基础和驱动力量，有助于提高词的使用效率，形成形象生动、修辞性强的语言表达，在实现语言经济性的同时提高语言的表现力。一般说来，语言的核心概念词由于重要性强、使用频率高，容易形成大规模的语义网络。英汉语核心概念词 air 和“气”衍生的名词性义项构成一个复杂的语义网络，在意义衍生的初始阶段有较多共性，说明人类的转隐喻思维，尤其是较为基础的转喻机制具有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共性特征。同时，air 和“气”在语义拓展的中后阶段由于英汉语言系统的不同特点和英汉民族截然不同的思维

方式和文化背景，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英汉名名复合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转隐喻认知机制驱动产生的，这些词可分为半喻式、全喻式和双层隐喻式三类；其中半喻式名名复合词语义透明度较高，成词理据往往一目了然，而全喻式和双层隐喻式名名复合词由于涉及多次转隐喻操作而体现出语义较为隐晦的特征。文化因素是认知域百科知识的一部分，通过参与转喻和隐喻操作影响和决定名名复合词转隐喻理据的生成和识解，使得不少转隐喻名名复合词带上较为浓厚的文化特征。

本研究表明，理据性广泛地存在和作用于英汉词汇系统，成为塑造词汇系统基本面貌的重要力量之一。语言符号的理据类型、理据程度和词汇系统的多方面特征有直接的联系。理据性影响或决定了词汇系统的组成和规模、词法的类型、外来语吸收的方式和数量以及词化程度和词库规模。理据类型和理据程度差异较大的语言在词汇层面具有较多不同性质和特征，可以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作为**划分语言类型的标准**之一，区别**高理据性语言**与**低理据性语言**，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汉语是高理据性语言的典型代表，对汉语系统理据性和理据因素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掘汉语的特点，建立适应汉语汉字特点的语言理论。同时词汇层面有不少跨越语言界限的理据因素，如合成语言符号的理据规律、语言的经济理据和转隐喻理据，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系统研究，定能更好地反映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

现代语言学创立至今约已一个世纪，在这期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受到了空前重视，而理据研究则被冠以“前科学”或“不科学”之名，排除在主流语言学之外。今天，西方认知语言学的迅速发展使语言“象似性”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理论语言学界的重视；而对汉语特点和传统汉语研究的深入发掘，也使语言理据问题重新回到语言学者的视野内。我们认为，对于汉语这样使用表意文字并通过理据原则构建词汇系统的语言来说，任意性固然是语言符号的重要性质，但理据性的根本地位更不容忽视。对理据性在汉语系统中的作用和理据研究的重视，不仅有理论意义，还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如果能在汉语社团的语言政策、语言教学、信息处理、辞典编纂、语际翻译等语言实践活动中充分考虑汉语作为理据型语言的特色，充分发挥汉语的理据优势，定能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

化带来极大的效益。

本研究为词汇理据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个起点。理据研究的深入开展一方面有赖于理据理论的建设和理据事实的挖掘；另一方面有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例如，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语言研究是理据研究的宝藏，许多闪光的语言理据思想和有价值的语言理据材料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古今中西学术资源的会通和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此外，相关学科的突破也能给理据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如果认知科学对人类转喻和隐喻思维的机制有更精细、更确切的描写和解释，语言中的转隐喻理据现象也必然能得到更好的阐释。这些都将是今后理据研究深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期刊论文

[1] 鲍思陶.《释名》声训的检验标准[J]. 文史哲，2006，(6)：45－54.

[2] 蔡基刚. 英汉词化对比与综合表达法[J]. 山东外语教学，2005，(5)：35－40.

[3] 陈保亚. 20 世纪语言研究中的同质化运动——索绪尔语言观与博爱士方法论的殊途同归[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53－59.

[4] 陈其荣. 科学主义：合理性与局限性及其超越[J]. 山东社会科学，2005，(1)：35－39.

[5] 陈炎. 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16－126.

[6] 冯宪光.《文心雕龙》的符号学问题[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8－63.

[7] 干红梅. 语义透明度对中级汉语阅读中词汇学习的影响[J]. 语言文字应用，2008，(1)：82－90.

[8] 高瑛. 英汉外来词的对比研究[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4)：60－62.

[9] 顾江禾，黄克琴. 德语外来词刍议[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3)：80－84.

[10] 韩芸. “经济原则”发展概述[J]. 中国外语，2007，(6)：53－56.

[11] 贺川生. 音义学：研究音义关系的一门学科[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1)：

22－29.
[12] 胡壮麟. 对语言象似性和任意性之争的反思[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5－102.
[13] 黄洁. 汉英隐转喻名名复合词语义的认知研究[J]. 外语教学，2008，(4)：25－29.
[14] 黄洁. 名名复合词内部语义关系多样性的认知理据[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6)：1－7.
[15] 黄洁. 基于参照点理论的汉语隐喻名名复合词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5)：64－71.
[16] 江澜. 瓦罗：古罗马百科全书式散文家[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6)：70－73.
[17] 姜望琪. Zipf 与省力原则[J]. 同济大学学报，2005，(1)：87－95.
[18] 郎建国，李晋. 英语常用词与四部英语学习词典的词频标注[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1)：61－66.
[19] 雷颐. “黄金十年”[J]. 读书，1997，(9)：97－103.
[20] 黎昌抱. 英汉外来词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2001，(5)：92－96.
[21] 李福印，张炜炜. 挑战 George Lakoff——《隐喻、转喻及体验哲学：挑战认知语义学》介绍[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5)：392－395.
[22] 李洁. 莱奥·魏斯格贝尔的语言理论及其内容相关语法[J]. 国外语言学，1988，(2)：83－86.
[23] 李晋霞，李宇明. 论词义的透明度[J]. 语言研究，2008，(3)：60－65.
[24] 李如龙. 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2)：108－116.
[25] 李如龙. 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及相关的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4)：9－17.
[26] 李晓燕，李光群. 英汉象形文字的应用与翻译[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2)：67－69.
[27] 李瑛，文旭. 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J]. 外语教学，2006，(3)：1－5.
[28] 李兆忠. 汉字的圈套[J]. 东方艺术，1998，(1)：30－33.
[29] 李泽厚，刘再复. 存在的“最后家园”——对谈录[J]. 读书，2009，(11)：25－28.
[30] 李志强. 谈《克拉底鲁篇》的语言自然论与约定论[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15－119.
[31] 梁光华. 试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形成原因[J]. 贵州文史丛刊，1995，(5)：50－55.
[32] 林书武. 国外隐喻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1)：11－19.

[33] 林正军，杨忠．一词多义现象的历时和认知解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5)：362－367.
[34] 刘茁．词化程度的英汉对比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113－117.
[35] 刘兴均．试论《释名》中的流俗词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59－64.
[36] 刘艳茹．索绪尔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J]．外语学刊，2007，(4)：17－21.
[37] 刘中富．《释名》性质新论[J]．东方论坛，2009，(1)：52－57.
[38] 卢偍．现代汉语音节的数量与构成分布[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6)：28－34.
[39] 陆丙甫，郭中．语言符号理据性面面观[J]．外国语，2005，(6)：32－39.
[40] 陆俭明．隐喻、转喻散议[J]．外国语，2009，(1)：44－50.
[41] 罗思明，徐海，王文斌．当代词汇化研究综合考察[J]．现代外语，2007，(4)：415－423.
[42] 马丁内．语言学中的功能和结构[J]．马新民译，法国研究，1984，(2)：45－50、52.
[43] 潘文国．字与 word 的对应性(上)[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1，(3)：42－51、74.
[44] 潘文国．字与 word 的对应性(下)[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1，(4)：26－29、40.
[45] 潘文国．语言的定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97－108.
[46] 潘文国．汉字是汉语之魂——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再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75－93.
[47] 潘玉坤．《史籀篇》年代考[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2)：82－85.
[48] 彭彧．论魏斯格贝尔的母语研究[J]．德国研究，2009，(3)：73－77.
[49] 皮鸿鸣．汉语词汇双音化演变的性质和意义[J]．古汉语研究，1992，(1)：56－59.
[50] 齐冲天．一字之形声韵兼备、音义俱全者十例[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4)：128－133.
[51] 秦炯灵，胡常熟．联绵词音节语素化问题说略[J]．汉语学习，1997，(3)：22－24.
[52] 邱冰．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30－33.
[53] 申小龙．语言的人文功能与索绪尔的语言学自律[J]．北方论坛，2005，(1)：8－15.

[54] 石毓智. 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J]. 语言研究，2002，(1)：1－14.
[55] 苏晓军，张爱玲. 概念整合理论的认知力[J]. 外国语，2001，(3)：31－36.
[56] 田松. 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J]. 读书，2010，(7)：57－66.
[57] 汪少华. 合成空间理论对隐喻的解释力[J]. 外国语，2001，(3)：37－43.
[58] 王艾录. 关于词的内部形式[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70－74.
[59] 王芳姿. 英汉外来词比较[J]. 嘉兴学院学报，2001，(4)：107－111.
[60] 王红梅.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近代语言学史中的对立[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4)：103－105.
[61] 王军. 英汉复合名词的非语义特征及其相关认知阐释[J]. 外国语，2008，(2)：33－39.
[62] 王骏. 科学主义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J]. 中国外语，2006，(1)：11－16.
[63] 王力.《同源字典》的性质及其意义[J]. 语文研究，1982，(1)：1－2.
[64] 王宁. 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1997，(1)：153－167.
[65] 王宁. 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1)：30－34.
[66] 王闰吉.《释名》的理据类型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2002，(6)：75－82.
[67] 王文斌，周慈波. 英汉"看"类动词的语义及词化对比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6)：412－419.
[68] 王文斌. 英语词化探析[J]. 中国外语，2005，(5)：64－68.
[69] 王云路. 释"零丁"与"伶俜"——兼谈联绵词的产生方式之一[J]. 古汉语研究，2007，(3)：25－28.
[70] 吴为善. 双音化、语法化和韵律词的再分析[J]. 汉语学习，2003，8－14.
[71] 伍铁平. 论词义、词的客观所指和构词理据[J]. 现代外语，1994，(1)：1－7.
[72] 向明友. 论言语配置的新经济原则[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5)：309－316.
[73] 徐时仪. 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内在原因考探[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2)：69－76.
[74] 徐友渔. 二十世纪哲学中的语言转向[J]. 读书，1996，(12)：100－106.
[75] 徐志民. 马丁内及其语言理论[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3)：62－66.
[76] 杨波，张辉. 隐喻与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分析与应用[J]. 外语研究，2008，(5)：1－8.
[77] 严辰松. 论"字"对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影响[J]. 现代外语，2002，(3)：231－240.
[78] 严辰松. "字"作为基本结构单位的"音、形、义、法"[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

报，2009，(6)：1－7.
[79] 闫顺英.《释名》的语言学价值[J]. 怀化学院学报，2008，(5)：83－85.
[80] 姚小平. 古印度语言文化二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30－35.
[81] 尹文刚. 汉字同音率、同音度及同音字音节个数随同音度增加而递减的规律[J]. 语言科学，2003，(4)：3－6.
[82] 余红卫. 英语词汇意义拓展的隐喻理据[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78－79.
[83] 张海媚. 义素分析在"因声求义"中的合理运用[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1)：116－118.
[84] 张其昀，谢俊涛. 论音义关系与训诂之因声求义[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67－72.
[85] 张如清. 读黄承吉"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有感[J]. 中医药文化，2007，(4)：30－31.
[86] 张世英.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J]. 哲学研究，1991，(1)：68－72.
[87] 张彦梅. 英语复合词浅析[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21－124.
[88] 张永言. 关于词的"内部形式"[J]. 语言研究，1981，(1)：9－14、82.
[89] 赵爱武. 从外来语引进之三大高峰看其特征[J]. 语言与翻译(汉文)，2005，(1)：45－49.
[90] 赵宏. 英汉外来语吸收机制和动因对比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21－26、76.
[91] 赵宏. 英汉词汇系统理据性对比[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华文教学与研究)，2009，(4)：68－79.
[92] 赵雄，魏家海，吴新华. 汉英词的互借及同化[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31－33.
[93] 赵艳芳. 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3)：67－72.
[94] 周荐. 连绵词问题零拾[J]. 语文建设，2001，(2)：34－35.
[95] 周婧娟. 德国历史上反对外来词的斗争及外来词的德语化进程[J]. 德语学习，2007，(1)：31－33.
[96] 周绍珩. 马丁内的语言功能观和语言经济原则[J]. 国外语言学，1980，(4)：4－12.
[97] 周先武，王文斌. 英语名名复合词中独立框架与复合框架关系研究[J]. 中国外语，2010，(3)：36－41.
[98] 朱一凡. 音译字字化的机制和动因[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3)：6－10.
[99] 朱永生，蒋勇. 空间映射论与常规含义的推导[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

(1)：26－33.
[100] 庄和诚. 英语中的语音象征[J]. 外国语，1999，(2)：56－60.
[101] 邹玉华. 论词的内部形式与社会文化[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5)：24－29.
[102] Haiman，John. 1980.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 [J]. *Language 56* (3)：515－540.
[103] Haiman，John. 1983. Iconicity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J]. *Language 59*：781－819.
[104] Hiraga，Masako K. 1994. Diagrams and metaphors：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 [J]. *Journal of Pragmatic 22*：5－21.
[105] Jakobson，Roman. 1965.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J]. *Diogenes* (51)：21－37.

2. 论文集析出论文及其他论文

[106] 白人立，国庆祝. 译者前言[A]. 2000. 奥格登，理查兹. 意义之意义——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及记号使用理论科学的研究 [M]. 白人立，国庆祝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8－9.
[107] 陈宝国，彭聃龄. 汉字识别中形音义激活时间进程的研究(I)[A]. 彭聃龄主编. 汉语认知研究[C](原文载于《心理学报》2001 年第 1 期：1－6)，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06，pp.61－69.
[108] 陈澧. 小学[A]. 杨志刚编校. 东塾读书记(外一种)[M].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清/1998，pp.218－231.
[109]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来书[A]. 葛信益、启功整理.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86，p.183.
[110] 程瑶田. 蜾蠃转语记[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清/2009，pp.398－406.
[111] 邓析. 邓析子校诠·无厚篇第一[A]. 王启湘校. 周秦名家三子校诠[M]. 北京：古籍出版社，春秋/1957.
[112] 杜文礼. 语言的象似性探微[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2009，pp.161－170.
[113] 段玉裁. 段玉裁序[A]. 王念孙. 广雅疏证[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795/1984，p.2.

[114] 段玉裁. 说文解字叙注[A]. 说文解字注[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795/1984，pp. 753－765.

[115] 高名凯. 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与外来词[A]. 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990，pp. 522－533.

[116] 公孙龙. 公孙龙子校诠·名实论第六[A]. 王启湘校. 周秦名家三子校诠[M]. 北京：古籍出版社，战国/1957.

[117] 公孙龙. 论释第三·名实论第五[A]. 谭戒甫. 公孙龙子形名发微[M]. 北京：中华书局，战国/1963.

[118] 顾海峰. 国内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学术争鸣述评[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2009，pp. 133－142.

[119] 哈丁. 边缘认识论[A]. 性别与科学读本[C].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pp. 85－103.

[120] 黄承吉. 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A]. 黄生撰. 字诂义府合按[M]. 北京：中华书局，清/1984，pp. 75－83.

[121] 黄侃. 字义起于字音说[A].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pp. 206－210.

[122] 黄侃. 右文说之推阐[A].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pp. 210－215.

[123] 黄侃. 音韵与文字训诂之关系[A].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pp. 34－47.

[124] 季国清. 语言的本质在“遥远的目光”中澄明——语言哲学的新视野[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1998 第 3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2009，pp. 53－63.

[125] 李葆嘉. 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三论[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pp. 19－52.

[126] 李冬. 汉英词语理据比较[A]. 李瑞华主编.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 （原载《外国语》1988 年第 6 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1996，pp. 123－130.

[127] 刘师培. 字义起于字音说[A]. 清儒得失论[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p. 147－151.

[128] 刘熙. 释名序[A]. 毕沅(清)疏证，王先谦(清)补. 释名疏证补[M]. 北京：中华书局，东汉/2008，p. 1.

[129] 刘勰. 原道第一[A].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梁/1986.

[130] 刘又辛. “右文说”说[A]. 文字训诂论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82/1993，pp. 62－89.

[131] 刘又辛. 论假借[A]. 文字训诂论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3，pp.37－61.
[132] 吕必松. 汉语教学为什么要从汉字入手？[A]. 潘文国主编.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8[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pp.31－41.
[13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A]. 吕叔湘文集·第二卷[C]（原载于《中国语文》1963 年第 1 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990，pp.415－444.
[134] 吕叔湘.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A]. 杨自俭、李瑞华主编.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77/1990，pp.21－33.
[135] 吕叔湘. 字、词、句[A]. 吕叔湘文集第五卷·语文常谈[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04，pp.36－45.
[136] 吕叔湘. 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A]. 吕叔湘文集·第四卷[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04，p.126.
[137] 墨翟. 经上[A]. 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 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春秋/2000.
[138] 墨翟. 经说上[A]. 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 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春秋/2000.
[139] 墨翟. 经说下[A]. 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 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春秋/2000.
[140] 墨翟. 小取[A]. 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 孙波注，北京：华夏出版社，春秋/2000.
[141] 宁春岩. 导读[A]. Jamal Ouhalla. 转换生成语法导论：从原则参数到最简方案(第二版)[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pp.F23－F33.
[142] 潘文国. 外来语新论[A]. 中国语言学·第一辑[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pp.61－78.
[143] 彭聃龄，徐世勇，丁国盛，李恩忠，刘颖. 汉语单字词音、义加工的脑激活模式[A]. 彭聃龄主编. 汉语认知研究[C]. (原载于《中国神经科学杂志》2003 年第 5 期：287－291)，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06，pp.150－157.
[144] 齐冲天，齐小乎. 自序[A]. 汉语音义字典[Z]. 北京：中华书局，2010，p.3.
[145] 钱玄同.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A]. 张宝明、王中江主编. 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C].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18/1998，pp.461－464.
[146] 秦洪武. 语言结构的顺序象似性[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外语研究》2001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2009，pp.280－287.
[147]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2009，pp.201－212.

[148] 沈兼士.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A].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33/1986，pp. 73－185.

[149] 束定芳. 导读[A]. Croft & Cruse. 认知语言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p. 1－28.

[150] 汪榕培. 英语中的汉语借词[A]. 英语词汇学研究[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pp. 79－89.

[151] 王艾录.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pp. 103－123.

[152] 王春茂，彭聃龄. 合成词加工中的词频、词素频率及语义透明度[A]. 彭聃龄主编. 汉语认知研究[C]. (原载于《心理学报》1999 年第 3 期：266－273)，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006，pp. 269－277.

[153] 王寅. 标记象似性[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1998 年第 3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2009，pp. 222－233.

[154] 王寅. Iconicity 的译名与定义[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中国翻译》1999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2009，pp. 77－83.

[155] 王寅. 象似性：取得问题特征的重要手段[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2009，pp. 234－246.

[156] 王寅，李弘. 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2009，pp. 84－94.

[157] 王宗炎. 评陈原(社会语言学)[A]. 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C]. (原载于《读书》1984 年第 12 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997，pp. 111－121.

[158] 文旭. 论语言符号的距离象似性[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外语学刊》2000 年第 2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2009，pp. 247－255.

[159] 文旭. 词序的象似性探讨[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外语学刊》2001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2009，pp. 256－270.

[160] 沃尔夫. 习惯性思维、行为与语言的关系[A]. 申小龙译.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39/2001，pp. 119－148.

[161] 沃尔夫. 科学与语言学[A]. 王志欣译.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40/2001，pp. 205－218.

[162] 许国璋.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 第 3 期)，长

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009，pp.1－18.
[163] 许慎. 说文解字叙[A]. 宋易麟注. 说文解字今注[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约100/2004，pp.1－8.
[164] 荀子. 荀子·正名(节录)[A]. 洪诚编. 洪成文集[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pp.33－46. 曾收入洪诚编. 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C]. (1982)，战国/2000.
[165] 严辰松. 语言象似性概说[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3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2009，pp.213－221.
[166] 严辰松. 语言理据研究[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2009，pp.64－76.
[167] 延俊荣. 汉语语音与语言意义象似性例举[J].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原载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2009，pp.171－187.
[168] 杨树达. 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A].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34/2007，pp.60－80.
[169] 杨树达. 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A].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35/2007，pp.80－112.
[170] 杨树达. 造字时有通假证[A]. 积微居小学述林[C]. 北京：中华书局，1943/1983，pp.97－109.
[171] 杨树达. 字义同缘于语源同续证[A]. 积微居小学述林[C]. 北京：中华书局，1950/1983，pp.171－181.
[172] 殷寄明. 声符义概说[A]. 汉语同源字词丛考[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pp.1－30.
[173] 殷寄明. 后记[A]. 汉语同源字词丛考[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pp.573－574.
[174] 尹文. 尹文子校诠·卷上[A]. 王启湘校. 周秦名家三子校诠[M]. 北京：古籍出版社，战国/1957.
[175] 詹鄞鑫. 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A]. 中国文字研究·第四辑[C].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176] 詹鄞鑫. 联绵词与单字词音近义同现象的思考[A]. 华夏考——詹鄞鑫文字训诂论集[C]. (原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pp.150－156)，北京：中华书局，2005/2006，pp.69－78.
[177] 章太炎.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A].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08/1996，pp.594－609.
[178] 章太炎. 语言缘起说[A]. 国故论衡[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10/

2003，pp. 31－35.

[179] 章太炎. 原名[A]. 国故论衡[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10/2003，pp. 117－124.

[180] 张辉. 导读[A]. Fauconnier 著心理空间——自然语言意义建构面面观[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pp. D11－28.

[181] 张永言. 论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兼及汉语和台语的关系[A].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C]. 原载汉语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 22 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4/1999，pp. 177－216.

[182] 张喆. 我国的语言符号象似性研究[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外语学刊》2007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2009，pp. 144－158.

[183] 赵彦春. 符号象似性与任意性问题的辨析[A]. 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1 年第 4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2009，pp. 95－102.

[184] 赵元任. 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A]. 潘文国主编. 共性·个性·视角——英汉对比的理论与方法研究[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75/2008，pp. 60－75.

[185] 朱长河. 语言的象似性问题：外界的质疑与自身的应答[A]. 见王寅主编.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原载于《山东外语教学》2005 年第 1 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009，pp. 124－132.

[186] 庄周. 内篇·逍遥游第一[A]. 庄子[M]. 孙雍长注译，广州：花城出版社，春秋/2000.

[187] Anderson, Stephen R. 1985. Typological distinctions in word formation [A].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56.

[188] Barcelona, Antonio. 2000. On the plausibility of claiming a metonymic motivation for conceptual metaphor [A].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 Moulton de Gruyter. pp. 31－58.

[189] Brdar-Szabó, Rita & Mario Brdar. 2004. Predicative adjectives and grammatical-relational polysemy: The role of metonymic processes in motivating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321－355.

[190] Fauconnier, Gills. 1999. 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 [A]. In Janssen & Redek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1] Fillmore, C. J. 1975.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 [R]. In Gogen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C].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123 - 131.
[192] Geeraerts, D. 2002.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osite Expressions [A]. In Dirven & Pörings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 Moulton de Gruyter. pp. 434 - 465.
[193] Grice, H. P. 1978. Further notes on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P. Cole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Pragmatics* [C]. New York: Acdemic Press. pp. 113 - 128.
[194] Heine, Bernd. 2004. On genetic motivation in grammar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03 - 120.
[195] Horn, L. R. 1984. Toward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 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 [A]. In D. Schiffrin (ed.) *Meaning, Form and Use in Context: Linguistic Applications* [C]. pp. 11 - 42.
[196] Neef, Martin & Heinz Vater. 2006. Concepts of the lexicon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 In Dieter Wunderlich (ed.) *Advances in the Theory of the Lexic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27 - 55.
[197] Radden, Günter. 2000.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A].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 Moulton de Gruyter. pp. 93 - 108.
[198] Radden, Günter & Panther, Klaus-Uwe. 2004.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on motivation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 - 46.
[199] Simone, Raffaele. 1994. Forward: Under the Sign of Cratylus [A]. In Raffaele Simone (ed.) *Iconicity in Languag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vii-xi.
[200] Taylor, John R. 2004. The Ecology of Constructions [A]. In Radden & Panther (ed.)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49 - 73.

3. 专著

[201] 奥格登、理查兹. 意义之意义——关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及记号使用理论科

学的研究(第十版)[M]. 白人立，国庆祝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23/2000.
[202]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现代汉语(重排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004.
[203]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04] 柏拉图. 克拉底鲁篇[M].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C].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古希腊/2003.
[205]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M]. 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1980.
[206] 蔡基刚.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07] 蔡勇飞，王之光. 汉英文字比较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08] 曹念明. 文字哲学[M]. 成都：巴蜀书社，2006.
[209] 岑麟祥. 语言学史概要[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57/2008.
[210] 陈澧. 东塾读书记(外一种)[M]. 杨志刚编校.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清/1998.
[211] 陈光磊. 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12] 陈家旭. 英汉隐喻认知对比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213]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14] 陈梦家. 中国文字学[M]. 北京：中华书局，1939/2006.
[215] 崔豹. 古今注[M]. 北京：中华书局，晋/1985.
[216] 崔清田. 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7] 戴侗. 六书故[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宋/2006.
[218] 戴昭铭. 文化语言学导论[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219] 德里达，雅克. 论文字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67/2005.
[220] 董秀芳.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221] 董秀芳.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22]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815/2006.
[223] 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24] 冯晓虎. 隐喻——思维的基础，篇章的框架[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225] 冯志伟. 现代语言学流派[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226] 符淮青. 现代汉语词汇(增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004.
[227] 高名凯. 语言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995.
[228] 高名凯，石安石. 语言学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63/1987.

[229] 葛本仪. 汉语词汇学[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230]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7.
[231] Goldberg. 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 吴海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007.
[232] 桂诗春. 新编心理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33] 郭鸿. 现代西方符号学纲要[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34]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5/2003.
[235] 韩非. 韩非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战国/1989.
[236] 韩婴. 韩诗外传集释[M]. 许维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汉/1980.
[237] 郝士宏. 古汉字同源分化研究[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238] 何九盈，蒋绍愚. 古汉语词汇讲话[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239] 何南林. 横行的英文[M]. 济南：齐鲁书社，2006.
[240] 赫尔德. 论语言的起源[M]. 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772/1998.
[241]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钱敏汝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836/2006.
[242] 黄生. 字诂义府合按[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243] 霍凯特. 现代语言学教程[M]. 索振羽，叶蜚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8/1986.
[244] 孔子·论语[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春秋/1998.
[245] 伦道夫·夸克，西德尼·戈林鲍姆，杰弗里·利奇，简·斯瓦特威克. 英语语法大全 [M]. 苏州大学《英语语法大全》翻译组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98.
[246] 况周颐. 蕙风词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24/2009.
[247] 莱布尼茨. 人类理智新论[M]. 陈修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765/1982.
[248] 劳斯. 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49] 老聃. 老子道德经[M]. (三国魏)王弼注，据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春秋/1986.
[250] 李葆嘉. 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51] 李梵. 汉字简史[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
[252] 李赋宁. 英语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53] 李敏生. 汉字哲学初探(第二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54] 李敏生，李涛.《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255] 李平武. 英语词缀与英语派生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56] 李思维，王昌茂. 汉字形音学[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0.
[257] 利科. 哲学主要趋向[M]. 李幼蒸，徐奕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88.
[258] 梁守锵. 法语词汇学教程[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259] 梁晓虹. 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260] 刘安. 淮南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汉代/1989.
[261] 刘文典. 庄子补正[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262] 刘熙. 释名[M]. 见毕沅(清)疏证，王先谦(清)补《释名疏证补》[M]. 北京：中华书局，东汉/2008.
[263] 刘勰. 文心雕龙[M]. 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梁/1986.
[264] 刘易斯. 约定论：一份哲学上的考量[M]. 吕捷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9/2009.
[265] 卢梭.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M]. 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775/2003.
[266] 鲁川，王玉菊. 汉字信息语法学[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267] 陆国强. 现代英语词汇学(新版)[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68] 罗宾斯. 简明语言学史[M]. 许德宝，冯建明，胡明亮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7/1997.
[269] 罗素. 中国问题[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22/1996.
[270] 吕必松，赵淑华，林英贝. 组合汉语知识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
[271] 吕不韦. 吕氏春秋[M]. (汉)高绣注，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战国/1986.
[272]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第一卷·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1990.
[273] 马西尼.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 黄河清译，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审定.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1997.
[274] 孟华. 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75] 孟华. 文字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276] 摩奴法典[M]. 迭朗善法译，马香雪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77] 墨翟. 墨子(华夏文库全文注释本)[M]. 孙波注. 北京：华夏出版社，春秋/2000.

[278] 潘文国. 汉语的构词法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004.
[279]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2002.
[280] 潘文国. 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81] 潘文国. 危机下的中文[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282] 潘文国，谭慧敏.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283] 潘允中. 汉语词汇史概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84] 彭玉兰. 语言学简史[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285] 乔姆斯基. 句法结构[M]. 邢公畹，庞秉钧，黄长著，林书武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1979.
[286] 秦秀白. 英语简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287] 任继昉. 汉语语源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288]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M]. 陆卓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1/1985.
[289]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自然与科学技术哲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290] 邵志洪. 英汉语研究与对比[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
[291] 申小龙. 汉字人文精神论[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292] 沈括. 梦溪笔谈[M]. 北京：团结出版社，北宋/1996.
[293] 史存直. 汉语词汇史纲要[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94] 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2004.
[295] 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96]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97] 宋易麟. 说文解字今注[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298] 孙常叙. 汉语词汇[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299] 孙东川，林福永. 系统工程引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00]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6/1980.
[301] 谭戒甫. 公孙龙子形名发微[M]. (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63.
[302] 汤姆逊.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M]. 黄振华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02/2009.
[303] 唐兰. 中国文字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49/2005.
[304] 万红. 当代汉语的社会语言学观照——外来词进入汉语的第三次高潮和港台词语的北上[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305] 汪榕培，卢晓娟. 英语词汇学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06] 汪寿明，潘文国. 汉语音韵学引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07] 汪学文.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变与结局[M].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

研究中心，1983.
[308]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 希腊哲学史(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9] 王艾录. 复合词内部形式探索——汉语语词游戏规则[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
[310] 王艾录，司富珍. 汉语的语词理据[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11] 王艾录，司富珍. 语言理据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12] 王观国. 学林[M]. 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宋/1988.
[313] 王理嘉，陆俭明，符淮青，马真，苏培成. 现代汉语(重排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004.
[314] 王力. 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国语法理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44/1984.
[315] 王力. 汉语史稿(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57/1980.
[316] 王力. 汉语史稿(第二版重排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57、1958/2004.
[317]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2006.
[318] 王念孙. 广雅疏证[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795/1984.
[319] 王启湘. 周秦名家三子校诠[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320] 王文斌. 英语词汇语义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21] 王文斌. 英语词法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322]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323] 王寅. 中西语义理论对比研究初探——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思考[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24] 王远新. 古代语言学简史[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325] 维特根斯坦. 名理论(逻辑哲学论)[M]. 张申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22/1988.
[326]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2001.
[327] 温格瑞尔，施密特. 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M]. 彭利贞，许国萍，赵微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009.
[328] 吴长安. 文化的透视——汉字论衡[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329] 熊文华. 汉英应用对比概论[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330] 徐通锵.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31] 徐通锵. 基础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32] 徐通锵.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汉语研究[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333] 徐通锵. 语言学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34] 徐通锵.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335] 徐朝华. 尔雅今注[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36] 徐智儿. 德语词汇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37] 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338] 荀况. 荀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战国/1989.
[339] 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 解释篇[M]. 方书春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古希腊/1957.
[340]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逻辑论文集·工具论[M]. 李匡武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古希腊/1984.
[341] 亚里士多德. 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M]. 颜一，崔延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古希腊/2003.
[342] 雅斯贝斯. 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49/1989.
[343] 颜之推.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颜氏家训[M]. 北京：燕山出版社，南北朝/1995.
[344] 杨琳. 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45] 杨锡彭. 汉语外来词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46] 杨振淇. 京剧音韵知识[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347] 杨自俭. 字本位理论与应用研究[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348] 姚小平.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349] 叶秀山. 美的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50] 殷寄明. 汉语语源义初探[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351] 殷寄明. 语源学概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352] 殷寄明. 汉语同源字词丛考[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353] 曾昭聪. 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M]. 合肥：黄山书社，2002.
[354] 张辉，卢卫中. 认知转喻[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355] 张绍杰. 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56] 张世南. 游宦纪闻[M]. 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宋代/1981.
[357] 张志公. 现代汉语(试用本)中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358] 章士钊. 中等国文典[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359]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唐代/1964.
[360]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61] 赵元任. 语言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62] 周上之. 汉语离合词研究——汉语语素、词、短语的特殊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63] 周信炎. 训诂学史话[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364] 周有光. 汉字改革概论(第三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1979.

[365] 周有光. 语文闲谈(上册)[M]. 北京：三联书店，1995.
[366] 周有光. 世界文字发展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67] 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二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68] 朱前鸿. 先秦名家四子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69] 庄周. 庄子[M]. 孙雍长注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春秋/2000.
[370] Aitchison, Jean. 1996/2002. *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71] Bauer, Laurie. 1983.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2]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M]. New York: Holt, Reinhart and Winston.
[373] Briton, Laure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74] Chomsky, Noam.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The MIT Press.
[375] Chomsky, Noam. 1966. *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 [M]. New York: Harper & Row.
[376] Croft, William & D. Alan Cruse. 2004/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77] De Cuypere, Ludovic. 2008. *Limiting the Iconic: From the meta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the creative possibiliti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78] Fauconnier, Gills.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379] Haiman, John. 1985/2009.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M]. Beijing: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380] Halliday, M. A. K. 1994/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81] Harris, Roy. 2000. *Rethinking Writing* [M]. London: Athlone.
[382] Harris, Roy. 2009. *Rethinking Saussure* [M]. London: Continuum.
[383] Heine, Bernd. 1997.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84] Hogg, Richard & David Denison. 2006.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85] Hoosain, Rumjahn. 1991. *Psycholinguisic Implications for Linguistic*

Relativit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M].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386]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2001. *Grammaticaliz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87] Jespersen, Otto. 1922.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388] Katamba, Francis. 1994/2005. *English Words: Structure, History, Usage (Second E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389]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90]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91] Lakoff, Goerge & Mark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92] Lakoff, Goerge.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y George Lakoff*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93] Langacker, Ronald W. 1987/2004.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94] Langacker, Ronald W. 1991/2002.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nd Edi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95] Langacker, Ronald W. 2000.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396] Langacker, Ronald W. 2007,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by Ronald Langacke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397]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398] Martinet, Andre. 1962. *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99] Ouhalla, Jamal. 1999/2001. *Introducing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From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o Minimalism (2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00] Packard, Jerome L. 2000/2001.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401]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83/2001.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Translated by Roy Harri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02] Sperber, Dan & Deirdre Wilson. 1986/2001.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03] Stockwell, Robert & Donka Minkova. 2001. *English Words: History and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4] Taylor, John R. 1989/2001.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05]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406] Zipf, George Kingsley. 1936. *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Philology* [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407] Zipf, George Kingsley.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 [M].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4. 论文集

[408] 高名凯. 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09] 洪诚. 洪成文集[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410] 黄侃.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11]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C]. 北京：中华书局，1993.

[412] 李瑞华.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413] 刘师培. 清儒得失论[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14] 刘又辛. 文字训诂论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93.

[415]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16] 潘文国. 共性·个性·视角——英汉对比的理论与方法研究[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417] 潘文国.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8[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418] 彭聃龄. 汉语认知研究[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19] 皮尔斯. 皮尔斯文选[C]. 涂纪亮，周兆平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55/2006.

[420] 沈兼士.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 葛信益、启功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1986.
[421] 汪榕培. 英语词汇学研究[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22] 王力. 王力文集[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423] 王寅. 中国语言象似性研究论文精选[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424] 王宗炎. 汉英语文研究纵横谈[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25] 沃尔夫.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426]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述林[C]. 北京：中华书局，1983.
[427]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28] 杨自俭，李瑞华. 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429] 詹鄞鑫. 华夏考——詹鄞鑫文字训诂论集[C]. 北京：中华书局，2006.
[430] 张宝明，王中江. 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C].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
[431] 章梅芳，刘兵. 性别与科学读本[C].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432] 章太炎. 国故论衡[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10/2003.
[433] 章太炎. 检论[C]. 章太炎全集(第三卷)[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34] 张永言.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435] Barcelona, Antonio (ed). 2000.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 Moulton de Gruyter.
[436] Cuyckens, Hubert; Thomas Berg; Rene Dirven; Klaus-Uwe Panther (eds). 2003. *Motivation in Language: Studies in Honor of Günter Radde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37] Dirven & Pörings (ed.) 2002.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Berlin: Moulton de Gruyter.
[438] Fischer, Olga & Max Nänny (eds). 2001. *The Motivated Sign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39] Gogen (ed.) 1975.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C].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440] Haiman, John (ed).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41] Janssen & Redeker (eds). 1999.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442] Maeder, Costantino; Olga Fischer & William J. Herlofsky (eds). 2005. *Outside-In — Inside-Out: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43] Müller, Wolfgang G. & Olga Fischer (eds). 2003. *From Sign to Sig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44] Nänny, Max & Olga Fischer (eds). 1999. *Form Miming Mea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45] Radden, Günter & Panther, Klaus-Uwe (eds). 2004.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446] Shopen, Timothy (ed). 1985.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7] Simone, Raffaele (ed). 1994. *Iconicity in Languag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48] Tabakowska, Elzbieta; Christina Ljungberg; Olga Fischer (eds). 2007. *Insisting Images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49] Willems, Klaas; Ludovic De Cuypere (eds). 2008. *Naturalness and Iconicity in Language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7*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450] Wunderlich, Dieter (ed). 2006. *Advances in the Theory of the Lexic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5. 工具书

[451]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

[452] 华泉坤等. 英语典故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53] 刘钧杰. 同源字典补[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54] 刘钧杰. 同源字典再补[Z].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455] 刘伶，王今铮. 简明语言学词典[Z].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456] 刘正埮，高明凯，麦永乾，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词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457] 陆谷孙. 英汉大词典(第2版)[Z].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2007.

[458] 曩洪汉，李长庚. 英语构词法字典[Z].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

[459] 齐冲天，齐小乎. 汉语音义字典(上下)[Z]. 北京：中华书局，2010.
[460] 王艾录. 汉语理据词典[Z].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2006.
[461] 王力. 同源字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983.
[463] Bussmann, Hadumod. 1996/2000.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64] Crystal, David. 1992.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65] Mathews, P. H. 1997/2000.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6. 学位论文

[466] 钟吉娅. 汉语外源词——基于语料的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7. 网络资源

[467] 孟飞，2005，《右文考》，信息来源：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mengfei_ywk.htm，登陆日期：2009-10-03.
[468] 王彬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引自 http://www.zhaojun.com/youci/riyu.htm，登陆日期：2009-2-21.
[469] 余秋雨，《中华文明的过去和今天——余秋雨教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节选)》[Z]. http://www.bmhzx.net/jiaosjx/ShowArticle.asp?ArticleID=357，登陆日期：2010-7-27.
[470]《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http://www.kzxy.com.cn/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20714，登陆日期：2010-7-27.
[471] 象似性研究项目网站，http://es-dev.uzh.ch:16080/en/iconicity/index.php?subaction=showfull&id=1197027781&archive=&start_from=&ucat=2&，登录日期2009-11-06.

[472] http://foreignedu.hdu.edu.cn/html/4-02.htm，登陆日期 2009-09-03.
[47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88%A5%E5%A1%94，登陆日期 2009-09-02.
[474] http://baike.baidu.com/view/66715.htm，登陆日期 2009-09-13.
[47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B%84%E4%BF%84%E5%B0%BC%E7%B4%A2%E6%96%AF%C2%B7%E7%89%B9%E6%8B%89%E5%85%8B%E6%96%AF，登陆日期 2009-09-18.
[476] http://lijiang.abang.com/od/yxlj/a/dongbawen_p1.htm，登陆日期 2010-2-4.
[477] http://www.djhuiyi.com/hyxts/200811/529.html，登陆日期 2010-2-4.
[478] http://odict.net/air/，登录日期 2011-1-30.

外教社
博学文库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最新研究成果

学术理论新颖

研究领域广宽

材料客观翔实

论述周密严谨

文字简洁流畅

本书将语言理据定义为语言形式及其演变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联系，分别从英语和汉语共时词汇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对比研究了两种语言在理据类型和理据程度上的异同。本书指出，理据是塑造词汇系统基本面貌的重要力量之一；英语共时词汇系统的根本属性是任意性，汉语词汇则是一个理据性占主导地位的系统；英汉词汇有不少共同的理据机制，但理据类型和程度的不同也是导致英汉词汇系统诸多差异的根源之一。

外教社博学文库

⊙ 策划编辑　梁晓莉　⊙ 项目负责　梁晓莉
⊙ 责任编辑　李健儿　⊙ 封面设计　彬　彬

外教社学术专著

ISBN 978-7-5446-3384-0
9 787544 633840 >
定价：35.00 元